



新疆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200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20003

# 维吾尔族 文化 简史

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 马德元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 鸣

特邀编辑:塔伊尔江·穆罕默德

美术编辑:王 洋

责任校对:晁 清

维吾尔族文化简史

# 维吾尔族 文化 简史

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 马德元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 《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中耀  
副  主  编  努尔夏提·朱马西  许尔才  
编委会成员  阿尔斯兰  高静文  孟  楠  
              潘志平  宋  岭  
主办单位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 课  题  组  名  单



负  责  人  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  
成    员  马德元  
          胡  毅  
          热扎克·买提尼亚孜  
          艾尼瓦尔·赛买提  
          海热提江·乌斯曼  
          优努斯江·艾力

## 总 序

中国西北包括五个省区,而中国西北边疆,从地理上讲主要指新疆,甘肃北部、中蒙边疆地区也属于西北边疆范围。中国西北边疆位于欧亚大陆中部,与八个国家接壤,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和桥头堡,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在我国的经济政治领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西北边疆是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的前沿。加强西北各民族的团结、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不仅关系到西北边疆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福祉,也关系到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维护西北边疆长治久安,关键是不断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西北边疆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西北边疆经济发展既与东中部地区分不开,更与中西南亚经济圈分不开。21世纪初欧亚石油运输走廊之争说明:中国西北边疆是面对中西南亚的前沿,如何实现区域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地缘政治前移,实现与欧盟经济区的对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关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复兴的核心。

西北边疆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艺术等既是中国文明史、中亚文明史乃至内陆欧亚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边疆民族间以及边疆民族与内地其他民族间所发生的事件,对国家安全、多民族间的团结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了解过去就不能了解今天,也不能把握未来,而研究西北边疆的目的终究是为了解剖现状和预测未来。

近年来,全国科研院所的边疆史地研究者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审慎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开展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使这一边缘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国家安全、民族团结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自2000年11月成立以来,秉持稳疆兴疆、富民固边、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

筑学术高地的宗旨,在西北边疆经济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文化、中亚历史与现状等领域开展学术和现状对策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丛书是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相关机构研究人员的近期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相信,边疆史地研究未有穷期,更优秀的学术专著还在后面,限于我们的能力,很难面面俱到,其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也很难说达到了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立足新疆,服务西北,面向中亚,提升水平,加快发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愿更多的仁人志士了解西北边疆并参与西北边疆的建设!西北边疆将迎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纪元。

张先亮

2009年4月14日

## 序 言

新疆是中国西北之边疆宝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左宗棠曾指出：“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守，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省之边城时虞侵掠，防不胜防，即直北山关，亦将无安眠之日！”可见新疆战略位置之重要。“盖汉弱匈奴，唐灭突厥，必先征定西域，巩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则侵陵与辽金，灭亡与蒙满，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婴南服，终至退无可退”（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汉唐之所以盛强，宋明之所以衰弱，虽非全关于西域之有无，然无土地以为凭借，成就大业或长治久安实属艰难。纵观历史，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和民族问题，消除隐忧潜患。汉、唐、清三朝盛世的出现是与边疆和民族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相伴随。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经历“白登之围”后，深知以当时的国力，无法与匈奴抗衡，只好奉行“和亲”政策；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远征匈奴，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几十年。唐太宗为解除突厥的军事威胁，派兵十余万分路征讨，又征伐吐谷浑，消除边患；之后又对突厥降众实行开明的统治政策，使得其他北方各族首领归心朝廷。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实行民族和衷共济，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宁，使盛世的出现和保持成为可能。当然，历代王朝盛极而衰，也常常与边疆和民族问题不能有效把握有关。数千年来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深思。

今天，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在我国的经济政治领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丰富的资源、众多的民族、多元的文化是我们进行大开发和大建设的宝贵财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加快经济发展、保持西北边疆政治大局稳定和文化繁荣应成为我们共同的宗旨和期盼。“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通古今之变”应成为我们这代学者和管理者

的期许之一。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丛书，肩负着提高学术水平和服务决策实践双重使命，我们期待着其中的成果能为西北边疆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是为序！

王 伟

2008年6月20日



## 前 言

作为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维吾尔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创造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灿烂文化、为维护和巩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维吾尔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之一,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其中 80% 以上居住在天山以南的绿洲。截至 2008 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是 965.06 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 46.06%。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维吾尔文字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他们现在使用的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字。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曾有过图腾崇拜,并且先后信奉过萨满教、拜火教、摩尼教、佛教,还有一部分人曾信仰过基督教,10 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塔里木盆地。

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称西域)位于祖国的西北部,总面积为 166 万多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6,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 8 个国家接壤,边界线长 5700 多千米,占全国陆地边界总长的 1/4。

新疆地理结构特殊,高峻绵延的山脉环绕着盆地,所以它有“三山夹两盆”之称。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斜亘于哈、俄、蒙三国边境地区,平均海拔为 2500—3500 米,边境线全长 2000 多千米。雄伟的天山山脉东西横亘新疆中部,以天山山脊线为界,将新疆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山脊线以北的叫北疆,山脊线以南的叫南疆,其全长 2500 余千米,平均海拔 3500—4500 米,是亚洲最高山系之一。巍峨的昆仑山脉环绕新疆南部。昆仑山脉为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以及阿尔金山的总称。其平均海拔在 5000—6000 米,它最高的山峰——乔戈里峰海拔 8611 米,居世界第二位。

著名的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总面积约 53 万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面积达 33.76 万平方千米。沙漠地下蕴藏有极丰富的石油资源。发源于天山和昆仑山的小河流形成了世界第五大内陆河——塔里木河。这条有着新疆母亲河

之象征的内陆河,全长2300千米,它自西北部向东流去,最后注入罗布泊湖。

准噶尔盆地位于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总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位于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面积4.8万平方千米,是我国仅次于塔克拉玛干的第二大沙漠。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的众多河流汇合形成额尔齐斯河,自东向西北奔流,最后注入北冰洋。发源于天山北麓的伊犁河向西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伊犁河流域土地肥沃,青山绿水,空气凉爽宜人,被誉为“塞外江南”。由于远离海洋,四周被崇山峻岭环绕,新疆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这里太阳光热能充足,降水量少,四季分明,是我国最好的农牧业地区之一。

新疆共有大小河流570多条,其中塔里木河、喀什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库车河、墨玉河、于田河、玉龙喀什河、木扎提河、开都河、孔雀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玛纳斯河、博尔塔拉河等河灌溉着天山南北的绿洲。

新疆是我国重要的农牧区。该地区从古代就开始种植小麦、大麦、水稻、玉米、高粱、黍子、豆类、亚麻、棉花等农作物。天山南坡和北坡辽阔的草原为牧业生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新疆的马、牛、羊、山羊、骆驼、毛驴、牦牛等牲畜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在我国都名列前茅。

新疆是我国著名的林区之一,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天山和阿尔金山,木材储藏量高达1.5亿立方米。

新疆地下矿藏丰富,矿藏中煤、铁、石油、黄金、玉石、钛、铀、镍等储量居全国第一位。

新疆是我国著名的瓜果之乡。新疆的葡萄、香梨、杏子、石榴、桃子、无花果、西瓜、甜瓜、核桃、巴旦木、阿月浑子等瓜果闻名全国。

新疆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和田的地毯、玉器、艾德莱斯绸,喀什的金银首饰、铜器、英吉沙小刀,还有花帽、皮帽和刺绣,建筑装饰自古便闻名世界。

新疆位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枢纽——“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在汉唐时期,甚至更早,我国的许多伟大发明创造沿着这条路传到西方,西方以及沿途各国的发明创造流传到东方,在这一过程中新疆起到了桥梁作用。

这种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新疆这一多民族地区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同时,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我国的稳定和团结。

综上所述,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独具特色。新疆的独特性不在于它“地域的辽阔或民族的众多,而在于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宝库所作出异样的贡献上。”<sup>①</sup>正如历史学家冯家昇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上它有文明地区之称。”<sup>②</sup>

在内容和形式特征方面,维吾尔文化属于多元化文化类型。这与他们的环境

① 刘勖:《新疆的2000年》(维吾尔文),1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② 冯家昇:《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若干问题》,载《新疆日报》(汉文),1957年6月21日。

(生存条件)有关。在公元9世纪以前漫长的时间里,维吾尔族先民在漠北草原(鄂尔浑河流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到了公元9世纪中期鄂尔浑回纥汗国灭亡,维吾尔族先民大批向西迁移,其中主要一部分越过阿尔泰山达到天山南北,与早已定居在西域的兄弟民族汇合。从此,维吾尔族先民由游牧生活逐步转变到以城乡为中心的定居农业生活。

西迁后,维吾尔族先民由封闭、孤立的草原游牧文化逐渐转变为开放的、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城市农业文化。这种多元化绿洲文化的形成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生活环境变化最为重要。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门槛,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原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以佛教文化为主的印度文化,以阿拉伯、波斯文化为主的伊斯兰文化,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主的欧洲文化汇合之处。西迁的维吾尔族先民不但吸收了西域的这种多元文化特征,而且随着生活在该地区的众多民族部落维吾尔化步伐的加快,他们如同熔炉一般使各种文化得到了融合提炼。正如日本学者羽田亨所说:“他们在新转入定居生活的所谓回鹘文化的处女地上播下的所有种子都得到了发育生长。在这些不同文化之间,随着时间之推移,自然产生了融合混成之势。这种融合混成就是回鹘文化的特征。”<sup>①</sup>这种特征表现在维吾尔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表现在新疆千佛洞壁画、雕塑、绘画、建筑、医学、历法编制和文学艺术等领域。虽然这种多元文化与维吾尔人独特的古代传统民族文化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来说,维吾尔文化在一定范围内从古代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种高层次、多元化的崭新的民族文化。

在祖国文化宝库中,维吾尔文化如珍珠般闪耀着异彩,正如历史学家刘志霄所说的那样,“维吾尔民族的历史功绩是庄严宏伟的。”<sup>②</sup>同样,维吾尔文化史的研究是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它涉及众多领域,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仅散见于中外学者的某些历史著作,至今还不曾有系统的关于维吾尔文化史的著作问世。因此,究竟怎样写作维吾尔文化史,我们没有可依循的范例。但是,也正如前人所说的那样,“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某些方面揭示了维吾尔文化发展的脉络。《维吾尔族文化简史》是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在这里,我们从宏观上对维吾尔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精神文化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总结。这一成果的问世也经历着一个不断修订、日渐完善的漫长过程。作为引玉之砖,希望能够引起同行专家学者们对此类课题的关注。

维吾尔族文化史课题组

①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8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②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3页,民族出版社,1985。

# 目 录

总 序 .....	1
序 言 .....	3
前 言 .....	5
第一章 中国北方的维吾尔族先民及其文化 .....	1
第一节 史前概况 .....	2
第二节 匈奴统治时期的丁零 .....	3
第三节 柔然时期的铁勒 .....	5
第四节 突厥汗国时期的回纥 .....	7
第五节 维吾尔族族源的传说 .....	10
第二章 鄂尔浑回纥汗国时期的回纥文化 .....	13
第一节 回纥汗国的产生和政权结构 .....	14
第二节 回纥汗国的经济文化 .....	19
第三节 回纥汗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 .....	24
第四节 回纥汗国的文学及其他 .....	31
第五节 回纥的生活习俗 .....	38
第三章 高昌王国时期的回鹘文化 .....	43
第一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47
第二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经济文化 .....	53
第三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商业和交通运输 .....	60
第四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水利设施 .....	63

第五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文化	64
第六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文学艺术及其他	70

#### 第四章 喀喇汗朝时期的回鹘文化 93

第一节	喀喇汗朝的建立	94
第二节	喀喇汗朝的经济文化	100
第三节	喀喇汗朝的手工业文化	112
第四节	喀喇汗朝的商业贸易与货币文化	115
第五节	喀喇汗朝的服饰与饮食文化	121
第六节	喀喇汗朝的社会文化	130

#### 第五章 西辽时期的回鹘文化 155

第一节	西辽政权的建立	156
第二节	西辽时期回鹘的社会经济状况	157
第三节	西辽时期的回鹘文化	160

#### 第六章 元代的畏兀儿文化 165

第一节	元代的畏兀儿	166
第二节	元代的畏兀儿文化	170
第三节	元代畏兀儿文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175
第四节	元代的畏兀儿历史人物及其贡献	178


#### 第七章 察合台汗国时期及维吾尔族文化 187

第一节	察合台汗国的建立	188
第二节	察合台汗国时期的经济生活	191
第三节	察合台兀鲁斯的伊斯兰化与维吾尔族完全皈依 伊斯兰教	196
第四节	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活	198
第五节	阿拉伯、波斯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	215

#### 第八章 叶尔羌汗国时期及维吾尔族文化 219

第一节	叶尔羌汗国概述	220
第二节	叶尔羌汗国的体制和官制	224
第三节	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经济文化	227

第四节	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社会文化	235
<b>第九章</b>	<b>清代的维吾尔族文化</b>	<b>255</b>
第一节	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	256
第二节	清代维吾尔族的经济文化	258
第三节	清代维吾尔族的社会文化	261
第四节	清代维吾尔族的文学与史学	263
<b>第十章</b>	<b>民国时期的维吾尔族文化</b>	<b>265</b>
第一节	民国时期新疆概况	267
第二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教育事业	273
第三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和出版印刷 事业	285
第四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文学和史学	289
第五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艺术	295
第六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科学技术	303
第七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工商业	309
<b>参考文献</b>		<b>313</b>
<b>后 记</b>		<b>317</b>



第 一 章

中国北方的维吾尔族先民  
及其文化

---

## 第一节 史前概况

学

术界认为,最早见于我国汉文史册的丁零以及后来的高车、铁勒均为不同时期活动在我国北方的古代民族或部族,他们同今日维吾尔族的远祖都有着某种关系。这些民族或部族可考的生活年代最早是两汉。那么,两汉以前的情形如何呢?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现今有关维吾尔族历史的著作在论及维吾尔族的族源时,一般都追溯到两汉时期的丁零为止,很少有往前延伸到秦或秦以前的论断。近年来有学者著书,对早于两汉的维吾尔族先民的情况作了一些推测,认为我国史册中有记载的商周时期的鬼方与丁零有民族源流关系。

魏收的《魏书》、李延寿的《北史》、杜佑的《通典》都把赤狄当做丁零的族源。清代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獫狁考》论证商周鬼方同春秋狄族的关系,认为春秋狄族出自鬼方。

鬼方是商周时期我国西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周易》、《山海经》、《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等史册以及商周甲骨卜辞中都可以找到有关这个民族的记载。例如在有关商代的记载中它被称作鬼方,在有关周代的记载中则作翟。段连勤在其《丁零、高车与铁勒》一书中认为,商代的鬼方即周代的翟,即春秋时代的赤狄,赤狄与鬼方一脉相承。按照这一说法,鬼方就是两汉时的丁零的祖先,是我国史籍中丁零历史的源头。



## 第二节 匈奴统治时期的丁零

匈

奴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其发祥之地就在我国北方的河套阴山。匈奴在我国史籍中早有记载,除了匈奴一说外,还有荤粥、狻猊、獯鬻等不同的名称。学者们认为,这些都是匈奴的同音异译。公元前 209 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匈奴单于。当时中原地区正值楚汉之争、政权更迭、天下未定之际,匈奴得到了快速发展的机会,西击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sup>①</sup>。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其势力范围北面直达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南面到达陕西、山西、河北的北部,东面直抵辽东平原,西面到达天山南北,形成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西汉初期,国力有限,对匈奴的侵扰无力根绝,只能向边境移民,筑城屯田,强化边防,甚至于嫁公主和亲,给予厚赠,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渐强,为谋求两面夹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终于在代郡、定襄、上郡、朔方、河套等地大败匈奴。公元前 60 年以后,匈奴上层发生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后有呼韩邪单于附汉,击走北匈奴,汉朝国内大安。公元前 33 年,汉元帝应呼韩邪单于之请,命王昭君出塞,换来了长达 60 余年的和平局面。东汉以后,匈奴分裂为两部分,原先的南匈奴于公元 48 年内附,原先的北匈奴后来被迫西迁。魏晋南北朝时,匈奴及其后裔又一次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建立了前赵政权、大夏政权、北凉政权,最后以北凉政权的覆灭而之后退出历史舞台。

与匈奴同时的还有丁零部族,学术界认为这个部族和今天的维吾尔族有族源关系。有学者考证,丁零即后来突厥语 *etil* 的省音形式 *til* 的音译,其义为“河”,由此推断丁零为依河而居的一个部族<sup>②</sup>;也有学者认为是蒙古语的前身——匈奴语 *tegre* 的音译,其义为“车”。丁零当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部族,仅仅因为与之相邻的匈奴太强大,常常不得不臣服于匈奴。因此,丁零的历史几乎与匈奴相伴随。《史记·匈奴传》记载:“后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这是汉文史籍中关

① 《史记·匈奴传》。

②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87 页,正中书局印行。

于丁零的最早记载,只是族称写法不同。丁零有时也记作“丁令”。

据《周书·突厥传》记载,丁零起源于古代的赤狄,游牧地在贝加尔湖附近,后来分布的地面十分宽广,但主要看来,可分为东、西两部分。

东部丁零即学术界常说的北丁零。《汉书·匈奴传》载:“其冬,单于(壶衍狄)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郅支单于)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汉书·李广苏建传》:“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零王。”又:“其冬,丁令盗武牛羊。”当时,苏武在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其牧地与丁零相邻。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知道东部丁零的居住地大致在叶尼塞河上游至贝加尔湖以南的这片土地上。

除了东部丁零外,还有所谓西部丁零。《三国志·魏书》卷三〇引《魏略·西戎传》:“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坚昆国在康居东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出好马。丁令国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息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乌孙北,似其别种也。又匈奴北有浑窳国,有屈射国,有丁令国,有隔昆国,有新犁国。明北海之南,自复有丁令,非此乌孙北之丁令也。”据丁谦考证,西丁零居住在鹿浑海(今阿尔泰山区的布伦托海);程溯洛则认为西丁零居住在今中亚撒马尔罕靠近咸海地区的西北方向。他指出:“根据四十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南西伯利亚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从昂古拉河流域到叶尼塞河上游地区都分布有丁零部落,他们是因为殷商及周初的扩展从中国逃亡去的,结果便造成了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高度发展的‘加拉苏克’型文化,表现为南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大统一,在中国编年史上称之为‘丁零’,也是南西伯利亚文化所据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由于苏联学者在南西伯利亚考古发掘的结果,才把中国史籍中所著录的东、西两支丁零统一起来,证明古代丁零原先分布于乌拉尔—阿尔泰山脉广大地区,这就足以打破古代丁零只分布在蒙古草原而不分布在阿尔泰山和新疆北部的偏见。”<sup>①</sup>

① 程溯洛:《维吾尔族居住新疆考》,见《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 第三节 柔然时期的铁勒

**柔**然也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初，他们在兴安岭一带游牧，匈奴西迁以后，柔然利用中原分裂、无暇北顾的机会，乘机向西北方向移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5世纪，柔然的首领社仑统一柔然诸部，自称豆伐可汗，建立了当时在北方称雄一时的柔然汗国政权。这个政权的势力范围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天山以南的焉耆一带，北接贝加尔湖，南抵蒙古沙漠。柔然政权始终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处理与其南邻北魏王朝的关系，二是处理与其内部各部族的关系。由于柔然政权经常侵扰北魏王朝，招致北魏王朝的反击，其实力受到很大的削弱，被迫向蒙古沙漠以北退去。与此同时，由于柔然政权不停地奴役和掠夺被征服的部族，也引起了内部被奴役的各部族的反抗。其中铁勒是较有实力、反抗比较激烈的部族之一。

铁勒与古代的丁零有很密切的关系。公元4—6世纪，汉文史书上有“赤勒”、“敕勒”、“涉勒”、“狄历”等记载，反映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对这个部族的称呼；与此同时，与他们接触过的汉人看到他们有乘坐木制高轮大车旅行或运输货物的习俗，就把他们称作“高车”。“铁勒”一名，与“丁零”同出一源，如前所述，是 etil 一词的省音形式 til 的音译，其义为“河”，因河川而得名。也有人认为源自北方某些民族的语言，其义为“车”。《蒙古秘史》给“车”的标音是“帖列格秃”、“帖列坚”、“帖尔格”、“帖列格”，都是“tegre”一词的转音。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铁勒”从“帖列格”（车）而来<sup>①</sup>。《魏书·高车传》记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北史·高车传》：“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这一表述和《魏书·高车传》中的记载大致相同。由上述引文可知，铁勒就是公元前居于匈奴之北的丁零，高车乃是汉人根据自己看到的风俗实情给铁勒取的名称，而不是铁勒的自称。

<sup>①</sup> 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上册，478页，民族出版社，1990。

铁勒分布很广,部落众多。据《魏书·高车传》记载,其部落有袁纥、斛律、乌洛侯、揭批、护骨、吐卢、狄氏、异奇斤、泣伏利、乙旃、大连、窟贺、达薄干、阿伦、莫允、俟分、副伏罗、乞袁、右叔沛、乌颡等。到了隋朝,其部落更多。据《隋书·铁勒传》记载,铁勒种类很多,自西海向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在独洛河(今土拉河)以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野古、覆罗(又称俟斤)、蒙陈、吐如纥、思结、浑、斛、薛等部落;在伊吾(今哈密)以西焉耆以北有契苾、薄落、职乙啞、苏婆、那葛、乌护、纥骨、也啞、於尼护等;在金山(今阿尔泰山)有薛延陀、啞勒儿、十盘、达契等;在康国以北、沿阿得水(今伏尔加河)有河啞、葛截、拔忽、比千、具海、葛比悉、何嵯、苏拔、也末、渴达等;得崑海(里海)东西两岸有苏路羯、三索咽、篋促、萨忽等;在拂林(罗马)以东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温昏等;在北海以南有都波(都播)等。在柔然的统治下,铁勒曾多次采取反抗柔然的军事行动,每次都遭到失败。公元492年,铁勒诸部十多万帐落在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及其弟穷奇的带领下,由蒙古草原出发西迁,向天山南部的吐鲁番盆地进发,灭了柔然扶植起来的高昌王阚首归,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阿伏至罗自称侯罗匍勒(大天子),其弟穷奇当了侯倍(储王)。他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实力,不久即控制了今哈密以西焉耆以北地区。后来中亚的另一游牧部族哒哒越过帕米尔高原,由南向北发展,在焉耆一带与铁勒的势力发生冲突,结果铁勒战败,穷奇被杀,穷奇的两个儿子被掳,铁勒的一部分退守今吐鲁番,另一部分则越过天山,进入准噶尔盆地。阿伏至罗后来被杀,跋利延被立为首领。柔然乘虚而入,与哒哒一起对铁勒形成两面夹攻之势。铁勒内乱,部众杀跋利延,立穷奇之子弥俄图为首领。弥俄图率众在北庭击败柔然军队,杀了柔然首领伏图,削弱了柔然在天山一带的势力。突厥逐渐兴起后,柔然终于放弃了与铁勒在天山一带的争夺。

## 第四节 突厥汗国时期的回纥

**关**于突厥的由来，汉文史籍中有三种记载：其一，“盖匈奴之别种”<sup>①</sup>；其二，“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sup>②</sup>；其三，其先“平凉杂胡”<sup>③</sup>。说法虽有不同，但都认为突厥以阿史那为姓，以狼为图腾。

按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突厥最初活动于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后南迁至高昌之北山，即贪汗山。此地出铁，突厥即以畜牧和锻铁为生。后来突厥被柔然奴役，成为柔然的“锻奴”，被迫迁往今阿尔泰山南麓。由于阿尔泰山形如兜鍪，而其语言称兜鍪为“突厥”，由此，“突厥”逐渐成为其族称。

关于突厥的语言文字，《周书·突厥传》最先提到，谓“其书自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记载，北齐人刘世清曾将佛经译作“突厥语”，送给突厥可汗。但是，突厥语是什么样子，它的文字是何种形制，以前人们并不知晓。1889年，俄国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在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突厥文《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1893年，丹麦学者汤姆森解读成功，次年发表题为《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解读——初步成果》的报告。从此，突厥语言文字的真实面貌才为世人所知。

据学者们研究，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由38—40个字母组成，其中32个来源于阿拉美文，其余由标示突厥人氏族或部落的记号逐渐演变而成。学者们对这种文字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种种推测。一般认为，它的形成可能与粟特人有关。有证据表明，公元6世纪末，突厥人还在使用粟特语和粟特文作为官方语言文字，前面提到的北齐人刘世清所译之突厥语或许就是粟特语，不过，刘世清译佛经时，使用的文字是不是上述碑铭上所见的突厥文，尚不能妄加推断<sup>④</sup>。突厥文因其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人使用过的runic文相似，所以学术界多将这种文字称作古突厥卢尼文，又因为用这种文字刻成的主要石碑多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因此

① 《周书·突厥传》卷五〇。

② 《周书·突厥传》卷五〇。

③ 《隋书·突厥传》卷八四。

④ 《西域通史》，260—261页。

又被叫做鄂尔浑卢尼文。

回纥原先是铁勒的一部,为九姓铁勒之一。其先民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丁零。如前所述,铁勒诸部中有袁纥部,又有乌纥、乌护、韦纥等名称。公元498年(北魏太和二十二年),魏孝文帝准备大举进攻南朝的齐国时,派使者到铁勒,让他们发兵助攻。铁勒不愿奉命,推举袁纥部首领树者为首,相帅北走。魏文帝遣征北将军宇文福讨之,大败而还。更命平北将军江阳王维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树者亡入柔然,自悔愿意臣服北魏。公元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突厥土门可汗攻破铁勒,迫使其5万余帐落投降。公元599年(隋文帝开皇十九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占领漠北,征服东部铁勒。公元603年(隋文帝仁寿三年),达头可汗部大乱,铁勒等10余部乘机反叛突厥。公元605年(隋文帝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进攻铁勒,“厚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为变,遂集其渠帅数百人尽诛之”<sup>①</sup>。铁勒起兵反抗,大败处罗可汗,公推俟利发俟斤契苾歌楞为漠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也啜为小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又“并铁勒”,契苾、薛延陀二部废除可汗称号,回鹘、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习,在都督军山者,东附始毕可汗,乙失钵在金山者,西役叶护可汗。大业中,韦纥与仆骨、同罗、拔野古、覆罗等部落,脱离突厥汗国,称回纥,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游牧于薛延陀北境,娑陵水(又称仙娥河,即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人口达到10万,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了。

8

回纥部落由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貂歌息讫、阿勿喃、葛萨、斛嗚素、药勿葛、奚耶勿等9个氏族组成,学术界称作“内九族”或“内九姓”,也称作“九姓回纥”。此外还有“外九族”或“外九姓”之说。“外九族”或“外九姓”是这样形成的:唐初,回纥联合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等结成部落联盟;公元632年(贞观六年),契苾部6000余户东迁,首领降唐,部众归附薛延陀。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薛延陀亡,契苾部归附回纥;后来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回纥怀仁可汗又收并拔悉密和葛逻禄两部。由此组成“外九族”或“外九姓”,总称依然是“九姓回纥”,再加上阿跌部,又有“十姓回纥”之说。

回纥“内九族”的核心是药罗葛部,回纥历代首领多出自药罗葛部。例如,隋末被各部推举为君长的时健俟斤就是第一位出自药罗葛部的回纥首领。时健俟斤的儿子菩萨,也是一位十分出众的可汗。据说他有勇有谋,嗜好射猎,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故为部众所畏服。时健死后,各部因菩萨贤明,公推他继任回纥首领(俟斤)。自称可汗的回纥首领胡禄俟利发吐速度以及他的儿子婆闰也出自药罗葛部。

贞观初年,回纥与薛延陀共击突厥,菩萨率五千骑兵在马鬣山大败突厥十万铁

<sup>①</sup> 《旧唐书·回纥传》。

骑,一时声震北方草原<sup>①</sup>。公元630年(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回纥与薛延陀开始称雄漠北。菩萨死后,吐迷度继立,为反抗薛延陀多弥可汗的暴政,他联合仆骨、同罗共击薛延陀。薛延陀大败,多弥可汗带领几千骑兵逃走。胡禄俟利发吐迷度袭杀多弥,占领了薛延陀的地盘。从此,东部铁勒诸部都称作回纥。接着,胡禄俟利发吐迷度派使者入唐,请求归附。唐朝在回纥部设瀚海府,册封俟利发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俟利发吐迷度在接受唐朝册封的同时,在部落内部自称可汗,仿照突厥官制设置官号,正式建立回纥汗国。公元648年,俟利发吐迷度被他的侄子乌纥谋杀。在唐朝官员的主持下,俟利发吐迷度的儿子婆闰袭父职继任瀚海都督。这件事标志着回纥汗国由药罗葛部首领世袭可汗的制度已经确立。婆闰与唐朝修好,多次带兵助唐,建立功勋,尽收西突厥贺鲁所居之地,扩大了回纥的势力范围。公元661年,婆闰死,其子比栗继承汗位。比栗死,其子独解支继承汗位。公元682年,突厥召集残部,再次与回纥开战,抢掠回纥的大量羊马,进攻回纥的驻牧地乌德鞬山。一部分回纥人被迫迁往独洛河流域,另一部分再次遭突厥奴役。为了反抗突厥的残酷压迫,他们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公元715年,独解支死,其子伏帝匍继承汗位。突厥默啜可汗讨九姓拔野古,先大败拔野古,后轻归不为备,被拔野古残众袭斩而“传首京师”。拔野古、回纥、同罗、仆骨等五部归附唐朝,被安置于振武军北。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乘突厥内乱,联合起兵攻杀突厥骨咄禄叶护可汗,推举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酋长骨力裴罗被唐朝封为奉义王。公元744年(天宝三年),回纥联络葛逻禄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重建回纥汗国。唐朝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原九姓回纥合并葛逻禄、拔悉密两部,成为11个部落。公元745年(天宝四年),骨力裴罗攻杀突厥白眉可汗,回纥占据了突厥的全部地盘,其疆域西至金山,东接室韦,在中国北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sup>①</sup> 《旧唐书·回纥传》。

## 第五节 维吾尔族族源的传说

首

先应当提到的就是《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这是一部流传在维吾尔族古代先民中的散文体英雄史诗。现存唯一的回鹘文写本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现根据我国著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汉译本的《导言》，将传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叙述如下：

英雄乌古斯一生下来就不同凡人，40天后就长大成人。他生相怪异，脸是青的，嘴是红的，眼睛也是红的，全身长满了毛。他有公牛一般的腿，狼一般的腰，黑貂一般的肩，熊一般的胸。英雄乌古斯为人民除害，在森林里杀死了吞噬人畜的独角兽。一天，乌古斯在一处膜拜上天，这时，从空中射下一道光，比日月还亮。光亮中有位姑娘，一人独坐其中。姑娘长得十分漂亮，她笑时，天也笑，她哭时，天也哭。乌古斯爱上了这位姑娘，娶了她。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名叫太阳，次子名叫月亮，三子名叫星星。

一天，乌古斯又在一个树窟窿中看见一位姑娘，她也十分漂亮，“眼睛比蓝天还蓝，发辫像流水，牙齿像珍珠”。乌古斯也爱上了这位姑娘，娶了她。生下三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做天、山、海。

之后，英雄乌古斯做了国中的可汗。他对属下诸官和百姓宣称：“我是你们的可汗，你们拿起弓、盾随我征战。让族标作为我们的福兆，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愿铁矛如林，愿狩猎的野马成群。让太阳作为我们的旗帜，让天空作为我们的庐帐！”

之后，乌古斯可汗开始了征战活动。东方（右方）的阿勒通汗（金汗）表示自愿归服。于是乌古斯可汗与他结成了友谊。而西方（左方）的乌鲁木（罗马）皇帝进行反抗，于是乌古斯可汗率大军征讨。一天早上，当他们扎营在冰山脚下时，一只大苍狼在亮光中出现。苍狼自愿为乌古斯可汗的大军带路。在亦得勒河（伏尔加河）畔，双方的军队进行了激战。乌古斯可汗获胜，乌鲁木皇帝败逃。

波斯人志费尼在他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了一个有关维吾尔族起源的传说：“畏兀儿人认为他们世代繁衍，始于斡儿寒（Orqon）河畔，该河发源于他们称为哈刺和林（Qara - Qorum）的山中。合罕近日所建之城池即因此山得名。有三



十条河发源于哈刺和林山；每条河的岸边居住着一个不同的部族；畏兀儿人则在斡儿寒河岸形成两支。当他们人数增多时，他们仿效别的部落，从众人当中推选一人为首领，向他表示臣服。这样一直过了五百年，才出现不可汗（Buqukhan）。现在有人说不可汗就是阿甫刺昔牙卜（Afrasiyab）；哈刺和林山附近的山旁有口废井和一方巨石，这口井据说是皮任（Bizhau）井。”“当时，哈刺和林有两条河，一名秃忽刺（Tughla），一名薛灵哥，汇成合木阑术（Qamlanchu）之地；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其中一棵，他们称为忽速黑，形状似松（Nach），树叶在冬天似柏，果实的外形和滋味都与松仁（Chilqhuza）相同；另一棵他们称为脱思（Toz）。两树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眼见这个奇迹，畏兀儿各族满怀惊异；他们敬畏而又卑躬地接近丘陵：他们听见歌唱美妙悦耳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线照射在那座丘陵三十步周围的地方，最后，宛若孕妇分娩，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根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帐篷上则铺有一张银网。部落的首领们来观看这桩怪事，畏惧地顶礼膜拜。当风吹拂到孩子身上，他们变得强壮起来，开始走动。终于，他们走出石室，被交给乳母照管，同时，人们举行种种崇拜的典礼。他们断了奶，能够说话，马上就询问他们的父母，人们把这两棵树指给他们看。他们走近树，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跪拜；对生长这两棵树的土地，也表示恭敬和尊敬。这时，两棵树突然出声：‘品德高贵的孩子们，常来此地走动，克尽为子之道。愿你们长命百岁，名垂千古！’当地各部落纷纷来观看五个孩子，犹如对王子一样尊敬他们。大家离开的时候，给孩子各取一名：长子叫孙忽儿的斤（Sonqur Tegin），次子叫火秃儿的斤（Qotar Tegin），三子叫脱克勒的斤（Tukel Tegin），四子叫斡儿的斤（Or Tegin），五子叫不可的斤（Buqu Tegin）。考虑到这些奇迹，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从五子中推选一人当他们的首领和君王；因为，他们说，这五子是全能的真主赏赐的。他们发现，不可的斤品貌秀美，才智出众，胜过别的诸子，而且，他通晓各族的语言文字。因此，他们一致举他为汗；于是他们汇集一起，举行盛会，把他拥上汗位。”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卷一记载，畏兀儿人以为其先世居斡儿寒河畔……昔分二部。人民既众，乃推一人之长。五百年后不可汗出。……璽中有一大石案，……遂译其文曰：“源出哈刺和林诸山之秃忽刺、薛灵哥二水会流处，有地名忽木阑术，有二树相邻，一树名曰 fistouc，其形类松如扁柏常青，结实如松实；另一树则野松也。二树之间，忽有小丘，日见增长，上有天光烛照。畏兀儿近前礼之，闻中有音声如同唱歌，每夜皆然。剧光烛照，三十步内皆明。增长既成，忽开一门，中有五室，有类帐幕。上悬银网，各网有一婴儿坐其中，口上有一悬管以供哺乳。诸部酋见此灵异，向前瞻礼。此五婴儿与空气接触，即能行动。已而出室，畏兀儿人命乳妇哺之。及能言之时，索其父母。人以二树示之。五儿遂对树礼拜，树作人言，囑

其进德修业,祝其长寿,名垂不朽。其地之人奉此五儿如同王子。……畏兀儿人以诸子为天所赐,决奉其一人为主。不可的斤美而慧,较有才,尽通诸国语,畏兀儿人遂奉之为汗。此汗即位以后,国内大治,而户口增多。天地赐之三乌,乌尽知诸国语,汗常遣之往访各地之事。一夜,不可的斤卧帐中,忽一神灵至,作幼女形。汗畏,伪睡而不敢与之言。次夜亦然,第三夜从其大臣言,随此女灵至一名曰忽都塔黑(Couttag)之山中,共话至于天明。此后每夜如是,计阅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末夜,女灵与不可的斤诀别,而语之曰:‘自东至西,全世界皆归汝治理,可完成汝之命运,善治汝民。’言毕而去。不可的斤由是聚集军队,命其长兄孙忽儿的斤将兵三十万,往征蒙古及乞儿吉思之地。次兄火秃儿的斤将兵十万,往征唐兀。三兄脱克勒的斤将兵十万,往征中国。四兄斡儿的斤留守本国。驻军征服驻地,大得俘获,还至斡儿寒河,建筑一城,名曰斡耳朵八里。时东方之国业已完全征服矣。至是,不可的斤复得一梦,见一白衣男子手持白杖,以块玉授之曰:‘如能永保此石,汝将奄有四方。’其大臣得梦亦同,翌日,不可的斤遂整饬军备,旋进兵西方。师次突厥斯坦,见一平原,水泉多而牧地肥美,遂留于此。建筑一城,名曰别刺撒浑(Bala-Saghun),即今之胡八里(Quz-Baliq)是已。遣军分徇各地,十二年间,尽取大地诸国。进至野人所居之地,知界外不复有人,遂率诸国国王还见不可的斤。诸国国王各献方物,不可的斤皆礼接之。唯印度国王貌丑,不许入见。命诸王入贡称臣,而放之还。大功既成,不可的斤遂离别刺撒浑,而还其出生之国。”

这两处所记传说,情节大多相合,很可能是同一传说的不同表述。其主要思想是回纥人或畏兀儿人的始祖——不可的斤兄弟系上天所赐,其先世曾居住在斡儿寒(鄂尔浑)河畔。斡儿寒河发源于哈刺和林山。上天赐生不可的斤兄弟的地方就在发源于哈刺和林山的两条河——秃忽刺河(土拉河)和薛灵哥河(色楞格河)的汇合处。除去传说的神话色彩,他所传达的实质信息与各种史料有关回纥在漠北的居住地的记载大致相同。



# 第二章

## 鄂尔浑回纥汗国时期的 回纥文化

## 第一节 回纥汗国的产生和政权结构

### 一、回纥汗国的始末

**如**前所述,回纥原先是铁勒的一部,即袁纥,又称乌纥、乌护、韦纥等。后袁纥部逐渐成为铁勒诸部中较强的一部。在此后铁勒与突厥的斗争中,回纥与仆骨、同罗、拔野古、覆罗等部落脱离突厥汗国,在今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一带游牧。

14

唐初,回纥的首领菩萨联合薛延陀,率五千骑兵在马鬣山打败了突厥人的十万骑兵,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军事胜利,从此回纥与薛延陀开始称雄漠北。但是,回纥与薛延陀的联合没有持续多久,薛延陀就想利用东突厥汗国衰败的机会扩充其势力,不可避免地回纥发生冲突。回纥的首领菩萨死后,吐迷度代之而立。就在这时,即公元646年,薛延陀发生了内乱。吐迷度利用这个机会,联合仆骨、同罗共击薛延陀,从北面进攻,配合由南面进攻的唐军,大获全胜。薛延陀被击败后,吐迷度袭杀其首领多弥,占领了薛延陀的地盘。紧接着,吐迷度就派使者入唐,请求归附。唐太宗李世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到灵武接受吐迷度的归顺。第二年,唐朝在回纥部设瀚海府,在仆骨部设金微府,在多览葛部设燕然府,在拔野古部设幽陵府,在同罗部设龟林府,在思结部设卢山府,各设都督节制。唐朝嘉许吐迷度的功劳,册封他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吐迷度在接受唐朝册封的同时,在部落内部自称可汗,仿照突厥官制设置官号,正式建立回纥汗国。公元648年,俟利发吐迷度被他的侄子乌纥谋杀。乌纥企图胁迫回纥部众往投突厥车鼻可汗,被唐朝燕然都护府副都护元礼臣捕杀,迅速平息了叛乱。在唐朝官员的主持下,吐迷度的儿子婆闰袭父职继任瀚海都督,并被委以军职右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这件事标志着回纥汗国由药罗葛部首领世袭可汗的制度已经确立。婆闰与唐朝修好,多次出兵助唐,与西突厥汗国的军队作战,还跟随唐朝的军队到高丽参战,建立了显赫的功勋。公元661年婆闰死,他的儿子比栗继承汗位。比栗无能,引发回纥大乱。唐朝

对此先剿后抚,安抚了大部分部众,处置了叛乱的头目,将政权重归比粟。比粟死,其子独解支继承汗位。公元682年,突厥再次袭击回纥,迫使一部分回纥人迁移。公元715年,独解支死,其子伏帝匐继承汗位。就在这一年,突厥默啜可汗对回纥拔野古等部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回纥部大败,人畜伤亡惨重,拔野古、回纥、同罗、仆骨等五部归附唐朝,被安置于振武军以北地区。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乘突厥内乱之机,合兵向突厥发起进攻,袭杀了突厥骨咄禄叶护可汗,推举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酋长骨力裴罗被唐朝封为奉义王,称右叶护,暂居拔悉密酋长颉跌伊施可汗之下。公元744年(天宝三年),骨力裴罗联络葛逻禄袭击拔悉密部,杀了颉跌伊施可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立即派使者到唐朝请求册封。唐朝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承认骨力裴罗重建回纥汗国。天宝四年(745年),骨力裴罗攻杀突厥白眉可汗,回纥汗国的疆域“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sup>①</sup>

回纥汗国第一代可汗为药罗葛氏出身的骨禄毗伽阙可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他在灭突厥汗国后,把汗庭南移到于都斤山与鄂尔浑河之间,游牧于阿尔泰山脉以东、兴安岭以西的地区。

怀仁可汗死后,其子磨延啜(曷勒可汗,747—759年)继位。磨延啜勇悍、善于用兵,并按游牧民族的传统分封其二子统治汗国的东、西两部分。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古代柯尔克孜族)以及阿尔泰山脉西南、东部天山山脉北方的葛逻禄、拔悉密等族。他们与回纥汗国的关系,时附时叛。

天宝后期,唐朝正苦于安史之乱,回纥应唐朝的请求,出兵帮助平定叛乱。公元757年,由回纥王子率军援助,参与平叛。公元758年(乾元元年),唐朝把宁国公主嫁给曷勒可汗,同时封他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在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时,曷勒可汗本人并未率军南下,这时他正全力从事征服西北方和西方诸族的活动。

曷勒可汗死后,其子牟羽可汗继立,别号登里(Tengri)可汗(759—780年)。这时唐朝又有史朝义之乱,牟羽可汗在公元762年(宝应元年)接受其岳父仆固怀恩的建议,出兵帮助唐朝讨伐史朝义。结果前后延续9年的安史之乱遂得平定。牟羽可汗从河阳(洛阳东北)经太原返回草原。这时是公元763年(宝应二年)2月。

唐朝为表彰牟羽可汗的功绩,于同年6月(或7月)封他为英义建功可汗,封其妻为光亲丽华可敦。其他回纥官吏、各部族长也都得到相应的封赏。

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纥汗国内部爆发了争夺政权的内乱。其中一派勾结北方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攻下了“回纥城”(即Ordu-Balk或Qara-Balgasun),可汗被杀。到此,存在近一个世纪的回纥汗国灭亡。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二至四年》。

## 二、回纥汗国的政权结构

早期的回纥没有复杂的政治制度,处在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的氏族社会生活中。拉施特的《史集》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没有一个国王或一个领袖给全部维吾尔人民有共同的规定。只是每一个时期,由一个氏族里出来一个强有力者,自称为领袖。后来,各氏族为了谋公共利益起见,开了一个大会……便一致地由伊什阙(Iskul)部选出最贤的蒙果匐(Mongo Bai),给了‘俟利咥尔’(ältrir)的称号。又由咀昆(Orkundur)部选出最聪明的一个领袖,给了他‘阙俟斤’(kül ärkin)的称号。这两个国王的氏族统治了维吾尔人达一百年之久。”<sup>①</sup>回纥汗国建立前后,统治者完全承袭了突厥汗国的一套封建统治制度,同时也效仿唐朝的官制。《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记载:“回纥酋帅吐迷度……贞观二十年,南过贺兰山,临黄河,遣使入贡,……因请回纥以南置邮递,通管北方。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部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俟利发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时吐迷度已自称可汗,置官号皆如突厥故事。”

16

如前所述,菩萨死后,吐迷度是回纥首领菩萨的继承人,其称号是胡禄俟利发(Qutluq Alp)。他在击败薛延陀,进而使东部铁勒诸部都改称回纥以后,于公元732年派使者去唐王朝进贡讨封。唐太宗答应他的请求,在回纥控制的地区设置了瀚海府,册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与此同时,决定在回纥部实行唐朝州府建制,为府一级的行政区域设置都督,为州一级的行政区域设置刺史,同时还设置了长史、司马等官职。又据《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记载:“……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回纥在接受唐朝册封之前,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就是回纥按自己原有的管理方法设置的官职。又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二记载:“唐贞观末,(吐迷度)自号可汗,置官号皆如突厥故事。开元中,有九部落,置都督十一人。代宗时,遣使册命可汗及其妻可敦,并封左右杀、胡禄都督、拔览将军、内外宰相已下。”由此可见,当时回纥的9个部落中设置了11个都督职位以及左杀、右杀等官职。以上文献记载说明,早在回纥汗国正式建立以前,回纥部已经接受了唐朝的行政区域划分和官员设置制度。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吐迷度在接受唐朝册封以前,已在回纥部落内部自称可汗,并仿照突厥官制设置官号。这说明回纥实行的是既承袭突厥官制,又接受唐朝官制的双重政治制度。

<sup>①</sup> 转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16—17页。

按照回纥传统的政治制度,汗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可汗。可汗最初是部落公推的,后来逐渐转为世袭制。无论公推还是世袭,回纥历代可汗多出自内九族的核心——药罗葛部。例如,时健俟斤就是回纥汗国正式建立前第一位公推的出自药罗葛部的回纥首领,他的儿子菩萨也是被公推继任的,自称可汗的吐迷度以及他的儿子婆闰也出自药罗葛部。公元648年,吐迷度被他的侄子乌纥谋杀。在唐朝官员的主持下,吐迷度的儿子婆闰承袭父职继任瀚海府都督。这标志着回纥由药罗葛部承袭汗位首领世袭可汗的制度已经确立。回纥汗国建立以后,前后共有12位可汗被扶上王位。前6位可汗均出自药罗葛部。他们是怀仁可汗骨力裴罗(744—747年)、曷勒可汗磨延啜(747—759年)、牟羽可汗移地健(759—780年)、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780—789年)、忠贞可汗多罗斯(789—790年)、奉诚可汗阿啜(790—795年)。公元795年,阿啜夭亡,因无子嗣立,相国骨咄禄(非药罗葛部)被国人拥立,唐朝册封他为怀信可汗。自此始,后来的保义可汗、崇德可汗、昭礼可汗、曷萨特勤、彰信可汗、胡特勤、驳可汗、乌介可汗、乌希特勤、遏捻可汗等均出自别部,药罗葛部遂告中断。

可汗以下的统治机构是如何设置的?汉文历史文献关于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记载:“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勤),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颡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卫士曰附离。”又有:“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勤)。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颡利发、曰达干,凡有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卫士曰附离。”

《文献通考》对突厥官制及名称的来源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因回纥“置官号皆如突厥故事”,故加以引用,可资参考:“土门遂自称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其妻为可贺敦(可敦),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颡利发,次吐屯,次俟斤。其初,国贵贱官号,凡有十等,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鬓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亦呼为莫贺弗。肥粗者谓之三大罗。大罗便,酒器也,似角而粗短,体貌似之,故以谓号;此官特贵,唯其子弟为之。又谓老为哥利,故有哥利达官。谓马为贺兰,故有贺兰苏尼阙;苏尼,掌兵之官也。谓黑色为珂罗便,故有珂罗啜,官甚高,耆年者为之。谓发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谓酒为匐你热汗;热汗,掌监察非违,敕整班次。谓肉为安禅,故有安禅具尼,掌家事如国官也。有时置附邻可汗;附邻,狼名也,取其贪杀为称。亦有可汗位在叶护下者。或有居家大姓相呼为遗可汗者,突厥呼屋为遗,言屋可汗也。其后,大官有叶护,次设、特勒(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习焉。”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获得的信息是：第一，回纥的可汗相当于匈奴的单于，回纥的可敦相当于匈奴的阏氏；第二，贵族子弟的称号是“特勤”，这不仅仅是荣誉称号，也是官职的名称；第三，大臣和各级官员有 28 个级别，诸如内宰相、外宰相、叶护、特勒（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吐屯、俟斤、阎洪达、颉利发、达干等，这些官员都是世袭的；第四，统兵的军事首脑是设，左杀、右杀、苏尼等；第五，除上述以外，还有都督、将军、司马、长史等；第六，各级官员职数没有作规定；第七，“附离”似乎也是这个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可能相当于禁卫军。

有的学者认为，回纥的统治集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层，第一阶层是享有很大政治特权的贵族阶层，另一阶层是因功分封的各级官吏、将军。贵族阶层包括特勤（亲王）、叶护（副王）、设（别部领兵者）。特勤、叶护、设，分别由可汗子弟及宗室充任。官吏阶层的等级是：阿波（统兵马官）、阎洪达（评议国事官）、达干（统兵马官）、梅禄（皇室总管、带兵者），以及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此外还有掌玺官。其中，三名内宰相由王族成员担任，六名外宰相分别由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等六部举荐，而不包括拔悉密和葛逻禄，因为他们是“客部”而不是原来的基本九姓部落的成员。九姓铁勒各部共有都督十一人，王族集团出三人，其他部落各出一人。贵族阶层和官吏阶层各有不同的职员。贵族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和特权，官吏阶层，主要掌握着汗国内外行政大权。在地方管理机构方面，遵循唐太宗的“各因其土地，择其部落，置为州府”的政策，对新降服的部族派叶护或设去统治，或派吐屯去督察政事、征收赋税。在回纥内九部保留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部落组织形式，使以药罗葛氏族为核心的回纥贵族居于统治地位，决定军国的重大事务。以军事联盟为纽带与仆固、浑、拔悉密等外九族结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形成汗国的基本组织形式。外九部在政治上有服从汗国的政令、接受可汗的调度的义务，在经济上有按时向汗国国库缴纳贡赋的义务，在军事上有听从可汗调集军队，对外作战，维护和巩固汗国军事统治的义务。



## 第二节 回纥汗国的经济文化

**大**量的史料表明,回纥汗国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人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后来由于与中原农业地区大量的交换活动,商业贸易获得了发展,再加上他们在东西交通方面具有影响,促使其社会经济发生转化,一部分人民由不定居转向半定居生活,发展了商业,产生了部分农业。

### 一、狩猎和畜牧业文化

据《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记载,回纥“……其众微小,其俗骁强……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可见回纥作为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其狩猎业和畜牧业应该是很发达的。

狩猎是人类最原始的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一。回纥在漠北崛起的前后,狩猎业作为回纥人获取肉食和皮毛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回纥经济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回纥人的社会组织亦军亦民,经常演练战阵,集体射猎。唐太宗时回纥吐迷度归附,貂皮是他们向唐朝贡献的主要贡品。

北方的畜牧业生产历来盛产马、牛、羊、驼,回纥的牧业也不例外,盛产马、大足羊和骆驼,但是,由于回纥贸易中以马为最有名的交换产品,所以回纥马在汉文史料中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畜牧业出产。据记载,唐德宗时,回纥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迎娶唐咸安公主为可敦,用两千匹马和一千峰骆驼当做聘礼。由于回纥曾参与唐朝廷平定叛乱,收复西京长安,代宗皇帝给回纥以优厚的待遇,准许回纥每年向内地输送漠北草原出产的马十万匹,酬以百余万匹缣帛作为回报<sup>①</sup>。回纥马产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唐朝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作《北征》中描写回纥汗国第三代首领牟羽可汗在公元762年(唐宝应二年)出兵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时其马多于兵的情况时十分惊异地写道:“出兵五千人,骑马一万匹”<sup>②</sup>,说明一个兵有两匹马。这

<sup>①</sup>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sup>②</sup> 《九家集注杜诗》卷三。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回纥畜牧业产马的数量之多。《唐会要》记回纥、拔野古、同罗、仆固、思结、契苾、浑、葛逻禄、拔悉密九部许多马群聚集在某山某水。这些马的身上并打上各部落的印记,叫“印纳马”。在遍布于原野的马身上打上印记,正是牧业生产中识别财产的一种方法。

## 二、商业文化

回纥作为一个以畜牧生产为主的民族,畜牧业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其生活必需,由此必然引发交换的需求。回纥畜牧业所生产的大量的马,除自己骑乘、役使、食用、装备军队和投入再生产外,剩余的就和邻近的民族或部族交换,以互通有无,调节余缺。这就是当时回纥商业的主要内容。从现存史料可知,回纥当时最主要的贸易对象便是农业经济十分发达的唐朝。

从公元744年迁居鄂尔浑河流域以后,回纥作为中国北部的重要部族保持了将近100年的守边任务,回纥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作出重要贡献,也觉得有功于朝廷,希望从朝廷那里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回纥每年输送马匹给唐朝,换取唐朝的丝绸制品和茶叶。这就是所谓的茶马互市。其实这种易货式的贸易有“互市”和“贡赐”两种具体形式。互市以其交换货物不同又分为绢马互市和茶马互市两种。《旧唐书》关于绢马互市有如下记载:“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缣帛,仍岁来市”<sup>①</sup>。关于茶马互市,《新唐书》记载,回纥“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sup>②</sup>。《封氏闻见记》中也有“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sup>③</sup>的记载。当然,互市时所要交换的货物决不仅限于绢、茶、马,应当还有其他的東西,只不过绢、茶、马是互市时交换的大宗货物而已。如前所引《新唐书·食货志》的记载,公元8世纪下半叶,回纥每年输入唐朝的马数,有10万匹,每匹马的价格,以40匹绢计算<sup>④</sup>,那么,一年中唐朝输送给回纥的绢就有400万匹。这个数目相当大。贡赋是指回纥和中央王朝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即回纥以进贡的方式每年向唐王朝进献骏马、皮毛等土特产,唐朝则以赏赐的方式赐予回纥以丝绸绢帛等中原地区的特产。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公元9世纪中叶回纥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的游牧封建汗国崩溃时为止,历时100年左右。唐朝每年给回纥输入的丝绸绢帛达到十万匹到几十万匹,回纥从唐朝获得的财富相当可观,这种贸易对回纥特别有利。回纥获得的丝绸、茶叶及其他用品,不仅用来满足自身的需

①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② 《新唐书》卷一九六《陆羽传》。

③ 《封氏闻见记》卷六。

④ 《唐会要》卷九六。

要,而且可以转运到中亚各地去销售,以换取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这一时期,回纥的商业活动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马绢交易发展到后来,甚至成了唐王朝的负担。据《旧唐书》记载,“(大历)八年(773年)十一月,回纥一百四十人还蕃,以信物一千余乘。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缣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特诏厚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sup>①</sup>。

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回纥商人进入内地,有不少人长年住在长安等地经商,积存余钱,放贷赚钱,发财致富。一时“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甚至一些达官贵人也向回纥商人借债。例如当时的右龙武大将军李基因“子贷回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被贬为宣州别驾<sup>②</sup>。

公元8世纪下半叶,吐蕃逐渐强盛起来,占据了陇右、北庭一带,企图控制安西四镇以及天山以南的地方,遏制交通要道。在这种情况下,西域各族人民只有取道回纥汗国境内的交通线才能和唐朝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保持不断地来往。北庭因当时处于东西交通要冲,它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回纥为了夺回北庭,多次与比自己实力强大的吐蕃兵戎相见,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到公元9世纪初,在保义可汗(808—821年)的率领下,西征吐蕃,才收复北庭、龟兹,西至拔贺那国(Ferghana,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sup>③</sup>,使东西交通线重新得以开通。东西交通线恢复以后,回纥引来一些粟特商人(胡商)在唐朝做买卖。粟特即历史上所称的“昭武九姓”或“九姓胡”。九姓是:一康、二安、三曹、四石、五米、六何、七火寻、八戊地、九史。他们本是古代从河西的昭武城(今甘肃张掖西北)迁去的,喜欢赚钱,善于经商,哪里能赚到钱就到哪里去。他们经常来回纥地区贩卖货物。粟特人曾经教给回纥人字母,后来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回纥人的工商业技能也是跟他们学的,甚至回纥信奉的摩尼教也是以他们为中介传入的。所以他们是回纥人的老师,在回纥社会中的地位很高,常常参与回纥的政治、外交大事,回纥的对外贸易常常依靠他们来做,他们也因此获利致富<sup>④</sup>。

①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

③ 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载《观堂集林》卷二〇;程瀚洛:《从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看唐代回鹘民族和祖国关系》。

④ 《资治通鉴》、《新唐书·回鹘》(上)。

### 三、农业和手工业文化

在我国汉文史册中,很少见到关于漠北时期的回纥直至西迁以前从事农业生产的记载,但是,西迁以后的回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由此推断,西迁以前的回纥应当有农业生产。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这样的推断。哈喇巴喇哈逊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及商业集中的地区。从考古发现的一所住宅中找到松香、铜片和青铜镜,断定这所住宅为工匠所有。在首府城内以及在鄂尔浑河畔农业地区周围,几乎每一户都有台架或磨,以备碾磨粮食之用。都城以外,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的其他回纥城市的周围,也有定居区及农业区,并且城内也有手工业<sup>①</sup>。公元9世纪前阿拉伯旅行家塔木姆在其所著《回鹘游记》(《Journey to the Uyghur》)中也记载回纥的首府是一个大的城镇,被充满农耕色彩的毗连的乡村所环绕。这个首府镇有十二扇巨型的铁门,人口众多,聚居稠密,有市镇和各种商业<sup>②</sup>。据考,定居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多用骆驼耕种,生产小麦、青稞、葱、韭、胡荽等农作物<sup>③</sup>。农业和手工业均有相当的发展,这就为西迁以后的生产和生活奠定了基础。

回纥在其管辖的各部族都设置“都督”(似突厥的 tutugh),这个官职不但在政治上负行政管理责任,同时还有征收赋税的责任。与此同时,回纥又在属部置“监使”,这个监使除在政治上负有协助都督的责任外,在经济上还负有按时向属部的统治者索取贡赋的责任<sup>④</sup>。

### 四、建筑文化

《资治通鉴》记载:“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成城,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sup>⑤</sup>就是说,在漠北时期,回纥以畜牧业为生,住在毡房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原本以畜牧为主、居无定所的回纥逐渐建起了城市和宫殿,一部分回纥人开始过起了半定居的生活。

早先的旗帜估计和今天我们在牧区随处可见的毡房不会有太大区别。可汗作

① C. B. 吉谢列夫:《蒙古的古代城市》,载《苏维埃考古学》,1957(2)。

② [英]米诺斯基:《中古时期的突厥人、伊朗和高加索人》,第一编,295页,伦敦,1978。

③ 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中)》,80页,民族出版社,1990。

④ 《资治通鉴》卷一四六。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为最高统治者,其牙帐的建造肯定不同凡响。据唐朝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曾经游历过回纥可汗住地的阿拉伯人塔木姆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他看到可汗的一个牙帐“那是金子做成的”,可容纳百人,牙帐的四周系在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木桩篱笆上,每十步远就在木桩之间堆扎108根长矛,估计金帐的周长有千步之大。牙帐的内部用饰金的动物图案装饰,金碧辉煌,气势宏伟。如公元8世纪中叶回纥的第11代首领英武威远可汗磨延啜在色楞格河旁曾建筑了一座富贵城<sup>①</sup>。磨延啜的儿子卜古可汗在鄂尔浑河流域建过卜古可汗城、斡尔朵八里以及许多宫殿<sup>②</sup>。又鄂尔浑河旁以及居延海一带即今额济纳河上游地方有好几处“可敦城”<sup>③</sup>。这些宫殿既在“可敦城”,就是为安置皇后或公主而建的。据苏联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发现,漠北有若干城郭都是回纥汗国时期的遗存。例如哈喇巴喇哈逊(又作合刺巴刺合孙)就是当年回纥汗国牙帐的遗址,占地25平方公里,中心有墙垣环绕,向外为居民区,城郭外垣之外有花园绿地城墙高达10多米,城中心建有一座14米高的瞭望楼,登上瞭望楼极目远眺,牧野如茵,一览无余。城郭四周的街道和建筑遗址,具有相当的规模,建筑装饰物和整体建筑风格有明显的唐代特色。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卷二二六，《新唐书·回鹘》(上)。

②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卷一，181页；《辽史》卷三；《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③ 王廷德：《使高昌记》；《辽史》卷三七；《新唐书·地理志三》。

## 第三节 回纥汗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

### 一、社会结构

如前所述,丁零、铁勒是今天的维吾尔族的远祖。公元前后,丁零已在阿尔泰山分东、西两部游牧,东支迁于贝加尔湖,西支转徙于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即阿尔泰山西南)。到公元4世纪时(北魏),铁勒或高车游牧于鄂尔浑河流域,公元5世纪时,因与柔然、鲜卑、拓跋魏斗争失利,一部分西迁于天山北,叫做乌护,一部分北退至色楞格河。西迁天山北的乌护就是后来回纥的西支;北退至色楞格河的袁纥(亦作韦纥)就是后来的东支。西支后来加入西突厥,东支则构成鄂尔浑河(因在公元8世纪中叶又迁回鄂尔浑河)流域回纥汗国的基本成分。

据《魏书·高车传》的记载,我们可推知,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初,高车(铁勒)当时是氏族社会,共有6个氏族。这6个氏族的名称是:狄氏,袁纥氏<sup>①</sup>,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后来他们彼此分合,又演变成了12个部落(姓),即泣伏利氏,吐卢氏,乙旃氏,大连氏,窟贺氏,达薄干氏,阿仑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罗氏,乞袁氏,右叔沛氏。高车6个氏族中的袁纥氏,就是维吾尔族先民最早见于汉文史册的译名。

种种迹象表明,高车的氏族社会是从母系氏族开始的,支持这一推断的理由之一是关于高车6个氏族有共同来源的神话传说。《魏书·高车传》关于高车来源有如下记载:“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

<sup>①</sup> 《魏书·铁勒传》作韦纥氏。

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开头的“俗云”二字说明这段故事显然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看似荒诞无稽，仔细分析，却透出远古的信息。单于的女儿与老狼婚配产子、繁衍成国之说，显然是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因而假借他们所崇拜的狼图腾来解释自己的祖先的一种说法。《乌古斯可汗传说》中也留下了母系氏族的痕迹，开头首先提到乌古斯可汗的母亲阿衣汗便是明证<sup>①</sup>。可见当时的高车或袁纥氏族的人们是处在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中。

在母系氏族社会中，两个氏族间可以互相通婚，这对于同一氏族说来是外婚，而对于部落说来是内婚。结婚时，若干男人和若干女人同时举行婚礼。婚前以牛马为聘礼。《魏书·高车传》中恰好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记叙：“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结言既定，男党营车阑马，令女党恣取，上马袒乘出阑，马主立于阑外，振手惊马，不坠者即取之，坠则更取，数满乃止。”意思是说，婚约一经讲定后，男方用车拦马，让女方随意挑选好马。女方骑在没有鞍子的马背上疾驰而出时，男方养马的人站在“阑外”拍手惊马。如果女方骑马欲出的人骑术高明，未坠下马来，马就归他们所有；如因骑不稳而坠下马来，可以再次进入马阑，重新挑选一匹马骑去。用这样的办法挑选聘礼，直到选够应得的马的数量为止。有的男方和女方成婚后，就住在女方的毡房内，一直等到有了孩子以后，才领着妻子和孩子一同回男家去。这种婚姻形式完全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魏书·高车传》所记王女与狼成婚的神话中提到匈奴单于，说明高车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可能是在匈奴西迁以前，即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三四百年之间。

据研究，大约从公元5世纪初至公元6世纪末，高车氏族社会经历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匈奴西迁后，高车的6个氏族南下鄂尔浑河流域，在那里游牧了几百年，最初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公元5世纪初，铁勒为柔然所迫，又北退至色楞格河流域，从事畜牧生产，发展犁耕农业，同时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制成各种衣料、药品。当时铁勒可能正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其经济基础是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产，其畜牧生产以牧马业为主，因为马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据《魏书·高车传》，铁勒各个氏族分担放牧马群，“其畜产自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意思是说，各氏族的马身上印有各自的记号，他们把有记号的马牧放在野地或草场上拦起来，也没有别人任意牵走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时铁勒的生产资料为氏族公有财产，由各氏族分担牧放使用。

生活在14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曾把当时吐鲁番盆地的畏兀儿人关于他们的祖先在鄂尔浑河流域生活时的传说写进他的《史集》。据传，那里有一座

<sup>①</sup> [俄] A. M. 谢尔巴克：《乌古斯可汗传说》，22页，莫斯科，1959；耿世民：《乌古斯可汗传说》，新疆人民出版社。

山,叫做福山。福山的一边有十条河,有些回纥人住在这里,叫做“十姓回纥”;福山的那一边有九条河,有些回纥人住在那里,叫做“九姓回纥”。这两个地方的回纥人没有首领。一年一年过去了,有大事时,只是由一个氏族出来一位强有力的人自称为领袖,临时统率两条河的回纥人民。后来,他们深感推举两位共同领袖的必要,于是开了一次大会,一致同意从十姓回纥内选出两位领袖,一位是“俟利咥尔”(altrir,古突厥语,意为部落联盟),一位是“阙俟斤”(külärkin,古突厥语,意为大首领),这两位领袖的权威和权力是平等的<sup>①</sup>。可见,铁勒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氏族间在政治或军事上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就像美洲印地安人易洛魁氏族联盟中“没有最高首长”,只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军事首领”的联合。不过,由于铁勒东支在土拉河北面,西支在天山北麓以及在阿尔泰山西南,更西北还达到里海以北。居住分散,各部落的语言不尽相同,不易形成一个政治集团,铁勒的部落联盟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后来由于铁的生产与商业的发展,引起铁勒的父系氏族社会内部出现私有财产,产生了阶级分化,原始氏族社会逐渐走向崩溃。

据《新唐书·黠戛斯》、《新唐书·拔野古》、《隋书·突厥传》记载,铁勒外部的黠戛斯和突厥部,内部的拔野古都产铁,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可改良工具,提高生产率,从而使铁勒的畜产品如骨角和皮毛,以及车辆、鞍辔、毡帐等有了剩余,成为铁勒和其他部族进行交换的商品。回纥作为铁勒部落中的一个氏族,经常和毗邻的汉人进行交换。铁器的生产和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回纥氏族社会的生产力,使回纥社会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除了满足他本人的最低限度生活需要外,还可能有一些剩余。铁器的制造和应用一方面使回纥社会的农业和畜牧业分工,另一方面又使手工业成为特殊的生产部门。于是各家族和家庭开始拥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和牲畜,氏族全体成员共同进行的集体生产逐渐被各家族和家庭单个进行的小生产所取代。氏族的首领利用他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有利地位和便利条件多占本氏族共有的剩余产品,逐渐有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对外掠夺战争的成功渐渐增长了氏族首领们的威信,扩大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由全氏族共同推举的首领逐渐演变为世袭的贵族。

如前所述,回纥向有“十姓回纥”与“九姓回纥”之说。十姓回纥住在鄂尔浑河流域,九姓回纥在色楞格河一带游牧。九姓回纥是回纥内部的氏族,由九个氏族构成。其中药罗葛部是最显贵的氏族。从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9世纪初,回纥的大小可汗都是从药罗葛这一氏族中产生的。公元552年,突厥土门可汗攻占了广袤的鄂尔浑河流域,经常用武力压榨和奴役色楞格河流域的回纥,心怀不

<sup>①</sup>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239—241页,商务印书馆,1983。



满的回纥为了反抗突厥的欺压,认为有必要和同样受欺凌的氏族联合,于是其内部产生了能够带领大家一致行动的领导人,带领回纥与周围的各氏族加强团结、巩固同盟。公元605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坑杀一百多位铁勒头目,这一残暴的举动促使袁纥和仆固、同罗、拔野古等氏族成立同盟,以“回纥”为称号,公推回纥药罗葛部出身的时健俟斤为最高军事首领“阙俟斤”。时健死,部人立其子菩萨,与薛延陀共攻突厥北边,取得胜利。菩萨死后,其子吐迷度立。吐迷度助唐朝灭东突厥及薛延陀后,被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府的都督,采取双轨制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沿用突厥制度,在可汗下面设文武官员,如亲王称“特勒(勤)”,大臣叫做“叶护”,典兵官名“沙”(或译为“设”、“杀”),税官叫“达干”,法官称“梅录”等,有28个等级,与地方上的大小牧主即伯克(或译为匐),形成广大的统治集团;另一方面又采用唐朝的官制,设有内宰相、外宰相、都督、将军、司马等<sup>①</sup>。被统治的阶级,则沿用突厥之旧制,除“黑民”(战争中的归附者)外还有奴隶。由此可见,到公元7世纪初,回纥已经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进入初期阶级社会了。公元9世纪初,九姓回纥中的药罗葛成为产生回纥首领的氏族,说明回纥社会完全进入了阶级社会。这个阶级社会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程溯洛认为是封建社会,就是说回纥社会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由氏族社会直接跨入封建社会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草原游牧社会不太适于奴隶制,究其原因:一是畜牧生产不一定需要很多人,人多消费就多,牧主觉得不合算;二是在流动的畜牧业生产的条件下,监管奴隶是极其困难的。公元7世纪,回纥灭了突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回纥社会是建立在突厥社会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可以从灭亡以前的突厥社会了解回纥社会的大概情况。当时,突厥社会以牧地封建所有制为基础,大牧主占有牧地,依照一定的方法把牧地分配给中小牧主;牧民没有土地,但有私有牲畜,向牧主缴纳一定的赋税和服一定的劳役。地方上的剥削阶级是各级大小牧主伯克(Bag,或作匐),被剥削阶级是平民(Turk budun),其次是黑民(Qara-budun),即战俘,他们有的做了牧主的荫客或佃客。再次是奴隶(汉语译为“苦尔”),奴隶包括牧主的妾、妾所生的子女以及牧主在战争中所俘获得来的儿童。这些奴隶和牧主住在一起,从事突厥人不屑做的农耕和手工业,为牧主放牧牲畜的,称为牧奴。但在突厥社会中,激烈的社会冲突不是发生在牧主和奴隶之间,而发生在黑民和牧主伯克之间。黑民有自己的牲畜和家庭,需自备兵器、马匹服兵役,必须将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财产和男女战俘及其他劫掠的人口贡献给牧主。这便是加在黑民身上的一种封建剥削。在这种盘剥下,黑民变得日益贫穷,最终全家沦为牧奴。因此,黑民是突厥社会中和牧主伯

<sup>①</sup> 《新唐书·回鹘》(上);《通典》卷一八五《突厥》(上);《册府元龟》卷九六二。

克相敌对的阶级<sup>①</sup>。回纥代突厥而兴,居突厥故土,统突厥旧民,仿突厥社会的结构和制度,继续与发展了这个社会制度。从回纥受外部的影响来看,回纥多年与唐朝交好,受唐朝的影响很大。唐王朝不仅赐予回纥首领以封号、封地,而且有时还直接任命他们为唐王朝的官吏,使他们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中原文化从而影响回纥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 二、宗教信仰

作为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回纥最初是信仰萨满教的。到公元8世纪中叶,摩尼教由西方传入,而且成为回纥内部影响极大的宗教;公元9世纪初,回纥甚至派人入唐传播摩尼教,但不信佛教。

### 1. 萨满教

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流行于亚洲和欧洲的极北方,在我国北方操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古代民族中普遍流传。萨满教的名称来源于其神职人员的名称,因为在满洲一通古斯语族诸语言中该教的巫师被称作萨满。萨满教相信灵魂不灭,接受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认为人有三个性能和作用不同的灵魂。宇宙有上、中、下三界,上界为天上,主宰世界的神灵住在那里;中间是人间,今世的人们就住在其中;下界是阴间,鬼魔和祖先神住在那里;上界又分为7层,最高的神主长生天居于最上层,其余诸神分居各层;下界也分为7层(一说分3层),由大小鬼魔分居。萨满教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冥冥之中的神鬼主宰。神灵给人间赐福,鬼魔给世上降祸。萨满是神灵为护佑氏族的人畜而选定的代理人,有特殊的品格,可以通神,可以为族人消灾祈福。

回纥最初信仰萨满教。《多桑蒙古史》中有一段记载说明回纥信萨满教:“当时畏吾儿人信仰名曰珊蛮之术士(萨满巫师),与今之蒙古人同。珊蛮自言术能役鬼,鬼能以外事来告。我曾以此事质之多人,诸人皆言闻有鬼由天窗……入帐幕中,与此辈‘珊蛮’共话之事,有时且凭于此辈术士之身。”<sup>②</sup>

据记载,回纥先民的巫师不叫萨满,而叫做“甘”。凡有大事,都要先请“甘”占卜决疑,“甘”在回纥的军国大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旧唐书·回纥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回纥首领罗达干到泾阳进见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请降,请求面见郭子仪,郭子仪脱去铠甲,回纥将领高兴地说:“初发本部来日,将巫师两人来,云:‘此行大安稳,然不与唐家兵马斗,见一大人即归。’今日领兵见令公(指郭子

<sup>①</sup> [俄]伯思斯坦:《六至八世纪鄂尔浑—叶尼塞流域突厥人的社会经济结构》,第五、六两章,莫斯科,1964。

<sup>②</sup>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卷一,181页,转引自冯家昇:《维吾尔族历史资料简编》。

仪),令公不为疑,脱去衣甲,单骑相见,谁有此心胆!是不战斗见一大人,巫师有征矣。欢跃久之。子仪抚其背,首领等分缠头采以赏巫师……”<sup>①</sup>意思是说,他们发兵来这里的时候,有人带来两位巫师。巫师预言,此次出行基本平安,将不与唐朝的军队作战,只是与一位尊贵的人见面即归。今天我们带着兵马来见您,您不存一点疑心,脱去铠甲,单人独骑和我们相见,(除了您)谁还有这样的心胸和胆量呢!这就是巫师所说的‘不作战,只和一位尊贵的人见面’,巫师的话被验证了。于是他们长时间地欢呼雀跃。……从这段文字记载不难看出,回纥人当时肯定信萨满教,遇有战事,领兵上阵前,必请萨满(巫师)预测吉凶,一旦萨满的吉言应验,所有的人便会欢呼雀跃。

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其哲学和社会观念十分原始。随着回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萨满教已不能完全适应回纥部族的需求,渐渐被后来传入的摩尼教所取代。

## 2. 摩尼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是波斯人摩尼(Mani)于公元3世纪中叶创立的,公元7世纪时传入中国,并于公元763年唐朝传入回纥游牧区域。摩尼教以“二宗三际论”为根本教义,宣扬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的斗争,崇拜光明和代表光明的大明神,所以也叫“明教”。据记载,是牟羽可汗把摩尼教引入回纥的:当时,牟羽可汗率部帮助唐朝平定史朝义叛乱时,“可汗乃顿军东都(指洛阳),因观风俗。……国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澈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于时都督、刺史、内外宰相……今悔前非,愿事正教”<sup>②</sup>。据说,摩尼教在初引入回纥时,曾经遭到回纥萨满教神职人员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甚至传播摩尼教的人员遭到迫害,连牟羽可汗本人也有点犹豫不定。经两天两夜和摩尼教徒激烈辩论,回纥的萨满们在辩论中失败,摩尼教才被接受,后来居然发展成遍布全境的宗教。

摩尼教传入回纥后,曾经给回纥汗国带来很大的变化。据《新唐书·回鹘传》载,“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葷,屏酒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就是说,摩尼教的僧侣们经常有机会陪伴可汗,与可汗一起商谈国家大事。可见当时回纥汗国内摩尼教的影响有多大。摩尼教在当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推动了回纥畜牧生产文明的全面发展,并对其后来过渡到农耕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摩尼教的传播和粟特商人的影响,甚至使回纥的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摩尼教的教义对回纥人的思想意识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摩尼教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讲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其中透露了一种朴素的辩

<sup>①</sup>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sup>②</sup> 《回纥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见罗振玉校补《和林金石录》。

证法思想;摩尼教主张和平、向善,追求光明,反抗黑暗,这些都对回纥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3. 佛教

《悟空入竺记》中记述:“洎贞元五年己巳(780年)之岁九月十三日,与本道奏事官节度押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愕等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又为单于不信佛法,所斋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sup>①</sup>这说明,就回纥汗国来讲,是不信佛教的。

## 三、语言文字

按照今天语言学的发生学分类法,回纥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其文字开始是形制与日耳曼人使用过的鲁尼文(runic)相似的古代突厥文。后来,大约在公元8世纪采用了模仿粟特文创制的回鹘文。

关于回纥语言的最早的可靠信息当推已经发现的用突厥文(有时与汉文、粟特文混合书写)刻写的碑铭。属于回纥汗国的古突厥文碑铭主要有3个:一是《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又称《磨延啜碑》或《曷勒可汗碑》);二是《九姓回纥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又称《九姓回纥可汗碑》);三是《塞维列碑》(在蒙古国 sevroy 地方发现,故名)。其中《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完全用古突厥文刻写,《九姓回纥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用古突厥文、汉文、粟特文3种文字刻写,《塞维列碑》用古突厥文和粟特文刻写。这些碑铭记载了当时的回纥语。根据对碑铭语言的研究,回纥语言与突厥语言基本相同。对此,后来的史书记载也是认同的。例如《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中写道:“考回纥称谓亦多本于突厥,‘可汗’、‘可敦’、‘特勤’之名固无论矣,突厥别部将兵者皆谓之‘设’,默啜可汗立其子弟为‘左厢察’、‘右厢察’。毗伽可汗本蕃号为‘小杀’,而回纥亦有‘左杀’、‘右杀’。分管诸部曰‘设’、曰‘察’、曰‘杀’,皆译音之异。今波斯王称‘沙’,犹是突厥遗称。‘骨咄禄’、‘可汗’及‘叶护’之称,‘达干’之名,回纥并同突厥。以突厥统之,诚不为过。度其言语或亦多同。”

<sup>①</sup> 《悟空入竺记》,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三。

## 第四节 回纥汗国的文学及其他

### 一、民间文学

#### 1. 歌谣

**回** 纥在漠北时期以及更早的时候，一定有过大量的民间创作的歌谣，但因缺少文字的记载，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了。流传至今的一些颇有古风的歌谣，因其产生的年代不详，也不好妄加推断。所幸有 11 世纪的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传世，其中收录了不少流传到当时的古代歌谣，可以帮助我们窥见一斑。例如：

让我们把敌人团团围困，  
让我们跳下马冲锋陷阵，  
让我们像雄狮吼声震天，  
让敌人的势力削弱殆尽。 （第二卷第 136 页）

刮来一阵阵狂风，  
好似暴风雪降临，  
人们在哆嗦颤抖，  
天空里乌云轰鸣。 （第二卷第 228 页）

亦的勒河奔驰骤，  
浪拍两山夹一流，  
但见湖水盈盈处，  
鱼儿成群蛙亦稠。 （第一卷第 79 页）

百花盛开放异彩，  
有如锦毯巧铺排，  
天堂景色眼前是，

严冬一去不复来。 (第一卷第129页)

可汗锦帐搭得牢，  
战鼓隆隆牙旗飘，  
杀敌斩将如割草，  
尔首能向何处逃？ (第一卷第211页)

你要给我个诺言，  
我带黑痣的美人，  
你迷惑人的双眼，  
可知我的愁与难？ (第三卷第349页)

## 2. 传说

回纥的传说主要是有关族源的传说。

其一是英雄乌古斯传说中有民族起源的部分。如前所述，乌古斯与空中射下的光亮中的姑娘相爱，生下名叫太阳、月亮和星星的三个儿子，反映回纥对光亮的崇拜；乌古斯又与树窟窿中的一位姑娘相爱，三个儿子出生后，取名分别叫做天、山、海，反映回纥对树的崇拜。

其二是《世界征服者史》和《多桑蒙古史》中记载的民族起源的传说。相传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两树间冒出个大丘，有道光线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最后，宛若孕妇分娩，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当风吹到他们身上时，男孩们变得强壮起来竟能走出石室。当他们能够说话时，马上就询问他们的父母，人们把这两棵树指给他们看。他们走近树，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跪拜，对生长这两棵树的土地也表示尊敬。这两部著作中所记录的传说，情节大致相同，所描述的情况与各种史料中有关回纥在漠北的居住地的记载大致相同。

其三是散见于汉文史籍中有关回纥先民图腾的传说。如前引《魏书·高车传》关于高车来源的记载：

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

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 3. 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主要有两部:一是《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这部史诗以韵文和非韵文相杂的形式描述了英雄乌古斯汗出生、成长、娶妻、生子、征战、建国、分封诸子的事,保存了古代回纥先民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信息,再现了回纥的一些古老习俗。这里引其中的一个片断:

.....

于是,大军继续前进,  
乌古斯可汗又看到了那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  
苍狼对乌古斯可汗说:  
“乌古斯,现在,你带领大军从这里出发,  
你率领着百姓和官员,  
让我给你在前面引路。”  
次日天亮时,  
乌古斯可汗看到公狼在大军前面走着,  
心中十分喜悦,  
于是率军继续前进。  
乌古斯可汗骑着一匹花斑牡马,  
他非常喜爱这匹骏马,  
路上,骏马失踪了。  
这里有座高山,  
山中寒冷结冰,  
因此,它的名字叫冰山。  
乌古斯可汗的马逃到了冰山里,  
他因此受了许久的苦。  
这时大军里有一个魁梧结实的勇士,  
他勇敢无畏,  
是个在征战中经过锻炼的人,  
这个人入山去寻马。  
过了九天以后,  
他给乌古斯可汗找来了马。  
由于冰山里十分寒冷,

这人身上盖满了雪，  
全身白花花的。  
乌古斯可汗高兴地笑道：  
“你留在这里当伯克之长，  
就让哈尔鲁克永远做你的名字！”  
.....

二是《阿勒普·艾尔·统阿》。阿勒普·艾尔·统阿是回纥传说中的一位勇敢善战的可汗。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称他为阿普拉昔牙卜。史诗《阿勒普·艾尔·统阿》早已失传，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收录了其中的一些片断：

英雄艾尔统阿死去了吗？  
不幸的世界留下了吗？  
命运之神报仇了吗？  
真令人心碎！

当突厥人见到他时，  
百姓都赞不绝口，  
他不愧是个伟大之人，  
真是后无来者。

他好行义举，  
他热情待客，  
在严寒的冬季，  
他使人们充满希望。

#### 4. 《敕勒歌》

《敕勒歌》是一首见于汉文《乐府诗集》的脍炙人口的古代民歌。公元546年，北齐将领高欢在进攻西魏玉壁城失败以后，为了鼓舞士气，命令手下的一员战将——高车敕勒部人斛律金当众咏唱《敕勒歌》，并亲自为之唱和，一时全军将士感慨泣涕，群情激昂。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就是铁勒，回纥先民是铁勒诸部之一。敕勒人的故乡在于都斤山、独乐河一带，那里牧野辽阔，水丰草美，是敕勒人引以为豪的家乡。这首古歌正是铁勒赞美自己故土的心声。汉译文合辙流畅，清新活泼，洋溢着草原牧歌的情调，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熟知，所喜爱，所传唱，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

## 二、碑铭文学

回纥汗国建立之后，回纥人学习突厥人在石碑上刻字的方法，创作了兼有发表作品、纪念墓主、歌功颂德三种作用的碑铭文学。现在为世人所知并已成功解读的回纥碑铭作品有4件：

### 1. 《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

《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之一（又称《磨延啜碑》或《曷勒可汗碑》），1909年由著名突厥学家兰司铁发现于蒙古色楞格河畔的西耐—乌苏地区，共有50行碑文，正文是用古突厥文拼写的回纥语，另有粟特文和汉文部分。碑文的内容是对被唐朝册封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的回纥第二代可汗磨延啜（曷勒可汗）一生的记述。据突厥语专家解读的结果可知，从石碑坐落的方位看，北面的12行碑文以曷勒可汗的口气，追忆他跟随父汗骨力裴罗起兵，攻灭突厥人的国家，直到骨力裴罗去世；其余各面的文字都是战争记录，尤其提到回纥外九族中反抗最多的葛逻禄和拔悉密。

### 2. 《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

《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之二，是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于1957年在铁尔痕河谷发现的，现存30行碑文，内容包括曷勒可汗追忆回纥建立汗国之前其首领称可汗、攻灭突厥汗国的历史，曷勒可汗表述他即可汗位之后建立的功绩，其子牟羽可汗对所征服的部族和属官姓名的详细记载。

### 3. 《九姓回纥可汗碑》

《九姓回纥可汗碑》，全称是《九姓回纥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1889年为俄罗斯历史学家雅德林采夫在哈喇巴喇哈逊回纥汗国国都旧址发现。碑文由3种语言组成：古突厥文拼写的回纥语、粟特文记写的粟特语和汉字记写的汉语。据研究，此碑刻于公元814年，是一块墓碑，墓主是回纥汗国保义可汗（又称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碑文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从回纥汗国开国首领骨力裴罗到墓主生活的时代的大事；第二部分是为主墓主记功的文

字,叙述了墓主保义可汗一生的功绩,尤其是帮助唐朝保卫北庭、收复龟兹的事迹。到此碑为止,回纥碑铭的撰写已形成比较固定的格式,即开篇首先追忆开国历史,一直追忆到墓主,然后表述墓主一生的功绩,末尾是墓主的遗嘱和后人的赞美之辞。碑文的主要部分多用墓主自述的第一人称写成。

#### 4.《塞维列碑》

塞维列碑在蒙古国塞维列(sevroy)地方发现,故名。《塞维列碑》用古突厥文和粟特文刻写。

### 三、其他学科的学术观点

#### 1. 天文历法

据研究,回纥在西迁以前,曾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十二生肖,或称十二属相,本是古代占星家用12种动物代表星象,记日记年的一种方法,也用来表示人的出生年岁和计算岁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这种情况。例如古代欧洲的希腊、亚洲的巴比伦、北非的埃及、北美的墨西哥、亚洲的中国,都有过用动物代称12个星象的记载,只不过所选择动物有所不同。例如我国用十二地支与动物搭配,其组合依次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犬)、亥猪(豕);欧洲、西亚和北非的有些国家和地区选择的动物是牡牛、羊、狮、驴、蟹、蛇、犬、鼠、鳄鱼、红鹤、猿、鹰;而北美的有些民族则选择了水中怪物、虎、兔、龙、猴、马、犬、豕等。在中国,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表示地支的名称早在商代就出现了。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犬)、猪(豕)等动物名称相配合表示生肖的说法出现较晚,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东汉王充(27—97年)的《论衡》,但考古发现证明,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犬)、猪(豕)等动物名称相配合表示生肖的说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

历史上,十二生肖先后在突厥、回纥、蒙古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当中流传。《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黠戛斯“谓岁首为茂师哀。以三哀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九叙黠戛斯风俗,说:“人谓岁首为茂师,谓月为哀,每三哀为一时。”黠戛斯与突厥、回纥等语言相近。突厥语称“冰”为mous,即“茂师哀”中的“茂师”,称“月”为ay,即“茂师哀”中的“哀”,“茂师哀”的意思正好是“冰月”。“以三哀为一时”就是以三个月为一个季节。用十二种动物纪年的历史事实在突厥文碑铭中得到了证实,名称为子鼠(sicgan)、丑牛(ud, okuz)、寅虎(pars)、卯兔(tawisgan)、辰龙(nak)、巳蛇(yilan)、午马(at)、未羊(qoy)、申猴(bicin)、酉鸡(takagu)、戌狗(it)、亥猪(tonguz)。前述《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中就有“我于鸡年让粟特人、汉人在色楞格河流域建了富贵城”一语。

这从一个侧面证实《新唐书》所说“太岁在寅，则曰虎年”的记载是真实的。

据冯家昇先生研究，回鹘人用十二生肖纪年大约可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用十二生肖纪年，第二时期用五行配合生肖纪年，第三时期除五行之外又加数目字。其生肖名称为子鼠(kosku)、丑牛(ud)、寅虎(bars)、卯兔(tawisqan)、辰龙(luu)、巳蛇(yilan)、午马(yom)、未羊(qoi, qon)、申猴(bicin)、酉鸡(taqiu)、戌狗(it)、亥猪(tunquz, lazın)。其中“luu”音译自汉语“龙”。

## 2. 医学

早在回纥人信奉萨满教时，萨满教的医术在回纥人中就极为盛行。萨满教的神职人员——萨满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氏族的成员治病，治病的方法就是巫术。萨满的治疗术是精神治疗辅以某些民间的经验治疗法。当时，人们受原始的幻想性世界观的影响，认为宇宙万物都由神灵支配，往往把疾病发生的原因归于神鬼的活动。回纥人的巫师——萨满认为，人之所以患病，是因为邪恶的鬼怪侵入人体或人们有意或无意触怒了某位神灵所致，所以治病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萨满跳神和祭祀神灵，与神灵完成沟通，驱赶侵入体内的鬼怪或者祈求神灵饶恕，从而达到祛病消灾的目的。刘义棠在《维吾尔研究》中论及回纥萨满的医疗作用时写道：“即今时之维吾尔族，虽曾相继改奉摩尼教、袄教、景教、佛教以至于伊斯兰教一元化，其民间习俗，仍不无蛛丝马迹可寻。如今之 QAM 或 BAXSHI 仍然存在，能为人治病，即为其是著之例，萨满对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矣。”“萨满能役使鬼魅、占卜、行医等，集万能于一身。”这可以叫做精神疗法。

与此同时，生活在北方草原和沙漠地带的人们，从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中逐渐认识到一些植物的根、茎、叶、种子有治病的功效，洗温泉、涂奶汁、裹兽皮、埋热沙可以解除寒性关节疼痛，四肢涂抹淤泥或野蒜汁可以预防蚊虫叮咬，刺破耳后静脉放血可以消除由于骑马造成的关节肿胀和干热性头痛，也采用一些偏方土方作为辅助治疗方法。当然，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治病的方法。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一些回鹘文医学文献，共有 201 行，记载了腹痛、催产或堕胎、眼痛、狐臭、夜盲、尿闭、腹绞痛、牙痛、白癜风、失明、头屑、疯、气促、死胎、狂犬咬伤、月经过多、疮疖、虫蛀牙、多尿症、疣、毒疮、鼻衄、尿血、鼻息肉、感冒、口腔溃烂、癣等近 40 种病症，59 种处方，所涉及药物近百种，其中动物药有公山羊肉、狗奶、山羊胆、兔胆、羊蹄、黑山羊肝、乳牛角、绵羊角、黑牛粪、石鸡胆、骆驼尿、鹿角、田鼠胆汁、死母猫脂肪、骆驼肺、雪鸡脑髓、麝香、鸡胆汁、鸡蛋、骆驼肉、人尿、熊筋、狼胆汁、奶油、奶酪、狼骨、狼舌、牛胆汁、兔脑髓、燕子肉、骆驼粪、牛尿、狼粪、蛇皮、蜂蜜、狗毛、兔毛、海狸香、刺猬皮、蛇头、鱼胆等 40 余种，此外，还涉及植物类药物近 30 种，矿物类药物 8 种。从回鹘医书不难推想，西迁以前回纥医学的发展水平也应达到相当的水准。

## 第五节 回纥的生活习俗

### 一、婚俗与葬俗

#### (一) 婚俗

38 **回** 纥先民早期的婚俗究竟如何,没有留下多少可资考证的资料,根据人类婚姻制度一般的演变规律,远古的时候大概也经历过“男女杂游,不聘不娶”的阶段,前引《魏书·高车传》中关于高车先民是匈奴单于的女儿与老狼婚配繁衍而来的说法,说明当时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高车先民婚姻制度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早期婚姻制度。到了南北朝时期,作为回纥先民的高车人,其婚姻制度至少已进入对偶婚阶段,在两个氏族间互相通婚,婚前以牛马为聘礼。《魏书·高车传》就有一段记叙:“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结言既定,男党营车阑马,令女党恣取,上马袒乘出阑,马主立于阑外,振手惊马,不坠者即取之,坠则更取,数满乃止。”有的男方和女方成婚后,就住在女方的毡房内,一直等到有了孩子以后,才领着妻子和孩子一同回男家去。

回纥当时也实行一夫多妻制,特别是贵族。例如乌古斯可汗就娶了光亮中的姑娘,生下名叫太阳、月亮和星星的三个儿子,又娶了树窟窿中的一位姑娘,生下名叫天、山、海的三个儿子。

和其他古代北方民族一样,回纥也有收继婚习俗。例如,据《唐书》记载,宁国公主先后配英武可汗和英义可汗为可敦。贞观二十二年(698年)“吐迷度为其侄乌纥所杀,初,乌纥烝其叔母,遂与俱陆莫贺达干俱罗勃潜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sup>①</sup>再如,咸安公主应回纥之请,于公元789年7月到达回纥牙帐,成为顿莫贺可汗的妻子。9月顿莫贺去世,按回纥收继婚习俗,咸安公主先后被4位可汗收为妻子。关于此,《唐会要》卷九八《回纥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天亲可汗卒,子忠贞可汗立,忠贞可汗卒,子奉诚可汗立,奉诚可汗卒,国人立其相,是为怀信可汗。皆以

<sup>①</sup>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胡法，继尚公主。”天亲可汗名叫顿莫贺，忠贞可汗就是他的儿子多罗斯，即位不到一年就被其弟谋杀；奉诚可汗名叫阿啜，是多罗斯的儿子；继阿啜而立的是汗国的相骨咄禄，这四人都按照回纥的习俗“继尚公主”，即娶咸安公主为妻。

说到回纥的婚仪，百姓有何做法，因无文献可考，不得而知。但《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有崇德可汗与唐宪宗的亲生女太和公主成婚礼仪的记载：“（公主）既至虏庭，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纥可敦。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毡幄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姬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入毡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初礼。虏先设大舆曲宸，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纥‘九姓相’（内相三，外相六）分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自此，臣下朝谒，并拜可敦。”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公主到达回纥可汗牙帐以后，其婚仪起码有以下六个步骤：

一是由可汗选择一个好日子，册封公主为回纥可敦，先把名分定下来。

二是举行婚礼时，有一处高楼（很可能是高台），在楼下设一毡帐，可汗先上楼面朝东方坐定（这可能是太阳崇拜习俗的表现），安排公主坐在毡帐里，先学习回纥的习俗和礼仪。

三是公主脱去唐服，换上回纥的民族服装，在一位年长女佣的陪侍下，出来拜见可汗。

四是可汗坐而受礼，公主再次俯身参拜后，又进入毡帐更衣，穿上“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的可敦服，出来再次向可汗行礼。

五是侍者让公主登上一乘大轿子，上面设有屏风，屏风前设小座，公主坐在特设的小座上。回纥九个部落的相抬起大舆，向右旋转九圈，表明回纥九个部落拥戴可汗娶公主为可敦。

六是公主下舆上楼，与可汗并肩面朝东方坐定，接受群臣朝拜。

回纥的上层经常与唐以及周围的其他民族通婚。《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载：公元756年，回纥曷勒可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出使回纥汗国的大唐使者承采，唐肃宗十分重视这桩婚姻，加封曷勒可汗的女儿为毗伽公主，承采本人也因此而得到擢升，官加开府仪同三司，拜为正卿，曷勒可汗也给承采加封了叶护称号。

唐朝先后有多位公主出嫁回纥。例如宁国公主，她是唐肃宗最小的女儿。公元756年，唐肃宗调用回纥军队平定安禄山叛乱，以回纥平叛有功，将宁国公主嫁给了曷勒可汗。再如咸安公主，她是唐德宗的第八女。如前所述，她于公元789年嫁给了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顿莫贺去世后，又改嫁其后的几位可汗。还有太和公主，她是唐宪宗的亲生女，唐穆宗的妹妹。如上所述，她于公元822年被唐穆宗封

为“仁孝端丽明智上寿可敦”，嫁给了崇德可汗。

## （二）葬俗

在所有的习俗中，葬俗受宗教的影响最大。一个民族或部族的葬俗随着其宗教信仰的改变会有所不同。考古发现，大约在9世纪左右，回纥仍实行土葬。人死后，停尸于毡帐之中，死者的子孙和其他亲属都来奔丧，各自杀牛马，摆在毡帐前，骑马绕着死者的毡帐走七圈，然后来到毡帐门前，用刀划自己的脸，划得鲜血直流，边划边哭，以致血和泪水一起流下。用这样的方式志哀七次，才算表达了失去亲人的哀痛。土葬的姿势是仰身直肢，有时死者是放在木板上安葬的。墓室分为内室和外室，内室的入口用木板、木头、栅栏和石头封闭起来。内室与外室的位置关系多有不同，有的与外室垂直，有的与外室平行，有的则位于外室的一角。下葬时，多将死者的头朝北或东北方向摆放。有祭祀和陪葬的习俗。墓前设有祭坛，杀牲畜祭祀，火堆就在祭坛近旁，祭祀时先将祭品放在火里烧，然后再摆放在墓室里。回纥有殉马的习俗，因为马是回纥人生活中一时也离不开的伙伴。回纥也有用人殉葬的习俗。据《资治通鉴》记载，“回纥毗伽阙可汗卒……回纥欲以宁国公主为殉。公主曰：‘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然亦为之劈面而哭。”<sup>①</sup>

回纥信奉摩尼教时，依摩尼教教规，不采用土葬，而将死者的遗体置于特殊的建筑物之中。后回纥信奉佛教以后，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也曾实行火葬。

## （三）其他生活习俗

### 1. 饮食

回纥的先民在氏族社会时代过着狩猎为主的生活，那时他们的食物当然以捕获的动物和采集的植物为主。到了漠北回纥汗国时期，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肉类和奶制品已成为回纥人的主要食品。从回纥和唐朝之间的茶马交易来看，当时回纥已盛行饮茶之风。《新唐书》对此有明确记载：“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sup>②</sup>这一时期回纥也有少量的农业，农产品也应当是回纥人饮食的组成部分。

### 2. 居住

漠北时期，回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和突厥人一样住在穹庐毡帐中。从岩画所描绘的情况看，回纥人的毡帐用木棍、皮绳支撑和连接，上面横拉两根皮

<sup>①</sup>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sup>②</sup> 《新唐书》卷一九六《陆羽传》。

绳,圆顶上又加一个高高的天窗<sup>①</sup>。这大概是普通老百姓住的毡帐。当时回纥可汗也住在毡帐里。公元821年,阿拉伯人塔木姆曾经游历回纥地区,此人在游记中称他在“距可汗的城市五治尔萨赫的里程之外,就看到该国王的一个帐篷,那是金子做成的”,可容纳100人<sup>②</sup>。在苏联的图瓦自治共和国境内,考古学家发现了回纥人居住过的15座古城<sup>③</sup>,说明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定居的回纥人开始在土木构建的住室里安家。

### 3. 交通

回纥作为游牧民族,其主要交通工具当然是马,水草丰美的草原为养马业提供了最好的自然条件,马的速度快、耐力好,很适合在广袤的草原上驰骋。回纥人很早就有乘坐毡车的习俗,回纥人遗留的岩画上就有毡车的图像:有车辕、车轮、车舆、车棚、车尾。车轮高大,有15根辐条,车厢上竖起木棍支持着毛毡,可遮挡风雨。史书对回纥人的毡车也有记载:“会昌三年,春,正月,回鹘乌介可汗帅众侵逼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袭其牙帐,沔自以大军继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鹘之众寡,见毡车数十乘,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使谍问之,曰:公主帐也。”<sup>④</sup>

### 4. 舞蹈

关于回纥人的舞蹈的具体情况,资料很少。《旧唐书》曾提及回纥人的舞蹈:“登里可汗营于陕州黄河北。元帅雍王领子昂等从而见之,可汗责雍王不于帐前舞蹈,礼倨。子昂辞以元帅是嫡孙,两宫在殡,不合有舞蹈。回纥宰相及车鼻将军庭诘曰:唐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侄有礼数,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辞以身有丧礼,不合。又报云:元帅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储君也,岂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sup>⑤</sup>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原地区,其中所指的“舞蹈”恐怕不是用于娱乐的“舞蹈”,而是一种礼仪。回纥人的舞蹈应该是起源于萨满教巫师跳神活动的具有强烈节奏的剧烈舞蹈。

① 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2。

② 米诺尔斯基:《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地区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通报》,1948(12)。

③ [苏]T. 伊斯卡阔夫:《回鹘人在图瓦》,载《民族译丛》,1985(5)。

④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

⑤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日常生活



清洗劳动工具——坎土曼



选购小花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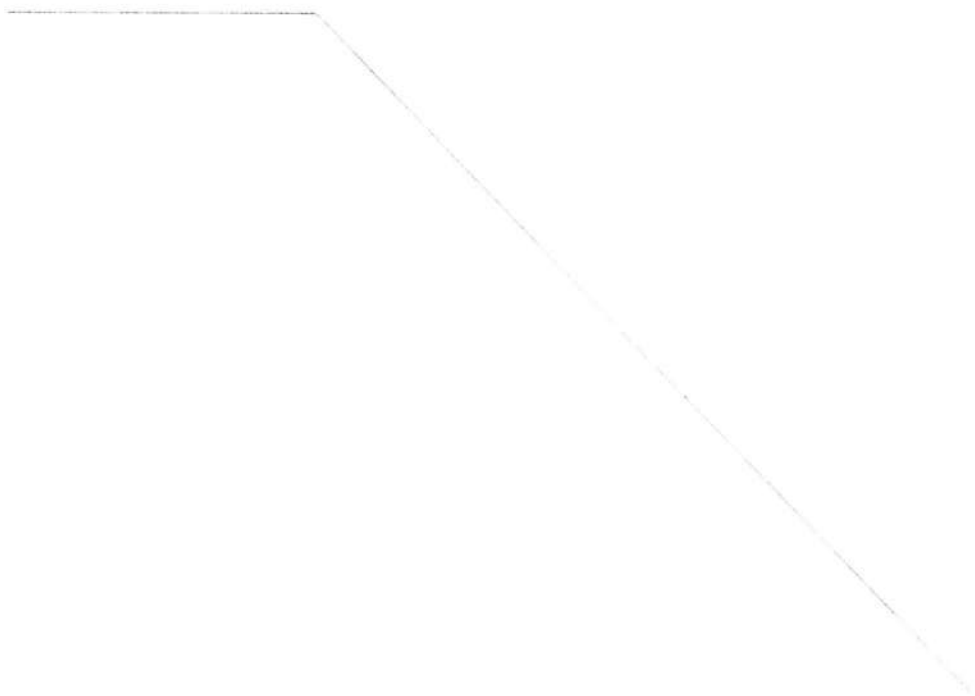
在河边烤鱼





# 第三章

## 高昌王国时期的回鹘文化



**高**昌一名起源于西汉时期。因其地有屯田驻军的高昌壁，“地势高敞，人庶昌盛”<sup>①</sup>，故名。在中国汉文历史书籍中，高昌又有和州、火州、哈喇火州、哈喇火者、哈喇霍州、哈喇和卓等不同名称。在突厥文写本中，此地名称译作“Qocö”或“Kocö”。《突厥语大词典》“qoco”条记载：“高昌，回鹘城市，同时也是该地区所有城市之名（意指整个吐鲁番盆地）。”现在维吾尔族当地人则称其为“亦都护塞里”。因为回纥汗国的国王被称为“亦都护”，这是回鹘文“Idiqut”的汉文对音，意为“幸福之主”或“神圣的殿下”，“亦都护塞里”的含义是“亦都护城”。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距今六七千年以前，吐鲁番的阿斯塔那一带就有了人类的狩猎、采集活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人们渐渐在吐鲁番盆地定居，生产方式逐渐变为以农业为主。据《史记》记载，生活于吐鲁番一带的土著居民是姑师人。他们在吐鲁番盆地上建立了姑师国、狐胡国、小金附国等。西汉时期，中国北部的匈奴控制着西域的大部地方，并不断侵扰汉朝。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各国，以断匈奴“右臂”，姑师之地是开辟西域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由此，西汉王朝与匈奴对姑师展开了长期的反复争夺。

公元前108年，汉遣将军赵破奴及王恢率骑数万克楼兰，破姑师。姑师自此改称车师，在今博格达山南北建车师国，臣属于西汉王朝。不久，匈奴又控制了车师。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9年），汉以匈奴降将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率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率数万骑救援，汉兵败归。公元前89年，汉又派开陵侯率楼兰等六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投降汉朝。公元前74年，匈奴重新占领车师，派四千骑兵在此屯田。公元前71年，汉朝与乌孙联兵东西夹击匈奴，车师屯田匈奴兵惊惧逃走，车师又归汉。之后车师王与匈奴联姻，汉又失车师。公元前68年，汉侍郎郑吉率兵攻占车师交河城，派驻士兵300人屯田车师。匈奴派兵再次争夺。公元前62年，汉放弃车师。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日逐王率众降汉，车师之地也随之归属

<sup>①</sup> 《北史·西域传》。

汉朝。这五次重大的车师之争,史称“五争车师”。西汉在统一西域的同年(前60年),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任郑吉为首任都护。西域纳入汉朝版图,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车师归汉后,汉“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把原来车师人的领地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八国,其中车师前国在博格达山南(现吐鲁番境内)。《汉书·西域传》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今吐鲁番市交河故城遗址),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到公元25年,车师前国已经全部吞并了吐鲁番境内诸国,交河城成为吐鲁番第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前48年,汉朝在车师前国设置戊己校尉,驻交河城,掌管西域屯田事务,公元前21年,戊己校尉移驻高昌壁(今吐鲁番市高昌故城遗址)。公元75年后,匈奴围攻车师,匈奴与汉朝又开始了高昌的反复争夺。戊己校尉随之几经撤回、恢复。公元123年,西域长史班勇率兵500出屯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攻克车师。公元124年,复置戊己校尉。晋朝,车师前国归晋,晋朝戊己校尉仍设高昌。西晋灭亡以后,凉州(今甘肃武威)形成了张氏割据政权。公元327年,前凉王张骏攻占高昌,擒获叛将戊己校尉赵贞,始置高昌郡,立田地县,隶属沙州(今甘肃敦煌)。公元376年,前秦苻坚灭前凉。高昌郡属前秦,隶属凉州。公元386年,奉命西讨龟兹的前秦大将吕光入破伊吾关,攻占凉州,建后凉。高昌车师前国属后凉。公元394年,吕光遣其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公元397年,沮渠男成推举后凉建康(今甘肃酒泉西南)太守段业为大都督、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占据高昌。公元400年,李暠建立西凉,在高昌设郡。车师前国臣属西凉。公元412年,沮渠蒙逊建立北凉。公元420年,沮渠蒙逊攻灭西凉,高昌易主北凉,车师前国向其称臣。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阚爽自立为高昌太守,北凉残部西奔鄯善(今若羌县境内)。公元450年,车师前部王伊洛随魏军东征,留子歇守国。沮渠安国与柔然联兵围攻车师前国交河城,车师兵败,西奔焉耆,车师前国亡。

公元460年,柔然灭高昌,册立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城为国都,建立了一个汉族地方王朝,高昌城成为吐鲁番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阚伯周开始,吐鲁番进入高昌国时期。公元481年,回纥首领阿伏至罗立张孟明为高昌王。公元496年,高昌人杀张孟明另立马儒为王。公元501年,马儒欲内迁,高昌人恋故土,不愿东归,于是杀马儒而立麴嘉为王。自此开始了麴氏家族对高昌的统治。麴氏高昌国曾先后依附于柔然、高车、突厥,臣服于北魏、西魏、周和隋,并受其册封。高昌国建置为郡、县、城制,县下设乡,乡下设里。唐灭高昌时,高昌国有交河、田地、南平3郡;白苏、永安、元半、盐城、始昌、新兴、柳婆林、安昌、酒泉、威神、龙泉、横截等13县;高宁、临川、诸城、永昌、宁戎、东镇、笃进7城。公元639年,高昌叛唐,投西突厥,阻断西域通道。公元640年,唐灭高昌,高昌国结束了其180年的历史。这一

时期,表现在文化上,受汉化较深<sup>①</sup>。

公元640年,唐朝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师伐高昌。平定高昌后,设西昌州,改为西州,实行县(乡)、里制,下辖五县:高昌县、柳中县、交河县、天山县(今托克逊县境内)、蒲田县(今鄯善县境内)。唐置西州的同年,设安西大都护府于交河城,以乔师望为首任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安西大都护府领辖22个都督府,118个州。公元648年,安西大都护府迁至龟兹。公元651年,又撤回西州。公元658年,再次迁龟兹,西州改置为西州都督府。公元662年,吐蕃军队进入西域,开始了与唐朝长年的西域争夺。公元670年,吐蕃与西突厥联兵攻陷西域18州,唐放弃安西四镇,退守西州。公元689年,安西大都护府复移至西州。公元692年,又迁于龟兹。公元714年,唐置天山军于西州境。公元742年,改西州为交河郡。公元758年,又恢复西州原建置。公元790年,吐蕃与回鹘<sup>②</sup>争夺北庭(今吉木萨尔),吐蕃占北庭,随后攻占西州。吐蕃与回鹘对西州进行了长期反复的争夺,最终回鹘控制了西州,开始了高昌回鹘王国的时代。

<sup>①</sup> 《晋书·张俊传》;《魏书·沮渠无讳传》;《北史·高昌传》。

<sup>②</sup> 回鹘:维吾尔族的唐代译名,旧译回纥。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长寿天亲可汗遣使至唐,请改回纥译名为回鹘,取“捷鹘如鹘”之意,自此“回鹘”译名便开始通行。(见《新疆历史词典》,199页,薛宗正“回鹘”词条。)

## 第一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一、从鄂尔浑河流域西迁的回鹘

**建**于鄂尔浑河流域的回纥汗国由于协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很受唐王朝的赏识，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权，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财富。这时的回纥汗国可以说是既强盛又富足。汗国统治阶层，特别是在平定史思明叛乱中亲率大军出征的登里可汗，因功高权重，逐渐骄横起来。收复洛阳之后，登里可汗纵容部下大肆掳掠，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马寺惨案。《旧唐书》中记载：“初，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

公元780年，唐德宗初立，登里可汗受奸人煽动，阴谋乘唐朝皇位更迭之机，对唐朝发动掠夺战争。宰相顿莫贺达干顺应回鹘部众不愿与唐作战的情绪，起兵袭杀登里可汗及其二子。顿莫贺达干自立为汗，并遣使向唐朝说明事变原因，请求册封。唐遂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在其后的岁月里，回鹘统治阶层内部内讧不断，离心倾向日益明显。

这一时期，回纥汗国除了统治阶层动荡不安外，还孕育着其他的不安定因素。

回纥汗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国家，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严密的行政体系。当汗国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汗国所辖的各个游牧部族，迫于强大的武力威慑，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做出越轨行为。及至汗国后期，上述条件逐渐发生了变化。可汗的不时更替，迫使臣属汗国的各游牧部族必须随之改弦更张，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命运系于某一可汗，既得利益失去保障。更为严重的是，可汗的更替常常伴以各种规模的战争或冲突，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凡此种种，加剧了汗国所属诸游牧部族的离心倾向。

公元790年，回纥汗国军队在北庭配合唐朝军队对吐蕃作战失利，统率回鹘军队的宰相颉干迦斯迁罪于人，诱杀了唐朝的北庭节度使杨袭古，引起西域各地

人民的不满。

回纥汗国内讧不止,所属诸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外部又化友为敌,呈现出一派没落景象。这说明,汗国的车轮已经越过鼎盛时期,向着衰败的深渊滑去。

公元808年以后,回纥汗国在保义可汗的领导下,曾出现过一段复兴。这期间回纥汗国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一方面是由于吐蕃国势的一度衰落,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保义可汗本人的才能。但是,回纥汗国中兴时期取得的这些胜利已无法挽回其衰败的颓势了。

对于回纥汗国来说,诸多的不幸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其中黠戛斯人的进攻成为汗国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黠戛斯在唐以前我国汉文史籍中,称作“坚昆”、“结骨”,唐朝时才正式称作黠戛斯。黠戛斯起初受匈奴、柔然、突厥以及薛延陀的统治和奴役,回鹘立国期间,黠戛斯又成为回鹘的属部。公元795年,黠戛斯的首领在与回鹘作战时,被回鹘怀信可汗一箭射死。自此,黠戛斯与回鹘结下冤仇。

公元839年,回鹘发生内乱,宰相安允合和王子柴革相互勾结,阴谋篡位,被彰信可汗发现后杀死。与王子柴革关系密切的副宰相掘罗勿这时带兵在外,听说柴革被杀,就用300匹马作为礼物向沙陀突厥借兵,进攻彰信可汗。彰信可汗兵败自杀。掘罗勿扶王子勿荐公为新可汗。这年冬天,大雪不停,牛马冻死很多,回鹘缺少食物和粮草,国势急剧衰落。公元840年,将军句禄莫贺痛恨掘罗勿,投奔黠戛斯请兵,黠戛斯认为报仇的时候到了,于是出兵十万,在句禄莫贺的引导下,由北向南横扫回纥汗国,攻破汗国都城,杀勿荐公可汗,毁坏城郭,掳走财产。立国百年的回纥汗国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打击下终于灭亡了。

回纥汗国灭亡后的回纥部众分别向南、向西两个方向迁徙。向南迁的部众是住在汗国都城附近的13个部落,约10万户。他们越过蒙古大沙漠,南迁到唐朝天德军和振武军的驻防地区。南迁的部众于公元841年拥立乌介特勤为可汗。当时乌介可汗的牙帐设在大同附近,尚有10余万人口。向这样众多的人口提供粮食和衣物,对于唐朝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唐朝提出用粮食和衣物交换马匹,但乌介可汗拒绝了唐朝这一合理建议,他纵兵天德、振武防区和大同附近,大肆掠夺党项、沙陀等游牧部落,掳去的马匹、牛羊达数万之多。

公元843年,唐朝将领石雄、张仲武大败乌介可汗,乌介可汗逃往今河北北部黑车子部。几年后,他被部下所杀,其弟遏捻特勤被立为可汗。他率领的回鹘部众几经波折,所剩无几。公元847年,遏捻可汗为躲避其他游牧部落追杀,逃往山林,不知所终,其部众也几乎全部被黠戛斯追兵擒获殆尽。这一支南迁的回鹘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向西迁徙的回鹘人非常幸运地选对了方向,他们不但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西迁回鹘分为三支: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一支迁往吐鲁番盆

地,另一支迁往中亚草原地带。

迁往河西走廊的回鹘部众起先受吐蕃统治,后来他们积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10世纪初,他们成为河西地区威震一方的势力。其势力范围东起灵州,西至敦煌、玉门、安西一带。他们就是今天裕固族的祖先,所以裕固族在历史上又称作“黄头回鹘”,现在裕固人仍自称“尧乎尔”。

西迁的第二支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期以后,跨过阿尔泰山脉进入今新疆东北部。这支回鹘逐渐强大,到公元866年,已使邻邦刮目相看了。这一年,回鹘与吐蕃大战于北庭,回鹘大胜,遂据北庭。北庭一战,是西迁进入天山东北部的回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一胜利不但使他们有了立足点,掌握了深入天山南部的交通枢纽,而且由于北庭在天山南北的重要地位也给回鹘增强了自信心。从此,来自漠北高原的游牧部族回鹘,成为这一地区历史活动的主要角色。

回鹘攻占北庭之后,接着又攻占了轮台,然后南逾天山,占领西州,建立了西州回鹘政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高昌回鹘国。

西迁的第三支进入中亚草原地区。因为他们开始主要活动在帕米尔高原以西,所以史称“葱岭西回鹘”。10世纪时,这支回鹘建立了强大的喀喇汗朝,并向东扩展势力,进入今新疆西南部,在龟兹一带与高昌回鹘相对峙。

鄂尔浑回鹘的西迁进入今天新疆地区的回鹘人与原有的土著居民相融合,逐渐成为天山南北的主要民族。

## 二、高昌回鹘政权的产生

公元9世纪60年代,北庭回鹘中出现了一位名叫仆固俊的新首领,他就是高昌回鹘国的缔造者。仆固俊是当时唐朝沙州节度使张义潮发现并向唐朝政府报告的。仆固俊率领部众,向统治到安西一带的吐蕃人进攻。公元866年,仆固俊自北庭出击,大败吐蕃的大将尚恐热,夺取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要地。战败的尚恐热被拓跋怀先活捉之后斩首。从此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的政权逐渐巩固和扩大。

回鹘在高昌建立王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处于漠北回纥汗国时发达得多。这一巨变为其部众在天山南北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高昌回鹘最初进入天山东部时,完全处于逃亡和流徙的状态。他们最初对吐蕃作战的胜利并不完全基于自身的活力,而是利用了吐蕃的虚衰。此时回鹘的实力比它的敌对势力弱。在这些敌对势力当中居首位的是因击溃回纥汗国而称雄漠北的黠戛斯部。黠戛斯与回鹘的世仇并未因后者的分崩离析而一笔勾销。回纥汗国崩溃,回鹘部众逃离,虽然避开了黠戛斯的直接压力,却未完全逃离黠戛斯的势力圈。残存的回鹘部众,仍被黠戛斯视为心头大患。

与高昌回鹘政权为敌的第二股势力是吐蕃王朝。吐蕃在天山南部经营多年,历来将这一地区看做自身的安全屏障。尽管在与回鹘的最初较量中,吐蕃接连失利,但它决不肯轻易认输。

这一切,都一度使高昌回鹘处于不利的境地。但在这危机时刻,唐朝站在了回鹘一边,给予他们大力支持。公元856年,唐宣宗发布诏书:“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顺,北边无警……近有降者云,已特勤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封。”后来,当唐朝确知庞特勤已立为可汗后,当即予以承认。

公元863年,黠戛斯遣使入唐,要求唐朝允许他们攻击进入天山一带的回鹘部众,并把安西以东土地归还给唐朝作为交换条件,但唐朝没有答应。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制止了黠戛斯的行为,让回鹘躲过了又一场灾难。作为中央政权的唐朝,对于力争与其友好相处的黠戛斯,无疑是有约束力的。对于和唐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吐蕃来说,唐朝对其不会产生约束力,但必然增加回鹘的实力。这一点,在吐蕃看来显然是清楚的。

对于高昌回鹘来讲,唐朝的大力协助使他们暂时免去了外患,获得了统一内部、积蓄力量的机会,为他们以吐鲁番为基础作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 三、高昌回鹘的政治经济状况

高昌回鹘王国基本上沿用了漠北回纥汗国时期的行政建制。最高统治者称作可汗,可汗以下分两个系列:一个是贵族系列,一个是官僚系列。

可汗给贵族系列里的人分别授以特勤、俟利等贵族称号。当时获得这种贵族称号的,还有天山北部诸游牧部族的酋长。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于:获得贵族称号的诸游牧部族酋长在自己部落范围内拥有行政权,而获得贵族称号的回鹘人则没有这种行政权。

行使高昌回鹘王国行政权力的官僚机构的最高层是宰相和督屯,他们直接协助可汗处理军政大事。需要注意的是在高昌回鹘政权的行政体制中,首次出现了伯克的官职。

高昌回鹘政权存在的最初年代里,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公元10世纪中叶,契丹人消灭了北方诸割据政权,统一了黄河以北地区,建立了辽。在长江流域,赵匡胤消灭南方诸割据政权,统一黄河以南地区,建立了宋。这样,在中原地区就出现了势均力敌的两个对峙政权,即辽和宋。

中原地区政局的变动,引起了天山南北各政治势力的重新组合。这些政治势力为了抵消来自各自对方的压力,或投靠辽,或投靠宋。

大体上讲,天山以北是辽的势力范围。辽在天山北部各游牧部族中间,分别设



置了黠戛斯王府、西突厥王府、乌孙王府等机构。

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则为宋的势力范围。宋与这个地区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与于阗政权有着密切的往来。

出于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的考虑,高昌回鹘与辽、宋都力图保持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高昌回鹘政权与宋也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从公元962年到公元1020年,高昌回鹘政权向宋派出过7个人贡使团。这些使团规模都很大,既包括官员,又包括佛教僧侣。宋也非常重视与高昌回鹘政权之间的关系。公元981年,宋派遣王延德、白勋出使高昌,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这个使团于公元982年到达高昌并受到隆重的欢迎。高昌回鹘可汗在汗国的夏都——北庭亲自款待了宋朝使团。宋朝使团在高昌逗留了将近一年。王延德利用这段时间考察了高昌回鹘的政治、经济状况,并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记载《使高昌记》。公元983年,王延德为首的宋朝使团在完成使命起程返回时,高昌回鹘还派出100多人的使团,随王延德去宋朝表示答谢。

高昌回鹘在对待辽和宋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这种双重性,一方面是因为辽、宋互相对峙,无力在天山南北行使权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的高昌回鹘政权,以吐鲁番盆地为基础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谁也不能对它等闲视之。

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的绿洲土地宽广,资源丰富,有充足的水源和较先进的灌溉工程,所以发展农业、牧业、手工业的条件比较有利。

高昌回鹘王国的经济随着西迁而来的回鹘人在此主政而实现由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经济类型的转变,这在回鹘人的历史上,包括维吾尔文化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影响远远超过事件本身。天山南部地区远离海洋,四周又有大山阻隔,潮湿空气不易进入,因此,形成了相当干旱的大陆性气候。每年平均温度为 $3^{\circ}\text{C}$ — $14^{\circ}\text{C}$ ,无霜期长。在吐鲁番盆地无霜期更是长达250天之久。土地多为灰棕色荒漠土、棕色荒漠土或灰钙土,易于开荒造田,种植各种农作物。大自然赋予这一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中我们得知,早在公元以前,今莎车、喀什噶尔、库车、轮台、焉耆以及吐鲁番盆地,已经有了农业生产。西迁的回鹘进入吐鲁番盆地的时候,塔里木盆地周围各绿洲的农业,无论就其规模而言,还是就其种类而言,或者就其设施而言,都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而且正在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维系和推动。

显然,对于原本以游牧为主的回鹘来讲,“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来到天山南部地区,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他们面对这新的环境必须作出或是改变、或是顺应选择时,他们选择了后者。依照这里的客观条件,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就范于当地的农业生产。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土地引起了回鹘国统治阶层的强烈兴趣。据史料记载,王国的土地大致分为四种占有形式,即王国所有的土地,亦都护所有的土地,寺院所有的土地和小农租佃的土地或个人所有的土地等。

**王国所有的土地:**是指属于王国所有的土地,包括尚未划分给封建主、宗教裁判所和农民的耕地。尚未开垦的土地、没收的土地以及果园、森林、草原,包括河流、水渠等也归王国所有。王国所拥有的土地伸缩性相当大。王国如果把国有土地分赐给寺院或者分给迁移来的农民,王国的土地就会减少。但由于新开垦大片土地,王国所有的土地就又有所增加。

**亦都护的土地:**亦都护的土地是归亦都护及其家族私有的土地。这样的土地相当宽广,如草原、狩猎地以及国王、大臣的陵园、宫殿等。亦都护的土地由国家派专人看管并耕种。

**寺院的土地:**在高昌回鹘国境内,佛教居于统治地位,为了传播和巩固佛教,王国分给寺院一定的土地和农民。农民耕种寺田,将收获的一部分用来供养僧侣。如未交足定额,政府便要强令他们交纳。

**小农租佃的土地:**多数农民的土地是政府或封建主租给的,因此,农民要向政府缴纳赋税。一件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中写道:农民无力向领主缴纳贡品和酒,为了抵偿全部债务,只得出卖沿河两岸的牧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卖主要提出十人为证,这十户证人可能是与此农民相关联的整体,从而保证了每一户农民对国家应尽的赋税义务,并且保证这些农民不会随意舍弃土地而逃往他方。

对于土地的追求,一度引起了回鹘王国社会内部的分歧。从《福乐智慧》中我们得知,围绕农业地位的问题发生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福乐智慧》作者生活的公元11世纪下半叶。这种争论反映出农业经济不仅在回鹘社会结构方面引起了变化,而且在政治观念方面也引起了冲突。

尽管围绕农业的地位问题长期存在争论,然而这些并没有阻止住回鹘国统治阶级对于土地的追求和攫取。大约在公元9世纪末的时候,高昌回鹘国疆域内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大部分回鹘贵族倚仗政治特权占有了大量农田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水利设施,开始向封建地主转化。

封建制度的确立是高昌回鹘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进步。由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与当时高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所以促进了高昌回鹘社会的发展。

到了11世纪初,高昌回鹘王国疆域内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尤其是园艺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又为高昌回鹘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活跃,提供了丰富充裕的物质基础。

## 第二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经济文化

### 一、定居的农业文化

**高**昌回鹘的诸种经济活动中,农业经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固然得益于高昌独特的自然条件,但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也是分不开的。高昌的农产品种类繁多,有小麦、水稻、大麦、豆类等粮食作物和棉花、葡萄、瓜果、芝麻等经济作物。其中小麦与杂粮交替播种,可以一年两熟。高昌出产的棉花一向著名,多用来织布。棉织布柔软耐用,回鹘人在市场上把它当做商品交换,当时的汉人称之为白氍布或花蕊布。19世纪在高昌境内发现了七八件高昌回鹘国时期买卖棉布的回鹘文契约文书,文书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王国境内棉花和棉布生产的情况。拉德洛夫所写的《回鹘文献纪念集》一书中就收录了这样两件契约文书。一件文书称:云拉柯立克需要棉布。为了借得棉布,愿将葡萄园丁送到伊利霍加处作为抵押,替霍加劳动负担霍加的赋税,并将土地上的所得奉送给霍加。另一件文书称:回鹘人西什和柯莱二人需要棉布,于是向奥奎各赊借棉布三匹,讲好春借秋还,利息加倍,到时每人要奉还棉布六匹。如到期不能如数偿还,按照民间俗例,还要外加息。这两件文书的内容反映了高昌回鹘国的棉花生产与棉布的生产在王国的生产中都是重要的项目。

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或者长圆形的马奶子葡萄在国内外享有盛名。高昌回鹘王国的封建领主经营葡萄园的很多,私人间买卖葡萄园及酿葡萄酒之风也很盛行。回鹘人白泰米尔租借特米奇在普星山的葡萄园一片,租价是10个塘(Tang),春租秋还,葡萄园的赋税仍由原主负担。还有以葡萄酒换借棉布的字据:回鹘人土耳排因急需棉布,愿以一皮囊葡萄酒向契依穆图交换一匹半棉布。先借棉布,葡萄酒于秋初奉还。如不能按期归还,依民间惯例愿增加利息。王国政府不但要向酿葡萄酒的人征收赋税,而且还要征收一部分葡萄酒。这些酒的一部分被存放在专门的酒窖里。阿拉伯史料说到九姓乌古斯可汗王宫里的侍从非常多,王宫里每天要喝三次葡萄酒。唐代库车一地盛产葡萄,富家酿制葡萄酒多到几百石。这种情况到

高昌回鹘国时期,肯定也不会改变。

冯·加班女士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一书中记载了在高昌出产的水果和几种农产品的回鹘文名称,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农业生产和园艺业发展的一个侧面。“由于高耸的天山南面日光照射的地势,高昌以出产上等水果而闻名。就中出产 sarjārük(杏)、tülügarük(桃子)、üzüm(葡萄),葡萄也作为葡萄干食用,也用葡萄制作 bor(葡萄酒),葡萄酒是该地极为重要的税收和商品。astguüzüm(葡萄藤)也用葡萄制造 sücük(果子酒)和 borsirkū(酒醋)。在 qabaq 和 qayun(甜瓜属)中有长形瓜和圆形瓜。其次应该提到 nara(石榴)、itburun(野蔷薇果)和梨,有一幅图画绘出了梨树叶。除葡萄酒外,人们也饮 bakni(啤酒)。蜂蜜用假借词 mir(来源于汉文‘蜜’,又来源于 miet)表示,或者称为 banit,这个字与梵文 phanita 有关系。sakar(糖)——与文学语言一样——与中伊朗语 sakar 有关系。必要时甚至‘面粉’也用假借词 min(来自汉文‘面粉’,又来自 mian - men)表示。”<sup>①</sup>

“在谷类果实中,各种各样的黍有重要作用:qonaq, yur = oyur 和 togu; yur 和 tuki yur(脱壳黍)要纳税。aypa = apra(大麦),也用大麦制造 talqan(烘烤的大麦粉),值得指出的是,除 bugday(小麦)和 kuruc(大米)以外,大麦也用作食物:tuturqan, burcaq(豌豆) sogun(洋葱), satun 或 usqun(大蒜)。kuncit(芝麻)由于芝麻籽和芝麻油(kuncityagi)而被人们栽种。

“kapaz(地里的棉株), batatu(未经纺织的棉花)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意义。棉花的质量可能 taz(粗糙)或者 yumsaq(柔软)。把棉花打成一定长度,一定宽度和一定质量的包。有几次提到了喀什噶尔和遥远于阗的棉花的质量。在打包的时候,始终在质量问题上打着印记:luigcun kidininta yorir suolugtam galig uc otuz boz(二十三件打着喀什噶尔印记的棉花,在柳中那边交易)。与此相类似:因为棉织物的税收特别频繁,必然存在许多家庭纺织工厂。”<sup>②</sup>

## 二、畜牧业

畜牧业在高昌回鹘王国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延德曾亲眼目睹了王国养马业的兴盛,他在《使高昌记》中这样写道:“养马放牧于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王国境内的北部是广袤而优良的牧场,放牧着马、骆驼、牛、驴、单峰驼,另外还有野马、牦牛、大头羊、黄羊、羚羊等野生动物。在各地农业使用较多的耕畜则是骆驼、牛和驴。马匹多用于交通工具。在地区之间经营商业,马匹的需求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军事上,马匹的使用很多。每逢战争发生,壮丁

① 冯·加班著,郎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42页,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② 冯·加班著,郎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42页,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都跨马投入战斗。1001年,高昌回鹘国派往沙尔比的使者曾经对自己国家的富足与强盛有着这样的描述:“那里的任何一位小的长官,都拥有数百个骑兵。”

养马业的发展除了适应军事的需要,还是因为当时高昌的交通运输和人们的旅行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依赖马。冯·加班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一书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

例如:“人们喜欢骑长背和四足不太直的牲口,因为这种牲口弹跳力好。乘骑时,勒住缰绳,而不上嚼口铁。除非在非耕作地区,不给牲口上蹄铁,在耕作地区,给牲口的前蹄安上蹄铁。马和骡要训练溜蹄,如果它们生性不要溜蹄,那么在溜蹄时,人们可以长时间乘骑,而不会使它们疲倦。因此,一匹供乘骑的牲口在经过良好的溜蹄训练后,其价钱便提高了。所有赛跑也采用这种跑法。如果牲口在疾驰或飞跑中失蹄,则必须退出比赛。人们在买牲口时,根据红色、黑色和黑红色口腔来识别其优劣。人们不喜欢黑红色口腔的牲口。如果把一匹牲口祭神,则在鬃毛和额毛上系上红色布带。”<sup>①</sup>

再如:“特别谈一下马,公马不用来乘骑,上等人士骑阉马,少数人喜欢骑母马。在骑乘和赛马时人们让马奔跑和不让马头抬起来。这样,马必然迅速向前行走。在骑乘以后,马像驴子一样在地上打滚,抖动身体。然后,人们牵着马溜一会儿。在骑乘时,马不如骡子那样有耐力。人们常常必须下马,牵着马行走,在长距离骑乘时,甚至让马在地上吃草,或者给马喂饲料。马比骡子怕热。在山地,马不太安全,身躯短小的大同马例外。马的蹄子比骡子的蹄子大,马有长鬃和额毛。人们特别喜欢用白马祭祀神灵。”<sup>②</sup>

关注辔具和马鞍,刻意对马进行装饰,甚至在马尾巴上打结都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高昌回鹘对养马业的重视。

例如:“不论在北魏和西魏时代的敦煌,或者在公元7世纪以前的库车,都没有发现鞍蹬,不过在公元4世纪左右可能有了鞍蹬。但是,如果说唐代敦煌一个滚鞍下马的骑者的鞍蹬系得很牢,那么这便证明已经充分认识鞍蹬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有用。在丹丹乌里克也发现了鞍蹬。在高昌回鹘,显然已普遍使用鞍蹬。”

再如:“在高昌,天仙的马装饰得非常华丽,马身上饰以大大小小的璎珞、小铃和皮条。在这里可以不考虑这一些。在我们看来,骑士的马的装饰有重要意义:所谓‘阿斯塔那的蓝色骑士’在马身上悬挂璎珞,约每三个璎珞扎成环圈系在胸脯和尾巴皮带上。起源于回纥时代的‘鸟附身者’的马,在脖子和胸脯的皮带上挂着璎珞还挂着头饰。可以设想,这种璎珞是否只是装饰品。脖子上灵活的璎珞可以抵挡敌人的刀矛。手背上的璎珞可能是防止枪刺的保护物。或者一定数量的璎珞可

<sup>①</sup> 冯·加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22页,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sup>②</sup> 冯·加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23页,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能被认为是‘马尾巴’，使得骑士享有马匹众多的声望。这也许是挂在矛尖上作为一个著名骑士标志的奥斯曼‘马尾巴’的由来？”<sup>①</sup>

又如：“高昌也采用这种标记：一个疾驰甲士的马和悉达多出家时骑的马，尾巴尖扎成蝴蝶结，这是一个也许不保持很久的措施。高昌‘鸟附身者’的马尾巴，在下半部用马尾毛松松地捆扎起来，这看来是一种比较实在的办法。如果用一个大箍把马尾巴箍起来，这倒很漂亮，也很结实，但对于马来说就不方便了。”<sup>②</sup>

### 三、建 筑 业

高昌回鹘国的建筑业是发达的，尽管今天已没有保留下多少高大完整的建筑，但历经千年沧桑仍然风韵犹存的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却在印证着当年的辉煌。从昔日建筑的废墟和保留下的当时的图画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自漠北的回鹘人在高昌所做的建筑是受到汉人的强烈影响的。

吐鲁番绿洲是一个黄土地带，这是一种粘结牢靠的土壤结构，以至于当高大的木轮车在这种土地上行走时会在地面上留下深陷的车辙，而且非常坚硬。这种土质有利于洞窟住宅的建设，因为陡峭的房屋正面可以利用“现成的”垂直壁立的土坎。这种洞窟式结构的建筑不是贫穷的象征，而是比较舒适的。因为对于吐鲁番这样的“火洲”来说，洞窟式结构夏天可以防暑，冬天可以御寒，其优点是不言而喻的。

高昌回鹘国护城的城墙很厚，城墙的下部特别是城门附近，有时可以容纳一间小斗室或者房间。城墙里常常有一条狭窄通道，人们可以踩着墙壁里的小踏洞沿着通道往上爬。城墙顶上的房间通常是武器库。

城墙的角上有时附加一个隆起的四角墩，四角墩饰着浅色和深色相间的瓷砖。这个建筑部位常常安上一个半球形的小顶，这种顶是按照库车和片治肯特的样式制成的。

城墙或大住宅区的门与宽度相比显得很高，门有两扇，朝外开。门墩朝里突出，城墙的墙壁里有时设一个小壁龛，可以放蜡烛或灯盏。

从吐鲁番保留至今的图画表明，城墙和重要房屋一般是建筑在台基上，台基用两种面砖呈棋盘形镶贴起来。房屋的台基都有回廊，与现代中国的建筑式样不同，这种回廊不是用低矮的栅栏，而是用镶贴面砖的墙壁与外面隔离开来。

重要建筑物的内墙只用石灰刷白，但是寺院的内墙则大多数装饰着图画或阿拉伯式的花纹，有时墙壁上也嵌着彩色瓷砖。

① 冯·加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27页，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② 冯·加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27页，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城门和重要建筑物的大门常常涂着牛血,饰着门蕾。两扇门的每一扇上安着二至六行门蕾,每行二至七个门蕾。不清楚门的颜色和门蕾的数目是否意味着一种特权。城门和私人住宅的大门上有时建筑一间小屋。私人房屋的这间小屋常常布置得非常漂亮,以致它可能不只用作门房,而且也供住宅里的人用作瞭望塔。

住宅建筑的墙壁有时被小壁龛隔断,其中可能放置家用器具。而寺院外墙上的一大壁龛则用来放置神像。

在以前祭祀建筑物的废墟上还发现窗户痕迹。位于最上面的小窗户安着龙骨拱,窄堵波安着圆拱窗户。此外,在内院和内花园也许有许多窗户。在古代,房屋正面墙壁还较少用木结构,即使是砖墙时,窗户也很少建成钥匙孔形状。高昌愈是推行汉族风格,则各种形式的红色栅栏愈是取代正面的砖墙。在一张木板印刷物上绘着一个低矮的长方形窗户,这个窗户使人们能够眺望湖泊和山岳。可见这个窗户不是建筑在内院,而是朝向户外。

中国自古以来存在两种建筑方式:为地下的坟墓建筑拱顶,而为地上活人的住宅建筑木结构。但在高昌的地面建筑中却同时采用这两种建筑方式,因而也部分地采用宏大的半球形屋顶,不过,这种半球形屋顶主要应用于大神殿,而不应用于住宅。大神殿采用筒形拱顶。在这里,筒形拱顶覆盖在主要神像周围的回廊或走廊上面,它们常常绘着布满花卉的图形,下缘绘着帷幔。筒形拱顶还绘着挂满葡萄的葡萄藤,表现了一种敞开的走廊的思想。筒形拱顶尽头的半圆形窗户在必要时也布满着藤蔓缠绕的花卉和人物场面,平顶则是住宅的常见构造。平顶一般刷成白色或者装饰分格镶板。

在汉人影响下,高昌在建筑上常常采用装饰得相当讲究的栅栏。台基、房屋的上一层楼阶梯和养鱼池一类的地方,都有栅栏围绕。这种栅栏用红色木条做成,其柱头有时具有蓓蕾的或盛开的小莲花形状。栅栏有时还有金属饰物。

用厚实的墙壁建成的古代神堂在里面有楼梯,这种楼梯可能建成盘旋梯,在外面有的也有规模很大的门前台阶。

#### 四、手工业

高昌回鹘国境内的手工业较以前更为进步。采矿冶铁业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王延德称:回鹘人性工巧,善于冶炼金、银、铜、铁,把它做成各种器具,还会雕刻玉器。

王国的棉纺织业相当发达。出土的回鹘文契约文书证明纺织品产量相当高。仅拉德洛夫刊布的几件文书称:回鹘人特戴弥黎克和卡拉普尔二人因出卖妇女,一次就得到棉布 150 匹。卡林木图转卖一个女奴就从布拉特手中一次得到棉布 100



铜制手工艺品



戈壁旅行者的行囊——胡尔俊



匹。一个织布匠为了缴纳可汗税等项欠款,在一个月里就交出十来匹棉布,可见高昌回鹘国境内织布业的发达。除棉织业外,蚕桑、丝织和毛纺织也占重要地位。鲁克沁一带因麻纺双股线织成的布而著称。吐鲁番传统的刺绣及其种类很多。20世纪中叶以来,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棉、毛、丝、麻织品的总数已逾千件,丝织物的种类达十几种,其中有绢、花缎、艾提等。属于唐代的有带双狮图案的锦缎,带珍珠图案的礼服。有在天蓝底色上用金线绣葡萄图案的白底绣花彩绸。属于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丝织品有珍珠图双图案的锦缎。从纺织技艺上看,出土的丝织品,除中国传统的“编线绣花”锦缎之外,还有具有典型的西域风格的“挑花绣花”织品。

高昌回鹘王国的手工业生产中还有一件特别的物品需要提及。在衣服的口袋发明以前,人们通常把随身携带的物品挂在腰带上。不过,回鹘人和突厥人系腰带的方法与汉人不同。在高昌回鹘人中,腰带上的悬挂物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当悬挂物部分地成为一种标志时,它们原来都是有日常用途的。腰带上的悬挂物有:筷子、钻孔器、小刀、盛火绒、火石和打击铁的袋子,最后还有一小块包布。正因为要悬挂这么些东西,腰带的作用才凸显出来,所以在高昌的手工业中,腰带制作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内容。

腰带一般用皮革制成,多无扣,只在皮带两端各有一个金属环。根据图案来判断,有两种腰带。一种是腰带从前面穿起,两端向后缠绕,再从后面交叉又绕到前面,一直绕到髋部,两端在髋部用套环套住,从那里在两个髋骨上面一掌处垂下来。

另一种腰带则是把腰带从后面穿起,一端绕到前面腹部中间,用一个环套住,并且从套环垂下一掌长。腰带的另一端在前面不是与这一端固定起来,而是穿过去在腹部中间另一侧同样用一个套环套住,从那里垂下来。

另外,高昌回鹘人所使用的草垫、祈祷用的地毯、举行宗教仪式用的地毯以及装饰用毛毯也都是很常用的手工艺品,自然也同它的手工业密切相关。

高昌的金银首饰、玉雕工艺品早就远近闻名,是当时中原地区和中亚诸国统治阶层争相抢购的珍品,足见其手工业发展水平。

### 第三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商业和交通运输

**回** 鹘西迁后,由于生产的发展和东西交通的便利而变成擅长经商的民族。这种贸易和经商活动同时向几个不同方向展开的。高昌回鹘与五代、北宋的贸易中最大的一宗当属马的贸易,所得马匹主要充作战马。根据公元924年到1025年近百年的统计,就达3000匹以上,其中有些年份尚无准确的数量记载<sup>①</sup>。后晋时,契丹南下,后晋所需战马也常常向回鹘购买。

吐蕃到宋初已经逐渐衰微,而西夏从1032年赵元昊即位后,同北宋的关系是战多和少。因此,回鹘与北宋之间马的贸易,从公元10世纪中叶到公元12世纪始终不断,而最大的一次交易要算1085年的价值120万贯钱的买卖,如果按当时的价格一匹马最高价为50贯钱算的话,那么此次马的交易数最少也得24000匹,足见贸易量之巨。

药品及香料的贸易也是回鹘与五代、北宋之间商业活动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交易的主要品种有硃砂、星矾、羚羊角、大硼砂、膻脐、大琥珀、梧桐泪、香药、乳香、木香、安息香、鸡舌香、胡黄连等。虽然交易的数量无法精确统计,但根据《宋会要稿·食货》三八记载,仅乳香一项私人的交易就有达数万斤的,可见是一桩很大的买卖。

其次是衣料及装饰品的贸易。高昌回鹘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力发展为衣料及装饰品贸易提供了可能。交易的主要品种有白玉、玉团、波斯宝碟、玉带、白氍布、斜褐、绿野马皮、白貂鼠皮、青貂鼠皮、岑皮靴、玉珠子、碎玉、琉璃、花蕊布、胡铮、宿绫、翡翠等。

回鹘以大量马匹及其装备,还有药物、香料等物资向北宋输出,而北宋的交换品则为金银首饰及铜钱。由于回鹘同北宋巨量交易的结果,使北宋金银的价格上涨,足见其商业之兴盛。

高昌回鹘同契丹、女真的贸易也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商业活动的重要内容。回鹘同契丹的贸易,大约每隔三年有一次较大的贸易,连国王都亲自参加评价。

<sup>①</sup> 《维吾尔史料简编》,上册,70、71页。

贸易的商品,除药品、香料、装饰品及兵器外,还有细毛织品,而换来的几乎全是契丹货币。

自古以来,高昌就是我国中原地区通往西域以及中亚、西亚、欧洲各国交通要道上的重镇。

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此后,官吏、僧侣、学者来往其间,络绎不绝。公元前101年,汉朝就在轮台、渠犁设置了“使者校尉”等机构负责屯垦戍边,护送来往使者,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分南北两道。高昌是北道的必经之地。此后从中原地区到西域,又开辟了从敦煌经伊吾、巴里坤、车师后王庭、轮台西行的新北道。经高昌西去的丝绸之路随之改称为中道。

唐代,高昌改称为“西州”,是西域都护府的所在地,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扼东西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丝绸之路来往畅通。沿途设驿站,便利来往官员、行人,当时的高昌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市镇。据史书记载,高昌古代的交通网络主要有以下各条:

伊西道:据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由古都长安至安西都护府,是从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到达吐鲁番的一条重要路线。其中,吐鲁番到哈密段在《西州图经》上被称为“伊西道”。

银山道:交河曾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曾设西州交河郡、金山都督府,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交河西南行,经托克逊、卧虎不拉沟、库米什、榆树沟、和硕至焉耆的路线在《西州图经》中称为银山道。“右道出天山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磧,唯近烽、足水草、通车马行。”

金岭道:汉唐及其以后,逐渐开辟了吐鲁番直达吉木萨尔之间的道路。《西州图经》称“他地道”,“出交河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逐水草,唯通车马”。其路线是现在的交河故城向西北,沿大河沿河谷上溯,翻越天山达坂,沿大龙口河谷,经过长山渠,直达吉木萨尔后堡子古城,是吐鲁番通往天山北麓吉木萨尔的捷径,也称“西州路”、“柳谷道”。宋时王延德出使高昌就是走的这条路。

白水涧道:《西州图经》残卷记载:“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以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此道也就是现在的由交河故城向西北,经过三个泉入白杨河谷,经达坂城到乌鲁木齐的古道。

赤亭道:唐代中期由于塔里木河改道,罗布泊干涸。柳中、蒲昌通向沙州的道路中断。此时又开辟了赤亭道。此道由赤亭(今鄯善县七克台)西至西州,东可达伊吾,西南越白龙滩可达沙州。当时赤亭是从中原通往西域两条道路的交会点,在

古代交通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正是有了以上的交通要道,才保证了在高昌回鹘国时代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与来往,也促进了高昌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为了便利过往人员,在交通要道上每隔一定的距离,选择有水草的地方设立驿馆。吐鲁番境内就设有龙泉、吕光、宁戍、交河、天山酸枣、留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东碛、石舍、柳中、赤亭等驿馆,各驿站设驿长、马夫等人,配备一定的交通工具(马、驴、车等)形成较完善的交通网,保证交通运输畅通。

## 第四节 高昌回鹘王国水利设施

**自**汉武帝通西域开始直至唐初,吐鲁番一直是通往西域的要道,也是当时的屯田中心。屯田产粮不但供应居民和守城官兵食用,而且还要为过往官兵准备足够的粮草。春季仅依靠泉水和少量河水是满足不了生产需要的。吐鲁番每年2月10日左右开始播种春麦,3月初灌菜地,3月中旬开始播种大田蔬菜,3月20日左右开始灌棉田,4月初开始种棉花,而一般年份,天山上的积雪到6月15日左右才开始大量融化形成洪水,在6月中旬前的河水总量只占全年水量的15%。来水量和农业用水量之间的悬殊差距,形成历年的春旱。为了解决春旱,古代吐鲁番人逐步认识到掏泉或延伸泉可以增加水源的道理。

从公元501年高昌麴嘉为王,到公元640年唐灭高昌,设西州都护府,下设5县,吐鲁番的农田水利发展较快。从吐鲁番大量的出土文书可以看出,当时兴修了不少渠道和堤堰,并设置了专门的水利管理机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西迁而来的回鹘人由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经济类型的转变,继续从事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护。

## 第五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文化

高

昌回鹘王国时期的文化活动在文化领域中发生的变更,较多地表现为过程和征兆。

### 一、语言文字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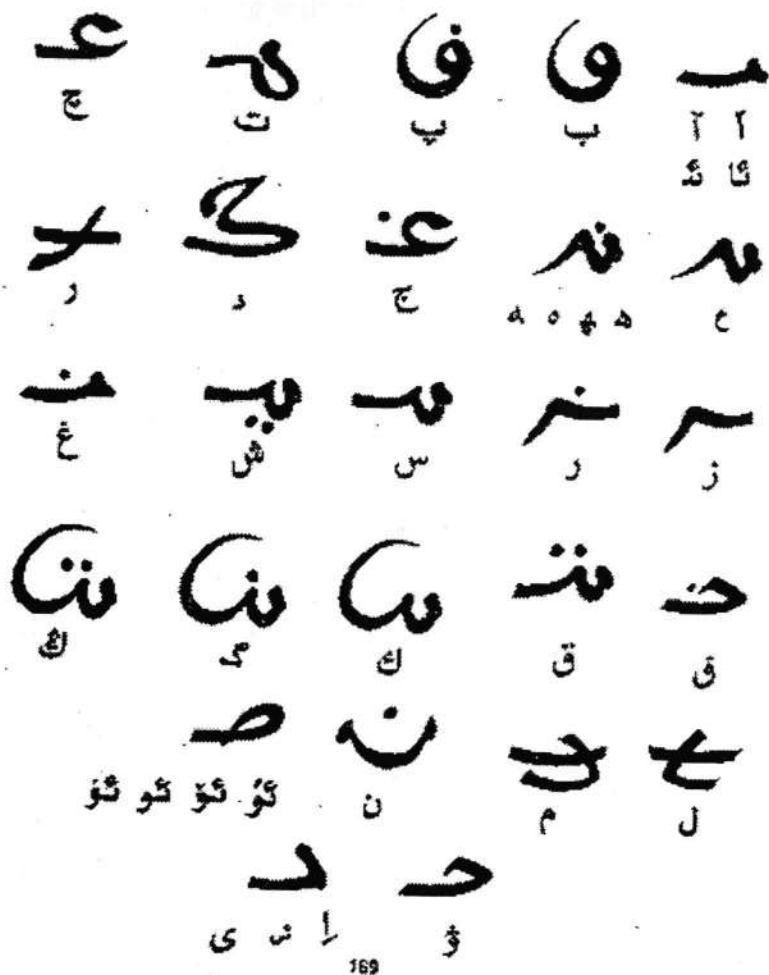
突厥汗国在天山南北的统治,已经打破了早期塔里木盆地的语言格局,使突厥语逐渐渗入曾经是塞语、龟兹语、焉耆语通行的地区,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交际工具。在高昌回鹘国之前的几十年间,除了汉语外,吐蕃语曾一度通行于这个地区,但是由于当地居民中操突厥诸语言的人口迅速增加,因而吐蕃语远没有达到突厥语普及的程度,这一切,为属于突厥诸语范畴的回鹘语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这一时期回鹘人在亚洲腹地取得的政治优势,也是回鹘语得以传播的重要原因。据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记载,到11世纪,回鹘语已通行天山南部,在东起河西走廊,西至中亚布哈拉绿洲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取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

随着高昌回鹘政权的日益巩固,回鹘语逐渐由世俗生活领域向宗教典籍方面渗透。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用回鹘文翻译的佛教典籍。

完整保存到现在的有《弥勒三弥底经》。该书共608页,由吐火罗文翻译成回鹘文。除了《弥勒三弥底经》外,翻译成回鹘文的宗教典籍还有《妙法莲花经》、《观无量寿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玄奘传》、《俱舍论安惠实义疏》、《摩尼教徒忏悔词》、《福音书》等。

《金光明最胜王经》和《玄奘传》是由别失八里人僧古舍里都统翻译成回鹘文的。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回鹘语当时被称作“突厥语”或者“突厥一回鹘语”。

生活在12世纪下半叶的回鹘哲理诗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将当时通行于喀喇汗朝疆域内的回鹘语,称作喀什噶尔语。他在自己的哲理诗《真理的入门》中写道:“我的语言是完美的、纯洁的喀什噶尔语,它有着优美的风采。”在这部



回鹘文字母

长诗的结尾部分,阿合买提·玉格乃克写道:“我用喀什噶尔语写完了这部长诗。”作者的这些说明性文字表明,这一时期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和中亚河中地区的回鹘语,还有另一个名称——喀什噶尔语。

创造回鹘文是高昌回鹘国的重大文化成果。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关于回鹘文的起源及其开始使用的时间,学者们普遍认为,回鹘人在西迁之前就已开始使用源自粟特文的回鹘文,但广泛使用是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后,回鹘文因时期不同,其字母数目也各异。一般认为,回鹘文字母最少有18个,最多达23个。每个字母在词首、词中、词末的书写形式也不相同。其中5个字母用来表示8个元音,辅音字母18个,标记21辅音音位。

早期回鹘文横写,从右至左;后在汉文的影响下改为竖写,从左到右。高昌

回鹘国广泛使用回鹘文以后,逐渐废弃了古代突厥文。但是 11 世纪喀喇汗朝建立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葱岭以西至喀什一带的回鹘人首先改用了阿拉伯文字母。而回鹘文则在新疆东北部和甘肃的回鹘人中长期通行。在哈密、吐鲁番一带,回鹘文使用到十五六世纪。在甘肃酒泉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经》刻本则刻成于 17 世纪。

回鹘文除了以上在语言学范畴内的一系列特点外,其最重要的特点则是其应用的广泛性。如果说鄂尔浑时期回鹘人使用的文字仅仅反映在墓志铭方面的话,那么高昌回鹘国时期的文字则在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刻而明显的痕迹。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 10 世纪前后的维吾尔文献,差不多都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其中包括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玄奘传》、《金光明经》、《摩尼教徒忏悔词》等。

这一套文字还广泛用于官方文件、民间契约、商业合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用途表明,回鹘文已经成为这一特定区域内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文字。

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先民对人类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也是维吾尔族先民历史上最早用于印刷事业的文字。

19 世纪末,法国探险队的伯希和在敦煌千佛洞捡到几百个回鹘文木刻活字。1914—1915 年俄国探险队在吐鲁番的千佛洞又捡到数千枚。这些木活字不是单体字母,而是一个个单词。这些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为研究高昌回鹘国时期的印刷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使我们对高昌回鹘国境内的印刷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印刷上采用木刻活字是印刷技术的一大进步。中原内地地区使用这种印刷技术是在 1295—1300 年之间,首先使用者为王祯。吐鲁番地区出土回鹘文木活字的事实证明木刻活字印书法也曾在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采用。这种方法的采用,可以大幅度提高印刷效率,对于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于回鹘人使用雕版印刷术则更是早于活字印刷,而且取得过重大成就。

公元 7—8 世纪是雕版印刷的极盛时期。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出现了许多印刷中心,吐鲁番盆地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 755 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中原地区政治失调,经济破产,百业荒废,印刷事业也受到严重摧残。然而,这些不幸的变乱,客观上却突出和强化了吐鲁番盆地的印刷事业在全国的地位。因为,严重的战乱始终远离这一地区。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回鹘进入吐鲁番盆地的时期。

高昌回鹘王国的印刷事业是整个维吾尔族的民族文化史上绚丽的一页,但这一重要成果直到 19 世纪末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之前,无论是创造了



这种文化成果的场所还是完整的印刷成品,都由于宗教偏见和宗教战争而无一幸免地遭到了毁坏。19世纪末,当人们第一次在瓦砾遍地的废墟中发现这些散乱而又残缺不全的印刷品时,它的数量之多,仍然使人们吃惊。比如,在高昌故城一个佛教寺院里,散落的纸片高可及膝。稍后,在吐鲁番盆地的木头沟的一个佛教寺院遗址里,终于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大批雕版印刷品。

从印刷术后来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的情况来看,高昌回鹘接受并发展吐鲁番地区印刷事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范围。13世纪,印刷术传入伊朗和埃及地区。直到15世纪,欧洲才有了雕版书籍。在南亚洲西部地区、非洲和欧洲传播印刷术的过程中,吐鲁番盆地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 二、宗教信仰

### (一)佛教

回鹘人定居高昌之后,新的环境不但使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组,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引起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高昌回鹘皈依了佛教。

佛教是世界性宗教之一。佛教传入西域虽然早于回鹘入西域,但回鹘人皈依佛教,促进了佛教的繁盛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其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尽管佛教进入西域并有了一定的根基,但是它要渗入并控制回鹘的精神生活却非轻而易举。因为从漠北而来的回鹘人带来了他们固有的宗教——萨满教和摩尼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这些宗教必然地要同佛教进行抗衡和竞争。抗衡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回鹘人皈依了佛教。从那时起,将近600年间,佛教在回鹘人精神生活领域内,一直占据着首要地位,而留在河西走廊的那一部分回鹘人的后裔,则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自己信仰。

佛教得以在高昌回鹘中间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统治阶层对于精神手段的迫切要求。如果把漠北回纥汗国的政治威力与高昌回鹘国的政治威力相比较的话,自然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回纥汗国在其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所以,对回纥汗国的统治阶层来讲,借助精神手段并不是十分急迫的。但高昌回鹘国政权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它利用时代造就的某些条件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但是在其内部和外部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结果,它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受到严重抵消,显然,高昌回鹘政权要维持其统治,仅仅依靠其有限的武力是难以办到的,而借助精神手段就成了重要的选择。

高昌回鹘统治阶层在宗教问题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皈依佛教满足了其统治阶层借助精神手段的需要。

既然首先是统治阶层需要借助佛教,这就注定了佛教传入回鹘的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即首先皈依佛教的不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而是其统治阶层。

高昌回鹘皈依佛教的最早记载于公元965年。这一年,高昌回鹘王政权派出以和尚法渊为首的人贡使团去宋朝入贡。这是一个纯宗教性质的使团。

随着佛教在回鹘人中间的传播,回鹘和尚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佛教事业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他们的活动不仅仅限于天山南部地区,就是在西夏,他们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比如:元昊做西夏皇帝时,在其都城兴庆府东边建造了一座佛寺。寺院落成以后,元昊邀请了大批回鹘和尚来此主持宗教活动,翻译佛教经典。

元昊的儿子谅祚做皇帝时,又在兴庆府的西边修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寺院,在这里也有许多回鹘和尚宣扬佛法,讲经传道,谅祚本人也是听众之一。

回鹘和尚的声誉由西夏又传入辽。1067年,西夏向辽派出一个纯宗教性质的使团。使团除带去金佛、佛经外,还专门向辽推荐了一名回鹘和尚。

佛教在回鹘人中间得势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佛教僧侣取代萨满教巫师和摩尼教士,直接参与回鹘统治阶层的政治活动。他们或充当可汗的代表赴中原入贡,或陪同可汗接见外地使者,佛教寺院也成为外地使者下榻的地方。

回鹘人皈依佛教,还对其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天山南部地区接触佛教以后,辉煌的佛教艺术激发了他们新的艺术灵感。这一时期的回鹘建筑艺术,尤其是泥塑、雕刻等造型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建造了宏大的佛教寺院,开辟了新的石窟寺,绘制了与此相适应的各种壁画。

## (二) 摩尼教

摩尼教是流行于高昌回鹘国境内的第二大宗教,摩尼教早在回鹘人西迁之前就在天山南北传播。西迁天山南北之初,回鹘人仍信仰摩尼教。据阿拉伯、波斯史料记载,塔明·伊本·巴赫尔曾经见到公元9—10世纪高昌回鹘国的国王信仰摩尼教,身穿中国的绸缎衣服。王延德也曾见到国王“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吉洪诺夫援引戈尔迪孜的记载说,高昌回鹘国的可汗信奉摩尼教,每天有三四百人聚集在王宫周围,高声诵读摩尼教的著作。巴里托尔德援引《书目》记载的一则趣闻,该趣闻说高昌回鹘的可汗听人说萨曼王朝的统治者企图迫害撒马尔罕王朝的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便派人恫吓萨曼王朝的异密尔说,高昌回鹘国境内的伊斯兰教徒比萨曼王朝的摩尼教徒多得多。如果萨曼王朝要迫害摩尼教,那么高昌回鹘国将迫害自己境内的伊斯兰教徒。这一恫吓果然有效,

萨曼王朝立即取消了迫害摩尼教徒的计划。高昌回鹘王国的这一举措表明对摩尼教予以保护的政策。

由于得到官方的支持和扶植,摩尼教迅速进入发展的鼎盛阶段。在高昌、交河、唆里迷等地,都建立了摩尼教的寺院和宗教组织,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摩尼教僧侣队伍。高级僧侣享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并发放高利贷,寺院经济非常发达。近代以来,在吐鲁番地区陆续发现和出土的大量摩尼教的文物壁画和遗址,反映了当时吐鲁番摩尼教的盛况。后来,随着回鹘人改信佛教,摩尼教逐渐走向衰落,但直到宋朝时期,吐鲁番、和田等地仍有摩尼教徒在活动。

摩尼教有祈雨之法术,回鹘人也学会了祈雨法术。求雨所用石子是在牛马腹中生成的结石,有的是在蜥蜴尾根中生成的,质量更胜一筹,它们坚硬无比,有青、黄、赤、白、绿、黑等各种颜色,大小也不齐整。回鹘人求雨,一般是用柳条系之,放于净水中。若想求风,就挂在马尾上。如求天阴,则挂在腰间。回鹘人把这种求雨石称作“加答”(jadah)。

## 第六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文学艺术及其他

**回** 鹘人在迁徙到吐鲁番和焉耆、库车地区以后，在当地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舍弃游牧生活，转入定居的农业和城市生活。与此同时，发生了回鹘人民与当地原始民族的融合。在吸收了当地汉族文化后，于是产生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鹘文化，而与南部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由另一突厥部族葛逻禄人为核心建立的黑汗王朝伊斯兰文化相区别。

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文献和文学情况时，应当指出回鹘文字的创制和使用对于回鹘文学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回鹘使用这种文字著述和翻译了大量摩尼教、佛教、景教经典和文献，这不但大大丰富了回鹘语词汇，而且加速了回鹘王国内部各方言的统一。19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了大量用这种文字书写的文书。这些文书现被收藏于世界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内，其中包括佛教经典、摩尼教文献、景教文书、文学作品、医学文献及医方、碑记、历法、经济文书及龟兹——回鹘文字母对照表等。最为著名的有佛教大乘派的作品《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妙法莲花经》、《阿弥陀经》、《华严经》、《金刚经》，佛教小乘派的作品有《弥勒会见记》。佛教作品中还有现存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佛教诗歌集，属于回鹘国时期的佛教作品的传说故事有《Pdamawati》、《Danit-palabag》和“本生”等。属于摩尼教的作品有《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和《赞美诗》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摩尼教的传说故事，如《仆固可汗入摩尼教》、《三个王子的遭遇》和《神奇的帽子、手杖和鞋》，其中《神奇的帽子、手杖和鞋》的故事至今还在维吾尔人民中间流传着，在维吾尔文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属于景教的作品，有《福音书》、《圣乔治殉难记》、《圣经》译本和用回鹘文写成的景教文献《巫师的崇拜》残卷以及《占卜书》，还有《古代吐鲁番民歌集》，史诗《乌古斯可汗传》，叙事诗《恰希塔纳伊利克伯克的故事》，小说《两个王子的故事》以及许多佛教本生、譬喻故事。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的神话传说故事和一些与回鹘祖先有关的传说，如《高昌城的出现》、《独子河的传说》、《掘井的放羊娃的故事》、《高昌山上九条沟的故事》、《七个姑娘和七个青年的神话》、《托克逊名称的由来》、《化成石头的神》、《恰希塔格的神话》等。回鹘人民通过丰富的想象，创造了有关自己的祖先、部落历史的神话和传说，表现了本民族的风土人情、山川河流、历史人物以及与宗教有关的传说。这些神话传

说中提到的有关狼、树、山丘、白鹿等形象,表现了回鹘祖先关于动物、树木、山河、蓝天、太阳和火等古代图腾崇拜的习惯。这些神话传说,以它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形象的语言特色,英雄形象的塑造手法以及传统的表现方法,在高昌回鹘书面文学、翻译文学以及维吾尔古典文学发展史中成了一个不竭的艺术源泉,同时这些神话传说与佛教文学融为一体,丰富了当时的回鹘文学的内容。

回鹘王国时期的翻译作品,有译成回鹘语的古印度著名童话集《五卷书》、印度著名史诗《摩诃波罗多》和与摩尼教的传播一起传来的古希腊寓言集《伊索寓言》残篇,还有《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的景教故事以及契约《斌通卖身契》、《定惠大师卖奴契》等。此外,还有一些医学、天文学文献,两种语言对照字书以及许多社会经济文书等。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现存以上回鹘文献大多为断简残篇,作者、译者的名字多已不详。我们目前知道名字的只有以下一些文学家和诗人:迦鲁纳普思、必兰纳识里、吉纳识里、齐齐、僧古萨里、阿色格、齐速牙、卡里木凯什、阿普林啜特勒、阙达干等。

## 一、文学(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

### (一) 诗歌

高昌回鹘王国境内产生了许多民歌、歌谣叙事诗以及挽歌、谚语等,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作家、诗人和文学翻译家。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一部分以手抄本的形式,一部分以木刻印刷本的形式流传至今。这一时期产生的诗歌大部分是生活在当时的回鹘诗人创作和整理的,还有一部分诗歌是从其他语言翻译的,例如译自佛经和摩尼教经卷的翻译作品。

下面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部分文学作品选段:

民歌选段:

白云翻滚,  
是四方要下雪吗?  
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  
是因悲伤而流泪吗?  
乌云翻滚,  
是要落雨下雪吗?  
我那年迈的母亲,  
是因忧伤而流泪吗?

春云滚滚,

是要落雨吗？  
我那年轻的妻子，  
是在落泪吗？

秋云翻滚，  
是要下大雨吗？  
我那心爱的两个幼子，  
是在流眼泪吗？

我的宝贝儿，像逃跑的马驹，  
是要找自己的爸爸吗？  
我亲爱的胞弟和弟媳，  
是要找自己的哥哥吗？

我贴身的五十壮士，  
是要找自己的主人吗？  
别则克里克的妇女，  
将要悲痛心碎吗？

我身边的所有战士，  
是要找自己的主人吗？  
他们盼望相逢的日子，  
一口气等得十分忧伤吗？

高昌回鹘诗人的宗教诗歌：  
摩尼教赞美诗

A

黎明之神来了，  
黎明之神自己来了；  
黎明之神来了，  
黎明之神自己来了。

起来吧！众官员和弟兄们，  
让我们赞颂黎明之神！

无所不见的日神，

你保护了我们！  
无所不见的月神，  
愿你拯救我们！

黎明之神，  
馥香芬芳，  
光芒四射的  
黎明之神！  
黎明之神！

黎明之神，  
馥香芬芳，  
光芒四射的  
黎明之神！  
黎明之神！

#### B

人说我们的善神是宝贝，  
人说我们的善神是宝贝；  
我们的善神比宝贝还宝贵，我们的英主！  
我们的善神比宝贝还宝贵，我们的英主！

人说金刚石不磨也锋利，  
人说金刚石不磨也锋利；  
我们的智慧、善良、光明之主比金刚石锋利，  
我们的智慧、善良、光明之主比金刚石锋利。

你像日神一样光明，我们心中的英主，  
你像日神一样光明，我们心中的英主，  
我们美妙之神，我们的光荣，我们的保护神，  
我们美妙之神，我们的光荣，我们的万能之神。

佛教诗歌之佛赞片断：

愿我们初生在莲花中，  
看到佛奇异曼荼罗，  
在普照的无限光明之前，

愿我们得到真正的授记。

愿我们得到觉者之王的赞赏，  
显出千万种如意，  
愿我们具有为众生谋利的力量，  
能经常巡游四方。

愿我们如湖中的莲花一尘不染，  
像蓝空中的日月一样自由遨游，  
愿我们从各种孽行、烦恼、魔窟  
和来去世间之途中得到解放。

你为众生带来利益，  
周游各国一个不漏，  
消除他们的恐惧和痛苦，  
愿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

愿十方所有国家，全都繁荣昌盛，  
愿它们在僧众的围绕下，常列座于菩提道场上。

愿普天下的众生，  
没有忧苦常享快乐，  
愿人们得到正法的益处，  
成为虔诚的善良信徒。

我们全心全意以全妙者行为做榜样，  
愿和指引我们的睿智导师，常在一起。

为了继承他所说的善法，  
我们不畏艰险走上征途，  
为了发扬伟大常见者的所行，  
我们永世决不变心。

我们努力走在菩提之道上，  
在以后诸生诸世间  
让我们打碎污秽之室求解脱，



遵循纯洁无瑕的斋戒。

他神通广大，  
他慈祥如弥勒睿智无比；  
让我们以三昧之力  
努力聚集正觉的力量。

让我们消除一切罪行的恶果，  
结束无尽的烦恼；  
让我们斩除纠缠着的一切魔鬼，  
努力具有全妙者的力量。

让我们虔诚地传布佛法，  
满怀圣洁的愿望；  
让我们以常时不懈的膜拜，  
来渡过无边的苦海<sup>①</sup>。

## （二）故事

高昌回鹘国时期翻译故事的兴起与发展，首先是由于高昌回鹘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高昌社会经济的繁荣，给回鹘文翻译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随着古代罗马、伊朗、中国、印度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得高昌回鹘国的文化、经济都受到了影响，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1世纪，高昌国成了西域文明古国，社会生活水平提高，音乐、舞蹈、戏剧艺术都很发达，而且佛教、摩尼教也很盛行。高昌的佛教传播特别深远，在文学方面也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这就使高昌回鹘文学具有多种色彩和广泛的内容。由于回鹘文字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广泛应用，必然推进书面文学语言的更趋完美。这时期出现了一个用回鹘文翻译佛教典籍的高潮，涌现了一批用回鹘文进行翻译工作的大师。他们从梵文、汉文和吐火罗文翻译了许多佛经、古典名著和小说戏剧作品。在吐鲁番、库车、敦煌等地出土的有关这方面的许多文献反映了回鹘王国时期回鹘人民的生活、习俗、绘画艺术、音乐、舞蹈、戏剧艺术以及书面文学和翻译文学的情况。在高昌，佛教文学不仅是一种翻译文学，而且也是内容丰富、别具一格的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在维吾尔族文学的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回鹘翻译文学的发展，也是维吾尔族古典文学本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的结果，它为回鹘

<sup>①</sup> 上述诗歌引自《上古至高昌汗国时期的文学》，见耿世民译：《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诗歌》，139—159页。

文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和方法。由于其他文学体裁对它的影响,使它更加波澜曲折,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富于感染力。

《金光明经》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它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僧古萨里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留下的翻译文学珍品。

《金光明经》是大乘派《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简称。汉文译者是唐义净,回鹘文译本是从汉文译本译成的。僧古萨里的这部译作为促进回鹘人民与汉族人民、西域和中原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在翻译过程中,僧古萨里特别注意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与通俗性,运用了回鹘语中洗练通俗的语言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译者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对《金光明经》中的传说、故事进行加工润色,使其维吾尔化,可以说是一种再创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的翻译已不是简单的代码转换,而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应当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克陶别克的故事》的今人汉译文片段:

从前,有个叫克陶别克的人,他的女儿出嫁,他宰杀了许多牛、羊和飞禽。婚礼结束没几天,克陶别克就生病了。不久,他突然死去,全身冰冷,可心窝还有点儿热气。差役守着主人的尸体,一直没敢掩埋,整整守了四天四夜。到了第五天该埋葬了。克陶别克却突然间活了过来。差役们吓得头也不敢回,撒腿就跑。克陶别克好不容易才叫住差役。他向他们述说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原来,被他宰杀的牛、羊、飞禽变成人形,把他抓到天帝面前,告他杀生的罪状。他在那儿受尽折磨和质问,最后天帝告诉他,要想平安度日,死后不入地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抄写《金光明经》,传播《金光明经》赎罪积德。从此以后,克陶别克辞去官职,卖掉全部家产,怀着虔诚之心在一个山腰的寺庙里找到了《金光明经》,以抄写佛经为神圣使命。

又如《舍身饲虎》(今人汉译文):

从前,有位富有的汗王,他有三个可爱的儿子。大王子叫摩诃波罗,二王子叫摩诃提婆,小王子叫摩诃萨埵。一天,三位王子随父王出城游玩,沿河畔玩耍。可汗离去时,三位王子游兴未尽,要求留下多玩些时间,父王允诺,三位王子便沿河散步,并进入河畔的密林之中,他们在林中发现一只刚刚下崽七天的母虎,由于多日未进食,已奄奄一息。三位王子悲怜母虎处境,商讨着救助母虎的办法。大王子、二王子指出母虎只有吃活物才能得救,而周围除人是活物外不可能再找到别的活物。无活物喂虎,母虎和虎崽就只能饿死。他们悲悯老虎的命运,但是又无能为力,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母虎继续前行。

一向爱护生灵的小王子摩诃萨埵听了二位兄长的议论,决心用自己的肉体饲虎。于是,他悄悄返回到母虎身旁,把衣服挂在树枝上,躺

在虎口旁。但是,由于母虎太虚弱,连张口吃人的气力也没有了。小王子就用树枝代刀把自己的肉体划破,母虎舔食人血后有了力气,遂将小王子吃掉。

大王子、二王子发现小王子失踪,折回身去寻找,发现了弟弟的衣服和地上的骨骼,知道弟弟已舍身饲虎了,他们悲痛欲绝。国王和王后为失去最钟爱的儿子悲痛万分,他们含泪将小王子的尸骨埋葬,并修建了一座墓。

僧古萨里在翻译《金光明经》时,成功地增添了为小王子逝世而哀歌的内容。维吾尔族民间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唱哀歌的习俗。这种哀歌是古代维吾尔人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诗歌形式。当祭奠者走进丧家时,妇女们要吟诗唱哀歌,哀歌要即席创作演唱,从而使人们把痛苦悲哀的回忆保留在哀歌当中。

僧古萨里的译文和原文在细节描写、叙事方式、叙事风格诸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译文表现力丰富,修辞讲究,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环境和景物描写、人物心理刻画都相当细腻,抒发人物感情和景物描写交织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很高的文学性。

### (三) 戏剧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 simit)是保存至今的翻译剧本,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抄本有好几种,其中1959年在哈密地区发现的当属现存手抄本中存留叶片最多的一种。

从存留的一些跋文中得知:该作品的蓝本是古代焉耆的一位精通佛教经论名叫圣月的法师根据印度梵文本改编成吐火罗文的一个剧本,后有一位法号智护的法师又从吐火罗文转译成回鹘文。有关专家就现存的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两种文本之间在语言和风格上有一定差别,这说明后者有再创作的成分。该作品写作手法独特、用词丰富,反映出当时的维吾尔族文学与创作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这是其中的一段:(第二卷 第一叶正面)

- 1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
- 2 现此圣言当是在跋多利婆罗门,
- 3 家中所悟。
- 4 尔时,跋多利婆罗门清晨
- 5 起(床)后这样说道:“喂!
- 6 你们是些谁?”其间在
- 7 男子围绕之下慢步走着

8 值得尊敬的弥勒来到跋多  
 9 利婆罗门跟前，  
 10 举起双手，十分  
 11 恭敬地这样说道：  
 12 “天师！您心绪如何？昨夜  
 13 尚安否！”满面笑  
 14 容的跋多利婆罗门这样说道：  
 15 “善哉，善哉，我的好孩子。我很安  
 16 好。因为现在我已经一百  
 17 二十岁了，连夜计算已经有  
 18 四万三千二百个夜晚了。  
 19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只有一夜  
 20 即今晚我没有睡得  
 21 安乐。因为  
 22 昨夜里一位衣冠  
 23 楚楚，看无厌足  
 24 （身）放光芒的天童，站在蓝  
 25 天之上对我这样说道：“全  
 26 明全智的天中天的佛要在世上  
 27 出现了。自迦叶佛涅槃  
 28 以来，再未转动过的法轮  
 29 又在贝拿勒斯国转动了。”之后  
 30 面带笑容的善弥勒这样说道：

（背面）

1 “那么，现在那值得尊敬的  
 2 天中天的佛在哪儿？  
 3 尔后，跋多利婆罗门这样说道：  
 4 “（他）在摩竭陀国孤绝山上。”  
 5 听了这话之后善弥勒这样  
 6 自忖道：  
 7 “这话昨夜净居天处  
 8 的诸天神也全都  
 9 告诉我了。”尔时，摩诃拉奇男子  
 10 这样说道：“天师啊！

11 在如此五浊混乱  
 12 的岁月时佛要在  
 13 世上出现的消息可信吗？”  
 14 尔后，跋多利婆罗门这样说道：  
 15 “我的好孩子，我很相信。  
 16 因为，从过去诸位有果位者（和）  
 17 学者智人那儿我曾听到过这样的  
 18 话：将会有位英武的、有能力的、血气方刚的、有胆识  
 19 有决心的人，他不顾这  
 20 种暂短的恶时。  
 21 不堪蒙受进入  
 22 无限痛苦的轮回中的  
 23 众生所受的痛苦而  
 24 祈求佛果。现在有完美  
 25 行为的、有果位的生灵已在摩竭陀国  
 26 战胜了四种恶魔的军队，  
 27 获得了佛的果位。  
 28 为了消除一切众生的  
 29 苦难而孜孜不倦地讲  
 30 述善妙之法，为远方和近处<sup>①</sup>。

《弥勒会见记》运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形象又生动的古代回鹘文学语言，描述了佛的万能、弥勒之仁慈，叙述了佛教理论，解释了佛教哲理，记录了诸佛、天神、弥勒显世、普度众生的故事，描绘了佛教徒敬仰的未来救世主弥勒的生平事迹。

《弥勒会见记》从形式上看，像是一种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文体。从内容上看，不像是戏剧，但写本残卷中的戏剧术语，如“全体退场”、“幕间插曲”等证明这是剧本。

《弥勒会见记》译本的产生，说明高昌回鹘国时期回鹘文学不仅在诗歌、散文方面，而且在戏剧方面跨入了较高的阶段，也说明话剧和舞台艺术在当时已经渗入到回鹘人的生活。《使高昌记》中记载高昌回鹘王接见宋人王延德之后，“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这就说明当时回鹘人已经有了戏剧。参照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戏剧演出场面的文物，也可以证明在传统节日里，高昌的大寺院常常举行盛大庙会，用回鹘语剧本演唱佛教戏剧。这是回鹘戏剧艺术的雏形，也是文学艺术翻译和西域舞乐的见证。

<sup>①</sup> 《上古至高昌汗国时期的文学》，见李经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选译），211—213页。

## 二、音乐、舞蹈和美术

早在南北朝时期,新疆的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悦般乐的整个乐队就先后多次来到内地,以龟兹乐队为代表的西域音乐以其独特的风情倾倒了中原。到了高昌回鹘国时代,这种声势不但丝毫未减,而且借着时势又上升到了新的阶段。

龟兹与高昌本来就是属于高昌回鹘国的辖地,而且都曾作为王国的中心。说到王国的音乐,理应说到这二地的情况,但历史上龟兹乐远比高昌乐有名,所以我们就以龟兹乐为代表叙述这个问题。

在古代,龟兹乐在国内和国外享有盛名,对我国的音乐文化和亚洲一些国家的音乐文化都曾产生过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隋唐时代龟兹乐的乐器琵琶、箏箏等的盛行是和当时许多新疆少数民族音乐家的贡献分不开的。龟兹乐人苏祇婆和白明达,疏勒乐人裴神符和裴兴奴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苏祇婆不仅以善弹琵琶而著称,而且由她所介绍的源于印度的龟兹乐律七调说,对于我国音乐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白明达原是隋朝主管音乐事务的高官,到唐朝时仍然在宫廷担任要职,是弹琵琶的好手。裴神符一改先人用木拨弹琵琶的技法,转而以手弹,称作“手琵琶”。于是他便以“妙解琵琶”和经改进的琵琶演奏技法而享有盛名。

龟兹乐乐曲名目繁多。如《隋书·音乐志》载:龟兹乐中有龟兹人白明达创制的乐曲共十四曲,即《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结》、《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高昌乐的乐曲有《善善摩尼》、《婆伽儿》、《小天》和《疏勒盐》。疏勒乐的乐曲有《元利死让乐》、《远服》和《盐曲》。西凉乐中有舞曲《于阗佛曲》。唐代崔令钦著《教坊记》中载有六个曲子,即《苏幕遮》、《太平乐》、《北庭子》、《龟兹乐》、《伊州》、《醉浑脱》。唐代南卓著《羯鼓录》中有《疏勒女》、《龟兹大武》、《耶婆色鸡》等。

关于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舞蹈,我们可从历史记载中略见一斑。从隋唐时代关于《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的记载来看,龟兹乐等乐器演奏,是和唱歌、舞蹈结合在一起进行的。高昌和疏勒的乐曲被分为歌曲、舞曲和解曲三种。大概开始时以器乐合奏的解曲作为序曲,唱歌时以歌曲伴奏,其后跳舞时以舞曲伴奏。关于解曲,在《羯鼓录》中有这样的解释:“凡曲有意尽声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如《耶婆色鸡》用《屈拓急遍》解,《屈拓》用《浑脱》解之类是也。”

龟兹舞有单人舞和四人舞,歌曲和舞曲有白明达所制十四首歌曲。《疏勒乐》有双人舞,歌曲有《元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高昌乐》

有双人舞,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迦儿》,舞曲有《小天》和《疏勒盐》。

隋唐的《音乐志》对舞者与歌者服装等均有记载,对舞蹈姿态和曲谱歌词却没有记载。但在唐诗中对音乐舞蹈却有很多生动的描述。在唐人的散文中也有一些记载。比如记载中所描绘的舞蹈中的“或踊”、“或跃”、“乍动”、“斫足”、“弹指”、“乍息”、“撼头”、“弄目”、“林”等,我们在今天的维吾尔族舞蹈中还是可以看到的。在唐诗中有许多诗篇曾经指出龟兹舞是以毡毯作为舞台的。演员穿鲜艳的舞衫和长筒皮靴,演员化妆时画一字长眉,舞蹈中有许多旋转的动作等。这些在今天的维吾尔族舞蹈中都还原原本本地保留着。这说明,现在新疆维吾尔族的舞蹈是继承了1000多年前龟兹舞乐的优良传统的。当年《龟兹舞》和《高昌舞》的一些舞姿今天我们还能在库车县库木吐拉千佛洞、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乐舞壁画中看到。

需要指出的是有着喜爱音乐舞蹈传统的回鹘人是开放的,他们积极吸收了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也吸收了国外的音乐文化,使自身的音乐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龟兹、疏勒、高昌、于阗、伊州等音乐文化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发扬了能歌善舞优良传统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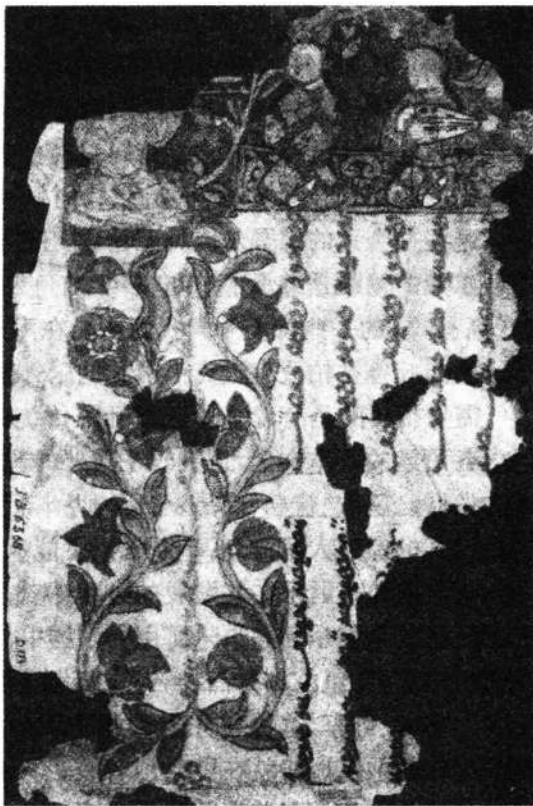
龟兹乐和高昌乐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接受了汉族音乐文化的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龟兹乐和高昌乐所用的乐器中,箏、笙、鼗、箫等都是汉族乐器。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龟兹和高昌的音乐、舞蹈还受到匈奴、羌、鲜卑、突厥音乐文化的影响。匈奴、鲜卑、突厥曾先后游牧于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并曾长期统治过南疆。羌族从两汉以来就在昆仑山放牧,有的还曾到山下农业区种田。高昌乐中的铜角就是由匈奴和羌族牧民所吹奏的角发展而来的。龟兹乐、高昌乐和疏勒乐中所用的笛,当初是由羌族牧民创造的三孔的骨笛,随后改为八孔的竹笛。

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贸易的商道,而且还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在我国的首都长安,向西通往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新疆的伊吾、高昌、龟兹、疏勒、于阗等这些自古以来就以能歌善舞而闻名的地方,都处在丝绸之路沿线,这就为这些地方吸收国内及国外音乐文化创造了方便的条件。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同时也将印度和波斯、阿拉伯音乐带到了新疆。龟兹乐中所使用的琵琶、箏篪、钹、贝等乐器及其演奏方法就是由印度、波斯等国传入的。狮子舞也是由波斯传入新疆再传入内地的。其后胡琴、三弦等乐器也由阿拉伯传入新疆,再传入内地。

古代龟兹、高昌、疏勒、于阗等地的人民有喜爱音乐、能歌善舞的传统,同时又积极吸收了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也吸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外国的音乐文化,这就使得以龟兹乐为代表的高昌回鹘国时期的维吾尔族音乐舞蹈文化丰富多彩,受到了国内各族人民的欢迎,在国外也得到广泛流传。

高昌回鹘国时期的绘画艺术与佛教的传播紧密相连。吐鲁番、库车、吉木萨尔、于阗等地的佛教洞窟、寺院都有其自己的特点。

以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为例，该石窟开挖时间较早，但以回鹘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属于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洞窟有 14、20、31、33、39、41、82 等窟。壁画题材比以前更丰富，有诸佛、千姿百态的各种菩萨像、大型经变图、说法图、千佛像、供养菩萨行列、天龙八部、四大天王像、供养人和供养比丘像及各种装饰图案，并出现了反映释尊前生无数世诚心供佛，终于自身成佛的本生图像故事，塑绘结合的“鹿野苑初转法轮”以及密教诸题材。20 号窟是窟群中有代表性的洞窟，平面呈方形，中间是穹隆顶式中堂，两侧和后面有甬道和隧道连成的回廊，中堂壁画以大悲观音为中心，左右壁配毗沙门天，甬道和隧道两侧绘有十五幅宣扬释迦牟尼本生因缘故事。有《云童子受诀经变》，壁画中的云童子五体投地，长长的



柏孜克里克出土的回鹘文经卷奏乐图

的黑发铺散在燃灯佛脚下，让佛践渡。另有男女回鹘供养人像，画面完整，色泽鲜艳。男供养人穿红色圆领长袍，腰部束带，佩带刀石、打火石、针筒、刀子等，头冠形如一个竖起的荷花瓣，前低后高，上尖下圆，有带，对照引窟供养人形象，因此图像边有回鹘文题词“此为勇猛之狮，统治全国的九姓之王，全民苍鹰侯回鹘特勤之像”，故断定此为回鹘王供养像。女供养人身穿橘红色窄袖通裾大襦，领口刺绣美丽的卷草纹图案，颈下圆领内衣外露，两鬓包面，插满凤钗、金簪，头冠形如一条上翘的金鱼，昂首向前，尾朝后，脑后垂一条长红绢，中间挽起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右上方回鹘文榜题清晰，经释大意为“此是高贵的王后之像”。31、33、34 号窟是相邻的三个洞窟，其形制、题材画风相同，应为先后相继的高昌王所建。窟内布局是两侧壁继承了 20 号窟大幅本生因缘故事画，其中 33 号窟顶部绘千佛，后部是塑绘结合的《涅槃经变》，卧佛塑像已毁，后部上方绘沙罗双树，表示佛于天竺国拘尸那城跋提河边沙罗双树之间入灭。右侧是悲哀供养人的菩萨、天龙八部。左侧是前往举哀的各国王子。中间火焰冲起，顶端并列绘舍利塔，表现的是八王分舍利的



场面。

佛经上记载,释迦牟尼在世时,印度有16国皈依了佛教。佛涅槃后,16国王子赶来追悼。这些王子形象,从壁画上看已完全中国化了。不仅有头戴冲天冠的汉族帝王,还有突厥、吐蕃、回鹘等各民族王子的衣冠形象。西壁后端上层属后壁《涅槃经变》的组成部分。表现诸弟子号啕悲痛的场面,痛不欲生的阿难挥动着拂尘,其左下方是最后赶到的迦叶,所处位置正是卧佛脚下,据佛经上说“迦叶七日后赶到,如来自金棺出双足使见之”。与之相对应的东壁后端上层,是婆罗门外道闻佛涅槃后,欢欣鼓舞。奏乐的婆罗门群像,神采各异,造型生动,线描娴熟奔放,充分体现了古代画工艺术上的成熟和手法的精湛。

39号窟为大型长方形纵券顶窟,顶部绘千佛,侧壁前部相对绘供养菩萨行列,画壁中部一文殊菩萨及其眷属左右簇拥,云环外围画五台山风景,冈峦重叠,林木丛生,景色宜人,塔寺林立,游山朝圣者跪拜于前,有的朝拜者正在赶路,云绕青峰,鹿游平川,静中有动。画面再现出当年前往五台山拜文殊菩萨的胜景。

82号窟前室四壁紧贴地面用红色绘出五层相衔接的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正壁中间迎门画一弧形山丘,山丘两边对称地有两个相似的人像,袒露上身,腰束裙带,胸饰璎珞,脚穿短靴,手上戴环,身体向右下方弯曲,转脸侧视左上方,左手持弓,右手控弦。两个人像举弓仰望箭指的方向。南北两壁相对画一山丘,上面长着大树。南壁杨树完全采用白描写实手法画出片片树叶,怒放的杏花开满枝头,左下方有一只鸭子登上山坡。以墨色浓淡表现立体感,用笔简单,表现力强。83号窟前室四壁紧贴地面处,是绘有砖砌墙基的象形图案,虽壁画已模糊不清,但可以看出画的树木和花草。树木颜色用石绿或紫红,而花草的基色多用石绿。画法和色彩与82号窟前室壁画相同,可以断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佛像

### 三、石窟艺术

石窟又称“千佛洞”。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兴盛的缘故,这一时期西域的石窟艺术也是辉煌灿烂的。虽然到了高昌回鹘国时代石窟早已存在多年并非首创,但作为独特的绘画与雕刻艺术的一部分,石窟艺术在维吾尔文化史上仍然占

据着重要的位置,是其他艺术不能取代的。现存的千佛洞遗址有:

### 1. 克孜尔千佛洞

克孜尔千佛洞在新疆拜城县东南约64公里克孜尔镇东南约9公里处的峭壁悬崖下,石窟背靠明屋塔格山,前面有木扎提河蜿蜒流过,隔河是乔尔达格山。

克孜尔千佛洞是新疆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处石窟寺群。洞窟分为供僧徒礼佛观像与讲经说法用的支提窟和供僧侣居住与坐禅用的毗河罗窟。

支提窟主要有以下几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平面作长方形,窟分前后两室,顶作拱形,前室凿出中心方柱,有的窟正面凿龕,有的窟三面或四面凿龕。正龕上部一般有须弥山的塑壁痕迹。中心方柱左右开甬道入后室,后室有的凿一长条形可以安置“涅槃佛”的石台,有的不作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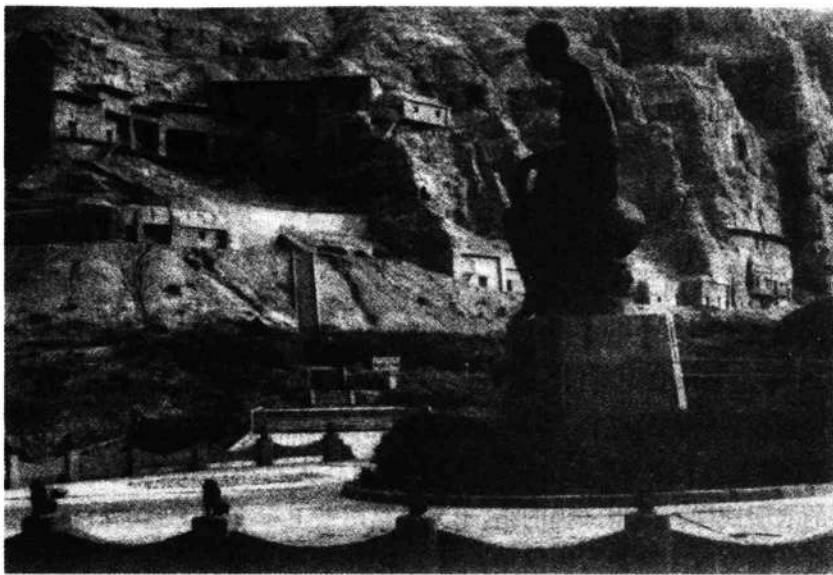
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丰富多彩,总面积约有1万多平方米。壁画的一般布局形式是:一进窟门在拱形窟顶上的菱形格内画的是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本生故事,而杂以树木、山川鸟兽为背景。这些壁画以中间的日天、月天为界,分左右两半。前室佛龕外画着供养菩萨及飞天。窟门入口上方大体都是画的说法图。左右两壁一般也画着划分为连续性的四格、六格或八格的佛传故事和说法图,上沿周围画着天宫墙栏和伎乐行列,也有画千佛的。甬道的左右壁大抵画着立佛像或供养人像。龕壁画有“骑士守舍利城”、“八王分舍利图”等。后室的壁上主要有描写释迦牟尼死时的涅槃图和弟子举哀图。在涅槃图对面,龕的后壁大体画的是火化图或分舍利图。

佛传故事是描绘释迦牟尼从降生印度净饭王之家为悉达多太子到出家成道的故事画。在克孜尔千佛洞,画面最多的是“妙转法轮”、“降魔成道”、“精进苦修”三个场面,也有画“魔耶夫人八梦”、“宫中嬉戏”、“出游四门”等的,但画面不多。

本生故事,是指释迦牟尼诞生在净饭王家为太子以前的行善时种种难行苦行的故事。在克孜尔千佛洞,有睽子本生、忍辱本生、商主本生、兔王本生等几十种。在敦煌莫高窟,本生故事都是画成连环画的形式,把整个故事情节一幅接着一幅画出来。而在克孜尔千佛洞,只是选取故事中最精彩的一个场面,把它高度概括地画在一个菱形格内。

供养人,是指出资修建佛窟寺院,宣扬佛教的人,在克孜尔千佛洞,供养人大部分都着古龟兹服装,有男有女,可能是当时龟兹国王贵族及其家属。他们有的“以锦冒顶”、“锦袍宝带”,有的披甲、佩剑、断发,脚穿长靴。

飞天,又名香音神,是能奏乐,善歌舞,满身香气的菩萨。在克孜尔千佛洞,飞天也具有龟兹独特的风格。这就是,赤裸上身,只用宝带、璎珞、钏环作装饰,下身着羊肠裙,或赤脚或穿长靴,身上的飘带也较简单。



克孜尔千佛洞外景

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还有根据当时龟兹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创作的作品,如壁画中表现的商旅驮货返运图、坎土曼刨地图以及二牛抬杠犁地图等。还有淘金、制陶、提水、狩猎等画面,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和生产状况,而数量众多、形象生动的鸟兽图则又是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一个特点。

## 2. 克孜尔哈千佛洞

克孜尔哈千佛洞位于新疆库车新城西北 12 公里处的盐水沟沟口附近的山坡上,共有石窟 47 个。在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着一个关于克孜尔哈石窟的动人故事。传说龟兹国王有一个女儿长得非常漂亮,深得国王的喜爱。她幼年的时候,一神仙曾预言,她将被青蝎蜇死。国王为防不测,就命手下人在戈壁滩上筑起一座土台把女儿安置其中,自以为万无一失了。但是,有一次国王给女儿送去一只苹果,青蝎从苹果里钻出来蜇死了美丽的公主。人们为了纪念公主,后来把这个土台子称作“克孜尔哈”,意为“姑娘住的地方”。事实上,这个土台是西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座烽火台。

克孜尔哈千佛洞的石窟建筑以券顶中心柱形支提窟为主。第 24 号窟是七角形平面,有中心柱和左右甬道,后壁有隧道,又是平顶支提窟,为其他石窟群所未见。尤为特别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讲经洞,面积有 100 平方米左右。克孜尔哈千佛洞所留壁画不多,仅个别洞窟中能依稀见到残留壁画。

## 3. 玛扎巴哈千佛洞

“玛扎巴哈”意为“陵墓果园”,该石窟群位于库车县城东北约 30 公里处。从库车县克内什村出发,向东南方向走 5 公里便是一片戈壁。在此戈壁靠近山边的

地方有一绿洲,这就是玛扎巴哈村。在村西南约半公里处散见一片小山丘,玛扎巴哈石窟群散落在小山丘上。这里共有洞窟 34 个,其中保存原有窟体形制的支提窟 4 个,毗珂罗窟与长约 10 米的长条形储藏室窟占绝大部分。现存的 4 个完整的支提窟部分保存有壁画。具有特色的是第 1 号支提窟,在其穹庐顶上的四角,画着佛在鹿野苑说法图,其中有一幅白鹿听经图,形象生动逼真。窟顶的飞天像,天衣飘舞,神采飞扬,称得上是壁画艺术中的精品。

#### 4. 雅尔湖千佛洞

雅尔湖千佛洞在吐鲁番县城西北约 10 公里的交河南岸的半山腰中,共有 7 个窟,1 个毗珂罗窟,6 个支提窟。窟群最东面的第 7 个窟是一个大型长方形的纵券顶支提窟。窟顶所画的莲花、竹笋形的天雨花、水鸟、鳅、螺等图像线条流畅,姿态生动,是壁画中的上品,壁画上的佛像身穿通肩式大衣和双领下垂式大衣,是西域人常穿的衣服式样。值得一提的是,第 5 号窟两壁上有突厥文题记,它是新疆各地石窟中唯一的突厥文题记。

#### 5. 吐峪沟千佛洞

吐峪沟千佛洞在鄯善县西南约 40 公里处吐峪沟两侧的半山腰间。现有石窟 46 个,分布在沟内 2 公里长的沟岸上,可以分为东南区、西北区和西岸区三个部分。在吐峪沟千佛洞曾经出土了西晋时期的《诸佛要集经》写本和前秦时期的《维摩经义记》写本等佛典。

#### 6.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在吐鲁番县城以东 40 公里处的木头沟畔。该石窟寺群已编号的有 83 个窟,其中有残存壁画的洞窟 40 多个,是吐鲁番地区保存较好而且洞窟较多的一处石窟寺群。石窟的形制主要是支提窟和毗珂罗窟,也有禅窟和影窟。

#### 7. 库木吐拉千佛洞

“库木吐拉”意为“沙漠烽火台”,该洞窟位于新疆库车县城西南约 30 公里处的渭干河流出却尔达格山口处的断崖旁边。已编号的洞窟有 112 个。

库木吐拉千佛洞的壁画堪称美妙绝伦。保留壁画的洞窟有 40 多个,且各有自己的特点。南区的第 20 窟的魔众怖佛图生动鲜明,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个洞窟还保存着新疆唯一完好的泥塑禅定坐佛像,实为佛教艺术之珍品。大量壁画保存于主区的 30 多个洞窟内。就壁画的起止年代而言,当为龟兹壁画之最。这里有公元 3 世纪的壁画,也有 13 世纪的壁画,时间跨度达 10 个世纪,包括龟兹石窟的全部画风。从中可以领略到印度风、龟兹风、汉风、回鹘风等各种艺术风格。

回鹘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又是一个有着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的民族。表现在壁画艺术上,就产生了一种源于汉风又别于汉风的壁画,即回鹘汉风壁画。库木吐拉的这种壁画,人物体态、形象皆似唐风。设色用线却大有改

变。设色简洁,红色平涂,用线则注重表现力,落笔雄劲,挥洒自如,强调动态感,有“吴带当风”之妙。

#### 四、翻译和注释活动

回鹘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西迁之前,回鹘人使用古突厥文。《磨延啜碑》、《九姓回纥可汗碑》等都是回鹘语碑铭,但分别用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刻写。西迁之后的回鹘最初仍然使用古突厥文,后来采用了在粟特文基础上改制的回鹘文。回鹘文共22个字母,从上到下竖写,或从右到左横写。竖写时,行次多从左至右。字体分木刻印刷体、写经体和草体三种。有完整的书写规则,标点分段也有固定的特殊记号。在高昌国,这种文字通行官府和民间,同时也是翻译佛教、摩尼教、景教经典,书写文学作品的文字。在喀喇汗朝,最初也使用回鹘文,著名的文学作品《福乐智慧》的一种手抄本就是回鹘文抄写的。

近代在吐鲁番、托克逊等地出土的大量印刷品说明,高昌国的回鹘人除了使用突厥文、回鹘文外,还使用粟特文、汉文、叙利亚文、波斯文、梵文、希腊文等16种文字。喀喇汗朝境内民族众多,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王朝中心地带的人民操用纯正的突厥语,叫做“哈卡尼耶语”,秦人(契丹人)和马秦人(北宋人)各有自己的语言,于阗人另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至10世纪中叶,喀喇汗朝的人民逐渐信奉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入,不仅改变了西域部分地区人民的宗教信仰,而且使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字逐渐对西域许多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辽统治的时期,西域在语言方面受汉语和西夏语的影响比较多。

综上所述,在由唐初至宋末660余年间,西域经历了一个多民族交汇,多文化交流的融合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上述各民族和各语言(包括文字)的互相接触,必然有翻译活动贯穿其中。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为西域当然也包括高昌的翻译事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机遇。

##### 1. 佛经翻译

西域佛教发展至唐,虽然已逾盛期,但由于西域之统一于唐和回鹘西迁后逐渐放弃摩尼教而信奉佛教以及唐宋各执政者对佛教的重视,致使西域佛教和佛经翻译事业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并使这一时期的翻译家继前期翻译家之后为佛经翻译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西域的佛教仍保持了繁荣,信徒众多,寺院广布,规模宏大。高昌王麴文泰笃信佛教,国内僧众数千。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的佛教僧徒更数以千万计。以前佛典经由西域东传,至隋末唐宋时期,内地翻译佛经之人寻找梵语本、胡

本的热情渐渐降低了。与此同时,佛教似乎出现了从内地向西域回流的趋势,这一时期,汉文佛经流传西域,不少僧人用汉语诵经。北庭、高昌、龟兹等地设立了汉文佛典的译场,译场中既有龟兹、于阗等地的高僧,也有内地僧人共同从事佛经翻译活动。从已出土和收集的佛经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佛经译品非常丰富,有从梵文、汉文译为回鹘语的,也有从龟兹焉耆语及藏文译为回鹘语的。仅回鹘翻译家僧古萨里都统一人翻译并流传至今的佛经就有《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多部。此外,还有许多其他译者译自梵文、汉文、藏文的回鹘文佛经,但多数或译者不详、或年代无考、或残缺不全。如译自义净汉文本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华严经》、《妙法莲花经》等。早期佛经大多译自梵文、龟兹语和焉耆语,如《阿那律陀阿罗汉比喻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等。从唐宋佛教发展和佛教史料记载来看,自西域去中原传法译经且有据可考的著名的西域佛经翻译家就有十多位。由唐至宋,中原各佛经译场里几乎都有西域翻译家参与,为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想重点介绍高昌回鹘国时期有成就的翻译家——僧古萨里都统。僧古萨里都统又称作祥古舍利都统,别失八里人。他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有影响的翻译家和学者。由于回鹘西迁,改信佛教,大量佛经从梵文、古龟兹焉耆语译成回鹘语。在那些卷帙浩繁的佛经文献的翻译中,僧古萨里都统是最有影响的翻译家,他的佛经译作大多译自汉文本,这为促进西域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僧古萨里都统有两部有名的译作流传至今,一部是佛教大乘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另一部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这两部译作行文流畅,章法严谨,堪称译作之上品。所据汉文本为六朝文体,文义深奥,用词生僻,而译者理解正确,表达精当,有的段落甚至无一差错,足见译者之功力。为了准确翻译佛教的某些特有术语,僧古萨里利用回鹘语中固有的构词材料,创制了许多看似简单,实则含义深刻的新词语,例如把“身”译作  $et - \theta z$ ,把“色界无色界”译作  $\theta \eta luk - \theta \eta siz te \eta ri jir$ 。僧古萨里的译文中也有许多来自梵文、汉文的借词,说明他善于汲取兄弟民族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例如汉语借词  $linxuat | etek$ (莲花),  $qoyt | uj$ (公主),  $tutu \eta$ (都统),  $sangun$ (将军),  $t \epsilon j | in$ (大乘),  $saw | in$ (小乘),  $tojun$ (道人),  $bu | i$ (布施),  $tuj$ (罪);梵语借词  $ma - xraaj$ (天王),  $sudur$ (经),  $nirwan$ (涅槃),  $dijan$ (禅定),  $arxat$ (阿罗汉),  $maxajan$ (大乘),  $xinajan$ (小乘)等。由此可见,译者不仅精通回鹘语,而且精通汉语、梵语及其他西域古代语言。

## 2. 摩尼教经典的翻译

摩尼教是产生于公元3世纪中期的一种古老的宗教,曾在亚洲的许多地方流传。其基本教义和世界观是所谓“二宗三际”。“二宗”指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摩尼教源于波斯,后在中亚传

播,大约在公元6世纪前后,经粟特人向西域东部传播。摩尼教在回鹘人中曾广泛流传。回鹘人原来信仰萨满教,后在牟羽可汗时期信奉了摩尼教。回鹘西迁以后虽然改奉佛教,但摩尼教仍有相当影响。这大概是因为高昌等地的土著中早有信奉摩尼教的传统,二者互相影响所致吧!

据敦煌出土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的主要经典是摩尼所著的七部经书,即《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净命宝藏经》、《律藏经》、《秘密法藏经》、《证明过去教经》、《大力士经》及《赞愿经》,《佛祖统记》一书中还提到了《二宗经》,这些摩尼教经典大部分当时已译成汉文。现在发现的用古代高昌流行的文字书写的摩尼教经典有《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等。《摩尼教徒忏悔词》是当时由古波斯语译成古代回鹘语的。这部《摩尼教徒忏悔词》有338行,它仅仅是当时众多摩尼教经典中很小的一部分。由此可推知当时译事之盛。

### 3. 景教经典的翻译

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传入我国后称景教。景教于公元5世纪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公元6世纪传入西域,长期在民间流传,至盛时期是在唐宋及其以后。景教流行时期,西域各地有大量景教经典,不过这些经典多用叙利亚文抄写,叙利亚语似乎是景教的寺院语言,神职人员多用叙利亚语读经,但是,从吐鲁番地区考古发现的景教文献看,这里的景教文献用四种文字写成,即叙利亚文、粟特文、中古波斯文和回鹘文,其中有一些是叙利亚文和回鹘文合璧的抄本。叙利亚文的景教经典显然是原文,而回鹘文等语文的抄本则应当是译本,是为了适应当地操不同语言的多民族信徒的需要,为了传教的方便而翻译的。这些景教抄本中有的是《圣经》的译本。现已发现的《圣经》译本有两种,一种是由叙利亚文译成粟特文的抄本,另一种是译成中古波斯语的抄本。根据比较研究,这些《圣经》相当于公元4世纪叙利亚景教徒所使用的本子,和今天欧洲人所用的《圣经》有较大的区别。用回鹘文字写成的景教文献有《巫师的崇拜》残卷。

### 4. 文学艺术方面的翻译活动

这一时期在文学翻译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当属回鹘文的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最早是由梵文译成焉耆高昌语,即所谓吐火罗语言的。翻译的时间大约在公元7世纪以前。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曾在我国吐鲁番地区发现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抄本残卷。1959年4月,哈密县发现了藏于石堆中的写本,后经专家鉴定,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最完整的抄本。根据此抄本中的记载可知《弥勒会见记》原本是印度语(梵语)本,由圣月菩萨大师把它译成古代焉耆语,以后又由智护法师译成回鹘文。从译作语言流畅、感情真挚、熟练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的情况来看,译者的水平高超,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哈密发现的这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由1幕序文和25幕正文组成,是一部规

## 五、医 学

模最大的回鹘文翻译剧本。序文是一般佛教教义的说教,施主曲·塔恩·依甘对佛法僧及印度、龟兹、焉耆等地佛教大师的敬言。接下来 25 幕正文主要讲述了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译本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事实:西域自古不仅有歌舞,而且有戏剧。同时,剧本也实实在在向人们展示了真实情况。有人把焉耆抄本同回鹘文译本相应部分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总体结构和内容基本相同,但风格有差异。说明回鹘文译者学识渊博,其中有艺术的再创作。

用回鹘文译成的文学作品除了《弥勒会见记》外,还有在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抄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据研究,这个抄本是译作,它译自汉文佛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但又不认为它只是依据汉文的简单翻译。因为这个译本在主要内容上是按《大方便佛报恩经》翻译的,但在个别地方作了发挥。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该故事的某些情节回鹘文本上有,而汉文本上却没有。

此外,保存在德国柏林的回鹘文《五卷书》和《伊索寓言》残卷显然也是翻译作品。有人认为印度是世界上童话的故乡,古希腊是世界上寓言的源头。回鹘翻译家选择了印度的故事集《五卷书》和希腊的寓言集《伊索寓言》翻译并介绍给回鹘人,足见其不同凡响的鉴赏力。

公元 9 世纪,《回鹘医学文献》问世,这部医书是反映当时高昌回鹘国医学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其内容包括临床各科疾病、治疗及药方。疗法包括食疗、药疗、理疗、冷热敷、灸烙、放血、穿刺、清理伤口、骨折夹板固定、水疗、日光疗以及精神疗法。药物中提到牛角,尿液,乳汁,羚羊角,牛、马、狼、兔和人的胆汁,麝香,海狸香,硃砂,胡杨胶,桑葚干,柴白檀香,葡萄醋,黑胡椒,芝麻,大蒜和白铅粉等。同期,回鹘医生吸收中医技术,用于药物加工炮制,使维吾尔医药制剂工艺与剂型不断趋于完善,出现了药物学与脉学专著。名医司马义撰写的《孜里拉买克曼》,加马尔·卡尔西撰写的《苏拉赫》、《临床医学辞典》是当时维吾尔医药学代表作。回鹘医生研制的秋水仙丸治疗无名肿毒,汞合丸治疗麻风,疗效都很显著。回鹘医生月举连赤海牙等奉诏供职于“回回药物院”,是皇帝的侍御医,为宫廷、王公大臣和御林军官兵诊治疾病,曾受朝廷委派在四川合州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在回回药物院供职的回鹘医药技术人员参与著述的《回回药方》共 36 卷,分内、外、妇、儿、伤、皮肤、用药、食疗、服法等 37 门、70 余类病症。《药方》以“四原素、四原质、四体液”维吾尔医传统理论为基础,配方用药达 270 余种,其中 126 种一直沿用至今,为现代维吾尔医必用药种。剂型有蜜制、浸膏、露酒、滴鼻剂、漱口剂等,独特疗法有灼烧、放血、水蛭吸血法等。同期,高昌已有锦丑衣(女性经期用品)、眼罩等保健



用品。还有麻风等传染病患者不得参加祭典活动的规定,证实当时回鹘医药技术人员已经对疾病传染因素有了较深的认识。

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西域,在位于今新疆阿图什的地方设立了“麦德里斯·萨其也”学堂,它是包括医学专科在内的综合性学堂。该学堂最著名的伊麻都丁·喀什噶里是受百姓尊敬的医师,他以其高超的医术和人道主义精神,博得了国王博格拉汗的恩赐,奖给了战马和战刀。他著有《注大医典》、《中国菝契》等专著。虽然维吾尔族在喀喇汗朝中期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式的察合台文,使得许多回鹘文医著未能保存下来,但从当时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及元代以后维吾尔医专著可验证有关回鹘医学的大量资料。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的医学临床各种疾病,上百种疗法及药名与《回鹘医学文献》一脉相承。如:“给狂犬咬伤的人,服疯狗的脑就会好”,“对夜尿症,用骆驼肉和大麦混合做饭,食用就会痊愈”,“若牙疼,硼砂、麝香混合点在牙上”等。《福乐智慧》的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不但以长诗形式颂扬了喀喇汗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面貌,同时又用医学思想阐述了人的生、老、病、死与自然界四要素(火、气、水、土)及人体气质、体液的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介绍其治疗总则及20种剂型的名称。

## 六、历 法

高昌回鹘国时期使用的历法至少有两种,一种叫做“七曜历”,这是一种古老的历法,据专家们从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历书残页研究,历史上所记的日子用粟特语、汉语和突厥语三种称呼。其中用粟特语记七曜名称,汉语记天干地支,突厥语记十二生肖。汉族历书首次用七曜,据说是唐开元七年由中亚康国人,通晓天文的摩尼教徒大幕阁传入的。后来在敦煌发现唐朝后期的中国历书数册,都是七曜历,其日曜日下面都有朱色印“密”(mir,粟特语,意为“日曜日”)字,其余6个曜日,也各注有粟特语的译名。北宋王延德出使高昌时,记载了当时高昌“用唐开元七年历”,由此可知回鹘人用七曜历是确实的。高昌回鹘国时期通行的另一种历法,也是在吐鲁番出土的一种历书。这种历法把一年分为12个月,第一个月名为“安然木阿衣”意为斋月,类似汉族农历的正月,第十二个月名为“恰合沙帕提”类似汉族农历的腊月,从2月到11月,则以数目次第为名。这种历法也分大、小月。大、小月的配置并不按一大一小的间隔规律,而是用十二生肖表示,如鼠年、兔年、马年、羊年等,但十二生肖中的蛇、鸡、猪已被别的动物所取代。

回鹘人的画像



壁画中的回鹘国王像



仕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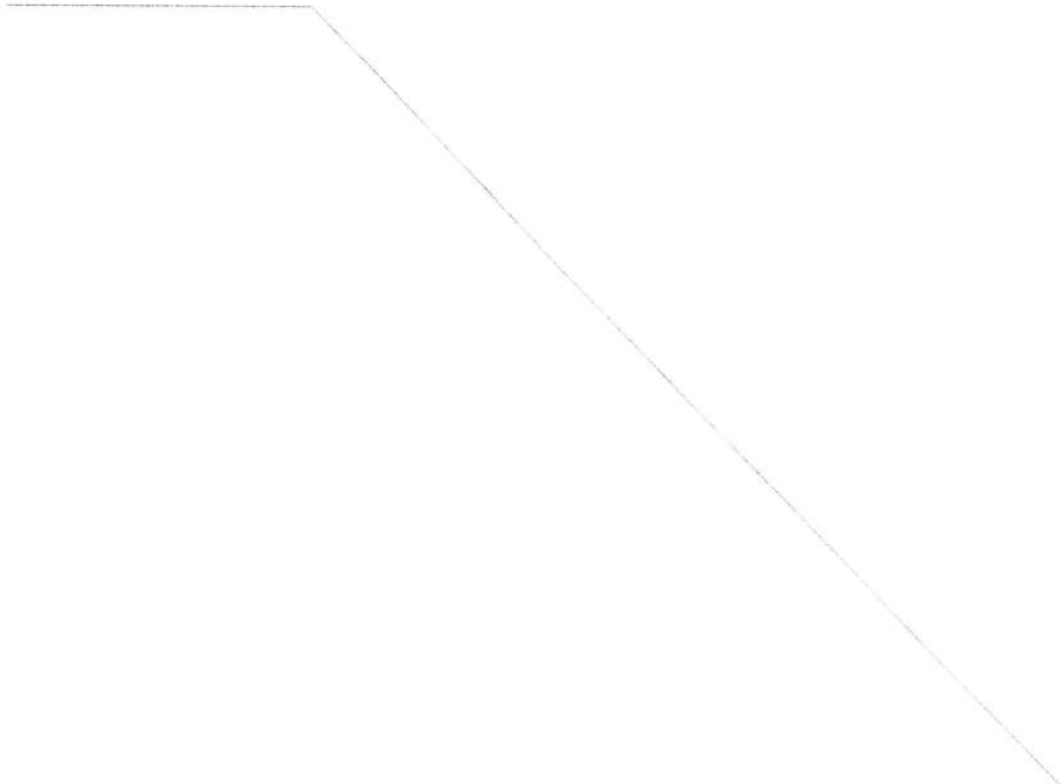


壁画中的回鹘人像



第  四 章

喀喇汗朝时期的回鹘文化



## 第一节 喀喇汗朝的建立

喀

喇汗朝是以回鹘为主体西迁的“九姓铁勒”或“九姓回纥”部落在西域建立的疆域辽阔、文化发达、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

在阐述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化的归属关系和其性质及特点之前,有必要弄清楚喀喇汗朝汗王家族来自哪个民族。这个问题,自1756年法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德吉涅(Joseph Deguignes)发表关于中亚史的著作<sup>①</sup>二百多年以来,在世界史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 样磨说(W. 巴尔托尔德,1896年;安瓦尔·巴依图尔,1991年;阿吉努尔·阿吉,2001年;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2002年等)。

(2) 葛逻禄说(F. 格里纳尔德,1900年)。

(3) 葛逻禄—样磨说(M. F. 阔普茹鲁,1927年)。

(4) 土库曼说(J. V. 汉梅尔—普尔萨勒,1835年)。

(5) 处月说(W. 巴尔托尔德,1927年)。

(6) 突厥说(阿赫麦德·扎克·瓦利德·托干,1939年)。

(7) 样磨—处月说(B. 加富罗夫,1972年)。

(8) 突厥—回鹘说(王治来,1977年)。

(9) 葛逻禄—回鹘说(马雍、王炳华,1978年)。

(10) 葛逻禄—样磨—九姓乌古斯说(郭平梁,1980年)。

(11) 回鹘说(J. 德吉涅,1756年;范文澜,1965年;刘义棠,1975年;刘志霄,1985年;魏良弢,1986年;杨兴民,1991年;林幹、高子厚,1995年;伊布拉音·穆提伊,1996年;钱伯泉,1997年;海热提江·乌斯曼,2002年等)。

以上假说中的大多数,只是在作者的有关论著中附带提出来的。关于喀喇汗朝汗王家族的族属问题,魏良弢教授在其《喀喇汗王朝史稿》中曾指出:“喀喇汗朝起源于回鹘,即王朝的汗族是回鹘人。确切些说,喀喇汗朝就是公元840年奔葛逻

<sup>①</sup> Joseph Deguignes: 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巴黎,1756—1758年,四卷本,第一卷,253页,第二卷,29页。转引自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2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禄的回鹘王朝的汗族成员之一庞特勤建立,并由其后裔继承了王朝的汗位。”<sup>①</sup>

众所周知,公元840年由于内乱、天灾和黠戛斯人的反叛,漠北回纥汗国溃散,回鹘主力在庞特勤的率领下分数支西迁。西迁回鹘的一支进入中亚草原葛逻禄所辖地区,夺取葛逻禄的政权,建立了以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为首都的强大的喀喇汗朝,庞特勤自称可汗。

葛逻禄是鄂尔浑回纥汗国时期部落联盟的一部。他们自公元756年起逐渐强盛,与回纥争强,终于在公元789年脱离回鹘联盟,并成为威胁回鹘安全的一支力量。脱离回鹘联盟之后,葛逻禄人的势力迅速发展,控制了原属回纥汗国的阿尔泰以西地区,进而越过七河地区,占领怛逻斯河和锡尔河流域,建立了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葛逻禄汗国<sup>②</sup>。但在公元9世纪中叶,随着西迁的回鹘部众进入七河地区并打败葛逻禄汗国,葛逻禄人便被迫分为三支,一支向东迁到了阿克苏地区,一支南迁,第三支则留在原居地,成为喀喇汗朝军队的主力。但是,他们的首领经常与喀喇汗朝发生矛盾、冲突,成为朝境内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西辽最高统治者鉴于此,于1164年命令西部喀喇汗朝的可汗巴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地区的葛逻禄人强行迁往喀什噶尔地区,禁止他们随身携带武器,迫使他们从事农业和其他事业。这引起了葛逻禄人的强烈反抗,但最终被镇压<sup>③</sup>。

总之,庞特勤率领回鹘人建立了喀喇汗朝后,他们先建都于巴拉沙衮附近的喀喇斡儿朵,到庞特勤的孙子萨图克·布格拉汗时,喀什噶尔已成为喀喇汗朝的首都。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塔里木盆地的中部和西部、伊犁河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围、锡尔河中游和阿姆河中游以东地区。

在许多史料当中,虽然所说年代有所不同,但都提到奥古尔恰克的侄儿萨图克布格拉汗在萨曼王朝的王子阿布·纳斯尔·萨曼尼的直接影响下最早皈依伊斯兰教,并率领自己的信徒在一夜之间把未接受伊斯兰教的叔父奥古尔恰克及其家人全部杀戮,自称“布格拉汗”,夺取汗位。然后,通过激烈的战争征服喀什噶尔及其附近地区的样磨、葛逻禄和其他回鹘部落,使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并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朝的国教。根据已故历史学家安瓦尔·巴依图尔在其著作《新疆民族史》中的论述,这一历史事件发生于公元932年(回历320年)<sup>④</sup>。这一事件之后,

①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3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② 葛逻禄部的族源是维吾尔族的直接族源——高车的副伏罗部。公元742年,东部地区的葛逻禄部与回纥联合消灭突厥汗国,立拔悉密酋长阿史那(古突厥语,意为狼)为可汗。该部在骨力裴罗建立回纥汗国的过程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回纥汗国助唐平息安史之乱之际,葛逻禄部西迁到七河区,锡尔河和塔拉斯河流域,并建立了以碎叶为中心的葛逻禄汗国。由于他们仍然尊重回纥汗国的创立者骨力裴罗,把碎叶城改名为由裴罗(Boyla = Bala)和将军(Saghun)组成的裴罗将军城,就是巴拉沙衮城,原址在碎叶城附近的楚河畔。碎叶是今托克马克城。

③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66、6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④ 安瓦尔·巴依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649页,中央民族出版社。

“现莎车县以西以北地区,阿克苏河以西地区和在这一带生活的部落皆归萨图克布格拉汗统辖。公元942年(回历331年),由萨图克布格拉汗和阿布·纳斯尔·萨曼尼的儿子阿布·法塔赫率领的伊斯兰大军越过托尔噶特达坂,占领了纳林河以南地区,紧接着突袭并占领巴拉沙衮城,彻底消灭了葛逻禄汗国。与此同时,他自称‘喀喇汗’,号称‘苏丹萨图克布格拉喀喇汗阿卜杜勒克里木’”<sup>①</sup>。由此,在这一地区出现了第一个伊斯兰王朝——喀喇汗朝。喀喇汗朝在萨图克布格拉汗(932—955年)、木萨布格拉汗(萨图克的长子,956—971年)和哈龙布格拉汗(萨图克的次子苏来曼之子,991—993年)时期经历了统一和鼎盛阶段。公元992年,哈龙布格拉汗从萨曼王朝手中夺得撒马尔罕和乌兹干等城之后,他继续推行“伊克塔”分封制度,授予其长子玉素甫卡迪尔汗“桃花石布格拉汗”的称号,把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朝的主要疆域的统治权交给了他。哈龙布格拉汗还授予堂侄阿里·本·木萨布格拉汗的次子纳赛·本·阿力·伊本·木萨布格拉汗低一级的“伊利克”称号,把喀喇汗朝以乌兹干为中心的中亚疆域的统治权交给了他。公元993年11月,哈龙布格拉汗在回喀什噶尔的途中在一个名叫阔什卡尔别希的地方去世后,继承汗位的木萨布格拉汗之孙阿赫马德·伊本·阿力(又称托安汗一世),逐渐排挤玉素甫·卡迪尔汗,企图将他的权力交给自己的弟弟纳赛尔·本·阿力·伊本·木萨(纳赛尔伊利克汗)。结果,以玉素甫·卡迪尔汗为代表的哈龙布格拉汗的后代(史学界一般称为哈龙或哈桑系)与以阿赫马德·本·阿力·伊本·木萨托安汗为代表的阿力·本·木萨布格拉汗的后代(史学界一般称为阿力系)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而矛盾的焦点就是由谁来继承喀喇汗朝的最高权力——布格拉汗之位。

在喀喇汗王族成员当中,玉素甫·卡迪尔汗不仅是一位对内和对外战争中都有赫赫战功的武将,而且他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反对喀喇汗朝的宿敌萨曼王朝的斗争中,在1008年反对伽兹纳王朝的斗争当中,以及在由于尖锐的宗教分歧而针对和田和吐鲁番亦都护佛教徒进行的多次征战中,玉素甫·卡迪尔汗率领喀喇汗朝的军队皆能克敌制胜,大大拓展王朝的疆域,为王朝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才是喀喇汗朝汗位的法定继承人。他从加强喀喇汗朝的内部团结、进一步繁荣统一的喀喇汗社会这一大局出发,劝说与自己争夺汗位的阿赫马德·本·阿力·伊本·木萨托安汗以及他的支持者,主张摒弃前嫌,共谋国事,从而暂时避免了喀喇汗朝的分裂。但是,哈龙系与阿力系之间的政权之争始终没有停止。1017年或1018年(回历408年),阿赫马德托安汗去世,布格拉汗之位由他弟弟曼苏尔继承,称为曼苏尔布格拉汗。曼苏尔即位后,积极和与喀喇汗朝为

<sup>①</sup> 安瓦尔·巴依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650页,中央民族出版社,1991。

敌的伽兹纳苏丹马赫穆德联合,试图进一步孤立玉素甫·卡迪尔汗。于是,玉素甫·卡迪尔汗于1024年率大军由喀什噶尔出发进攻巴拉沙衮,结果曼苏尔大败,被迫让位。玉素甫·卡迪尔汗重新拥有了“布格拉汗”的称号,并且将喀喇汗朝的首都由巴拉沙衮迁至喀什噶尔。此后,玉素甫·卡迪尔汗为了巩固政权,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使喀喇汗朝进入了一个和平繁荣的时期。

1032年12月(回历424年正月),玉素甫·卡迪尔汗在喀什噶尔去世后,其长子苏来曼·本·玉素甫继承布格拉汗位,但他自称“阿尔斯兰汗”。苏来曼阿尔斯兰汗为了加强对喀喇汗朝西部和北部疆域的统治,又将首都由喀什噶尔迁回巴拉沙衮。他继续沿用其父的政权体制,发展与周边国家间的睦邻关系,在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的同时,也为各类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由此,喀喇汗朝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阶段。

但是,这时阿力系又重新抬头,开始与苏来曼阿尔斯兰汗对抗。特别是阿力系的纳赛尔·本·伊本·木萨伊利克汗的两个儿子阿力甫特勤(穆罕默德·本·纳赛尔)和贝里特勤(伊卜拉欣·本·纳赛尔)集结各地反苏来曼阿尔斯兰汗的势力,于1042年与花剌子模联合占领河中地区的北部,阿力甫特勤在乌兹干城号称“桃花石汗”。1052年,阿力甫特勤去世,其弟贝里特勤继位,自称“桃花石布格拉汗”,并宣布脱离喀喇汗朝。公元932年,统一的喀喇汗朝,由于王族内部两大派系之争,至此分裂为两部分。由阿力系的贝里特勤统治的、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原王朝西部,被称为“西喀喇汗朝”(亦称“桃花石喀喇汗”);由哈龙系的苏来曼阿尔斯兰汗统治的、以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原王朝的东部,被称为“东喀喇汗朝”。由于这种内部分裂极大地削弱了王朝的势力,原本是喀喇汗属国的花剌子模也于1042年脱离喀喇汗朝而独立。这样一来,喀喇汗朝实际上分裂为四个部分。分裂的结果使得桃花石喀喇汗统治的西喀喇汗朝成为伽兹纳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附庸,1143年起又成为西辽的属国。

由哈龙系统治的东部地区保留了喀喇汗朝的原称号。尽管东喀喇汗朝内部的宫廷之争始终不断,但东喀喇汗朝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却比西喀喇汗朝高。东喀喇汗朝非常重视与邻国和睦相处,并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各方面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作为在西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典型的伊斯兰王朝,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把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视为精神支柱,与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广泛联系。法拉比和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等都曾在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学习伊斯兰教经学、逻辑学、哲学和其他属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成为东方的著名学者。阿拔斯王朝也经常派伊斯兰教经师到喀喇汗朝的喀什噶尔、巴拉沙衮、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兹干和讹达刺等城市,为喀喇汗朝培养了大批专职宗教人员。结果,在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在喀喇汗朝的知识界掀起了广泛学习和研

究阿拉伯与希腊哲学的高潮,为东方文化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喀喇汗朝的统治者始终把自己看做是中国的王朝,为了表示这种所属关系,他们把自己称为“桃花石汗”(中国的汗)。周边的其他王朝也都承认喀喇汗朝是中国的王朝。喀喇汗朝及其属国高昌汗国与中原地区的后唐、宋朝、辽及其他王朝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向中央王朝进贡<sup>①</sup>。这种关系为喀喇汗朝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持续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根据德国学者普里查克和苏联学者达维道维奇新编制的喀喇汗朝世系年表来看,自喀喇汗朝的创立者毗伽阙·卡迪尔汗(庞特勤)开始,到1212年屈出律灭亡东喀喇汗朝为止,喀喇汗朝共传八代,59位可汗<sup>②</sup>。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当中,使用的多是喀喇汗朝的可汗们的官号,如“哈喀尼耶”<sup>③</sup>、“伊利克汗王朝”<sup>④</sup>、“阿甫拉昔牙卜王朝”<sup>⑤</sup>、“桃花石王朝”<sup>⑥</sup>、“布格拉汗王朝”<sup>⑦</sup>、“喀喇汗朝”等等。法国学者约瑟夫·德吉涅在他于1756年发表的著作《匈奴、突厥、蒙古、鞑靼通史》中,对以上各种名称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该王朝的名称应为“喀喇汗朝”<sup>⑧</sup>后,这一称呼逐渐被世人广泛接受。

“喀喇汗”这一突厥语名称,是由“喀喇”(Qara)和“汗”(Han)这两个词组成,“喀喇”的含义除了“黑色”之外,还有“伟大”、“大”、“强大”、“总”、“崇高”和“最高”等含义。喀喇汗朝的统治者在给自己的王朝命名时,采用的就是“伟大”、“强大”、“崇高”这种含义,并以此体现自己王朝的伟大和强盛。采用此名称,可能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为了表示喀喇汗朝是鄂尔浑回纥汗国的继续,故继承鄂尔浑回纥汗国作为尊号使用的“喀喇”称号;第二,回鹘人以北方为尊,崇尚黑色,所以使用“喀喇”称号。据研究,古代北方民族都把方位与颜色联系起来:北方——黑色,南方——红色,东方——青色,西方——白色。用四种颜色象征四方的传统,在这些民族中一直保存了下来。

喀喇汗朝建立之初,除了中亚草原之外,还拥有碎叶、喀什噶尔、巴拉沙衮、恒

①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1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参见《喀喇汗王朝世系表》,转引自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2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③ 哈喀尼耶(Al-Haqaniya)一说来自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和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

④ 伊利克汗王朝(Ilik-Han)一说来自11世纪波斯史学家乌特比的《亚米尼史》。

⑤ 阿甫拉昔牙卜王朝一说来自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西尔的《全史》,阿甫拉昔牙卜是《王书》中土兰英雄阿甫拉昔牙卜(Afrasiyab)的名字。

⑥ 桃花石王朝(Tabgac-Han)是来自11世纪波斯史学家乌特比的《亚米尼史》。

⑦ 布格拉汗王朝(Bugra-Han)一说见《苏图克·布格拉汗传》、《艾布·纳斯尔·萨曼尼传》等。

⑧ Joseph Deguignes: 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巴黎,1756—1758年,四卷本,第一卷,253页,转引自安瓦尔·巴依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651页,中央民族出版社,1991。



逻斯、且希(今塔什库尔干)、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重镇。经过长期的征战,征服和田地区,其势力范围越过阿克苏、喀什噶尔、莎车等地区,到达金山和敦煌一带。喀喇汗朝在这广大的区域内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在王朝初期,最高统治者(即大汗)称为“阿尔斯兰汗”,副汗称为“布格拉喀喇汗”。但是,自萨图克布格拉汗当政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发生了变化,即大汗称为“布格拉喀喇汗”(布格拉汗),而副汗则称为“阿尔斯兰汗”。从此以后,喀喇汗朝的最高统治者——大汗便一直使用“布格拉汗”或“喀喇汗”称号。而位居第二的副汗称为“阿尔斯兰伊利克”、“布格拉伊利克”或“阿尔斯兰特勤”、“布格拉特勤”,而且这些称号只有王族成员或王子们才有资格获得,是汗位的合法继承人。次一级的有于伽、俟斤、将军、伊难珠、匐、恰格尔、托格鲁尔等行使具体职权的官职,均由王族成员担任。此外在王宫中还设有“游古鲁希”(宰相)、“伊力穆哈”(总秘书官,亦称哈基甫)、“伊麻木”(负责宗教事务的大臣)、“喀兹”(负责刑法)和“阿葛奇”(财务大臣)等官职。除了上述王族成员专有的各级中央官职外,还有“伊利克汗”、“居外”、“叶护”、“图尔克森”(亦称“图合森”)和“巴希坎”等五级地方官职,属于王朝管辖地方的政权机构。在军队中实行的是“苏巴希”、“阿利普”、“图尔滚”和“别克”四级官吏体制。布格拉汗以这些官吏为主召集名为“塔炎古”的大臣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专门授予在王朝范围内作出特殊贡献的军政官员的许多荣誉称号,如:“特勤”、“恰格尔”(鹰)、“托格鲁尔”(鹭)、“喀迪尔”(富于才干)、“阿利普”(勇敢)、“统阿”(豹子)、“贝里”(狼)、“亚干”(象)、“克利奇”(剑)、“比勒格”(智者)、“库勒”等。获得这些荣誉称号的人,组成喀喇汗朝社会的特权阶层,免除所有经济义务。

喀喇汗朝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萨图克·布格拉汗在位期间,忙于传播和推广伊斯兰教,因而未来得及建立和完善系统的统治机构和全面整顿社会秩序。木萨·布格拉汗继位之后,喀喇汗朝才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家制度和一系列伊斯兰教法规。于是,在喀喇汗朝境内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性文化类型”<sup>①</sup>。这种文化除了单纯以伊斯兰信仰为内容的宗教文化之外,还包括伊斯兰教法制、伊斯兰教道德与礼节、伊斯兰教哲学,阿拉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医学、自然科学、天文历法、建筑和手工艺艺术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文化体系。

① 阿不都秀库尔·买买提明:《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文化》(维吾尔文),1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 第二节 喀喇汗朝的经济文化

**喀**喇汗朝的统辖范围西起卡拉库姆沙漠，东至罗布泊，北濒巴尔喀什湖，南临阿姆河。这个广阔的疆域具有优越的地理结构，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这里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仅以喀什噶尔为例，在公元6世纪以前，种植的农作物除了小麦、黍外，还有棉、麻等经济作物。7世纪时经过此地的唐朝高僧玄奘在其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写道佉沙国（即古疏勒）“……稼穡殷盛，花果繁茂。……气候和畅，风雨顺序……”<sup>①</sup>

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在天山以南和喀喇昆仑山山麓，生活着西回鹘、葛逻禄、样磨、古斯（乌古斯）、突骑施、处月等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也有一部分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的粟特人和于阗塞人，此外还有操诸语言的汉族、吐蕃、羌人等，长期以来也在塔里木周边的绿洲从事农业、园艺业和少量的畜牧业，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就社会形态而言，他们当时已处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较高发展阶段。在天山以东和以北，包括在七河草原生活的民族和部落基本上维持着游牧或以游牧为主、以农业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处在宗法封建制（父系氏族）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无论是畜牧业还是农业，就其发展状况而言，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从漠北西迁中亚建立喀喇汗朝的回鹘人，在西迁以前已进入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封建阶级社会。喀喇汗朝建立初期，西迁而来的回鹘人面临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是继续保存原有的传统游牧经济形态，还是发展定居农业经济。这个问题同样也成为喀喇汗朝统治者亟须解决的问题。由于以定居农业经济为主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符合喀喇汗朝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喀喇汗朝的统治者在王朝境内大力发展能够体现农业经济特点的封建制度。这样做，一方面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广大民众的自然选择。结果，建立了该王朝的回鹘人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开始了与他们在鄂尔浑回纥汗国时期游牧生活截然不同的定居农业生活，获得了新的发展。

<sup>①</sup> 转引自郎樱：《福乐智慧与东西文化》，3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无论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还是在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喀喇汗朝实行的都是“伊利克汗制”和“伊克塔制”两种土地管理制度。

伊利克汗所有土地,一般指家族世袭领地。这种土地被永久性地授予承担王朝的政治、经济或军事职务的王室成员和上层贵族,称为伊利克汗,其后代有权继承。这种土地的所有者(伊利克汗),在家族领地范围内,有权收取赋税、出租土地和自行处置佃农,但无权组建军队和设立军政权力机构。

伊克塔制度是喀喇汗朝主要的土地管理制度。伊克塔是指喀喇汗朝从国有土地中分封给当权的官吏们自行管理的封地,即国家给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赐予的封地。这种土地管理制度,在喀喇汗朝之前的鄂尔浑回纥汗国和萨曼王朝也曾实行过。喀喇汗朝初期,伊克塔所有者只有权收取自己管辖范围内农民的收获物的一部分,作为伊克塔的土地仍然属于国家所有。起初伊克塔隶属于伊利克汗,所以他们必须承担向国家缴纳一定量的赋税的义务。到11—12世纪,伊克塔封地实际上变成了伊克塔所有者的私有土地,租种这种土地的农民便完全依附于伊克塔所有者。但是,由于喀喇汗朝时期特别重视农业和园艺业,农民的地位与过去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结果相当一部分农民也变成了伊克塔所有者。这种制度也在牧区推行,因为政府将草原和牧场也作为伊克塔封地分封给了王室成员和各级部落贵族。由于推行这种封建土地管理制度,喀喇汗朝社会产生了以拥有家族世袭领地的伊利克汗和拥有伊克塔封地的贵族为主体的剥削者阵营,以及以个体农民、佃农和伙种者为主体的被剥削者阵营。在喀喇汗朝时期,耕种者(伙种者和佃农)阶层分为几种:一种是常耕者,他们一般无地或只有少量的农具,通常受雇于伊克塔领主,将年收获的两成交给地主,八成归自己。另一种是半耕者,他们与常耕者相比拥有较多的私有耕地和农具,每年用一部分时间为伊克塔领主耕作,收成的七成归地主,其余时间则为自己耕作,还有一种是自由耕种者,他们可以与伊克塔领主签订协议耕种其地,如不想耕种可退还耕地。以上三种农民作为受压迫者除了向伊克塔领主尽各种义务之外,还必须向国家和宗教机构缴纳各种赋税。

在喀喇汗朝的土地所有制中,还有称为“瓦合普土地”的第三种所有制形式。瓦合普土地所有制是指永久性给予伊斯兰教寺院、宗教学校和墓地的土地和财产,除了耕地之外,还有水磨、手工作坊、店铺和城市中划归瓦合普的地面、房产等。这是宗教统治势力的经济基础,是阿拉伯征服时期的产物,直接与伊斯兰教相关。瓦合普土地制度在萨曼王朝时期不断发展,到喀喇汗朝时期更加完善和法律化。喀喇汗朝时期瓦合普财产是由称为“木塔瓦利”的宗教统治阶层的人士管理的,他通常是瓦合普捐赠者本人及其后代。有以萨德尔为首的专门机构对瓦合普管理事务进行监督。萨德尔办公处从瓦合普财产中征收特别税,作为监督机构的运作经费和监督人员的薪俸。但瓦合普土地和财产经常享有国家给予的免税特权,宗教统

治势力便可从中获利。

喀喇汗朝土地所有制中的第四种形式是农民米尔克,即自耕农的小块耕地。这种农民是劳动人民中的“特权阶层”,因为他们只需向国家纳税,但其地位相当不稳定,随时都可能成为宗教封建主或世俗封建主兼并的对象。关于农民米尔克在土地总额中占的比重,我们缺乏具体材料。但根据一些间接材料推断,作为喀喇汗朝人口主体的农民阶层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故所占土地的比重不会太小。

第五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是集体社团所有制土地。这是指在喀喇汗社会存在的非国有的各种集体社团组织所拥有的土地,其所有权归各社团。这些集体社团组织只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赋税,其余收获物归己有,用于支付社团的各种费用。喀喇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都建有以宗教事务为核心的各种社团。关于喀喇汗朝时期集体社团组织的资料虽然缺乏,但是从察合台汗国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可知集体社团所有土地和依照伊斯兰法典按 1:10 的比例向各社团所有土地征收“哈拉吉”税的情况<sup>①</sup>。

上述土地所有制说明,在喀喇汗朝所管辖的地区内实行的并不是土地国有制,而是土地私有制,这正好体现了喀喇汗朝社会典型的封建生产关系。

综上所述,喀喇汗朝所统辖的中亚地区不仅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绿洲平原,而且有水草丰美、一望无际的草原。喀什噶尔地区、和田地区、塔里木河流域、阿姆河以北和楚河流域都属农业发达地区。天山山麓、帕米尔高原、碎叶、塔拉斯草原是优良的牧场,是游牧部落的天堂。喀喇汗朝基于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实行的是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并重的政策。喀喇汗朝的农业区普遍种植和生产水稻、小麦、黍、胡麻、棉、葡萄、甜瓜、西瓜和其他经济作物。畜牧则以马、牛、羊、骆驼为主。这两种经济形态是喀喇汗朝时期发达的封建经济的突出特征和喀喇汗朝文化的经济基础。

以天山以南地区的定居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构成了喀喇汗朝经济的主体。这些地区的灌溉设施在喀喇汗朝以前就已基本健全,喀喇汗时期沟渠建设和地下水建设更加配套和系统化。邱处机在他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就其所见这样写道:“时禾麦初熟,皆赖泉水浇灌,得有秋,少雨故也。”<sup>②</sup>G. E. 戈卢穆—戈尔吉马伊罗这样描述人工灌溉设施——坎儿井:“居民们探明水位不太深的水源后,便就地挖一口较深的头井,这个井要达到水源水位的深度,然后在距此井四萨金(长度单位,一萨金约合一米)处,最多不超过五萨金的地方再挖第二口井,然后再挖第三口、第四口……甚至挖到第一百口井。而后再从井底部将各井串通形成地下井渠,水便从首井水源处沿着井渠一直流到尽头,或者把井一直挖到将水引上地面为止。

①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17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②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流经串通的管道的水,受到管道排水能力的制约。需要增加坎儿井的水量时,可将坎儿井分支的水连到坎儿井头井。如果因受到地面条件的限制,坎儿井分支不能与头井相连的话,则可以与原坎儿井并排再挖一组坎儿井,然后再把两组坎儿井的水汇为一处,也可以把这坎儿井继续往前延伸。”<sup>①</sup>坎儿井是在吐鲁番盆地这样地上水奇缺,但却具备优越的地下水资源的地区生活的人们为了生存作出的伟大创造。在这个时期的前后,除了吐鲁番以外,别失八里一带,库车、且末、若羌和田的一部分地区也曾开掘和使用坎儿井。在这些地区至今可见被废弃的坎儿井遗址。邱处机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和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曾就喀喇汗朝管辖下的河中地区发达的水利设施有过写实的记载:“引河以激”;“飞渠走泉,方池圆沼”;“疏二河入城,分绕巷陌,比户得用”<sup>②</sup>。这说明喀喇汗朝时期非常重视水利设施的建设。

### (一) 园艺业

园艺业是喀喇汗朝时期发达的定居农业的重要分支,优越的地理条件为这些地区发展园艺业提供了便利。另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也是园艺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定居农业地区的居民都要为自己营造一片果园外,各伊利克汗也都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周围营造“汗国园林”,“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sup>③</sup>这样的园林景色,在喀什噶尔、和田、莎车等绿洲更为多见。学者伊敏·吐尔逊先生在其《塔里木一瞥》一文中指出向园林主征收的税称为“萨利赫”<sup>④</sup>。这说明喀喇汗时期设有管理园艺业的专门机构。

喀喇汗朝的园艺业中,最有名和常见的产品是葡萄、甜瓜和西瓜,特别是葡萄种植业,是喀喇汗朝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自古西域的葡萄就以甘甜可口、品种多样和葡萄加工技术精湛而享誉世界。葡萄在喀什噶尔、和田等绿洲种植的历史非常久远。这些地区的土壤和气候非常适合于葡萄的种植和生长,每年充足的日照时间和干燥炎热的气候为高糖水果——葡萄的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葡萄种植业作为一种特殊产业在喀喇汗朝非常普及,在回鹘文和汉文文献当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和马洛夫整理发表的回鹘文契约文书中,有十二件是有关出售或出租葡萄墩的契约<sup>⑤</sup>。在这些契约中,有国家作为葡萄税向葡萄种植

<sup>①</sup> G. E. 戈卢穆—戈尔吉马伊罗:《西部中国游记》,转引自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79、8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sup>②</sup>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16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sup>③</sup>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1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sup>④</sup> 伊敏·吐尔逊:《塔里木一瞥》(维吾尔文),21页,民族出版社,1990。

<sup>⑤</sup> 拉德洛夫:《回鹘文献纪念集》,第88契约,转引自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者征收一定比例的葡萄或穆塞莱斯<sup>①</sup>的内容<sup>②</sup>。有些文献中还提到穆塞莱斯的制作方法。作为赋税向国家缴纳穆塞莱斯和葡萄在西州并入唐朝之时起就已成为定制,到喀喇汗朝时期该税种依然存在。穆塞莱斯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长期存在,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以葡萄种植为主的园艺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证明宫廷对穆塞莱斯的需求量很大。虽然伊斯兰教禁止饮酒和饮用带酒精成分的饮料,但是用葡萄或其他水果制成的穆塞莱斯和各种饮料及果酱的生产和食用是不受限制的。

## (二)城市与建筑文化

天山东麓和塔里木盆地的城市出现较早。这些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地段,这一客观条件促进了该地区的城市文化的发展,因而在古丝绸之路贸易中起过桥梁作用的这一地区城市文化的发展也相对较早。我们可以在各种历史文献中,见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7世纪中叶,西征的唐朝军队在西州占领22座城市,在库车盆地占领5座城市。”<sup>③</sup>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指出“bal-iq(巴里克),信奉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语中和回鹘语中对‘城市、城堡’的称呼。因此,回鹘人最大的城市之一就叫做‘bex baliq 别失八里’,意思是‘五城’。回鹘人的另一座城市叫做‘yangi baliq 仰吉八里’,意思是‘新城’”<sup>④</sup>。另外,早在前伊斯兰教时期,七河、河中以及喀什噶利亚绿洲就建有许多有坚固城墙的城市。13世纪下半叶经过西域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也曾提到这里的许多宏伟城市。<sup>⑤</sup>城市在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回鹘人的城市生活观念不断更新和丰富,促进了城市文化的进一步活跃。一方面,从鄂尔浑回纥汗国和高昌回鹘汗国时期作为文化和商业中心的主要城市与繁华集市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经过新的改革,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过去从事游牧生活的回鹘人西迁后向定居农业经济过渡的需要,以及他们对城镇的热情的进一步加强,出现了许多新的城镇。像喀什噶尔、巴楚、莎车、和田、库车、巴拉沙衮、讹打刺、撒马尔罕、布哈拉、揭石(塔什库尔干)、乌兹干、阿克苏都是当时闻名中亚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中心。这时期,作为王朝首都的巴拉沙衮和斡尔朵坎特(即喀什噶尔)的规模也都有较大的发展。喀什市东北30公里的汗诺伊(汗宫)古城遗址,是当时新建的喀喇汗朝可汗的夏宫,其遗址残存至今。“考古资料证明伊犁河谷在

① 当地出产的以葡萄为主要原料的饮料。

② 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③ 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9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98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⑤ 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9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10—12 世纪兴起了 56 个城镇”<sup>①</sup>。

喀喇汗朝时期,随着商业的活跃,在定居的农业区,围绕着中心城市出现了以村落为基础的集贸市场。每个村落每星期固定的某一天轮流成为杂货商们的交易场所,于是有很多村落便以举行集市的那一天的名称来称呼,如“笃善拜巴扎”(星期一集市)、“色善拜巴扎”(星期二集市)、“恰尔善拜巴扎”(星期三集市)……直到周日集市。从喀喇汗朝时期便很普及的农村集市,使得城市贸易和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商业贸易融为一体,为城市文化的繁荣和副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根据巴尔托尔德的解释,“巴扎这个词是指城门附近”<sup>②</sup>。就像伊斯塔穆里所说“古时候巴扎都在内城城门附近进行”<sup>③</sup>。喀喇汗时期的城市在外貌上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沙赫里斯坦”,即内城<sup>④</sup>,房屋密布,没有什么树木。另一部分是“拉巴德”(城厢),建筑物之间的空间比较宽阔,有大量的树木和纵横的沟渠。被称为“沙赫里斯坦”的内城四边有城墙,城墙与内城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就是通过城门来进行的。有些中心城市的城墙筑得又高又厚,负责守城的军队一般部署在各城门和城墙上。城墙内外有成排的杂货铺、丝绸和服装店、生活服务场所、餐馆等。农牧产品交换场所、驿馆及存放牲畜的驿站一般都设在城外,城市居民的房屋大部分使用泥块,只有少部分使用砖。房屋多为平房,每个院落一般由 5—6 间房屋组成。富人、商人和封建官吏的院落及房屋比较特殊,院墙及房屋比普通人家的高大,院落面积很大,通常分前后院。此外,城里的富人们多在离城不远、风景优美的地方兴建豪华的园林式庭院,夏季在此避暑和休息。喀喇汗朝时期繁荣的城市文化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与前代的建筑风格相比具有明显的阿拉伯特色。这一点在伊斯兰教中被誉为“真主的殿堂”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随着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并大规模普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包括建筑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佛教时期堪称回鹘建筑精华的佛寺被破坏,而在其旧址上建起了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经文学堂。在古代佛庙里供奉佛像的壁龛经过改造,成了伊斯兰教风格的房屋中摆放器皿、其他生活用品或伊斯兰书籍的壁橱。前伊斯兰教时期装饰房屋内外所用的佛祖或各种生灵的画像,被特定的植物、花卉、民族雕饰图案和用阿拉伯美术字体书写的《古兰经》辞章所取代,即一切都须适合于伊斯兰教禁止描绘人像或雕刻生灵形象的教义。住房的修建也严格按照伊斯兰教崇尚清洁卫生的教义,必须配备污水排放系统和洗浴设施。墓地(麻扎)与佛教时期的截然不同。如按照伊斯兰教教义给死者修建陵墓,墓室为两

①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20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② 王治来:《中亚史纲》(维吾尔文),第一册,57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③ 王治来:《中亚史纲》(维吾尔文),第一册,57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④ 沙赫里斯坦,突厥语称为巴里克,波斯语称为沙赫里斯坦。

层(内层和外层),以及标记修建的陵墓体现某种意义等。

必须指出,喀喇汗朝时期的建筑艺术是传统建筑风格与新兴的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精华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具备完全改变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的能力。所以,在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喀喇汗朝的建筑风格的形成过程中,除了伊斯兰教之外,在维吾尔族先民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然观、审美观、哲学观和风俗习惯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喀喇汗朝建筑风格中的圆屋顶、门窗以及建筑墙面上的圆拱等,均源自维吾尔族先民毡房的形状和圆顶建筑风格。在伊斯兰教风格的建筑上常见的花卉与几何图案,包括花的植株、花朵、蓓蕾、石榴、巴旦木、牡丹、郁金香、金莲花等植物及果实图案和波浪状、锯齿状等民族装饰图案,在前伊斯兰教时期的建筑上也很常见。这些图案所涂色彩也与本地民族的传统颜色习惯相一致。喀喇汗朝时期建筑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民居建筑

喀喇汗朝时期定居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住房建筑风格的不断更新,适于游牧生活的毡房被石木或土(泥块)木结构的房屋所取代。据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当时回鹘人居住的院落由配套的内、外院构成,包括庭院、果园、花圃、牲畜圈、大门、门楼、凉棚、厨房、前廊和凉炕等,具有典型的休闲庭院建筑的特点。关于房屋的内部结构,《突厥语大词典》中有如下记载:“särü——壁橱,搁架。在上面放置家什。”<sup>①</sup>“yüdrük——陈放衣物及其他东西的壁橱”<sup>②</sup>“oyuq——壁龛”等依其特点各有所用。另外还有“通绿克”即“天窗”、“乌恰克”即“炉灶”和挂墙裙的地方。居室一般分为客厅、卧室、达里子室、套间(或储藏室)等。“达里子室”要修土台或土炕。房间内铺毡子或地毯,大部分房间正面都朝向东方。所有住户都有适当的院落,而且院落都用芦苇或带刺的植物编制的篱笆或干打垒墙围成。院子有大门,房檐延伸成前廊,前廊下修建凉炕。前廊正对着葡萄架、南瓜棚或葫芦棚。农村的大部分院落都连着自家的果园,园中栽种各种果树,种植蔬菜。院落的一侧为畜圈。有些院落内还有地下排污井。为了预防房屋的墙壁受潮,建房时都要在地基上放基木。墙壁表面要用掺麦草的草泥抹平,圆木封顶。有些房屋的内墙用石灰粉刷。个别住房上面建有阁楼,存放喂养牲畜的饲料及杂物。这样的院落有序地彼此相连,促成了回鹘人和睦的邻里关系。回鹘人非常重视住房的修建,讲究家庭卫生。从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中的“屋宅府邸时时都应洁净、宽敞,气派啊,这会给你带来福气”<sup>③</sup>这一劝诫,可以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文),第三卷,217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文),第三卷,217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③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592页,4536行,民族出版社,1986。



## 2. 公共设施建筑

喀喇汗朝时期,在原先佛教时代修建的佛寺的基址上兴建了伊斯兰教的各种宗教活动场所及文化设施。于是在繁华的城市街道两旁麦德里斯(伊斯兰教经学院)、清真寺、商厦、货栈、市场等拔地而起。城郊则建起了供可汗及王公贵族们享受的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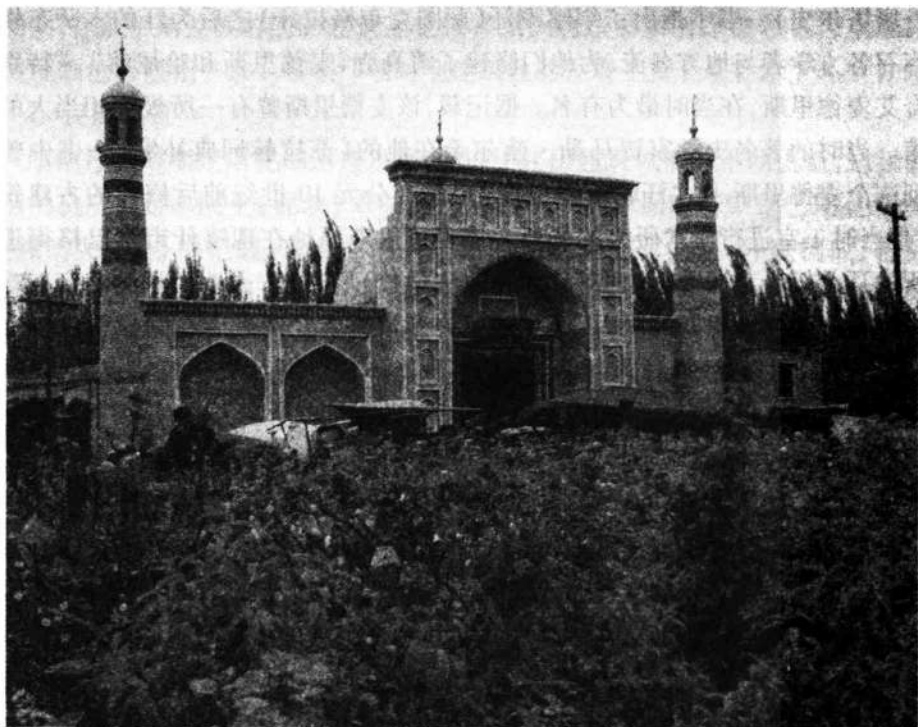
喀喇汗朝时期最显眼的公共设施便是麦德里斯。麦德里斯通常由教室、宿舍、厨房、淋浴室、蒸汽浴室、果园、花圃及公共卫生间等组成,主建筑的雕刻十分华丽。“苏丹萨图克布格拉汗时期在喀什噶尔建有萨奇艾麦德里斯、马赫穆迪耶麦德里斯和艾米迪耶麦德里斯等高等学府。”<sup>①</sup>土耳其学者阿赫马德·扎克·瓦里德在《突厥—塔塔尔史》一书中指出:“继喀喇汗(萨图克布格拉汗)之后为汗的木萨布格拉汗广召各方学者与地方名流,为他们修建了清真寺、麦德里斯和哈尼喀”,<sup>②</sup>特别是萨奇艾麦德里斯,在当时最为有名。据记载,该麦德里斯曾有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图书馆。当时的著名史学家贾马勒·喀尔希在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一书中曾经提到这个麦德里斯。<sup>③</sup>“汗朝麦德里斯”也是在公元10世纪前后修建的古建筑之一,是当时王室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该麦德里斯原址在现喀什市雅巴格街道管理所翰耳朵伊希克居委会(现喀什地区政法学校)所在地,占地面积约8亩。喀喇汗时期在修建麦德里斯的同时,还兴建了许多清真寺。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称为“麦斯奇特”,意为“穆斯林跪拜的地方”。最能体现伊斯兰教建筑特点的,莫过于清真寺建筑。在清真寺礼拜殿内礼拜者的正向(克尔白所在方向,是穆斯林做礼拜时面对的方向,在新疆应是西方)有一设施叫米赫拉普(形似壁龛,纵深约1米,宽约1—1.5米,高约1.5—2米左右,圆顶凹面),礼拜殿内正面墙左侧建有诵经的台子。早期的清真寺都是方形平顶,只有正面有前廊。后来为了扩建,便在清真寺主体部分的两侧也用成排的立柱修建前廊。在较大的清真寺的前面一般都有蓄水池或水井,清真寺的周围有各种树木。寺院里都有净身的浴室,为了呼唤人们做礼拜,一般都在清真寺的正门上方或除了米赫拉普所在的那堵墙之外的什么地方修建宣礼塔。伊斯兰教认为“所有工艺的首要任务是装饰《古兰经》和清真寺”,因此清真寺的雕饰是非常精美的。在米赫拉普所在的正墙墙壁上刻有用阿拉伯文美术字体雕刻的《古兰经》词句。于是,从喀喇汗朝时期开始的清真寺建筑业,成为回鹘人伊斯兰教审美观的象征。根据史料记载,位于萨图克布格拉汗陵墓旁的“布格拉汗清真寺”,被认为是喀喇汗时期兴建的第一个清真寺。在贾马勒·喀尔希的

① 阿里木江·买合苏提、阿不都秀库尔·买合苏提:《维吾尔建筑史》(维吾尔文),20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第一卷,375页,民族出版社,1987。

③ 阿迪里·穆罕默德·土兰:《喀什噶尔的遗址》(维吾尔文),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苏拉赫辞典补编》中,关于该清真寺有这样一段故事:“纳赛尔王子<sup>①</sup>成为阿图什的统治者后,阿图什便成为中亚商人云集的中心。这些商人不仅带来了各种商品,还带来了伊斯兰文化。但是,由于这时阿图什还没有一座清真寺,因此请求奥古尔恰克划一块一张牛皮大小的地,准许他们在这块地上修建清真寺。奥古尔恰克批准他们的请求后,他们便宰了一头牛,把牛皮切成细条,按其长度圈了一块地建起了清真寺。”<sup>②</sup>与喀喇汗朝时期相关的一史料称,1082—1101年间在莎车的拉布尔村修建了“伊萨克·贾茹普清真寺”,1121—1136年间在斯穆纳思村修建了“叶海亚·伊纳勒·阿尔·阿吉普清真寺”。<sup>③</sup>总之,在作为喀喇汗朝时期文化中心的喀什噶尔、布哈拉等大城市,清真寺的数量迅速增加。除了大规模的中心清真寺外,



艾提尔清真寺

每一个居民聚居区也都建有清真寺。此外,喀喇汗朝的可汗、王子、著名将领、著名学者的麻扎(陵园)旁也都建起以他们本人的名字命名的清真寺。简言之,麻扎、麦德里斯与清真寺合为一体。当时的“萨奇艾麦德里斯”、“汗麦德里斯”、“苏丹萨

① 指阿布·纳赛尔·萨曼尼。

② 阿里木江·买合苏提、阿不都秀库尔·买合苏提:《维吾尔建筑史》(维吾尔文),20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③ 阿里木江·买合苏提、阿不都秀库尔·买合苏提:《维吾尔建筑史》(维吾尔文),2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图克·布格拉汗麻扎”，位于阿图什市图古米提乡西南约 18 公里处山脚下的“贾伊派特奇木麻扎”，位于喀什市导来提巴格乡阿尔斯兰汗村的喀喇汗朝的著名将领阿尔斯兰汗（萨图克·布格拉汗之孙，公元 998 年在与和田佛教徒的战争中阵亡）的麻扎，“萨奇艾麦德里斯”的教师，被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誉为“导师”的著名学者、神学家、依玛木侯赛因·伊本·哈里夫·喀什噶里陵墓所在地“侯赛因·派祖拉·赫桌木麻扎”（在喀什市导来提巴格乡一村，即现塑料厂旧址），喀喇汗朝的第八代可汗（约 1026—1032 年）玉素甫·卡迪尔汗陵墓所在地，位于喀什市库穆达尔瓦兹以西的“古尔斯坦布伊”地方的“玉素甫·卡迪尔汗麻扎”（约建于 1032 年），喀什市疏附县乌帕尔乡阿兹赫村、以著名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名字命名的“艾孜里提毛拉木麻扎”，喀喇汗朝时期的伟大学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麻扎（位于喀什市东南的盘亚普乡）等著名麻扎皆与清真寺连为一体。包括诵经堂、清真寺、卧室、带有高塔或圆柱体的圆屋顶、双塔大门等配套设施。这些建筑为砖木双茅椽结构，室内平顶，其大梁、檩子及其他构件上均雕刻各种图案和书写阿拉伯美术体的《古兰经》辞章。清真寺里都有木制雕花窗格，在选料和雕饰方面，体现了回鹘人的伊斯兰教建筑特点。

### 3. 城郭建筑

喀喇汗朝时期随着城市的增多，城市建筑更加壮丽。专门为汗室成员和王公贵族修建了各式宫殿、广场和公园。城市街道得到规划，街道旁挖渠引水并在渠边栽种各种树木。商铺按商品种类划分，形成了各种专门市场。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兴旺，形成了按手工业的类别划分的市场和街道。喀喇汗朝之前修建的拉巴德（客栈、旅店）的规模逐渐扩大并发展成为城市。比如现在的巴楚县的原址是一个称为“托库孜萨热伊”（九家店之意，现巴楚县原址）的古拉巴德，在喀喇汗朝时期发展成为由沙赫里斯坦和拉巴德组成的大城市。城市四周有城墙，城墙外有称为“喀尔归”的报警用的高塔。根据在托库孜萨热伊古城遗址发现的毛织物、陶器、瓦片、房屋遗迹、木器、泥制或石膏雕像，以及以喀喇汗朝可汗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的名义铸造的各种铜币、农作物和水果种子、书写在木简和纸上的古文字资料来看，该城是当时农业、畜牧业、商业贸易、纺织业、建筑、园艺和文化等事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sup>①</sup>。

根据文献记载，喀喇汗朝时期的城市通常称为“斡耳朵”、“坎特”、“巴里克”。“斡耳朵”一词，自鄂尔浑回纥汗国时期起就一直表示“首都”的意思，到喀喇汗朝时期依然表示此义。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指出“ordu 皇城，宫城。因此，可汗们居住的喀什噶尔城被称为 ordu känd——斡耳朵城”，“巴拉沙衮城也称作 Qus or-

<sup>①</sup> 沙比提·阿合买提：《巴楚出土的一份文书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1996（4）。

du 虎思斡耳朵”<sup>①</sup>。故称为“斡耳朵”的城市与其他普通城市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可汗居住的“斡耳朵坎特”里,有被称为“斡耳朵巴西”的专门负责斡耳朵建设事务的行政机构。从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中的以下几行富有哲理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斡耳朵”的富丽堂皇。他写道:

金碧辉煌宫殿空留人间,  
你将在黄土之下悲泣忧伤。

多少富丽堂皇的楼台、宫殿,  
可痛啊,尽毁于死神手中!<sup>②</sup>

在这里,“ordu 斡耳朵”和“saray 萨热伊”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的确,“斡耳朵”这个王朝的政治中心,从外观上看,是由许多华丽的宫殿组成的非常壮观的建筑群。这种“斡耳朵坎特”一般都由2—3道城墙围成,城墙外有壕沟,城墙上筑有称作“喀尔归”或“喀喇古”的瞭望塔。城堡和要塞除了城墙上瞭望设施外,墙面上还有“乌开克”,这些设施是用来观察敌人和在紧急情况下发警报用的。

也就是说,喀喇汗朝时期除了住房建筑,城市、汗宫、清真寺、麦德里斯和麻扎等所有社会公共设施的建筑都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特征,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宗教意识的更新和新兴的伊斯兰统治的确立,政教合一的喀喇汗政权在一些新征服的地区,毁坏了属于其他宗教的建筑。特别是建筑艺术高度发展的佛教时代的许多宏伟壮丽的佛寺以及佛教文化的典型标志,从喀喇汗时期开始遭到破坏。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的以下民歌正好反映了这一情景:

我们势猛如山洪,  
攻陷他们座座城。  
佛堂庙宇全毁掉,  
菩萨身上肩一泡<sup>③</sup>。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文),第一卷,134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191页,1419行;788页,6070行,民族出版社,1986。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63页,民族出版社,2002。

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中,也能见到与此相似的表述:

焚毁其家园,捣毁其佛像,废墟上把教坊、清真寺建成<sup>①</sup>。

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教禁止绘画和雕塑生灵,所以伊斯兰教传入后,作为建筑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绘画和雕塑艺术处于迟滞状态,并逐渐退化。这一客观现实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喀喇汗朝时期的建筑艺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建筑风格也随之伊斯兰化。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按传统风格兴建的建筑顶上开始修建圆屋顶,并用瓦片装饰。城镇里修有圆屋顶的清真寺、麦德里斯和麻扎的大门旁修建有站台的宣礼塔。第二,建筑雕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图案更加丰富多样,更加好看。第三,喀喇汗朝时期伊斯兰化的建筑的一堵墙必须向克尔白所在的方向,清真寺和麦德里斯向克尔白的那堵墙内修建米赫拉普成为一种定制。第四,在建筑材料方面,主要使用砖木或土木材料。砖在当时的民房建筑和宫殿、清真寺、麦德里斯等公共设施的建筑中已开始广泛使用。第五,在民房建筑中,院落式建筑风格不断巩固和普及。第六,城市中出现排污和供水设施,普通百姓家中也都普遍使用称为“艾乌热孜”的排污设施。第七,建筑材料不断更新,特别是砖、瓦、花砖以及玻璃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建筑风格更加艳丽。

<sup>①</sup>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712页,5486行,民族出版社,1986。

### 第三节 喀喇汗朝的手工业文化

**喀**喇汗朝时期，手工业生产与过去相比有了迅猛的发展。喀喇汗朝的初期，王朝的建立者还只能按传统手工业技术加工畜产品和少量的农产品，而技术要求较高的手工业生产则主要依靠中亚的粟特人和唐朝的工匠。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普及之后，在发达的伊斯兰手工艺术和周边文化的积极影响下，喀喇汗朝的手工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喀喇汗朝整体经济与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生产的种类增加，产品质量提高，一部分手工业产品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贸易销往各地。喀什噶尔、莎车、和田以及河中的布哈拉、撒马尔罕、讹打刺和巴拉沙衮等城市成为主要手工业生产中心。这些城市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生产行业有制瓦、雕刻、石雕、陶瓷、玻璃、制锅、铁器加工、铜器加工、首饰加工、木器加工、编制业、制箱、织布、裁缝、制鞋、制帽、制革、刺绣、印染、制皂、泥瓦、镶牙、水磨、钉马掌、铸造、铁皮加工、制锁、养蚕、玉石雕刻、制刀、糖果生产、乐器制造、瓜果业、皮袄生产、皮帽生产、理发、屠宰、洗浴、地毯制作、制毡、蜡烛生产等。有些手工生产行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作坊生产。以喀什噶尔城为例，居民的绝大部分依靠手工业生产为生。喀喇汗朝时期的喀什噶尔城是中亚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城中的许多街巷都是以某种手工业生产行业的名称来命名的。从“喀斯坎巴扎”（蒸笼市场——译者注）、“栽盖奇库恰”（首饰匠街）、“塔噶尔奇库恰”（麻袋匠街）、“库纳克巴扎”（玉米市场）、“伊盖奇库恰”（马鞍匠街）、“恰盘巴扎”（服装市场）、“库兹奇巴扎”（陶罐市场）、“桑杜克巴扎”（箱包市场）等街道和市场名称来看，该城的手工业生产已形成一定的网状规模。

关于喀喇汗朝时期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局面，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间接资料。在这部史诗中的“论如何对待工匠”为题的第六十章中讲道：

还有另一等人乃系工匠，  
他们谋生度日全凭技艺。

铁匠、靴匠,还有皮匠,  
漆匠、弓矢匠,还有画师;

人世全凭他们缀饰装点,  
他们能制出惊世之物。  
手艺人难以一一列举、逐个道出,  
其余皆可类推,无须我再赘述<sup>①</sup>。

当时手工业生产门类之多,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著作中也被肯定。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也有关于11世纪维吾尔人民手工业技术发展的相关记载。如:“ökmäk 妇女戴在耳朵上的金质或银质的耳环或耳坠”、“qurq 钢”、“baqir 铜”、“kiviz 地毯”、“qäkin 用金丝线刺绣”、“burta 金箔”、“torqu 绸缎”、“kirxän 铅粉”、“monquq 串珠”、“tüxrüm 纺好的一团线”、“siriqgha 玻璃”、“kimixkä 喀什噶尔出产的花线毯”、“baghirdaq 乳罩”<sup>②</sup>、“täfqitti 让缉”<sup>③</sup>、“yatuq 用两种东西织成的布”、“yüzük 戒指”、“böz 粗布或大布”、“sun 金条”、“biläzükländi 戴手镯”、“patladi 上浆”<sup>④</sup>等上百个专用名词,实际上皆与手工业有关,反映了喀喇汗朝时期手工业生产的繁荣景象。

特别是玻璃生产在喀喇汗朝的手工业生产中占有光辉的地位。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许多喀喇汗朝时期的玻璃作坊和大量的玻璃器皿及其碎片。玻璃器皿的种类很多,主要是饮食器皿碗、盘、高脚杯,日常用品瓶、罐、墨水瓶、文具盒、香料小瓶和装饰品等。这些器皿多为无色玻璃制成,但也有用绿、蓝、天蓝、褐等有色玻璃制成的。工匠除用吹气法在器皿上造出各种装饰图案外,还做玻璃浮雕,或用玻璃丝做成浮雕。如喀什市东北30公里的汗诺伊古城遗址和疏附县城西南30公里的绥散古堡遗址,都有很薄的质地,很好的玻璃器皿碎片,“多为略带浅绿色,也有浅黄色的,蓝色的,褐色的”<sup>⑤</sup>。在巴楚县托库兹萨热伊遗址出土的一只淡黄色的高脚小酒杯,小巧玲珑,造型优美,是喀喇汗朝时期的艺术珍品。公元9—10世纪已开始制造窗户使用的玻璃,平板窗户玻璃在喀喇汗朝境内许多城市大量发现,其中也有彩色的,主要是用来装饰宫殿。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玻璃制造行业能这般

①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580页,4456、4458、4459、4460行,民族出版社,1986。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114、362、384、437、439、450、461、502、509、514、515、526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二卷,341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12、16、120、134、201、282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⑤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179、18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发达,表明喀喇汗朝时期的手工业是相当繁荣的。除了在中世纪更加繁荣的丝路文明的推动下兴起的多元文化因素的外在影响外,新兴的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强有力的内部需求对这一时期手工业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新兴的维吾尔伊斯兰建筑业对玻璃、油漆、木器、装潢、陶器、美术字书写和雕刻以及地毯和毛毡等多种手工业品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喀喇汗朝时期陶器生产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在喀喇汗朝境内的所有城市都发现大量的陶窑和制陶工具,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分为釉陶和未着釉的陶器两种。釉陶(彩陶)上的彩画,主要是几何图案、植物和花卉图案、动物(主要是鸟)造型以及阿拉伯文字题词等。未着釉的陶器主要是各种陶罐和餐具,这种陶器在百姓当中非常普及,个别器皿上也有浮雕。东部喀喇汗朝境内的棉纺和丝织相当发达,其“白氍布”和“花蕊布”闻名于中原。自从汉代我国中原养蚕技术西传后,西域兴起丝织业。玄奘说和田人“工纺绩丝绸”,“少服毛褐毡裘,多衣丝绸白毡”。喀喇汗朝向宋朝输出的商品中有“胡锦”和“西锦”<sup>①</sup>。在巴楚县托库兹萨热伊遗址出土了精致的棉、毛、丝织品。在遗址的属于公元9世纪的土层中发现的粗纹毛毯和花卉毛毯,十分引人关注。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保存的编号BT采—374的花卉缂毛毯,织制时不用综框,但需要投纬的梭子和打纬的工具,经线直径约3毫米,密度4根/厘米,纬线直径约1毫米,密度为11根/厘米,由红、蓝、黄、藏青和白色组织,显出红色和蓝色花朵,花蕊都使用黄色和红色填充。花瓣则使用棕色或藏青色毛线,从而使花卉图案获得立体感。

<sup>①</sup> 《宋史·于阗传》。



## 第四节 喀喇汗朝的商业贸易与货币文化

**由**于喀喇汗朝所属疆域,特别是它的中心城市多处在东西交通的枢纽地带,以手工业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发展,王朝特别重视与周边地区和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保护商人阶层的利益,所以喀喇汗朝的商业贸易(商品流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喀喇汗朝商品流通的繁荣并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00年前就已成为中东与欧洲和东亚之间的陆路交通的咽喉。古丝绸之路的中道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库车到喀什后,再越过帕米尔经费尔干纳和呼罗珊到波斯(伊朗)后,通往西海(里海)。丝绸之路的北道以巴拉沙衮和巴尔斯罕为枢纽。此路东连辽国(契丹)首都上京府,甚至可到达北宋首都汴京(开封)”<sup>①</sup>。这种以古代陆路交通为纽带的丝路贸易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喀喇汗朝时期,并依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与东方的宋和辽,与南方和西方的印度、伊朗、阿富汗以及西亚诸国、北非、东南欧地区建立和发展了贸易关系。

德国著名突厥学家冯·加班在谈到古代维吾尔人的商业贸易时指出:“回鹘人并长于经商(这点使当时的汉族人很感惊讶)。商业给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他们对远方民族的购买力和对商品的要求是很敏锐的”<sup>②</sup>。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迪斯基指出:“在中央亚细亚中世纪史上,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维吾尔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控制着从中国到咸海之间的商道中部的维吾尔人,对中国和印度—伊朗文化的相互交流,在多方面起到了中间作用。”<sup>③</sup>总之,维吾尔人无论是在蒙古草原,还是在天山南北生活的时代,都将商业贸易作为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频繁的商业活动中他们不断接受邻邦的新技术、新思想,同时还将这些新技术和新思想传播到其他地区<sup>④</sup>。

自从喀喇汗朝兼并和田后,它与宋、辽等王朝以及通过刺达赫道与印度等南亚

<sup>①</sup> 伊明·吐尔逊:《塔里木一瞥》(维吾尔文),26页,民族出版社,1990。

<sup>②</sup> [德]冯·加班(A. V. Gabain):《高昌回鹘王国》,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

<sup>③</sup> A. Γ. 马列也夫金:《九至十二世纪回鹘汗国》,405,40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sup>④</sup> [德]克林凯特:《丝绸之路上的古代文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转引自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族在东西方》(维吾尔文),28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活跃。从喀喇汗朝去宋朝经商的商队不绝于道,他们的主要商品有香料(乳香、木香等)、精细毛织品、棉一丝一麻制品、硃砂、珍珠、珊瑚、翡翠、琥珀、象牙、玉石、龙盐、西锦、玉鞦韆马、金星石、安息鸡舌香、毛、革和马、驴等<sup>①</sup>。以上商品的相当大的部分是喀喇汗朝境内出产的,但另一部分(如珍珠、珊瑚、象牙等)是从印度或西亚、北非转运的。其中最走俏的是马、乳香和玉石制品。1072年,喀喇汗朝的商队一次便运进宋朝乳香三万一千余斤,共获四万四千余贯钱。1080年,又运进“乳香杂物等十万余斤”<sup>②</sup>。而用卖货所得收入从宋朝购买金带、锦衣、铜钱、花绸、缎子、工艺品、茶叶等,运回本国或转运到西方。这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如巴楚县托库孜萨热伊遗址出土的滴珠鹿纹锦等,从制造工艺上看似明显是中原地区的产品。这一时期如此沸腾的商品流通景象,除了相关的历史资料之外,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中也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世界上无数的珍宝和绸缎,  
全都来自他们的身旁<sup>③</sup>。

在《福乐智慧》中,对商业交流的这种繁荣景象,有许多描述。如:

世间倘无商人奔走四方,  
怎能穿到紫貂皮的衣裳?

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  
无数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sup>④</sup>?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作为喀喇汗朝的见证人,对喀喇汗朝重视商人和商业市场的重要作用进行描述,强调应尊重商人阶层。如:

你要和他们接触来往,  
买卖中尽力满足其愿望。

天下的异珍都在他们手上,

① 《宋书·于闐传》。

②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19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③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574页,4424行,民族出版社,1986。

④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580页,4425、4426行,民族出版社,1986。

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对待他们应该慷慨大方，  
你的名声由此而四处传扬。

他们对利害计算得十分精细，  
与之交往，需要特别注意。

请听周游世界之人来讲，  
他曾奔走四方，见多识广：  
男儿啊，你想获得好的名声，  
要好好对待商队和异乡之人<sup>①</sup>。

这实质上表明，喀喇汗朝认识到了商业和商人对整个社会所起的积极影响。由于商品流通对社会的作用非常大，所以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其著作中还特别强调王朝所属管理经济的官员，应善于学习商业规律，及时掌握市场情况，善待商人和商品生产者，重视了解商业活动的特点和商人的本质特点等。被誉为“统治者要术”或“治国书”的《福乐智慧》中的这些论述，其实就是喀喇汗朝时期的商业观念的现实反映。关于这个时代的商业和商人阶层的论述中，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要点，即为了推动商品流通和繁荣市场，王朝通过具体手段强调打破闭关自守，对外开放门户的必要性。作者指出，为了满足王朝的需要，首先要搞开放，这是因为“你的商队历经列国在世上漫游，到处搜寻绫罗绸缎、紫貂灰鼠。东罗马锦缎和印度丝绸，也难以填满你无底的宝库”<sup>②</sup>。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上述论述，证明喀喇汗朝为了通过振兴商业和积极的商业政策富民强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也有关于喀喇汗朝活跃的商品流通方面的记载。比如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丝绸有18种，其中13种来自秦（即指中原）。《突厥语大词典》中对“bistā”一词是这样解释的：“bistā（比斯太）是留宿商旅的店主。他参与兜售商人们的货物，给他们收集羊只并接待商人。商人离去的时候，每二十只羊需留下一只作为辛劳费。”<sup>③</sup>通过对这一词汇的解释，可以看出喀喇汗朝时代的商业制度已相当专业化、正规化。

①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574、575、576页，4421—4437行，民族出版社。

②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696、697页，5367—5368行，民族出版社。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69、70页，民族出版社，2002。

喀喇汗朝时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商品的直接生产者，如织工和其他手工业者把自己的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或者在自己的作坊前设立店铺出售自己的产品。二是中小商人、商贩。他们在市区设立店铺经营日常商品，或在集市上摆摊出卖，这种商人具有代理商的性质。第三种是上层富商，有很大的商业特权，大部分从事跨地区甚至跨国的商业。由于这种商人的多数本身就是封建主，或者是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后代，因此他们出境经商时，常以王朝“使团”的身份出现，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经商的同时还肩负着处理王朝的外交事务和宣扬国威的使命。通过《福乐智慧》中的以下诗句，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喀喇汗朝统治集团当中被称为“哈孜尼达尔”的司库，负责管理商业市场和征收商业税，推行了商品价格管理和税收管理制度。“司库还要长于经商，也要经常了解市场的行情。商业带给国家很大的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国库免于匮乏。”<sup>①</sup>

喀喇汗朝时期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农业的逐渐分离、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货币流通。这一时期货币文化的显著特点是，自古延续下来的易货流通方式已被把商品折算成货币进行交易的方式所取代，即形成了在交易中以货币为计算单位的局面（但是在喀喇汗朝所属的游牧地区和一些偏远地区易货贸易传统并未完全消失）。这自然与喀喇汗朝货币文化的高度发展紧密相关。根据发达的商品流通的需要，喀喇汗朝的可汗们都以自己的名义冲制并发行了铸有古维吾尔文和阿拉伯文的钱币。这些钱币在新疆以及中亚和河中地区有大量发现。1980年3月，在阿图什县逊他克乡境内农民挖土时，在挖至离地面3—5米深时，发现总重量约130公斤的铜币。1982年11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蒋其祥先生发表了以《阿图什出土的喀喇汗钱币研究》为题的论文。据论文介绍，此次出土的钱币数约1700—1800枚，均为铜币，成分主要为铜，含有铅、锡、锑、铁、锌等，形制多样，直径22—31毫米不等，重量2.6—7.95克不等。但是所出土铜币的90%以上严重生锈，其中可以认读所铸文字的铜币的90%以上是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即穆罕默德·本·玉素甫，公元1056/1057—1057/1058年）时期冲制的，苏来曼·卡迪尔桃花石汗（苏来曼·本·玉素甫，1032\1033—1056/1057年）时期冲制的共18枚，还有几十枚的时间尚无法确认。此外，这批出土钱币中还混有若干枚宋钱<sup>②</sup>。

另外，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座古城遗址，于1960年和1976年两次共出土4859枚喀喇汗朝钱币。从其中个别钱币上保存下来的文字来看，这些钱币基本是在回历444—449年（1073/1074年—1078/1079年）间在巴尔斯罕、马赞德兰、虎思斡耳朵（巴拉沙衮）、乌兹干、和毡等地冲制的。目前，这些钱币在吉尔吉斯斯坦大学历

①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363页，2799—2802行，民族出版社。

② 穆罕默德·玉素甫：《新疆历史上的钱币》（维吾尔文），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史博物馆保存<sup>①</sup>。

著名古钱币学家 E. A. 达维道维奇在他的《塔吉克斯坦古代和中世纪钱币窖藏》(莫斯科,1979年)一书中,介绍了在塔吉克斯坦列宁阿巴德市休拉阿巴德街的一处窖藏中出土的 501 枚钱币,认为这些钱币中的 500 枚是在伊布拉音·阿尔斯兰汗(伊斯兰历 570—574 年,即 1174/1175—1178/1179 年)时期在乌兹干冲制的,只有一枚是以苏来曼·卡迪尔桃花石汗的名义冲制的钱币<sup>②</sup>。该书中还指出,当时在莎车、喀什噶尔、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也冲制钱币<sup>③</sup>。

在新疆的阿图什、疏附、乌帕尔、巴楚、莎车、和田等地也出土了许多喀喇汗朝时期的钱币,这些钱币目前分别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喀什地区文物局、大连市旅顺博物馆、新疆大学民俗博物馆、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金融研究所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历史博物馆中保存。《新疆历史上的钱币》一书的作者穆罕默德·玉素甫先生现收藏着喀喇汗朝的几种钱币,其中 18 枚是以马斯乌德(1095—1097 年)的名义冲制的,12 枚是以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的名义冲制的。马斯乌德时期的钱币的直径为 3 厘米,厚度为 1 毫米,重约 7 克。正面边缘有双圆环,圆环内刻有阿拉伯文经文“真主是唯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圆环外缘也有文字,但因严重破损,无法认读。钱币背面的圆环内分三行刻有阿拉伯文“马斯乌德·伊布拉音货币”字样。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时期的钱币的直径为 4.1 厘米,厚度为 1 毫米,重约 3 克,正面刻着“真主是唯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背面刻着“真主是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的恩人”字样<sup>④</sup>。

由此可见,喀喇汗朝的钱币多为铜币。根据《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载,除了铜币还有“sun altun 金条”、“yartmaq 铜钱”、“Qamdu 布币”等币种。其中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称作“Qamdu—喀米杜”的布币。“Qamdu 是长四盖斯,幅宽一拃的一块布,上面盖有回鹘国王的印,在交易中当货币使用。如果这布旧了,每七年可洗一次,重新盖印。”<sup>⑤</sup>关于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的特点,E. A. 达维道维奇指出: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同前一时期相比,黄金即金币的作用增大。许多城市都在冲制金币,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出现了所谓的“白银危机”,即从 11 世纪开始,钱币成色下降,在某些情况下重量也减轻。质量低劣的迪尔赫姆已不能输往东欧。它们一般只在境内流通。其名为迪尔赫姆,实际上已不含银,或者很少含

① 《新疆文物》(汉文),95,102 页,1987(11)。

② 这些钱币目前保存在列宁阿巴德国家博物馆。

③ 穆罕默德·玉素甫:《新疆历史上的钱币》(维吾尔文),10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④ 穆罕默德·玉素甫:《新疆历史上的钱币》(维吾尔文),11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⑤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442 页,民族出版社,2002。

银,只是在铜币上镀一层银。这种不含银的迪尔赫姆的购买力比它的实际价值高出许多倍,在商业中代替了真正的银币<sup>①</sup>。

第一种情况说明国际贸易的发展。第二种情况,即“白银危机”出现的原因,就像 B. G. 加富罗夫指出的那样:“如果依靠冲制高成色钱币,不可能给市场提供这么多的钱币。市场需要的增长,一方面使黄金积极化起来;另一方面推动了低成色钱币的发行,而且是大量的。说明这一时期商品货币关系是很发达的。”<sup>②</sup>

如上所说,喀喇汗朝时期的内外贸易,是以具有一定价值的金属货币流通为基础的。但在边远乡村的直接生产者中,易货形式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W. W. 格里戈里耶夫是这样描述和田一带的土著商人的:“这里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的,赋税自然也是以实物形式交纳的。易货中主要以大布、丝绸和粮食等作为中介。即把其中一种物品的一定的量作为标准,便可以确定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在这里星期五为集市日,上千人聚集起来,相互交换各自生产的产品。”<sup>③</sup>也就是说,在地方乡村市场上,一直是农民和农民互相交换商品。尽管货币流通在这些地区也存在,但是生产者之间的“货物流通”发挥着“货币流通”的作用。与以金属货币为主的“货币流通”相比较,这种“货物流通”对保持和稳定货币的价值是有益的。这是因为,喀喇汗朝时期的铸币热潮,由于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可汗的频繁更替而成为货币继续贬值的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喀喇汗朝向所属的广大农民和牧民,征收各种赋税时一般都是按税值征收实物(通常是粮食和牲畜),甚至向果园主征收穆塞莱斯和加工过的水果。

① 转引自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19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② 转引自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197、1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③ 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1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 第五节 喀喇汗朝的服饰与饮食文化

### 一、服饰文化

喀喇汗朝的文化作为传统的维吾尔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它受到新兴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阿拉伯、波斯、中原等文化体系的积极因素,成为一种多元性的文化。这些特征在他们的穿着习惯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在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之下,在皈依伊斯兰教后的喀喇汗朝人的穿着习惯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之所以出现这些变化,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西迁的回鹘以及其他突厥部族生存条件的地理变化可能也发挥了作用。这种变化在宗教服装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如信仰佛教的时代,佛教僧侣通常穿黄色长袍,袖子长而窄,通常挽在腰间,称为“伽萨”的黑色布条搭在左肩上,背和胸由黑布条遮掩着,淡黄色的长袍长及脚踝。鞋子一般由皮革或布料缝制,鞋跟用数层厚革或质地较硬的布制作,高1—2厘米。剃发,不戴帽子。“他们的衣服又长又肥,整个身体都被衣服遮掩,衣袖和衣襟也都很宽,很长。”<sup>①</sup>据王延德记载,道姑们头上都戴称为“苏幕遮”(cumaqa)的用漆染色的帽子<sup>②</sup>。与此不同的是,在伊斯兰教的生活习俗影响下的维吾尔族学者们头上要缠散兰(用白色或者黄色的绸缎、质地很薄的白布或白纱布盘绕的头巾,夏季盘绕在未绣花的小圆帽上,冬季则盘绕在圆顶皮边帽上),贴身穿用白布缝制的无领对襟长衫或者立领直筒式衬衫,外边穿长达膝盖的无袖袷衫(上衣),系腰带。腰带的左边系密丝瓦克牙刷(用特种芳香木本植物的枝条制成的小棍,供刷牙用)或带鞘的佩刀。无襟上衣上边还要穿黑色且克曼布(一种土布)或铁青色伯克赛木绸(一种厚实的,做袷衫的绸)缝制的长袍(开襟、无领,无扣),穿宽裆长裤。脚上通常都穿软底套鞋。做礼拜时,脱掉套鞋。妇女喜穿用各种布料(丝绸、花布或棉布)做成的长裙,裙子上边穿带袷或带扣的无袖夹子,上边再穿长度超过裙子

① 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38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38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的无袖袷衫。这种无袖长袍无领,大多用黑色或铁青色缎子缝制,有的用伯克赛木绸缝制。前襟通常做7—9个纽袷。脚穿软底套鞋。头上佩戴白纱布制成的头巾,上面戴圆帽。外出时,在以上服装上面还要披上披肩,把整个身体裹起来,面部则用长30—40厘米、宽25—30厘米的由黑色毛线织成的面纱遮起来,面纱的上端有与头部相结的挂钩式的线条。妇女将面部用面纱或头巾遮起来的习惯,可能与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有关。阿拉伯半岛风沙频繁,气候炎热,日照时间长而且强烈,阿拉伯妇女为了保护面部,防止风沙和紫外线的侵害,习惯于用面纱把面部裹起来。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妇女不能让陌生男子见到其面孔”以及“妇女不得在外抛头露面”等说教的流传,妇女佩戴面纱变成了伊斯兰教教规的一项内容。因此,从喀喇汗朝时期起,戴面纱的习惯在维吾尔族妇女中逐渐普及。但是,在距离城市较远的乡村妇女戴面纱并不普遍,那里的妇女一般在出嫁之后才开始戴面纱。从这一比较中可以看出,宗教信仰的变化会使服饰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有关这种变化的资料非常缺乏,或几乎没有。到目前为止,我们未能获得任何有关喀喇汗朝时期服装文化方面的考古信息,只是在与那个时代相关的一些历史和文学著作中见到少许这方面的间接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来看,喀喇汗时代的维吾尔服装,主要分为皮装、毛装、丝装和棉装四类。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对“iqük”一词是这样注释的:“皮袄。用貂皮、扫雪皮及类似的兽皮缝制的皮袄。”<sup>①</sup>皮袄的确是维吾尔族传统的服装,种类很多,基本样式像长袍,分为加面料和不加面料、有领和无领两种,大部分用羊胎羔皮(库车羔羊皮)、萨尼散皮(较长的卷毛皮)、貂皮、水獭皮、狐狸皮和狼皮缝制。在有些牧区(特别是气候寒冷的地区)还有穿皮裤的习惯。

毛布一般用于缝制外衣。维吾尔族的“毛织且克曼长袍”特别珍贵,被称为“喀热斯”,《突厥语大词典》中是这样注释的:“kars——用驼毛或羊毛做的衣服。”<sup>②</sup>诚然,新疆的出土文物中,毛织服装是很多见的。从古代毛织服装的形状来看,都有一种共同点,即都是鸡心领,开襟,形似长袍,前襟用彩色毛线绣成锯齿状。这种毛织且克曼布既结实又美观大方,在喀喇汗朝时期仍广泛使用。“丝绸”(维吾尔语作“伊派克”)在阿拉伯语中称作“哈勒”,波斯语中称作“嘎兹”或“嘎热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个词后来被维吾尔语吸收。时至今日,在现代维吾尔语中“伊派克头巾”(即丝巾)也称为“噶热斯头巾”或“嘎兹头巾”。在古希腊文献中,把丝绸称作“塞里斯”,可能是汉语“丝”的音译。在公元6世纪初写成的东罗马历史书籍中,现在的新疆一带被称作“斯任达”,指生产丝绸的人民居住的地区。后来中国在国际上被通称为“塞里斯埃利”(即丝国)。最早把连接东西方的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74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67页,民族出版社,2002。



商道称为“丝绸之路”的德国地质与考古学家李希霍芬曾指出,正是由于长安(今西安)和于阗(今和田)产的精美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大的轰动,因此用这享誉世界的极品的名称称这条古代国际商道为“丝绸之路”。“总之,丝绸之路是把中国的丝绸运往西方的道路,同时也是把养蚕术传到西方的道路。”<sup>①</sup>丝绸美观精致,能使人感到舒适,所以自古备受尊崇。甚至《古兰经》中也说:“进入天堂的人穿丝绸服装。”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丝绸在阿拉伯世界很受欢迎。据说,先知穆罕默德虽然有别人赠予的丝绸服装,但他只在向真主朝拜时穿过一次。一般认为,阿拉伯人在完成征服之后,才开始穿丝绸服装。在伊斯兰教传播的早期,阿拉伯人通过大力推行伊斯兰圣战,使自己的统治从丝绸之路的西半段一直扩张到帕米尔山脚下。结果在缫丝业发达的这一地区,阿拉伯人获得了大量的丝制品。斯坦因于1905年在塔里木盆地进行第一次科学考察时,在距和田96公里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有关缫丝技术西传的壁画,壁画描述了这样一个传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当时于阗还没有蚕。虽然于阗王请求秦王(供蚕种),但遭到秦王的拒绝。(秦王)严格检查过往行人,严禁蚕种外传。于是于阗王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嫁给自己的公主将蚕种藏在她的头发里带了出来,就从那时开始,养蚕业便在于阗传开。”<sup>②</sup>关于养蚕业的西传问题,日本学者千岛信次这样写道:“对于养蚕业的西传,按地区而言,首先是伊朗高原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这是无可非议的。按民族而言,波斯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将其领域从索格迪亚纳一直扩张到天山以南,甚至达到了黄河上游。”<sup>③</sup>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在喀喇汗朝人当中出现丝织服装并广泛普及,与塔里木绿洲所具备的优越的养蚕条件有紧密的联系。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有许多喀喇汗朝时期常见的丝织品的名称,如“ay,一种橙黄色的丝织品”、“al,国王制作旗帜、伯克们制作马鞍罩用的粉红色丝织品”、“aghi,丝织品”、“äxküti,秦织造的一种带花的丝织品”、“Känzi,绢子。一种秦绸,有红、黄、绿等各种颜色”、“qinahsi,秦国织造的一种带花的丝织品”<sup>④</sup>、“yolaq,带道儿,有条纹的。yolaq barqin,带道儿的绸布”、“lohtay,秦的金钱花纹的红色织锦缎”<sup>⑤</sup>、“qüz,锦缎。秦制造的红色的绣有金丝线的丝织品”、“küz,秦的一种丝织品的名称”、“torqu,缎,绸缎”、“tähqäk,秦的一种丝织品”<sup>⑥</sup>。上述种类繁多的丝绸,说明穿丝绸服装在维吾尔人中已相当普及。这一观点,还可以通过《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一些词汇的注释得到明确的印证。《突厥语大词典》中对“ütük”一

① [日]千岛信次:《丝绸之路的99个谜》(维吾尔文),2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

② [日]千岛信次:《丝绸之路的99个谜》(维吾尔文),2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

③ [日]千岛信次:《丝绸之路的99个谜》(维吾尔文),2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44,88,96,157,446,514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⑤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15,235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⑥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46,347,450,502页,民族出版社,2002。

词的注释是：“ütük,烙铁,熨斗。形似泥抹子的一块铁,烧热后用它熨平衣服的褶子。”<sup>①</sup>众所周知,毛和丝织物最需要用熨斗。诚然,穿以“和田艾德莱斯绸”闻名的精致丝绸服装,在维吾尔族中是最常见的。在维吾尔人的审美观中,可以把艾德莱斯绸比喻为环绕塔里木绿洲及其东南的无边大沙漠的艺术地图。

喀喇汗朝时期,在穿丝绸衣物的同时,用作为纺织手工业产品的棉布制作服装则更为广泛。由于棉布的价格要比丝绸便宜得多,因此,没有能力穿丝绸服装的大多数普通百姓通常穿的服装,便是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棉布缝制的。

按喀喇汗朝时期的着装习惯,依据性别、年龄、职业、地位以及场合的不同,服装亦各不相同。赛福鼎·艾则孜先生的历史小说《萨图克·布格拉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线索。在这部小说中,喀喇汗朝时期的王子们的着装特点是这样描绘的:“盘在头顶上的又粗又黑又长的头发上系着用金线绣花的绒套,身穿绿色丝袍,丝袍从领子到前襟有金色丝线绣成的刺绣,宽大的袖子也有同样的刺绣,金光闪闪。金丝绣边四指宽的丝腰带的右侧,挂着三拵长的银鞘青铜柄匕首。他不时地把柄上镶有贝壳的漂亮的双梢鞭子挥一挥,但不抽马,脚蹬靴尖带有青铜制的弯钩的靴子……”<sup>②</sup>这些描述提供了喀喇汗朝时代的宫廷官吏着装方面的信息。

随着喀喇汗朝时期文化的全面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有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服装的颜色方面也体现了出来。就像《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谚语“要撒娇穿红衣,讨欢心着绿衣”<sup>③</sup>所形容的那样,按照他们的色彩观,红色象征着青春与欢乐,白色象征着纯洁与吉祥,蓝色象征着喜庆与幸福,黄色象征着忧郁与悲戚,黑色象征着悲伤与痛苦。这一传统观念当时已基本确立并多样化。

总之,回鹘皈依伊斯兰教后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的回鹘服装文化,已具备系列化、多样化、标准化和多种色彩的民族审美体系,它使黄金及其他各种首饰、卫生和化妆品相互交织其中,按年龄和性别差别明显区分,传统和现实相适应的相当完善的文化实体。

## 二、饮食文化

维吾尔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与其生活的地理条件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虽然饮食文化在形成方面与服饰文化不同,是由人类自身先天的生理需求产生的一种自然能力使然,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范畴,具有时代性、传统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74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赛福鼎·艾则孜:《萨图克·布格拉汗》(维吾尔文),5页,民族出版社,1987。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415页,民族出版社,2002。

性、可变性和民族特性。特别是不同的生产形式、地理特点和宗教信仰等,是造成各地各族人民饮食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如从事狩猎和畜牧业的人们,习惯于食肉和乳制品;从事捕鱼业的人们则以鱼类和其他水产为主要食用对象等。

有史以来,由于维吾尔族从事狩猎业、畜牧业、农业、园艺业以及部分地区(河流与湖泊沿岸)捕鱼业等多种经济形态,因此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中,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产品便一直占据主要位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表明,维吾尔族食品种类繁多,以用肉和面粉做的食品为主。这一传统自古延续至今。

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这部权威性著作中,有许多关于维吾尔族较早的传统食品和灶具的记载。如“tiküq, 馕馓”、“kömaq, 埋在火灰里烤熟的馕”、“qöräk, 小圆馕”、“sinqu, 较厚一点的馕”、“qatma, qatma yugha, 千层饼, 用油烙的薄饼”、“qukmün, 蒸饼之一种, 薄而且容易消化”、“püskäq, 大薄馕”、“pöxkäl, 一种薄馕”、“qaqurghan, 以油和面, 在馕坑或炉灶上烤熟的一种馕”<sup>①</sup>、“yugha, 多层馕, 千层馕。”<sup>②</sup>等等, 仅馕的种类就有十几种。这说明, 馕是维吾尔族历史最悠久的传统食品之一, 同时也是维吾尔族食品文化的桂冠和核心。所以维吾尔族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旅途中, 都会把馕作为贴身伴侣。当有人出远门时, 送行的人会把馕举过出行人的头顶转几圈, 预祝他一路顺风。“受到馕的惩罚”这句话, 是人们最坚决的誓言。总之, 推崇馕, 把馕视为神圣之物观念, 深深扎根于维吾尔人的心理意识之中。

《突厥语大词典》中, 除了馕之外, 还介绍了多种传统食品。如: ügrä(细面条), türmäk(菜卷儿), sarmaquq(粒粒汤面, 一种专为病弱之人做的面食)<sup>③</sup>, soghut(灌羊肠, 一种把米、肉和调料灌入羊肥肠做成的食物)<sup>④</sup>, soqtu(灌肠之一种), tutmaq(面片, 传说是亚历山大时代传下来的, 食之可以强身, 使面色红润, 而且耐饿)<sup>⑤</sup>, kuwut(由炒熟的小米粉拌上油和砂糖制成, 供失血过多的产妇食用)<sup>⑥</sup>, sürüx(烤麦穗。采来黄熟之前的麦穗, 烤熟后揉搓的麦粒, 食之), topik(髌骨。用羊髌骨做的食物), kürxäk(小米加水或奶煮熟, 调以油之后食用的一种饭), bulghama(无油无味的面糊), bulduni(加葡萄干或鲜葡萄做成的一种食品)<sup>⑦</sup>, buhsi(一种食品名称。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 第一卷, 376, 378, 408, 441, 457, 469, 478, 506, 541页, 民族出版社, 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 第三卷, 24页, 民族出版社, 2002。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 第一卷, 137, 503, 550页, 民族出版社, 2002。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 374页, 民族出版社, 2002。汉文有误, 这里依据维吾尔文版462页。

⑤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 第一卷, 440, 478页, 民族出版社, 2002。

⑥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 第三卷, 158页, 民族出版社, 2002。汉文有误, 这里依据维吾尔文版223页。

⑦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 第一卷, 386, 398, 504, 517页, 民族出版社, 2002。

将麦粒煮熟,与巴旦木、杏仁拌在一起,浇上麸皮、蜂蜜和牛奶的混合浆液,使其发酵。制成后麦粒可食,浆液可饮),yamata(烤肥肉时为防止油脂滴出而涂抹于肉表面的一种稀面糊)<sup>①</sup>,sim sim simraq(一种饭食。把煮熟的羊头剥开,加佐料装碗,浇上酸奶,待味道融入后食用)<sup>②</sup>,ingliq(一种像大蒜的植物,可与烤肉同吃,调味佐食)<sup>③</sup>等。

从《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的上述食品可以看出,回鹘的传统食品一直以未经油炒、用粮食或肉做成的食品为主。这一传统在喀喇汗朝后一直延续,种类不断增多,形成了适应本地经济形态的独具特色的食品体系。这首先明显地表现在从喀喇汗朝时期开始的新型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饮食习惯和饮食原材料的选择上。例如,伊斯兰教规定“不食用奇蹄类牲畜的肉”,“不食用自死牲畜的肉”,“不食用屠宰时未出血的牲畜的肉”,“不食用牲畜的血”,“不食用妇女屠宰的牲畜的肉”,“不食用被视为不洁净的牲畜腺体、小肠、眼珠、阴囊及性器官等”,“不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等,同时这些规定还成为伊斯兰教观念的先决条件。从喀喇汗时代开始,回鹘人的饮食就是在这些规定的基础上定型并形成特色的民族饮食文化。由于喀喇汗朝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定居农业经济和城市手工业经济,因此饮食习惯自然要与当时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相适应,而且体系更加完备。日常家庭饮食、招待客人的饮食以及节庆和各种仪式上的饮食各有差异。比如,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家庭中一日三餐的习惯已经普及。早餐一般在晨礼(第一次礼拜)之后,家庭成员聚在一起进餐(以吃馕喝茶为主,佐以果酱);午餐一般在田埂地头分散地吃馕喝茶或酸奶;晚上阖家一起用餐。

好客是维吾尔族自古相传的优良风俗之一,无论什么时候家里来客人,主人都会拿出最好的食品热情款待客人。关于此,《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了这样一首民谣:

花冠丽服留自身,  
美味佳肴享他人。  
劝君殷勤多好客,  
自有众人传美名<sup>④</sup>。

-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446、470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132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125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51页,民族出版社,2002。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写道：

如果你打算举办宴会，  
诸事先应做好充分准备。

饮食应烹调得清洁味美，  
让宾客们吃得津津有味。

不分挚友、宗族、亲疏远近，  
一并邀请，酬答其情分<sup>①</sup>。

在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下，喀喇汗朝时期的回鹘开始过肉孜节、古尔邦节等宗教节日，举行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几种庆典活动。在这些宗教节日和庆典活动中所用的饮食独具特色，形成了饮食文化的民族特性（详见下一章）。

可以认为，从喀喇汗朝时期开始，维吾尔族的饮食文化发生了与伊斯兰教教义相适应的变化。但是，这方面的具体文献资料非常少，仅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了用奶制品制作的饮食 11 种，用肉制作的食品 13 种，纯粮食制作的食品 19 种，馕 14 种，作为副食品的水果 30 种，作为饮料的果汁 12 种，蔬菜 13 种。这些广为普及的饮食反映了喀喇汗时代的饮食文化。

今日维吾尔族饮食文化中最为普及的典型饮食品种仍显示出与喀喇汗时代的饮食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如维吾尔族传统食品馕，其种类不断增加，已有乌伊馕（家常馕）、巴扎馕（也称阿克馕）、格尔达馕（今俗称窝窝馕）、古西格尔达馕（和田大烤包子）、古西馕（肉馕）、艾麦克馕（薄片大馕）、托喀奇馕（小圆馕，《突厥语大词典》中解释“托喀奇”一词时指出：“这个词是由‘托克尔’——意思是肚子饱的人——中的‘托克’派生的。因为小圆馕可以使人果腹。”<sup>②</sup>）、结万岱馕（即混合面馕，也叫“阔休克里克馕”）、扎格拉馕（玉米面馕）、喀特里马馕（维吾尔馕中较特殊的一种。《突厥语大词典》中对“qaqurghan”一词解释说：“以油 and 面，在馕坑或炉灶上烤熟的一种馕。”<sup>③</sup>）等。烤制的面食除了馕之外还有“萨姆萨”（烤包子）和“帕尔穆达”（烤包子的一个种类，只是制作更加精致、讲究）两种。

除了烤制食品之外，下列美食也是脍炙人口的佳肴。例如：

珀罗，汉语俗称“抓饭”，这是因为珀罗要盛在大圆盘中，用手抓着吃，故名。

①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第一卷，51 页，民族出版社，1986。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76 页，民族出版社，2002 年。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541 页，民族出版社，2002。

珀罗还有两种变种,一种叫做“巴塔”,它与通常珀罗的不同之处在于,不用大块儿肉,而就着炒菜吃,菜里还要加入青杏,味道很酸,另有一番滋味;另一种叫做“僧度尔马”,这种珀罗比较清淡,将肉切成小块儿,与胡萝卜一起炒,与大米一起蒸熟。

卡瓦普,汉语译作“烤肉”,一直是维吾尔族传统美食,现有几十种。如:扞子烤肉(这是烤肉最早的类型)、羊肚烤肉(维吾尔族先民进入游牧生活之后便已出现。将剔骨羊肉切成块儿,拌入大蒜、洋葱、盐、黑胡椒粉和孜然粉等,塞进洗净的羊肚子里缝上口备用。在干净的沙子上用梭梭或胡杨木点篝火,把沙子烧热,拨开沙面上的火,把准备好的羊肚埋在沙中,然后再把火炭堆在埋肚子的沙面上。肚子在沙子里埋两至三小时后就熟了。从沙子中取出羊肚,切开便可食用。这种烤肉一般都在野外或放牧场所制作食用)、烤全羊、炒烤肉、丸子烤肉、整子烤肉、烤鱼、烤羊肝、烤羊肾、烤羊脾等,别具风味。此外,烤鹅、烤鸭、烤鸡、烤石鸡、烤鸽、烤鹌鹑、烤野兔等也是维吾尔族传统的烧烤食品。

杂碎(牛、羊的下水)食品。例如:面肺子、米肠子。

羊肝夹油,这是在宰羊时或夏天在户外野餐时食用的传统食品之一。把煮到八九成熟的羊肝和羊尾油切成片,两片肝中间夹一片羊尾油,撒一些盐和黑胡椒粉后食用。

曼塔,汉语译作“包子”,是维吾尔族最喜欢吃的传统食品之一,分为发面包子、薄皮包子、抓饭包子、南瓜包子和糖包子等几种。

雪伊莱,一种用大米、肉和胡萝卜条等煮成的黏饭。

麻西呼尔达,一种用大米、羊油、胡萝卜、酸梅、西红柿和绿豆等熬成的肉粥。

鱼谷菜,相当于汉语的面条,是维吾尔族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面食之一。如前所述,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就“ügrä”(面条)一词所做的注释“细丝汤面。汤面的一种,比一般汤面稀,而有滋味”<sup>①</sup>。这可以证明这一点。

曲曲儿,与馄饨相近的一种馅类面食。用肥羊肉和洋葱末加盐和黑胡椒做成馅,鸡蛋和面擀成皮,包成曲曲儿。煮熟后加汤食用。春季用苜蓿嫩芽做馅包的曲曲儿称作“毕搭曲曲儿”,可清理肠胃,有益于健康。

居瓦瓦,即饺子。

却普,汉语译作“面片”,是回鹘喜爱的食品,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点通过《突厥语大词典》对“tutmaq”<sup>②</sup>和“qovli”<sup>③</sup>两词所做的注释可以证明:“这种饭食可以强身,使面色红润,而且耐饿。却普可吃,汤也可喝。”现在维吾尔人食用的却普分“纳仁却普”、“阿图什却普”和“加饷却普”等类型。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137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478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431页,民族出版社,2002。

库尔达克,一种类似于红烧肉的肉菜。

哈勒瓦,一种佐餐的甜油面糊。

亚普麻,汉译羊肉焖饼,是一种以肉为主的菜肴。

颇席卡里,即油饼。

饮料。维吾尔族先民从游牧时代开始就把马乳灌入皮囊中发酵后饮用,把小米糝煮过,加入碾碎的麦芽,放置数日,发酵后将其汁过滤饮用,称为“博扎”。此外还有用小麦糝儿和面粉酿制的“阿伽提库”、“皮席马克”等饮料。开始定居生活后,饮用用葡萄汁发酵后制成的穆塞莱斯。穆塞莱斯一般分凉性和热性两类,用鲜葡萄制成的属凉性,对阳盛者能起到较好的调理作用。用葡萄干制成的或作为发酵材料放入各种热性调料及雏鸽制成的属热性,对阴盛者有较好的疗效。穆塞莱斯存放的时间越久越好,在气候较热的地方可埋入地下存放。和田酿制的“买扎普”,也是穆塞莱斯的一种。

茶。茶在回鹘人的传统饮食习惯中不可或缺,人们在饭前饭后都要饮用。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喝茶有益于健康,把亲朋好友请到家中喝茶聊天被视为一种享受。人们平时遇到熟人或邻里,都会热情地邀请他们喝茶。

今天,在喀什、和田等南疆城市里,处处都可以见到独具民族特色的茶馆,内饰朴素大方,茶炉上始终都摆放着二三十个茶壶,茶客络绎不绝。人们或者三五成群喝茶聊天、说笑话,或者聆听茶馆乐师们演奏动听的音乐。维吾尔族茶馆(包括餐馆)一般都备有都塔尔、弹布尔和热瓦甫等乐器,有时由茶馆的业余乐手弹奏,有时由茶客中的音乐爱好者即兴弹奏。

饮茶时,喜欢加入一些有药物作用的配料,这样的茶也叫“药茶”。所选用的茶主要是茯茶(维吾尔族称其为“黑茶”),而加入的配料是一些具有提高人体热量、开胃和强心安神等药用作用的粉末或片剂。如黑胡椒、姜、桂皮、豆蔻、丁香、孜然、红枣等。这些配料选择以及用量,则根据季节的变化、天气的冷暖湿燥以及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嗜好品。曾流行过吸水烟,后来则逐渐流行吸食碾成小米大小颗粒状的烤烟,叫做莫合烟。

## 第六节 喀喇汗朝的社会文化

季羨林先生在为刘勋先生的《新疆 2000 年》一书作的序中写道：“全国各个地区中，新疆有所不同。新疆的不同不在于其地域的辽阔，或民族的众多，而在于它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宝库所作出的异样的贡献上。”<sup>①</sup>这种不同或特点，在喀喇汗朝时期崭新的伊斯兰氛围中形成的维吾尔社会文化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社会文化包括经济文化之外的所有文化，比如具体民族的语言文化、科学文化、文学艺术成就、社会结构、针对社会及大自然的哲学观、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论述喀喇汗朝较典型和突出的文化现象。

130

### 一、语言文字

喀喇汗朝时期境内不同种族相互融合非常剧烈。据研究，喀喇汗朝以前，西域的民族和部族所操用的语言分属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或者使用同一语系的不同方言。回鹘西迁以后，回鹘语迅速传播，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于是，生活在喀什噶尔及其周围的乌古斯人的语言，便成了王朝范围内文学语言的基础。这种语言当时称作“哈喀尼耶语”。“哈喀尼耶语”的含义是可汗驻地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以 10 世纪以前的回鹘语为基础、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文学语言。这种文学语言，就像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所记载的那样，是以生活在喀喇汗朝中心地区（明确地讲是生活在喀什噶尔）的回鹘人的语言为基础的。从地理方面看，“哈喀尼耶语”是指生活在喀什噶尔和巴拉沙衮一带的喀喇汗人的语言。“哈喀尼耶语”能够成为喀喇汗朝时期的共同文学语言，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sup>②</sup>

操突厥诸语的各部众的活动区域较早就已比较固定，从公元 5 世纪开始，他

<sup>①</sup> 刘勋：《新疆 2000 年》（维吾尔文），1 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sup>②</sup>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3 页，民族出版社。



们的语言就分为东突厥语和西突厥语两个分支。分布于以伊塞克湖为中心的西铁勒诸部使用西突厥语,东铁勒诸部使用东突厥语。西铁勒诸部主要由乌古斯土库曼(即后来的土库曼、阿塞拜疆、阿纳托里突厥)和克普恰克(即后来的塔塔尔、巴什基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组成。东铁勒诸部主要由“九姓乌古斯”即“九姓回纥”组成,他们使用的便是古维吾尔语。10世纪以后,到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生活的时代,上述突厥两大集团中西边诸部的语言被称作“乌古斯语”,东边诸部的语言被称为“突厥语”。这里所说的“突厥语”,其实就是以喀喇汗朝中心区域的主要方言(喀什噶尔方言)为基础的文学语言。“九姓乌古斯”语曾是鄂尔浑回纥汗国时期的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喃、葛萨、斛嗛素、药忽葛、奚邪勿等回纥内九族和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葛逻禄等回纥外九部的共同语言。语言学家们按语言“谱系”分类法把它划入“维吾尔—葛逻禄语组”。

自公元8世纪至10世纪,回鹘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种古维吾尔语与鄂尔浑—叶尼塞时期(5—8世纪)的突厥语,在语音和词法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说有差异,那也只是表现在一些方言上,如“n”音用“y”取代,诸如 qon = qoy(羊),qanda = qayda(在哪里),qighan = qighay(贫穷)……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翻译的《金光明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文学遗产都是用“y”方言写成的。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就已经西迁的葛逻禄和回鹘等部落中“y”方言已普及,这为喀喇汗朝的共同文学语言形成奠定了基础。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把“维吾尔—葛逻禄语组”的语言称为“哈喀尼耶语”,并非考虑自己的故乡位于王朝的中心地区,他这样做是着眼于他对突厥语族诸语种近十年的调查所得的真实的语言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关于这一点,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指出:“最清晰和最准确的语言是只懂一种语言,从不与波斯人和其他外民族交融的人民的语言。凡是通晓两种语言并和城市居民有交往的人的语言是不纯的。索格达克、坎切克、阿尔古等部落就是通晓两种语言的。”“语言中轻柔的是乌古斯语,正确的是托赫锡和样磨语。从伊丽水(今伊犁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亚马尔河、亦的勒河(今之伏尔加河)诸河流域至回鹘诸城镇等地区居民的语言也是正确的。上述语言中最标准的语言要数哈喀尼耶中央地区居民的语言。……喀什噶尔有操坎切克语的村庄,但城里人均操哈喀尼耶突厥语。”<sup>①</sup>“巴拉沙衮人使用粟特语和突厥语。怛逻斯、巴伊扎城的居民亦如此。从白水城直至巴拉沙衮城之间,所有阿尔古诸城镇居民的语言是不纯的。”<sup>②</sup>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上述论述说明,《突厥语大词典》记载的“突厥语”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3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1、32、33页,民族出版社,2002。

和撰写《福乐智慧》的语言就是“哈喀尼耶语”或“喀什噶尔语”。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称未皈依伊斯兰教的高昌及其周围的回鹘部落为“回鹘异教徒”或“塔特”,以便把他们与王朝范围内已皈依伊斯兰教的回鹘部落区分开。实际上,喀喇汗朝时期共同的文学语言并未受到宗教信仰差异的限制,哈喀尼耶语在信仰伊斯兰教和未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中是通用的。喀喇汗朝接受伊斯兰教后,虽然佛教文献被毁或散失,但通行的语言依然是在此前曾经为佛教服务的语言,只不过其中的“佛”、“菩萨”、“佛经”一类的词汇渐渐弃置不用,被“安拉”、“胡大”、“先知”、“古兰经”等反映伊斯兰教文化的词汇所取代。

哈喀尼耶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1. 语音特点

(1)这个时期,喀喇汗朝开始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喀尼耶文。《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哈喀尼耶文共由 ش, ر, ج, ب, س, ن, م, د, ك, ع, ق, ز, و, خ, ف, ا, ل, ت 等 18 个字母和 8 个元音符号组成<sup>①</sup>。

(2)辅音“ك”要不同程度地软化。

(3)ص, ت, ق, ك, 等辅音使用在词首或两个元音之间时音不强化。

(4)辅音غ, ض用在词尾时保留,或变成ك, ق。

(5)两个元音之间使用的 ص, ك, ق等音连接附加成分时,并不像乌古斯—克普恰克语组中的语言那样软化成ض, غ。

(6)词汇的第一个音节中的ظلة,不发元音ظى,比如正确的发音应该是منظن,而不是منظن,سنظن或其他。

(7)除了上述基本字母之外,仅在口语中使用而不作为基本字母的还有七个字母。它们是:硬音的“ب—p”,阿拉伯字母“ج—j”,发音介于“ز—z”与“ش—x”之间的“i—z”,阿拉伯字母“ف—f”,带点儿的“غ—”,发音介于“ق—k”与“ك—k”之间的软“ك—g”,介于“ن—n”与“غ—”之间和“ن—n”与“ق—k”之间的“نعك—n”<sup>②</sup>。

### 2. 语法特点

(1)“哈喀尼耶语”的名词复数形式为 -lar/ -lar,在乌古斯—克普恰克语中则是 -tar/ -dar 或 -nar。

(2)从格形式是 -tin/ -din。(乌古斯—克普恰克语中则是 tan/dan 或 nan)

(3)宾格主要就是 -ni。(乌古斯—克普恰克语中 ig/igh, ugh 和 ni 混用)

(4)向格形式是 -gha/ -qa, -gä/ -kä。

(5)名词与动作的所属范畴使用 -lig/ -ligh 形式。乌古斯—克普恰克语则使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7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7页,民族出版社,2002。

用 -ti/ -li 形式。

(6)“哈喀尼耶语”中还有在乌古斯—克普恰克语中所没有的动名词形式 -ünq/ -unq。

(7)在“哈喀尼耶语”中,以 -qan/ -ghan 形式结尾的形动词使用广泛。

(8)在哈喀尼耶语的动词语法形式中,还存在着表示做某一件事是做这件事的人的义务的形式 -gülük/ -ghuluq。这种形式在现代维吾尔语中,特别是在和田方言中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但在其他突厥语中基本上没有保留。

### 3. 词汇特点

(1)在词汇方面,在喀喇汗朝范围内的维吾尔语词汇的基础上,有效地吸收了乌古斯—克普恰克语和阿尔古语中的一些词汇。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喀喇汗朝时期的文学语言的常用词汇有 7500 多个。

(2)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哈喀尼耶语中渗入了不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特别是到了作为哈喀尼耶语的延续和发展的“察合台维吾尔语”时期(13 世纪以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就更加凸显。

(3)由于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有些汉语词汇也通过古维吾尔语吸收到哈喀尼耶语中,并且很快就被当地语言所接受。比如“托音”(toyin,是汉语“道人”的转音)、“昆曲”(konquy,是汉语“公主”的转音)等。除此之外,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还能见到一些来自汉语的有关经济和社会的词汇。

总之,喀喇汗朝时期具有上述特点的共同文学语言——哈喀尼耶语是回鹘语的继续和发展,当时就有许多用哈喀尼耶语写成的名著问世。《突厥语大词典》完成于喀喇汗朝的鼎盛时期,说明当时哈喀尼耶语已相当完善,同“阿拉伯语如同竞赛中的两匹马一样并驾齐驱”<sup>①</sup>。“自古以来,从喀什噶里至上秦之间的所有突厥人故乡的可汗和苏丹们的诏书和信函,全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sup>②</sup>哈喀尼耶语在 13 世纪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分为北突厥语——金帐汗国文学语言(塔塔尔、巴西克尔特、哈萨克和柯尔克孜语的基础)、西突厥语——乌古斯—克普恰克文学语言(土库曼、阿塞拜疆和阿纳托里突厥语的基础)、东突厥语——察合台语(维吾尔和乌兹别克语的基础)三个分支。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喀喇汗朝初期一些突厥部落,比如生活在七河地区和塔拉斯河流域的乌古斯—克普恰克部落,把这种文字一直使用到公元 15 世纪<sup>③</sup>。高昌王朝使用由“粟特文”发展而来的“回鹘文”。《福乐智慧》最早的写本(维也纳本)就是哈桑·喀喇·沙依勒·谢米斯于 1439 年在赫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5 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1 页(前言),民族出版社 2002。

③ [俄]马洛夫:《蒙古与黠戛斯地区的古突厥文文献》(俄文),78,84 页,莫斯科,1951。

拉特城用回鹘文抄写的<sup>①</sup>。由此看来,回鹘文与喀喇汗时代的“哈喀尼耶文”同时存在了相当一段时期。

## 二、突出贡献

10世纪末11世纪初,喀喇汗朝对中亚和河中地区的统治日益加强,哈喀尼耶语(当时的维吾尔文学语言)同阿拉伯语并驾齐驱,在积极吸收东西方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次文化复兴。有人认为,这是“希腊—罗马文化、贵霜—龟兹文化以及隋唐文化之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产生的重要文化类型的代表。同时它赋予维吾尔和中亚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以新的内容与面貌”<sup>②</sup>。于是,在喀喇汗朝的喀什噶里、巴拉沙衮、撒马尔罕、布哈拉、讹打刺等大城市,出现了在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逻辑学、天文学、医学、伦理学、音乐、数学、代数等学科领域闻名于世的学者和科学家。如:法拉比、比茹尼、伊本·西纳、穆罕默德·穆萨·哈喇孜米、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麻赫穆德·喀什噶里、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穆罕默德·本·阿勒·喀什噶里、穆罕默德·本·撒马尔坎迪、伊马迪丁·喀什噶里、艾买克·布哈里、素赞·撒马尔罕、艾合买提·亚萨维均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学者和科学家。下面我们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和科学家作简单的介绍。

### (一) 音乐与艺术

回鹘人继承了其祖先集音乐与舞蹈为一体的艺术财富,并不断用新的内容加以丰富,用时代精神努力浇灌它。音乐和舞蹈一直是维吾尔族传统社交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如果不理解维吾尔族歌舞所表现的美学内涵,就无法理解维吾尔人民的哲学、艺术、道德、理想等意识形态文化以及他们的其他文化形态。仅从这一点而言,可以说维吾尔歌舞艺术就是维吾尔精神文化宝库的金钥匙。

维吾尔族先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以歌舞为主体的艺术瑰宝,后人吸收并继承其先民的歌舞要素,促其在新的土壤和环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所创造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在木卡姆艺术中得到了集中展示。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中段神秘的艺术园林,是东方音乐文化的瑰宝,是表现维吾尔族独具特色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生活画卷的史诗和民俗园,是把维吾尔族人民与世界、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木卡姆不仅是音乐艺术现象,它是融音乐、诗歌、舞蹈、戏剧等艺术于一身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哲学、道德、民族生活、民族风俗习惯及民族意识等内容体现其社会教育价值的、完整的、集中的民俗现象。

<sup>①</sup>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维吾尔文),9页(译者序),民族出版社,1986。

<sup>②</sup> 阿不都秀库尔·买买提明:《维吾尔族哲学史》(维吾尔文),122、12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本章不打算论述木卡姆艺术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和它的音乐内涵,仅对维吾尔木卡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喀喇汗朝时期的木卡姆的发展作简单的介绍。要想知道喀喇汗朝时期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发展,就必须要先了解作为其发展基础的第一阶段,即伊斯兰教之前的维吾尔木卡姆的萌芽阶段。这是因为,这一阶段与喀喇汗朝时期维吾尔木卡姆的发展阶段是紧密相连的。

### 1. 第一阶段——早期西域音乐及其对中原音乐的影响

这一时期历史漫长,据《晋书·音乐志》记载: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年)在位时,阿史那将《龟兹乐》带入长安,长安出现了以“于阗乐”、“伊州乐”、“疏勒乐”、“高昌乐”等西域乐曲为基础的教坊。龟兹音乐开创了西域音乐的先河。苏祇婆的音乐理论自成体系,以龟兹乐为依据,将散曲归结为“五旦七调”十二部分,与突厥汗国时期从漠北传入的乐曲融为一体。经高丽传入日本的中世纪的西域音乐舞蹈和戏剧艺术、乐器、乐谱等信息以及《敦煌古谱》可证明这一点。我们虽不能根据已有的资料说明以苏祇婆为代表的《西域大曲》的主体部分与现代维吾尔族木卡姆和古典木卡姆的音律系统具有一致性,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的思想与历史的连续性。公元6世纪的《西域大曲》的旋律和唱词并未传至今日,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时期音乐研究的历史功绩。

### 2. 第二阶段——伊斯兰教传入后木卡姆音乐的发展

如果说木卡姆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历史阶段以苏祇婆为代表,那么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后的代表当属法拉比。法拉比将木卡姆的影响扩大到了西方。法拉比所代表的木卡姆发展的时期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这一阶段与法拉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的木卡姆形成新风格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法拉比。法拉比在家乡学习了科学文化和艺术,30岁左右来到当时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巴格达,在那里接触了音乐理论代表人物艾勒坎迪等人及其作品。他为了向阿拉伯世界展示木卡姆的风采,用阿拉伯文完成了大部分作品,也为阿拉伯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有关木卡姆和音乐理论的优秀作品。主要作品有法拉比的《音乐之书》、《节奏的种类》、《音乐论》、《音乐书》以及其弟子伊本·西纳的《法则》、《救助之书》、《音乐之妙药》等。这些音乐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独特的“法拉比模式”。这模式在音乐演奏艺术、木卡姆乐曲分类标准、创新、乐器改造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法拉比将突厥民族音乐中的“九调”检定为“十七调”,此外还改造了卡伦、艾介克和乌德等乐器。在中亚与阿拉伯之间的音乐联系中,法拉比和伊本·西纳等人的影响最大。他们把阿拉伯和希腊音乐的一些概念运用到当地民族的音乐中,创造了用阿拉伯语名称图谱记音的规则。伊本·西纳在操突厥诸语民族的十二生肖、苏祇婆的《十二调律法》、巴比伦苏赫日文化类型

的十二星座、古代中亚人崇尚数字 12 的观念和古代“胡”、“戎”乐曲中的十二调的基础上规范了以往以各类数字命名的木卡姆及其变体,定为 12 个乐章,即热哈维、吾塞尼、热斯特、依加孜、阿布切西曼、布孜如克、伊拉克、伊皮哈尼、纳瓦、吾夏克、赞古莱、赛里开。特别是这一时期问世的法拉比的名著《音乐之书》,较全面地展示了喀喇汗朝时期音乐艺术的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以木卡姆为主要形式的歌舞艺术,在喀喇汗朝时期获得了较萨曼王朝时期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人们在喀什噶尔舞曲、和田舞曲等各地麦西来甫舞曲中,在节庆日的清真寺台阶上,在纳格拉鼓和唢呐的伴奏下演唱动听的木卡姆曲调。

在喀喇汗朝时代新出现的各种仪式、宗教节日和游览活动,包括自古的传统节日沿袭等无不与歌舞紧密相连。《突厥语大词典》记载了维吾尔人最古老的、最具代表性的节日歌谣、阿勒普·艾尔·通阿葬礼挽歌以及穆格歌谣的片断。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还可以见到“库布孜”(qobuz)、“乌德”(od)、“达普”(dap,手鼓)、“纳伊”(näy,笛子)、“热巴普”(rabab)、“空拉古”(qongraghu,铃铛)、“纳格拉鼓”(naghra)、“顿巴克”(dumbaq,鼓)、“布尔噶”(burgha)、“斯比孜古”(sipizghu)、“托穆卢克”(tomuruk)、“伊坎穆”(igäm,艾节克琴)等传统乐器名称,和“ir”(歌)、“iraghu”(唱歌)、“kög”(音乐)、“bodik”(舞蹈)等艺术专用词汇。

诺鲁孜节是中亚许多民族辞旧迎新的节日。每逢诺鲁孜节,人们成群结队出外春游,吃苏木菜(用谷类作物的芽做成的饭),举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庆祝春天和新的—年的到来。在喀喇汗朝时期,诺鲁孜节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备受重视。

此外,为了纪念阵亡的可汗或将领,也要举行群众文艺活动,演唱挽歌。如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次子阿尔斯兰汗,公元 960 年在今英吉沙和岳普湖之间的赛勒库穆荒漠对和田佛教徒进行的战役中阵亡,传说他的身躯埋在战场上,头颅埋在今喀什市达乌莱提巴格乡的谢伊提·阿尔斯兰汗麻扎。为他而举行的最初的悼念活动演变为“奥尔达穆—塞利斯”(意为汗国纪念),每年一次数千人聚集在一起,举行大型宗教仪式和游园活动,持续 5—10 天。现在仍在民间流传如下挽歌:“父亲是无畏的君主,母亲是艾拉努尔罕,为了真主而献身,殉教者阿尔斯兰汗。”挽歌《哈伦·布格拉汗》等也是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

简言之,喀喇汗朝时期音乐舞蹈十分普及,在宫廷、乡村和群众游艺活动中曾有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伊斯兰教默许了维吾尔人把“安拉与信仰,歌曲与舞蹈”融为一体的颇具特色的习俗。在喀喇汗朝时期,正在传播的苏非主义认为音乐和萨满舞蹈是一种纯洁人们的心灵的修行方式。医学也把音乐与歌舞视为治病健身的妙方,萨满教巫师们在伊斯兰的外衣下保存了纳格拉——旋转舞。于是,维吾尔民

族艺术、木卡姆以及游艺文化作为喀喇汗朝共同的艺术财富,对以后各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二) 史学与文学

喀喇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医学家,他们都是熟练掌握回鹘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其他语言的语言大师。他们借助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言,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学习世界各民族的先进的文化遗产,用回鹘文或阿拉伯文、波斯文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著书,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也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法拉比和花喇子密等人的一系列论著相继问世。这时期还出现了阿布都勒·哈帕尔·本·玉赛音·阿勒玛依、贾玛力·卡热西、伊玛迪丁·喀什噶里、麦吉迪丁·本·艾德那尼、穆罕默德·艾勒·撒马尔罕、艾卜·拜克力·穆罕默德·本·贾法尔·那尔夏赫、艾卜·赛伊德·艾勒·伊德里斯等学者。

阿布都勒·哈帕尔·本·玉赛音·阿勒玛依(?—1082年),出生在阿力麻里城,是当时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是《喀什噶尔史》,但这部著作已失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被其他作品引用而保存下来的部分内容。贾玛力·卡热西大约生活在12—13世纪之间,出生于阿力麻里城,他的活动主要是在喀什噶尔和巴拉沙衮。1282年,他借助喀什噶尔沙吉亚经学院收藏的丰富资料,编写了《苏拉赫词典》,记述了当时中亚一带各汗国的情况,以及各地的文人学者的传记材料。这部反映中亚丰富历史资料的词典流传到了今天。麦吉迪丁·本·艾德那尼著有《突厥斯坦与秦的历史》一书。据文献记载,这部著作系统地介绍了喀喇汗朝的族系和杰出人物的事迹。穆罕默德·艾勒·撒马尔罕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为当时的玛斯吾迪·本·阿力·克力齐·桃花石汗(1156—1162年)编著了名为《政治动机论》的著作,叙述苏里坦·散吉尔·克力齐·桃花石汗的生平事迹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艾卜·拜克力·穆罕默德·本·贾法尔·那尔夏赫的主要著作是《布哈拉史》。艾卜·赛伊德·艾勒·伊德里斯(?—1015年)的主要作品是《撒马尔罕史》。

喀喇汗朝时期,河中地区还出现了艾买克·布哈力(?—1149年)、素赞·撒马尔罕(?—1173年)、热西迪·撒马尔罕等著名的诗人。伊宾·阿西尔(1161—1234年)、泰伯里(839—923年)、贝拉祖利(?—892年)、艾卜·贾法尔·乌特比(11世纪)、伽尔迪孜(11世纪)、赛比(?—976年)、尼扎·穆留克(1018—1092年)、奥飞等学者撰写了部分有关喀喇汗朝和中亚历史文化的著作。限于篇幅,以下只简要提及几位影响很大的学者。

## 1. 法拉比

法拉比(870—950年)是公元9—10世纪中亚文化史上的思想巨人,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哲学认识史上创立了自然神论哲学体系,并将其贯穿于自然哲学、认识论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同时,在当时的语言学、逻辑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文艺学等领域,也留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思想财富。

法拉比的自然神论哲学、唯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对当时以及后来的进步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形成他们世界观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法拉比是中亚地区第一个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的学者,他在美学、文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中亚地区也是开创性的。同时,他还作为出色的音乐家和诗人,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艺术遗产。他的学术活动,不仅对阿拉伯世界,而且对喀喇汗朝以及整个西域和中亚地区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法拉比的全名是艾卜·奈斯尔·穆罕默德·伊宾·达干·伊本·乌祖鲁克·法拉比。他的本名是穆罕默德,艾卜·奈斯尔是其祖父之名,法拉比是他的笔名。由于法拉比著书立说多用阿拉伯语,阿拉伯史料中都把他视作阿拉伯人,认为他是阿拉伯的哲学家、理论家,并把他的《音乐大全》列入阿拉伯经典著作之中。西方学者也多持这种观点。如英国的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认为法拉比是一位阿拉伯的伟大理论家等。这些观点对我国的学术界影响非常大,如《辞海》中就认为法拉比是阿拉伯的哲学家、音乐理论家。

法拉比的出生地是法拉卜,也叫奥吐拉。据伊朗学者志费尼考证,法拉卜遗址在锡尔河的右岸,靠近阿雷斯河口。对这个地名,汉文史料中同样也有记载,但译名有些不同。《西游录》中称“讹答刺”,《元朝秘史》中称“兀答刺儿”,《元史·太祖本纪》中称“斡脱罗尔”,其地理位置均在锡尔河右岸。锡尔河在中亚,根本不在波斯。维吾尔文史料《乐师史》认为,法拉比的诞生地是在巴拉沙衮,这是操突厥诸语言的部族游牧的地方。俄罗斯突厥学家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说法拉比是突厥人。日本岸边成雄先生在《音乐的西传》中也说法拉比是突厥人。

大约在公元870年,法拉比诞生在奥吐拉郊区西吉树的一个军事城堡,奥吐拉属喀喇汗朝位于锡尔河北岸的巴拉沙衮。公元950年12月,法拉比在大马士革城逝世,享年80岁。法拉比的家族属于九姓回鹘葛逻禄部落<sup>①</sup>。当时,阿拉伯旅行家一直把回鹘部落称为“九姓乌古斯”(Taghazghaz)。回鹘—葛逻禄等九姓乌古斯西迁至中亚后建立了喀喇汗朝。法拉比的祖籍就是王朝所属锡尔河与七河之间的一个军事重镇,法拉比的父亲就是王朝军队中的一名军官。

<sup>①</sup> 参见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该书第187页有“维吾尔思想家法拉比(公元870—950年)”的字句。



法拉比的祖父乌祖鲁克曾参加过喀喇汗朝的第一位汗王与萨曼王朝之间争夺斯比加甫的战争。公元893年春季,萨曼王朝发动战争,进犯巴拉沙衮的时候,法拉比的父亲达干就是乌古尔恰克·卡迪尔汗军队中的一名指挥官。在战争中,萨曼王朝的军队占领了从塔拉斯到楚河之间的广阔土地,法拉卜城也随之归属于萨曼王朝了。当时,这里有1万多人做了萨曼王朝的俘虏,并且被迫皈依了伊斯兰教。喀喇汗朝的乌古尔恰克·卡迪尔汗因战争失利退回喀什噶尔。这次战争使法拉比和许多九姓回鹘家族与自己政治文化中心离散。

喀喇汗朝与萨曼王朝之间的矛盾在喀喇汗朝举国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也没有得到解决。后来,萨图克·布格拉汗和他的追随者们曾以收复失去的土地为目的,多次攻打萨曼王朝,终于在公元999年将其灭亡。从此,锡尔河以北的七河地区和河中地成了喀喇汗朝西部及西北部的疆域。

法拉比的青少年时代一直是在自己的故乡度过的。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回鹘文和音乐。这一时期,西亚地区开始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回鹘语作为作家文学创作的三种主要语言。

法拉比在中亚地区度过的30年中系统地学习了语法、音乐、数学、物理、天文、伦理、道德等学说。这也是他的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玛拉维学派的自然哲学对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大约在10世纪初期,也就是法拉比30岁时,他来到了当时伊斯兰文化中心巴格达深造,师从艾卜·拜克力·伊宾·斯拉吉丁。接着,他又师从巴格达著名学者艾布拜西尔·买台·伊宾·尤努斯学习了希腊语、逻辑学和医学。

为了继续深造,法拉比又从巴格达来到艾兰城。在这里,他拜著名基督教学者翰纳·伊本·海兰吉赖为师,学习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数学、理论医学以及音乐学。大约在公元921或922年,法拉比从艾兰城回到了巴格达,进入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研究阶段。10世纪20—30年代,他作为东方著名的哲学家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他的许多重要学术论著就是在这里完成的。20年后,即公元941年,法拉比离开巴格达来到艾拉甫城,从这里又到大马士革。当时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北叙利亚艾米达尼王朝的创建者赛甫鲁·代吾拉(915—967年)尊法拉比为导师,成了法拉比的庇护人,并为他的生活和学术活动提供了保障。

公元948年,法拉比从大马士革来到埃及举办了一次讲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第二年,法拉比回到大马士革,并在此生活了10年之久。这10年是法拉比晚年著书立说的阶段。据有关文献记载,法拉比从巴格达去艾兰城之前,曾返回故乡中亚一次。那时,布哈拉城还在萨曼王朝的统治之下。当时,法拉比应国王曼苏尔·伊宾·挪的要求写了《第二学说》一书。公元950年12月,法拉比在大马士革城外被一伙武装匪徒杀害,被安葬在大马士革城巴布思·珊黑尔门外的城墙边上。

据统计,法拉比一生的著作达300部之多,但流传下来的只有119部。其中主要的著作有《论灵魂》、《论理智》、《知识全书》、《音乐大全》等。法拉比以自己的一生精力汇集了东西方文化的精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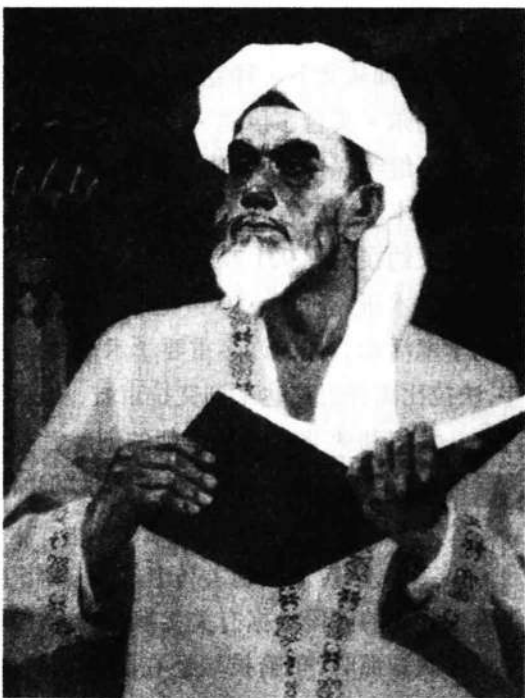
## 2.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1020?—1085年)是杰出的维吾尔族诗人、学者和思想家。《福乐智慧》成书于1069—1070年,当时他大约50多岁。根据19世纪维吾尔族诗人赛布里撰写的《谱系之书》记载,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大约病故于回历478年(1085—1086年之间),即《福乐智慧》写成十几年之后,去世后安葬在喀什市的帕依纳甫。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出生于巴拉沙衮的名门世家,自幼受到了良好教育,接受了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他智慧超群,才华出众,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和高尚的情操。少时,曾随父供职宫内,为可汗作词作曲、演奏音乐,深得汗王的器重。巴拉沙衮曾是喀喇汗朝国都,后因萨曼王朝不断侵犯,国之都被迫迁往原陪都喀什噶尔。喀喇汗朝的最高统治者苏来曼重视文化科学事业,发展经济,安抚百姓,国家曾一度繁荣富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此国王执政的20多年里,度过了一段安定的生活。

1056年后的四年里,喀喇汗朝政局动荡,可汗弟弟布格拉汗穆罕默德发动政变,夺取了王朝统治权,俘虏了苏来曼,搜捕了与苏来曼关系亲密的臣僚及亲属。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因怕受牵连,遭到迫害,便悄然离开了国都,潜人民间。在与人民群众广泛接触的时候,他搜集了大量的民歌的箴言,为后来写作《福乐智慧》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素材。

1060年之后,喀什噶尔政权由哈桑的弟弟穆罕默德掌握,他任命苏来曼的儿子(也叫哈桑)为副可汗。自此,王朝政局稳定,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便由外地回到喀什噶尔定居。在穆罕默德和哈桑两位可汗领导下,喀什噶尔很快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中原和中亚与西方交往的重镇。优素甫·哈斯·哈



《福乐智慧》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吉甫面对喀喇汗朝的繁荣,抚今忆昔,感慨万千,决心创作诗篇予以歌颂和弘扬。《福乐智慧》第四章《对明丽的春天和伟大的布格拉汗的赞颂》就集中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心愿。

《福乐智慧》完成之后,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将书稿献给了苏来曼王,很受汗王的赞赏,赐予他高贵的封号“哈斯·哈吉甫”,并命其进宫辅佐国事。

《福乐智慧》的丰富内容和思想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知识和智慧,为统治者提供了安邦治国的具体方略,为黎民百姓指出了安居乐业的方法,论及的问题大到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小至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百科全书,也是祖国文化的宝贵财富。《福乐智慧》不仅受到喀喇汗朝的重视,而且受到历代许多国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肯定和赞美。秦人称它为《帝王礼赞》,马秦人<sup>①</sup>称它为《治国南针》,东方人称它为《君王美饰》,伊朗人称它为《突厥语诸王书》,维吾尔人则称它为《福乐智慧》。

《福乐智慧》现有三个写本传世:第一是维也纳回鹘文写本,回历843年在赫拉特城抄成;第二是费尔干写本,又称纳曼干写本;第三是开罗写本。后两个写本大约在公元13—15世纪抄成。1890—1910年,俄国拉德洛夫根据回鹘文本和开罗本首次刊布了全诗的斯拉夫字母转写和德文译文。二次大战后有土耳其学者阿拉特刊布的本子。在此之前,土耳其语言学会于1942—1943年曾将三个写本分别影印出版。

《福乐智慧》是汉文译名,原文的词义是“福乐知识”。书名已显示了作品内容——主要阐述知识与幸福的关系及其在人生历程中的地位。

《福乐智慧》是一部鸿篇巨制。全诗共有13000多行,包括两篇《序言》(一篇是散文体,一篇是韵文体)、正文(共有85章),另附有3篇“附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哲学、文化、教育、外交、语言、天文、数学、地理、婚姻、伦理道德等,为研究当时的维吾尔族及突厥诸民族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在文学创作上的艺术成就也给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这部长诗以叙事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生动而简约。全诗以四个象征性的人物——“日出”、“月圆”、“贤明”、“觉醒”——为主体,描述他们的相识、共事、辩论、亡故,道出了人生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对白与论说中,把人们关注的人生问题、价值观问题以及今世后世的处事问题等,都推到了读者面前,覆盖面十分广泛。

作品的中心论题是安邦治国。围绕着这一中心论题,诗人展开了有关安邦治国的各个方面的论述。概括地说,作品主题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治理国家,即贤明大臣所论及的国君、大臣、将领、侍臣、宫监、使节、书吏、宫廷司库等必

<sup>①</sup> 秦人:在这里指喀喇汗国人。

备的条件,为臣的如何为国君供职,如何对待黎民、哲人、学者、医生、诗人、农民、牧人、工匠、贫者等以及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应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则是诗人心中向往建设的理想之国。这个理想之国即是以象征着法度、公正的日出国王为统治者,由他手下象征幸福、幸运和知识、智慧的大臣们撑起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王朝;它是一个人心向上、臣民具有高度素养的理想之国。

《福乐智慧》中除去两三个过渡性人物(如考赛米施、胡马鲁等)外,就是前述四位主要人物:日出国王、月圆大臣、贤明大臣和觉醒隐士。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主要通过他们的对白、言论和争辩刻画人物,展示他们的性格特征;此外,也用不多笔墨描绘他们的仪容和心理活动。

日出、月圆、贤明、觉醒是某种象征性思想的化身,也寓含人物的性格特征。譬如写日出国王:

我的秉性也和太阳一样,  
充满了永无亏缺的正义。(第 826 行)

其次,太阳每天出现,光照宇宙。  
光辉遍及万物,不差毫厘。(第 827 行)

我的法度和太阳一样,  
普及于万民而不分彼此。(第 828 行)

第三,太阳一出,大地温暖,  
百花朝阳而放,争妍斗奇。(第 829 行)

这些诗句已表明诗人给国王冠以“日出”称谓的用意,刻画了一位坚持正义法度的君王,似太阳一样永存,并将恩泽广布于众人 and 子孙万代。又譬如写月圆大臣:

月亮刚出生,好似娥眉,  
一天天丰满,悬挂高空。(第 731 行)

当它光芒黯淡,从天边消失,  
又重新出生,变虚为盈。(第 734 行)

我的秉性和月光相似，  
有时会出现，有时消失。(第 735 行)

月圆大臣是日出国王委任的第一位大臣，诗人给他“月圆”的称谓，象征着他的秉性特征，也含有“幸运”的寓意，因为“须知幸运无常，莫对它倾心，它好似满月，会亏损而消失”。意思是人们必须明白“幸运”同月亮一样，它有阴晴圆缺的变化，并非满月常在。

贤明大臣继父亲月圆大臣进宫辅佐国王管理朝政之后，显示出了他的非凡才能。国王问他何以如此精明干练，他道出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他说：

智慧是人类行动的制约，  
它秉性端正，办事有准律。(第 1837 行)

智慧处事明理，从不乖戾，  
它从无计心，而待人以诚。(第 1863 行)

智慧性格无比温柔，  
年年月月都循正道直行。(第 1865 行)

143

这个人物一出场，“智慧”的性格就分外鲜明，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生经验都集中在这一人物身上，赋予他渊博的学识、缜密的思考、宽广的情怀、高雅的谈吐，文臣武官的韬略豪气，锋利机敏的舌辩，让他处处闪烁着耀人眼目的知识和智慧的光芒。在诗人的心目中，知识和智慧才是人类的希望，才是生命价值的闪光点，这在《福乐智慧》的人物言语里都可以得到证明，从治国富民的大政方针，谈到做人的信条，大到国家的兴亡，小到百姓的处世之道，无一疏漏。诗人理想中的典范，正是贤明式的知识、智慧类型人物。

觉醒隐士这个人物的象征意义比较清楚，他要人们在面对人生享乐和财欲权势的争斗中，保持冷静和遁世的态度，要有为来世的幸福甘愿过山居、草食、粗衣的生活决定，要有“知足”的思想。觉醒的含义是对人事沉浮、荣华易逝、祸福相附、生命短暂的冷酷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只有抓紧时间祈祷真主给予来世的美好人生。诗人写道：

你若不远离世人而只身独处，  
兄弟啊，便不能专一地礼拜真主。(第 4086 行)

只有断了对尘世之情，  
真主之爱才能占据你心灵。(第4808行)

真主即是我心愿和希望的寄托，  
我日夜祈祷的真主，即是我的欢乐。(第4764行)

觉醒隐士的思想核心是“遁世”，这是一种消极人生观的反映，不过诗人仍然认为他是一位饱学之士，是有文化教养的才子，有为国为民理想的好人。例如，他劝日出国王在有限的生命流动的时空里，为邦国、为黎民百姓作出更大贡献。

诗人刻画人物，除去用人物的对白、言论、争辩来表现他们的思想品德，还采用了一些对人物音容笑貌的描绘和一些人物心理活动及动作的描绘，以加强读者对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如他这样描写月圆：

他容貌映丽，耀人眼目，  
他说话和气，语言魅人。(第464行)

如写贤明奉国王命，邀请他弟弟觉醒隐士出山人朝时，对人物的情绪、动作的描写也是十分细腻的：

他执辔鞴鞍，跃身上马，带着童仆，  
笑吟吟地朝他兄弟居处启程上路。(第4970行)

将近居所时他翻身下马，  
朝着兄弟门前缓缓迈步。(第4971行)

《福乐智慧》中关于人物外貌特征、动作及心理情感的章句虽然篇幅不多，但却不可忽视，因为这是认识人物整体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对人物内心世界和文化涵养的重要充实。

正如诗人在作品第七章里谈到的，人们要注意语言修养，才能使知识的智慧得到充分发挥，《福乐智慧》体现出了诗人拥有的高水平的语言修养。

《福乐智慧》全篇大部分采用传统的双行诗格式，一小部分借用古代维吾尔族民歌喜用的四行一联的格式。其韵律采用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化为基础的阿拉伯“阿鲁孜”韵律中的木塔卡里甫格律，即短长长/短长长/短长长/短长长格律，因为《福乐智慧》的诗行由11个音节组成，所以它的最后一组“短短长”变成了“短长”

韵,这是双行诗的格律。四行诗的押韵形式是:AABA 或 AAAA。双行诗采用的麦斯纳维体形式,是多音节双行体,押同韵,押韵形式是 AA、BB、CC……这种格律适用于哲理诗和宗教诗。《福乐智慧》所采用的双行诗正是中西亚及中东地区长篇叙事诗通常采用的诗歌形式。

《福乐智慧》是用回鹘文写成的。诗人为了避免人物对话和论说中枯燥乏味、呆板滞涩的弊病,采用了多种修辞手段,诸如比喻、对比、假设、反诘、排比、烘托、拟人等修辞格。这些修辞手段的运用,不仅使作品语言变得丰富活泼、多姿多彩,而且大大提升了语言的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如用日出比喻君王,用月圆比喻“幸运”。当月圆大臣问国王为何叫“日出”的名字时,国王答道:“是一位学者为我命名,他把我的秉性比作太阳。”(第 824 行)国王也问“月圆”名字来由,月圆答道:“你赐予我座位,我没有去坐,我居无常所,借此以表明”,“我让这只圆球为我作证,我和它一样,行止不定”,“圆球在地面上如何滚动,幸运也像它变幻无踪。”(见《福乐智慧》正文第 660—662 行)历史上将君王比作太阳的说法是常见的;幸运用月亮的有亏有盈、不能驻足来比喻就很清楚了,为了再次强调月亮变化不定的特性,诗人又用圆球作比喻,说明它不时滚动、不定位的特性。如:

智慧是明灯,给盲人赋予眼睛,  
它赋予哑人以语言,死人以灵魂。(第 1861 行)

财物好比是盐水一盆,  
你越喝越渴,欲壑难平。(第 3625 行)

人的心田好比无底的大海,  
知识好比珍珠,深藏在海底。(第 211 行)

诗人善于使用许多生活常见的熟悉的事物作喻体,例如草原、流云、牛、羊、马、骆驼、羚羊、野驴、狐狸、狼、马蝇、乌鸦、鹰隼等。

### 3.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全名叫麻赫默德·伊本·侯赛因·伊本·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出生在喀什疏附县乌帕尔乡阿孜克村。他大约生活在 11 世纪,死于 11 世纪 70—80 年代之交。他可能出身于著名的喀喇汗朝皇族。他的曾祖曾统治过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两地。他祖父穆罕默德是喀喇汗朝可汗玉素甫·卡迪尔汗的次子。1056 年(回历 448 年),穆罕默德与其兄苏来曼发生战争,将其兄俘获,自己成

为东部喀喇汗朝的可汗,称布格拉汗,他仅在位 15 个月,便于 1058 年将汗位传给长子侯赛因。侯赛因正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父亲,曾任七河地区巴尔斯罕的汗。

据说,侯赛因当储君时,一日出外打猎,在乌帕尔阿孜克村同一位学者的独生女伯比·热比亚邂逅,后来便娶了这位有才学的少女为妻。伯比·热比亚便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母亲。伯比·热比亚自幼从父亲那里受过良好的教育,相当博学,对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给他从小灌输了对文化知识的热爱,培养了他的美德。伯比·热比亚死后葬在通向帕米尔驿路边的伊克奇镇上,至今她的墓还在该地。喀什妇女直到现在仍无比崇敬这位母亲,奉她为“女祖”,在各种宗教活动中祈求她的助佑。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乌帕尔的阿孜克村度过了少年时代,在官邸附近的学校里接受了

良好的初级教育,后进入喀什噶尔经文学院学习,师从当时的著名学者侯赛因·伊本·海莱弗·喀什噶里,掌握了当时学术语言——阿拉伯语和文学语言——波斯语。

恰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父亲继汗位的同一年,穆罕默德的一个妃子与其子伊卜拉音发动了宫廷政变,亲属中多人被杀。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本人侥幸脱险,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但这却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有可能遍访伊犁、七河流域和钦察草原的广大地区,前后历经十几年,走遍了这里操突厥语的部族和部落,了解他们的语言、社会组织结构、风土人情、历史和宗教,作了大量的调查,得到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1072 年前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到达阿拉伯帝国巴格达城。在那里,他将多年搜集的材料加以梳理、分类、研究,开始编写《突厥语大词典》。那时候,阿拉伯哈里发国家政权掌握在塞尔柱人的统治者马立克·沙赫手里,马立克·沙赫的王后突尔坎可敦出身喀喇汗朝王室,这位王后曾操纵马立克·沙赫政权达 25 年之久。在她的荫庇下,喀什噶尔的许多学者来到巴格达,参与政治和学术活动。从《突厥语大词典》的某些内容来看,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可能也是在这位王后的庇护下从事自己的学术事业的。1076—1077 年,当《突厥语大词典》编写修订完成之时,他大约已 60 岁左右了。



《突厥语大词典》

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词典》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古代突厥语词典,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编纂《突厥语大词典》的缘起,词条的编排体例,文字结构,突厥诸部的地理分布,并附有他绘制的一幅圆形世界地图“达伊拉”(阿拉伯语,“圆形”之意)。第二部分是正文,也就是突厥语词的注释。正文分为8卷,各卷再分上卷、下卷,分列名词、动词。每卷收录的词目很多。卷内分章,每章的词目按拼写单词的字母之多寡分类(分为二字母词、三字母词、四字母词等);每类词根再按拼写类型、语言特征、词尾编排。《突厥语大词典》共收词7500余条。每个词条都用阿拉伯文详尽释义,并在必要时引民歌、谚语等材料作为用例。这些释义旁征博引,内容涉及语言、文学、民族、民俗、历史、宗教、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哲学、政治、经济、动植物、矿产地质等诸多方面,例如境域的变迁、民族的迁徙、山川的脉络、关隘的形势、都邑的方位、道路的远近以及各地风土人情、轶闻掌故等,都广泛搜集,系于有关条目之下。它是一部完整而可信的历史文献,是有关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部族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大百科全书。

除了《突厥语大词典》之外,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可能还著有《突厥语语法精义》等书。60年前,一位农民曾在他陵墓旁发现了一些埋在地下的手稿,它们被放在一只金托盘上的书板下。这或许也是他的部分研究成果。可惜这些著作的手稿现都已遗失。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晚年被一商队从巴格达带回故乡乌帕尔。回乡后,据说他曾在高级经文学院执教,培养了不少弟子。他去世以后,被安葬在乌帕尔乡阿孜克村近旁风景秀丽的山麓。这里,山上树木郁郁葱葱,山下有一眼名叫“切什麦祖拉尔”的山泉,是他生前最喜爱的地方。他的陵墓被人们尊称为“海兹里提·毛拉姆(意为尊敬的学者)之墓”,世世代代为人民敬仰。900多年来,喀什、莎车、和田和阿克苏等地的许多学者和经文学校学生毕业后常专程来到这座陵墓旁,称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为“先师”,祈求他在冥冥中为他们祝福。遵照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遗嘱,人们把他喜爱的书籍和著作赠给他的陵墓。来拜谒陵墓的人们便利用陵墓中的这些书籍,解决了学术问题。直至今日,每年诺鲁孜节还有许多探求宗教学问的喀什学者来拜谒这座陵墓,有的甚至在陵墓前结庐而居。1983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宣布这座陵墓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如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的序言中所述,“我以箴言、韵文、谚语、诗歌、民谣、叙事诗和散文片断修饰了此书,并按照专门的字母顺序把它们编排出来”。他在编纂《突厥语大词典》时,大量引用了历十多年艰辛亲自调查所得的资料诠释词条。词典中不仅有丰富的语言资料,同时还有大量书面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资料,其中记载的诗歌总计有277首,谚语达216条。这些诗歌和谚语多数是现实主义的力作。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真切的有关古代突厥语诸民族

文学尤其是古代维吾尔族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从公元前的遥远时代到公元11世纪这一漫长历史进程里突厥语诸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概况,艺术地再现了他们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显示了他们的艺术创造才能。这些诗歌、谚语中有相当多属于民间文学作品,它们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其语言朴素自然,饱含着人民的爱憎,是文学作品中难得的佳作。所以说,《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是突厥语言学史上的一块丰碑,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是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一部当之无愧的巨著。

畜牧经济曾在古代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从远古至公元8世纪40年代初的回纥汗国时期,也同样过着居无恒所,随水草流徙的游牧生活。通过《突厥语大词典》中引用的一些诗歌、谚语也可了解到,牲畜(尤其是马)在他们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显赫的地位:

谁拥有的财物多,谁当伯克就适合;  
伯克一旦破了产,左右星散奈若何<sup>①</sup>。

《突厥语大词典》里,有许多讴歌牧民们热爱的大草原的诗篇。它们自然浑成,不事雕琢,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例如:

百花盛开放异彩,  
犹如锦毯巧铺排,  
天堂景色眼前是,  
严冬一去不复来<sup>②</sup>。

鸟虫均苏醒,  
雌雄已麋集,  
群群分散开,  
巢穴不再进<sup>③</sup>。

雷鸣电闪起天边,  
云翻雾卷舞蹁跹,  
春风得意马长嘶,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81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129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4页,民族出版社,2002。

咳儿咳儿相呼唤<sup>①</sup>。

这些诗句使用的完全是白描手法,那绒毯上的“白花”,那伴着春雷、云雾的儿马母马,构成了淳朴自然的草原风光。哈萨克族有一种说法:闪电是天上的种公马奔跑的身影,因为天上的母马落到人间,天上那发情的种公马为找不到母马而狂奔乱跳,不住嘶鸣,于是人们听到了天上春雷轰响,而这时正值马群配种季节的到来<sup>②</sup>。这恰恰是对上面第三例诗歌的一个注脚。

当野马、野山羊、麂子成群地奔向牧场时,在那里放牧的牧民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些野味。《突厥语大词典》记载了不少关于古代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进行狩猎活动的诗篇。如:

乌鸦感到饥和渴,就是冰块也会啄,  
不见猎人伏一旁,为食饵欲进套索<sup>③</sup>。

从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狩猎除了用马匹、弓箭外,还用猎鹰、猎犬,有时也要放捕猎器诱捕猎物。每首诗歌并非简单的铺陈,而是显现出有趣、新鲜的风土色调。它们仿佛一幅幅狩猎民俗风情画,真实而形象地展现了古代突厥语诸民族狩猎活动的身影。

此外,“狐狸不喜欢猎犬的快跑”<sup>④</sup>、“没有从不出错的猎手,没有从不失误的哲人”<sup>⑤</sup>、“猎人有多少(捕猎的)谋略,狗熊便有多少(逃遁的)门道”<sup>⑥</sup>等谚语,恰恰是这些古代牧民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结晶,是他们对富有特色的狩猎活动中蕴藏的哲理的概括和总结。

公元840年,漠北的回纥汗国灭亡,以庞特勤为首的回鹘十五部西迁,与当地原有的回鹘游牧部落和土著居民融合后,逐渐过上了农耕生活。《突厥语大词典》记录了许多与农业、粮食加工业和园艺业有关的谚语,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已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例如:

在不适宜的地方建磨坊,从想象不到的地方会出事决堤<sup>⑦</sup>。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256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毕树:《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69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449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15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⑤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57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⑥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69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⑦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345页,民族出版社,2002。

磨坊里出生的耗子不怕天打雷<sup>①</sup>。

《突厥语大词典》引用的诗歌和谚语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以战争为题材的。有的诗歌直接描写了战争的激烈和残酷,还有些诗歌以豪迈的语言,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战场上勇士们的壮烈之举,鲜明地呈现出当时人们崇敬英雄、崇尚勇敢的英雄观:

我居高临下,把族人召唤,  
我抗击敌寇,弯弓射箭,  
我在战场上拼命厮杀,  
敌人看见壮士,抱头鼠窜<sup>②</sup>。

《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一些诗歌、谚语还向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古代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宗教信仰的状况。维吾尔族先民与北方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先民一样,曾长期信仰萨满教,后又相继信奉了袄教、摩尼教、佛教等,公元10世纪初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突厥语大词典》引用了不少赞美和崇拜腾格里(Tangri)(即“苍天、上苍、天神”之意)的诗句,如:

日夜向上苍膜拜,莫妄自尊大,  
对他要诚恐诚惶,莫嬉戏玩耍<sup>③</sup>。

另外,请再看下面的谚语:

谁身边有玉石,闪电触不了他<sup>④</sup>。  
敬奉胞衣,即可得子<sup>⑤</sup>。

前一谚语反映出古代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民族对玉石怀有的崇拜心理。后一谚语的“乌买”(译文中的“胞衣”)又是他们所崇拜的一位女神,被认为是司生育的女神。直到晚近的时候,旅行家们还曾在哈萨克民间见到过哈萨克妇女礼拜乌买女神的仪式<sup>⑥</sup>。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274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二卷,81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368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18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⑤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133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⑥ [土耳其]阿·伊南:《萨满教今昔》,中国社会科学院,汉译本(油印本)。

古代维吾尔族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在信奉萨满教的时代就有巫术和娱神的狂欢。《魏书·高车传》记载：“若安全无他，则为报赛……男女无大小皆集合，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他们以载歌载舞的形式来表达胜利的喜悦和对天地神灵的感谢。这种娱乐活动在后来就变成民间的娱乐喜庆活动保留下来。他们能歌善舞，每当节日喜庆之时，便聚集在一起尽情娱乐。《突厥语大词典》里的一些诗歌恰恰是当时节日喜庆风情的真实写照：

派出小子去干活，  
摇树采集新鲜果，  
猎取野马与黄羊，  
过个佳节得欢乐<sup>①</sup>。

每巡三杯饮三巡，  
离座起舞醉醺醺，  
一声长啸如狮吼，  
喝走忧伤亦销魂<sup>②</sup>。

《突厥语大词典》引起了世人的瞩目，是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记载突厥语词汇的词典，是一部价值很高的作品。它是展示古代维吾尔族人民创造的文化的里程碑，是维吾尔族前人对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之一。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其词典的《前言》中说：“……但我仍遍历了突厥的城镇和村落，查明了突厥、土库曼、乌古斯、奇吉尔、样磨、黠戛斯等语言的词汇和韵律，并将其语言熟记于心，经过细致的整理，使之有条不紊。”<sup>③</sup>正因为如此，这部词典就其对当时突厥语语言、语法的科学理解及其系统性来说，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词典的编纂过程中，对突厥语族各语言均作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开语言比较研究先河的著作也不为过。这部词典又是一部关于11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关于公元11世纪古代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民族生活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为了使这部词典采用“最优雅的形式和最明确的语言”，共引用诗歌和谚语各200余首（条），从而使这部词典同时具备了文学著作的特点，使之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占据了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285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154页，民族出版社，2002。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3页，民族出版社，200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是一位杰出的民间文学搜集者,《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诗歌、谚语正是他用十几年时间在毡房、农舍亲自采集所得。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多是现实主义作品,其中有不少是民间文学作品,因而愈显其珍贵价值。由于他的贡献,人们才能得到有关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民族的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依据。这些充满无比质朴深厚的思想感情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民间文学作品证明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给后来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启发和推动了他之后的文学家重视民间文学,走向民间,向广大人民学习,从而使他们的创作汲取新鲜血液,取得新的进展。如15世纪维吾尔文学杰出代表之一的阿塔依在创作中尽量使自己的语言接近人民的口语,曾恰到好处地引用过不少民间谚语。18—19世纪,为维吾尔文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阿布都热依木·尼扎里也从民间吸取营养,创作了一系列叙事长诗。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热碧亚与赛丁》便取材于流传在喀什一带的维吾尔民间同名叙事长诗。哈萨克族近代杰出诗人阿拜始终站在民众一边,以民族的振兴为己任。

《突厥语大词典》中收录了包括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民族的民歌。将现代维吾尔民歌与之相比较,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收录的诗歌多为四行诗,并且每行多由7个音节、8个音节或11个音节组成,这是现代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民歌中最常见的结构形式,表明这种结构形式在11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和发达了。

《突厥语大词典》里摘录的谚语不但是研究古代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诸民族社会、经济、信仰等的宝贵材料,而且相当多的谚语直至今日仍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民间流传着。例如:“勤劳满嘴油,懒汉血满头”,“好马一鞭,孛马千鞭”,“一个锅里煮不熟两个公羊头”,“鸟凭翅膀,人靠骏马”,“夏天多一分力,冬天多一分闲”,“人的花招儿在肚里,牲畜的花斑在外表”等,类似这样流传至今的谚语不在少数。倘若从《突厥语大词典》完成之时算起,这些谚语在历史长河里已经历了将近10个世纪,可见其持久的生命力。还有些谚语至今已发生了一些变异,有些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比如:“没有大麦,骏马翻不了山;没有帮手,英雄打不了胜仗。”这个表现英雄离开集体的支持与帮助将会孤掌难鸣的谚语,在今日的维吾尔族谚语中已发展成为“一匹马扬不起尘土,一个人成不了英雄”、“一根木头盖不成房,单枪匹马成不了王”、“天鹅离不开湖面,英雄离不开人民”等多个同样内容的谚语。再如:“用美好的语言可获得美酒佳肴”这一谚语,发展到今天,也有了“一支蜡烛可以照亮一顶毡房,一句话可以照亮大伙的心房”、“直言可截铁,柔语可断剑”、“好刀无事不出鞘,好话出口愁容消”等更加生动形象的谚语。另外一些谚语由于时代的变迁而不再流传,它们只是作为民间文学遗产被《突厥语大词典》保存下来。例如:词典中收录了“谁崇拜乌买,谁就会得子”,“打塔特人的

眼,挖荆棘的根”,“谁的身边有玉石,闪电不会击中他”等,在当代人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已不再出现了。与此同时,《突厥语大词典》收录的谚语当中,以游牧业生产和生活为题材的谚语,或者以驼、马、羊、牛四畜作比的谚语非常丰富,而农耕生活已延续了千年以上的维吾尔族人谚语已逐渐转向用庄稼、麦场、粮仓、果树来作比了。谚语是语言中的精华,谚语的语言形式特点是由语言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现代维吾尔等民族的语言是古代维吾尔族语及其他突厥语族语种的一种发展。因此,《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谚语形式同现今维吾尔族民族的谚语是相通的,还有一些完全相同。

《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诗歌和谚语,在语言风格上也充分体现了古代维吾尔等民族的特点。例如其中很少见到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这些诗歌和谚语内容丰富,语言纯熟,风格优美,反映出当时维吾尔等民族的经济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突厥语大词典》里多数诗歌都十分讲求韵律,表明了当时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民族的诗歌韵律已发展到相当高度。这种诗歌的韵律最终形成了具有中亚风格的阿鲁孜韵律。

《突厥语大词典》于1072—1077年完成之后,曾在巴格达王宫图书馆中保存,并且不断辗转手抄流传。土耳其学者穆·夏克尔·乌勒库塔希尔著的《大突厥语学家喀什噶尔人麻赫默德》一书中提到《突厥语大词典》有多种抄本<sup>①</sup>。1360年过世的埃及著名历史学家拜迪尔丁·马合默德在《时代参与者历史的珍珠》一书中,以《我所见到的麻赫默德的大词典》为题,提供了简单的材料。埃及拜依巴尔西亚经学院伊本·买合默德·喀什噶里在完成于1363年的《幸福之冠和统治者的称号》中,还引用了《突厥语大词典》的一些片断。200年后,阿拉伯语言学家加马利丁·伊本·尼穆罕拉自认为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学生,在从回鹘(古代维吾尔)人中积累语言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漂亮的语言和精美的阐述》一书。由此可见,《突厥语大词典》完成后,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此书曾失落几百年,直至1914年,土耳其学者阿里·艾米尔才从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它的抄本。该抄本是由波斯萨微地方人穆罕默德·本·阿布巴克尔于1265—1266年间根据作者的手稿原本抄写的。它原被奥斯曼帝国大臣纳吉甫·贝伊家族的一位妇女所保存,后因生活所迫,卖给了书商,出现在旧书店中,这是《突厥语大词典》现存的唯一本子,收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家图书馆。1917—1919年在土耳其出现了它的铅印本,1939—1941年在安卡拉出版了土耳其文译本。以后陆续被译成德文、俄文以及日、法、英等文字的节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学者们从1959年开始做整理和翻译工作,1978年,

<sup>①</sup>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文),第一卷,4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突厥语大词典》的翻译工作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从1980年相继出版了三卷本的现代维吾尔语译本,2001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汉文译本,译者是新疆社会科学院的校仲彝。

《突厥语大词典》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甚至在近年来形成了“大词典学”。广大学者对它的研究更加广泛,更加深入。随着词典的翻译、出版,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对它倾注着自己的心血,有的深入喀什细致地调查研究,有的将词典逐字逐句进行分析、探讨,已出现了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在中亚地区,在土耳其,对《突厥语大词典》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过。它在土耳其印行之际,近东似已知晓。在欧洲,近年来不少学者用德文、匈牙利文、俄文、英文等写了不少关于它的书籍和文章。德国从事此项研究的人最多,如著名的突厥学家卡尔勒·布鲁克曼从1919年起就写了很多有关文章。特别是1928年,他按德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突厥语大词典》的索引颇有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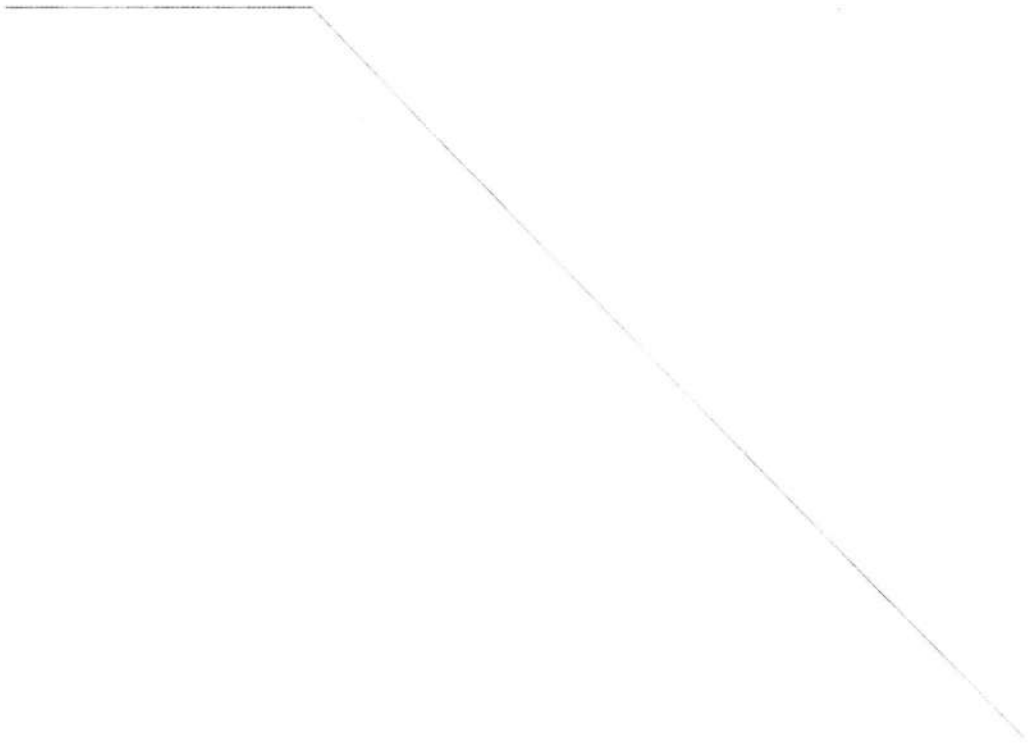






第 五 章

西辽时期的回鹘文化



## 第一节 西辽政权的建立

西辽(或称“喀喇契丹”)是从1124年到1211年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对维吾尔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朝代。西辽王朝的建立者名叫耶律大石,出身于王族,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汉文和契丹文,弓马娴熟,能文能武。因他曾做过翰林,也称大石林牙(契丹语称“翰林”为“林牙”)。1122年,女真大军进逼辽朝都城,辽朝逐渐濒于崩溃。耶律大石辗转来到位于鄂尔浑河东岸的可敦城,召集辽朝残部议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说服了众人,“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sup>①</sup>,组织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政权。此后,按照他“养兵待时而动”的既定方针,经过5年的休养生息,聚集了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决定向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朝所在的中亚地区发展。他先写信给回鹘王毕勒哥,当他来到回鹘人的地盘时,在别失八里受到了回鹘人的热情欢迎。之后他继续西行,到达吉利吉思人的地盘,受到吉利吉思人的袭扰。耶律大石没有与吉利吉思人过多地作战,一直挺进到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在那里招抚当地民众,扩大影响,修筑城垒,建立了根据地。管辖的地面东起土拉河,西到额敏河,属民的户数达到4万,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在这种形势下,耶律大石于1132年在叶密立称帝,号称菊儿汗,汉语尊号为天佑皇帝。建立了一个统治上述广大地区的政权,史称西辽。

耶律大石称帝以后,向南进军,把高昌回鹘王朝并为自己的属国。接着又进攻喀什噶尔地区,遭到挫折,他便转而向七河地区发展。适逢喀喇汗朝阿尔斯兰汗管辖的巴拉沙衮政权受到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部族葛逻禄和康里人的反抗,耶律大石应阿尔斯兰汗伊卜拉音的请求,帮助巴拉沙衮政权平定了诸游牧部族的叛乱,接着他便取代伊卜拉音做了巴拉沙衮的主人,并且以巴拉沙衮为首都,进一步扩充了西辽帝国的疆域。之后,他又乘胜进军,经卡特万会战,击败了塞尔柱王朝苏丹桑贾尔,迫使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河中地区。接着又派大军逼迫花刺子模归降,使西辽帝国达到了鼎盛。

1143年,耶律大石去世。直到1178年直鲁古继位,西辽王朝经历了近40年的稳定时期。其后,发生了推翻布尔罕王朝的桑贾尔起义,花刺子模灭亡,西部喀喇汗朝、高昌回鹘王国归附蒙古等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西辽王朝渐渐走向衰亡。1211年,屈出律俘获菊儿汗,自居汗位,从此西辽王朝归于灭亡。

<sup>①</sup> 《辽史》卷三〇附《西辽本末》。

## 第二节 西辽时期回鹘的社会经济状况

### 一、社会结构

**西**辽极盛时,其疆域东起高昌国以东,到达哈密、若羌,西至威海和卡拉库姆沙漠,北到巴尔喀什湖以北和叶尼塞河上游,南接昆仑山、阿姆河一线。境内居住的民族除了统治者所属的契丹族外,主要有回鹘、葛逻禄、塔吉克等,此外还有少量汉人以及操突厥语的康里、乌古斯、钦察人和操蒙古语的乃蛮人,其中回鹘人为最多。

西辽王朝建立之前,原有的喀喇汗朝、高昌回鹘王国和花刺子模均已进入封建社会,西辽王朝建立之后,承认这些地区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保持和继续发展了当地原有的封建社会制度,所以,社会的阶级成分主要是大小地主和农民、大小牧主和牧民。农民大多数租种地主的土地,此外也有一些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据魏良弢先生的《西辽史纲》,佃农或其他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一般情况下只能留下收成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地主又把其中的一半以哈拉吉(土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西辽王朝向全国的臣民征收赋税,基本上不实行喀喇汗朝那样的伊克塔分封制度(属国除外),文武官员的俸禄由国库支出。西辽王朝时期的城市作为国家或地区的大大小小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城市居民中的上层由王族、官员、宗教上层人士和富商组成,下层由一般宗教职业者、军队士卒、官私奴仆、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帮工、短工组成。

西辽王朝在全国实行承袭辽朝的两部制,就是说,针对境内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不同特点,分别设置国家机构实施统治:在游牧的牧业民族居住地区,以游牧民族原有的部族为行政单位,委任官员实施管理,中央王朝设北面朝官总理游牧地区的军政事务;在定居的农业民族居住地区,按照中原划分行政区域的办法,设置州县,中央王朝设南面朝官总理农耕地区的军政事务。在属国,采取给予一定自主权的间接统治政策和羁縻政策。如对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朝,西辽王朝派监督

官常驻其首府,行使间接统治;对花刺子模则定期派出官员,掌握情况和收取赋税,实行羁縻政策。

## 二、经济体制

如上所述,西辽王朝为了在新的疆域立足,对中亚广大地区的社会结构采取了不加改变的基本方针。与此相应,对这里的经济体制也采取了维持原有的生产关系、国家收取较轻赋税的政策。除了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外,其他地区仍然由原先的政权管辖,缴纳一定的贡赋。

支撑西辽王朝的主要的经济支柱依然是农业和畜牧业。中亚地区的农业是干旱区域的绿洲灌溉农业,农业的发展有赖于水利工程。考古发现,讹打刺绿洲上有完善的水利灌溉网,巴拉沙衮的水利灌溉系统也非常发达,这是当时农业发展的一个原因。一部分原来的牧民由于种种原因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也是促使农业大发展的原因。当时,高昌出产粟、大麦、小麦、水稻、豌豆、苜蓿、棉花、亚麻、胡麻、葡萄等;喀喇汗朝不仅种植粮食作物,而且还种植棉花,植桑养蚕,培育果木。《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七河流域“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蒲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河中壤地,宜百谷,惟无荞麦、大豆”。特别是提到这里出产的优质棉花,“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说河中地区“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瓜大者如马首许,长可容狐。八谷中无黍糯大豆,余皆有之。盛夏无雨,引河以激,率二亩收钟许。酿以蒲桃,味如中山九酝”。

西辽王朝的畜牧业是其经济的另一支柱。七河地区原本就是喀喇汗朝的中心牧区,到了西辽王朝,这里依然是王朝的主要畜牧业地区。这里天气凉爽,水草丰美,盛产苜蓿,是最好的牧场。伊犁河谷也是天然牧场,伊犁马和大尾羊闻名于世。高昌的畜牧业主要是养马,此外还有牛、骆驼、羊等。据《辽史》记载,高昌国王毕勒哥作为见面礼,一次送给耶律大石 600 匹马,100 头骆驼,3000 只羊。倘若没有相当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就不可能支持上层如此规模的礼仪活动。

狩猎也是西辽王朝的一项经济活动,主要猎获物有羚羊、鹿、狼、狐狸、野羊、野驴、野猪、熊等。在伊犁河、塔拉斯河、楚河和锡尔河一带,还有过一定规模的渔业。

与农业相伴而产生的是手工业。高昌国主要的产品是满足日常生活之需的纺织品(包括棉布、丝绸)、毡毯、铁制工具、刀剑弓矛之类的武器、葡萄酒等。喀喇汗朝手工业产品分纺织品、陶器、金属制品、玻璃制品和纸张等几大类,诸如棉布、毛织品、丝织品、家用器皿、铁制农业生产工具、挽具、武器、炊具、用玻璃制作的碗、盘、瓶、罐、高脚杯、香水瓶、窗玻璃等在当时都很有名气。

西辽王朝境内的采矿业也很发达,据记载,出产铁、铜、锡、金、银、汞、石棉、硫酸盐、红宝石、绿松石、天青石等。

西辽王朝的城市经济也相当发达。王朝直辖地的巴拉沙衮、乌兹干、讹打刺、怛逻斯、阿力麻里;高昌国的高昌城、月牙城、鲁陈城、别失八里;喀喇汗朝的喀什噶尔、萨末鞬等都是非常繁华的城市,是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西辽王朝的商业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两种。国内贸易包括城乡之间和农牧区之间的物质交换,国际贸易指处在古丝绸之路通道上的各城市(如怛逻斯、讹打刺、喀什噶尔、萨末鞬)的涉外贸易。在贸易活动中流通狄纳尔(金币)、迪尔赫姆(银币)和费尔斯(小铜币)三种货币。

## 第三节 西辽时期的回鹘文化

### 一、语言和文字

到了西辽王朝统治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的时期，回鹘已在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广为分布，已基本完成了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回鹘的语言（维吾尔语的前身）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逐渐成为这一地区通行最广的语言。与此同时，回鹘语也在与其他语言（如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接触过程中，从其他语言中吸收了不少外来词，丰富了它的词汇系统。由于地缘关系以及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中亚和天山以南各民族语言曾经吸收了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在西辽王朝管辖的范围内，这些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开始渗入塔里木盆地以北地区；原来流行于高昌国境内的汉语借词，此时开始进入塔里木盆地及其以南地区，甚至传播到中亚。此外，西辽王朝的中央政府曾经把汉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也加强了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进入回鹘语的阿拉伯语借词多数是与伊斯兰教有关的语汇，表达属于精神生活和政治哲学范畴的概念；进入回鹘语的汉语借词往往是表达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的语汇，进入回鹘语的波斯语借词则二者兼而有之。

在喀喇汗朝时期，记录《古兰经》的自右向左横写的阿拉伯文已经开始逐渐取代原有的由上到下竖写的回鹘文。在西辽王朝境内，在阿拉伯字母基础上略加改制的拼写回鹘语的文字继续向北传播，几百年以后在高昌国回鹘人的世俗生活中，逐渐取代了回鹘文，在当地牢牢地扎了根，直到今天，在阿拉伯字母基础上改制的拼音文字仍然是维吾尔族采用的文字（俗称“老文字”）。

### 二、文 学

在文学成就方面，西辽时期只有两位文学家的作品流传至今，一是苏非派神学家兼诗人艾合买提·亚萨维的《警言集》(Diwan - I Hikmet)，二是著名盲诗人阿合

买提·玉格乃克的长篇劝诫诗《真理的入门》(Hibbetul Heqayiq)。

艾合买提·亚萨维生活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中期,1166年去世。他出生于一个神职人员家庭,幼年父母相继去世,由姐姐抚养长大。他曾师从著名苏非派学者阿尔斯兰巴巴和玉素甫·艾马达因。艾合买提·亚萨维聪明好学,最终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善写有浓郁民间口语风格的格则勒诗,曾以其活泼轻快的格则勒诗享誉布哈拉。他的代表作是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警言集》。这部哲理诗阐发伊斯兰苏非派有关今世无常、后世永恒、当苦行修炼的遁世观念,同时对他那个时代的上层人士穷奢极欲的生活和腐败糜烂的作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的诗作语言接近口语,艺术感染力很强,流传很广,一时成为苏非派文学的代表作,对之后维吾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阿合买提·玉格乃克是生活在西辽王朝统治时期的一位回鹘诗人,约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在世。他是一位先天盲人,本名叫阿合买提,父亲名叫马合木提,住在玉格乃克村。他的全名写作艾地比·阿合买提·比·马合木提·玉格乃克,“玉格乃克”表示诗人的出生地,以示不忘故乡。

《真理的入门》(又译《真理的献礼》)是阿合买提·玉格乃克唯一的传世作品。现存三种完整的写本:一是回鹘文写本,字体工整秀丽,1444年由当时的书法高手再奴里·阿比丁、苏里唐·拜合提、玉赛音等人在撒马尔罕抄成,现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清真寺图书馆;二是回鹘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抄本,1480年由阿卜杜热扎克等人在伊斯坦布尔抄成,现存伊斯坦布尔图书馆;三是阿拉伯文抄本,在伊斯坦布尔抄成,抄写年代和抄写人不详,现存伊斯坦布尔托布卡甫—沙拉依图书馆。

《真理的入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土耳其学者乃吉甫·阿斯木在伊斯坦布尔阿亚索菲亚图书馆里从“蒙语文章汇编”丛书中发现的。由于它是用回鹘字母匆忙写成,所以很难阅读。乃吉甫·阿斯木以巨大的毅力克服了上述困难,于1915年出版了这部作品,使之在湮没了近5个世纪之后得以与世人见面。1951年,热西提·热合买提·阿拉提对这部作品重新进行了科学的考订后,将其译为土耳其文。1981年,海米提·铁木尔、吐尔逊·阿尤甫等要据土耳其突厥学家热西提·阿拉提整理、由土耳其火焰出版社出版的1951年《真理的入门》手抄本,在校订的基础上,对回鹘文进行了转写,并将其译为现代维吾尔语,从而使这部几百年前的珍贵文献与广大维吾尔读者见了面。

《真理的入门》从社会审美观的角度来讲,直接继承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所表达的社会审美理想。但没有用勾画“国王、国家制度及其统治者们的”形象来寄托自己的社会审美理想,这是因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处在一个相对动乱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道德沦丧。人民群众都向往前一时期比较安定富裕的生活而厌恶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表现在《真

理的入门》中的,主要就是对时代动乱、道德沦丧的谴责与揭露和对美好生活、完善人格的呼唤与追求。

在《真理的入门》这部长诗中,关于知识的论述占了很大的篇幅。诗人以此发展了知识将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思想。距今七八百年前的这位诗人,关于知识的价值,是这样写的:

一个智者能和一千个无知人较量。  
对比下你能懂知识的重量。  
你明智地观察就能理解:  
任何财宝都比不上知识的宝藏。

学者以有知识而登上高峰,  
无知人因愚昧而向下沉沦。  
探求知识切莫厌倦啊,  
真主的使者说:  
“知识在中国,你们也要去找寻。”<sup>①</sup>

162

诗人的许多论述不免有“知识至上”之嫌,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但诗人反对愚昧,强调知识的威力,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对我们尤其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诗人在长诗中,以很多篇幅颂扬了人类文明的最珍贵的成果之一——道德,如慷慨、谦虚、正直、宽恕、忍耐、缄口慎言等,而对它们的反面——吝啬、骄傲、伪善、桀骜不逊、饶舌等予以鞭笞。颂扬慷慨,为了衬托“正直”,他将其与“说谎”加以对比,作了形象的描绘:

假话如生葱,真话赛蜜甜,  
吃生葱嘴辣,吃蜂蜜味甘。  
谎话如疾病,忠言是良医,  
这将是万古不渝的格言<sup>②</sup>。

诗人的这种社会审美始终贯穿于长诗。在这部训谕性长诗中,诗人表明自己在哲学、社会、政治、道德、审美等方面的观点:他热情地讴歌了探求知识、勤奋学

① 《喀喇汗时期的文学》,63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② 《喀喇汗时期的文学》,63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习、英勇果敢、公正无私、谦虚谨慎等美德,严厉地斥责了愚昧无知、骄傲自满等恶习。诗人的这些观念,在当时来说,虽然具有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的一面,但其中包含的历代维吾尔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优秀道德成果,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诗人虽然对当时社会的种种阴暗面进行了愤怒的批判和揭露,但他并不要求人们去消灭它、改造它,而是认为这一切都是“安拉”的旨意和安排,因而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消极地服从安拉的旨意,这当然应当加以批判和抛弃。

### 三、艺 术

#### 1. 造型艺术

信仰佛教的回鹘人在造型艺术方面其实早已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他们在天山南北的绿洲上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庙宇,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佛像,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壁画和特色鲜明的雕刻。但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戒律中衍生出的禁止表现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的禁区,使回鹘人的造型艺术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于是,回鹘人转而发展以花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装饰艺术。在大型建筑(如清真寺)和比较讲究的民居的门、窗、廊、壁龛、壁炉上都刻有造型别致的精美花纹图案,生活用品和手工业产品都采用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以花卉为主的装饰图案纹样,如地毯、花帽、花布、手帕、首饰、器皿等<sup>①</sup>。

#### 2. 音乐

西辽王朝的回鹘人在音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天山南北曾经是龟兹乐和高昌乐得以产生的沃土,后来由于受到中亚和波斯器乐的影响,使回鹘人的音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出现了后来被称作“木卡姆”的大型套曲的雏形<sup>②</sup>。

### 四、宗 教

西辽王朝采取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对臣民的宗教信仰不加干预,致使各种宗教得到发展,包括伊斯兰教。

#### 1. 伊斯兰教

原喀喇汗朝的回鹘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曾经被奉为国教。在各种宗教并行的新的环境中,为了在各种宗教中胜出,西辽王朝的伊斯兰教信徒中出现了以艾合买提·亚萨维为首的改革派,尝试吸收回鹘人等游牧民原有宗教习俗中的某

①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228页,民族出版社,1985。

②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228、229页,民族出版社,1985。

些成分(如宗教仪式和有影响的神祇),简化伊斯兰教教规和仪式。经艾合买提·亚萨维改革以后的教义有两点核心内容:一是禁欲,即反对奢侈享乐,提倡清苦节俭;二是恭顺,即伊斯兰教原本提倡的安分守己、恭顺听命。前一点易于为平民所接受,后一点乐于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再加上艾合买提·亚萨维善于用回鹘人明白易懂的语言写诗,宣传他所提倡的教义,他所宣传的教义和仪式很快被游牧部落所接受,在他的许多门徒的拥护和配合下,居然出现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教教派——亚萨维派,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大部分地区的传播,使西辽王朝境内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分界线逼近了高昌国的都城别失八里<sup>①</sup>。

## 2. 佛教

西辽王朝初期,高昌回鹘国的回鹘人是信佛教的。据记载,当时那里“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邀乐于其间”<sup>②</sup>。直到公元13世纪蒙古西征,高昌回鹘国的佛教一直存在。长春真人当年路过别失八里时,那里“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龙兴西寺“有佛书一藏”<sup>③</sup>。吐鲁番和库车地区保存至今的千佛洞遗址,足证当年高昌的回鹘人信奉佛教的盛况。

## 3. 萨满教

萨满教是回鹘人最早信奉的宗教。后来,回鹘人的大多数先后改信摩尼教、景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但居住在北方的一部分回鹘人在西辽王朝时期也还信奉萨满教<sup>④</sup>。

# 五、建筑艺术

西辽王朝时期回鹘人建筑艺术的鲜明特征是建筑风格的伊斯兰化。这一时期在七河地区,到处可见清真寺的圆屋顶和高耸的宣礼塔,伊斯兰教教徒的公墓中圣徒的圆顶陵墓远远就可以映入人们的眼帘。城市和乡村的民居也发生了变化,门口多砌成拱形,有的房屋砌成圆顶。人们追求室内装饰的富丽豪华,雕刻玲珑剔透的护墙板配在色彩鲜艳的壁画周围,天花板上贴着石膏刻成的花叶装饰物。砖普遍被用作建筑材料,经常与土坯、泥块混合使用。宏大建筑的结构经常采用中央圆顶和高大的正门相结合的形式,给人一种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感觉<sup>⑤</sup>。

① 魏良弢:《西辽史纲》,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宋史》卷四九一《高昌传》。

③ 《长春真人西游记》。

④ 魏良弢:《西辽史纲》,135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⑤ 魏良弢:《西辽史纲》,138、143页,人民出版社,1991。



第 六 章

元代的畏兀儿文化

---

## 第一节 元代的畏兀儿

**西** 迁回鹘的一支以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另一支建立了喀喇汗朝,后为西辽所灭。高昌回鹘王国自愿臣服蒙古汗国,对蒙古帝国的建立有功,受到优待,维持半独立的局面。蒙古汗国只派一名“达鲁花赤”监督,高昌回鹘王国承担向蒙古帝国缴纳一定数量贡赋的义务。

成吉思汗后来将他开拓的疆域分封给诸王子和功臣。畏兀儿人的居地被划分为二:塔里木盆地南缘,河中和阿姆河以南部分地区属察合台的封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即天山北部区和东南部地区,包括高昌回鹘国管辖地区,则作为特殊的政治实体保留下来。高昌王继续使用“亦都护”称号,住在哈喇和卓。高昌亦都护派出的军队先后在四川盆地、长江流域、西藏高原参加成吉思汗北伐西征的军事活动,提高了畏兀儿军队在元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成为被人重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1246年大汗贵由死后,帝国汗廷里出现了争夺汗位的内乱。随着其争斗的深入和扩大,畏兀儿亦都护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到1280年,畏兀儿亦都护开始对统辖地区实施直接的政治统治。

### 一、社会状况

高昌回鹘王国一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受蒙古统治者的控制和压榨,其社会和生产虽然一度曾比较稳定,但又受战乱和动荡的破坏,既有一定时期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又有贫富分化,这是蒙古帝国时期畏兀儿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状况。

从唐末回鹘西迁,经五代、两宋直到元代,前后历经400多年,畏兀儿社会具备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即以封建农奴制为主,同时也有部分封建租佃关系。社会划分为封建领主和农奴,出现了地主和佃农。封建领主、地主掌握着主要的生产资料。宋代、元代的亦都护、达鲁花赤以及地方的大小伯克们构成了封建领主阶级,劳动农民、农奴、佃户在领主的土地上耕作并服劳役和缴纳实物地租。

元朝政府虽然在一定时期给畏兀儿人以某种政治特权,但其统治秩序是较为

稳定的,这可以从回鹘文文书中的“祝福套语”和“认罚言词”<sup>①</sup>里可以找到证据。祝福套语和认罚言词本身说明,蒙古统治者已经逐步消除了高昌畏兀儿人关于亦都护是他们唯一的“幸福之主”的观念,而树立了蒙古大汗是他们的主宰的意识。蒙古大汗的权威,达鲁花赤和诸伯克的政权体系以及蒙古法律在畏兀儿地区的实施,形成了一种集权主义的社会秩序。

元代畏兀儿社会经济经历了高涨、低落和恢复三个阶段。畏兀儿社会经济的高涨,首先由于摆脱了西辽的统治,其次是成吉思汗对畏兀儿社会的特殊的政治待遇。天山南部地区没有被列为作战对象,从而免于被掠夺。除此之外还有畏兀儿聚居地区利用蒙古帝国没有固定税收的空档,连一般的赋税都避开了。这些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成为畏兀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随着蒙古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逐渐活跃起来,畏兀儿聚居地区的商业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阿里不哥之乱将畏兀儿卷入争夺汗位的战争中,战乱波及到天山南北地区,由此,畏兀儿社会经济从高涨走向低落。一时交通断绝,城市萧条,农田荒芜,水利失修,大批耕畜用于军需或被宰杀。这一切使得农业生产受到干扰,农作物不能按时插种、按时收割,畏兀儿地区的农耕生产又倒退到刀耕火种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也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生产,那么他在畏兀儿地区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将很快失去意义。

1280年后,元朝在畏兀儿聚居地区采取了下列应急措施:首先制定了“计亩征税”的章程,规定农民按自己固定的土地面积缴纳田赋。其次抚慰逃散的百姓,调拨款粮,进行赈济,对某些地区减税或免税。对有一些被严重破坏地区,贷给耕牛和子种。除此之外,元朝在别失八里设立台练所,冶制农具。在和田、别失八里设置染织提举司和染织局,统管纺织和染织事业。在天山南北发行统一的纸币。这些措施对畏兀儿社会及生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 二、经济状况

蒙古帝国灭了西辽政权以后,塔里木盆地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各地经贸交流渐渐恢复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促进了经济较快恢复和发展。

根据元代回鹘文书和其他文献资料来看,当时畏兀儿社会的地主、寺院(包括佛教寺院和伊斯兰教寺院)、王室成员构成剥削阶级,对生产资料和农奴、佃农等共

<sup>①</sup> 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同享有占有权,这是当时具有普遍性的生产关系。

吐鲁番盆地气候干燥,缺水和气温高,绿洲有限的耕地面积同需求日益增加的生产产生尖锐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靠博格达山南麓的雪水和坎儿井水的灌溉。水是吐鲁番盆地乃至整个中亚绿洲农业的命脉,也是民间纠纷的根源。畏兀儿素有视水为财的观念,认为水是财产之一。这种意识在中亚绿洲农民中普遍存在。水作为吐鲁番绿洲农民的特殊财产,促使当地有了一套较完整的管理水的措施。元朝按察司对灌溉用水实行集中管理,而按察司撤销之后,还有其他掌水官员,称作“农官”。从用水管理中可以看出,元朝畏兀儿居住区农民的农业管理的具体情况。

元代天山南北的社会文化已经发展成一种成熟的封建文化,这种文化集中表现在农商经济特点上。畏兀儿人中的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背后潜藏着一种商业化倾向,这种倾向在元代回鹘文契约文书中都有反映。契约文书中的商业化以财产转移、商业资本筹集、土地买卖、交换布匹、出卖人口为主要手段。交换布匹、出卖人口、出卖家产都是筹集商业资本的活动。如“(换)得厚布 150(束)”<sup>①</sup>,冯家昇《土地文书》中“因需要银子”,“因需要在大都使用的钞锭”的记载提示了畏兀儿人买卖的筹集商业资本这一性质,同时表现了畏兀儿社会贫富分化的社会性质。

自然条件、耕作传统和位于丝绸之路商路要冲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畏兀儿人农业经济亦农亦商的特点。棉花和葡萄的种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在回鹘文文书中,有关棉花和葡萄园的买卖十分突出。如:“(因为)需要棉布,从 bu/at 处取棉布 100(束)”<sup>②</sup>,“收……的女奴织工”<sup>③</sup>。这些例子充分说明畏兀儿人存在着专业化的纺织户和纺织工,同时也说明元代手工棉纺业的发达。当时吐鲁番绿洲的葡萄种植业发展迅速,葡萄酒酿造业也很发达。在畏兀儿人心中,葡萄园居于财产之首,商业买卖中葡萄园很值钱。相反,在回鹘文文书中有关农产品和土地的买卖就很少见到。在葡萄园交易中,有的金额达 600 钞锭之多,甚至无法一次性付清,只能现付一部分金额<sup>④</sup>。这种农商经济不断刺激畏兀儿商业文化的发展,成为畏兀儿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元代回鹘文书中记录的历史事实来看,元代畏兀儿人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和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依附农和养子问题。自由农的依附农化是封建社会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依附农主要是贵族和官吏的葡萄种植园的园丁。在元代

① 山田, Usp, No61 文书。

② Usp, No56 文书。

③ Usp, NoF3 + 81 文书。

④ Usp, No12 文书。

称为“incu”(奄出,其含义约为“采邑”)。incu 园丁(即庄园依附农)享有免于征税的权利<sup>①</sup>。

元代大量回鹘文书说明当时还盛行奴隶买卖之风,养子现象就是元代畏兀儿社会出现的同奴隶关系密切的一个独特的问题。养子抱养常常在亲戚之间进行,也有在外族之间进行的。作为抚养代价抱养者要给养子的父母以乳礼(süt säwinci)。养子的性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养子名义上具有家庭成员的地位,甚至具有儿子的地位;另一方面,养子本质上是买来的劳动力,是事实上的家奴<sup>②</sup>。收养养子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劳动力,收养的目的是补充劳动力。畏兀儿人中还有“养子法”(oγul törü - si)的史料。养子的收养按“养子法”进行。生父按“养子法”送子,养子依“养子法”尽种种义务。养父依“养子法”尽抚养义务,即养父应视其为亲生,代为娶妻等项目<sup>③</sup>。可见养子抱养风气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家庭无后代而产生的一种社会问题。畏兀儿人养子抱养问题可能起源于回鹘时代。

总而言之,畏兀儿人在天山南北的绿洲生活,把个体农户这一生产单位锻炼得成熟起来,同时又把他们原有的养子抱养习惯改造成为适合生产规模需要和阶级分化要求的畏兀儿式的养子制度。养子抱养习惯导致了畏兀儿人某些特殊的家庭内部的阶级对立关系。大量史实说明,畏兀儿人有着自己较为特殊的情况,这种特殊性的发展为后来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畏兀儿这一时期的封建主义社会在各方面都进一步趋向于成熟。

① Usp, No22 文书。

② No3 文书, No2 文书等文献。

③ Usp, No98 文书。

## 第二节 元代的畏兀儿文化

元

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空前统一强盛的历史时期。元代的畏兀儿人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一、元代畏兀儿的宗教信仰

元代之前,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分别由西州回鹘政权和喀喇汗朝所统治。10世纪中叶,喀喇汗朝境内居民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高昌亦都护国和于阗佛教政权境内居民都信仰佛教。1006年,喀喇汗朝的军队征服了于阗佛教政权。从此,伊斯兰教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完全取代了佛教。至于高昌亦都护国伊斯兰化的时间无准确记载。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统治高昌亦都护汗国和喀喇汗朝的疆域时,两地的畏兀儿人统一于蒙古帝国统治之下。喀喇汗朝为推行伊斯兰教而进行的圣战虽然早已结束,但伊斯兰教在天山南路和库车以北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佛教势力逐渐削弱。到察合台汗国中期佛教已逐渐消亡,伊斯兰教在整个维吾尔族中占了上风,维吾尔族社会成了穆斯林社会,维吾尔族文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带来的新内容。

### 二、畏兀儿的语言文字

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西迁到天山南部地区,从此,天山南部地区居民成分发生了变化。回鹘同当地居民相互融合,在形成维吾尔民族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过程毫无疑问也加速了共同语言的形成,使当地居民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开始操用回鹘语。天山南部地区早期曾有吐火罗语、塞种语、汉语、粟特语等不同语系的语言。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给吐火罗语增添过新的活力,佛教消沉后,吐火罗语开始削弱,回鹘语作为官方语言,深入到天山南部地区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这一地区广泛流行的语言。回鹘语在天山南部的普及,为后来维



吾尔语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良好基础。10世纪中叶以后,回鹘语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天山南部地区,语言领域里的融合延续到了11世纪。《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等鸿篇巨制的问世,正说明当时回鹘语取代了当地居民的原有的语言,成为这一地区许多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元朝所使用畏兀儿语就是在这样漫长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维吾尔文学语言。

畏兀儿人使用的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源于中亚地区的粟特文,共23个字母,有词首、词中、词末字体之别。

从喀喇汗朝时期回鹘人的社会开始以宗教传播区域划线,分为穆斯林区和非穆斯林区两部分。穆斯林区的回鹘人逐渐转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佛教区的回鹘人继续使用回鹘文。在元朝,回鹘文虽然曾享有极高的地位,但并未把穆斯林区的回鹘人所使用的阿拉伯字母排挤出社会生活,相反,随着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阿拉伯字母的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到察合台汗国末期,畏兀儿社会多种文字并用的时期结束了,统一采用了阿拉伯字母。

1204年,成吉思汗率兵征伐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俘获了专掌乃蛮大印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当成吉思汗获知塔塔统阿熟知“本国文字”后,“遂命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即回鹘文)书国言”<sup>①</sup>。这里的“国言”指用蒙古语口头颁布的诏告敕令,后来人们把在回鹘文字母基础上改制的蒙古文字称为“回鹘式蒙古文”。回鹘文字母在元代的应用也给畏兀儿人本身带来了施展其才干的契机。清朝的满文也是在回鹘式蒙古文字基础上改制而成的。

蒙古人采用回鹘式蒙古文后便开始在军事政治活动的各领域广泛使用。蒙古人在接受回鹘文字母影响的同时,也借鉴了许多同语言文字有关的制度和传统,包括回鹘文契约、誓词、符牌、印章、印鉴等。

元代回鹘文字母借助蒙古帝国的势力,一方面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使用,由一个地区单一民族的文字一跃而成为推行区域广大、使用民族较多的文字;另一方面,在畏兀儿社会内部,它却受到以伊斯兰教为后盾的阿拉伯字母的排斥,而日益缩小其使用范围。

在塔里木盆地以西、以南地区的畏兀儿人中回鹘文字母和阿拉伯字母并用。由于元朝初期不少畏兀儿人进入各级行政机构,特别是中亚和波斯的税收机构,畏兀儿语在新的疆域里开拓了新的传播地。

畏兀儿语的发展表现在一大批翻译家的涌现和翻译作品的问世,其中较为知名的翻译家有安藏。他精通佛教经典、敦煌汉文典籍,尤谙熟回鹘文。他用回鹘式蒙古文翻译了《尚书·云逸篇》、《贞观政要·申景鉴篇》、《资治通鉴》等汉文史籍,

<sup>①</sup> 《元史·塔塔统阿传》。

供元世祖阅览。阿鲁浑萨里(1244—1307年)通经、史、百家、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迦鲁纳答思通多种语言,谙熟教典。他用回鹘文式蒙古文翻译了梵文、藏文佛经。舍蓝蓝是一位知名的佛僧、语言大师、翻译家。他书写了藏文《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等10余部,汉文的《华严经》、《楞严经》各两部,用回鹘文写了《法华经》、《金光明经》各两部。除此之外,还有必兰纳识里、岳麟帖木儿、唐仁祖、忙兀斤、合刺普华等有名的翻译家。他们的译著增进了各民族、各语言间的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畏兀儿语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回鹘文活字印刷术的应用。13世纪,我国印刷术进入活字印刷术阶段,活字印刷术引入畏兀儿社会。20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一个地穴里发现了数百枚回鹘文字母木刻活字,是用硬木料制成的。这是畏兀儿印刷术同中原汉文印刷术水平几乎同步发展的有力证据。

### 三、畏兀儿的文学艺术

蒙古帝国的建立为畏兀儿人进入中原地区创造了便利条件,使之有机会参与中原王朝的管理,畏兀儿人帮助蒙古统治者治国安民,维护政权。蒙古统治者依靠、重用畏兀儿人,联络各科人士为其效劳。当时畏兀儿人进入中原一方面给蒙古子弟传授知识,另一方面学习中原汉文化,涌现出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翻译家、理财家、书法家、宗教家……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优于其他民族。其中很多人成为官宦世家,豪门望族。根据记载,元代有作品传世的畏兀儿文学家、诗人多达20余人。元朝以前各朝代从未出现过此类盛况。

史传留名的元代文学家、诗人大部分居住在中原各地,其中有的人是随蒙古汗征战屡建功勋的文官武将。此外,当时西域诸地常出现社会动乱,不少畏兀儿人迁往内地,在中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们在中原居住,学习和引进中原民族的文化,使本民族文化更加充实和完善。这些畏兀儿人钻研汉文和儒家经籍文献,重视教育,珍惜知识文化,细心培育后代。经过几代人的传承教诲和不懈努力,涌现了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学家群体。他们用汉文创作,文学活动给元朝的文化增添了光彩,丰富了元代文学的思想和内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在元代文学家里,闻名于世的有贯云石、萨都刺、马祖常、薛昂夫、偃玉立等人。贯云石擅长散曲,为元代一流散曲大家。他还会唱曲,擅长作诗。他的书法也有名气,吸取古代书法家的优点,变化增益,自成一家。他的散曲、诗、词、文章和书法广为流传,至今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赞誉。

仅次于贯云石的元代文学家是萨都刺。他原籍西域,出生于山西省代州雁门。

他以诗文俊秀负有盛名,有诗文集《雁门集》,多为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除了诗,他的宫词作品造诣很深。

马祖常,随祖父辈内迁,熟习汉籍经典,拜名儒为师,写就一手好文章。其作文以秦汉为法,而自成一家,文章构思恢宏奇异,语言表达简练深刻,很受世人欢迎。他还参与了编修《英宗实录》,编译了《列后金鉴》等,有《石田集》十五卷传世。

薛昂夫早年受业于刘辰翁,曾任地方官和京官。在勤于政务的同时,笔耕不辍,是元代散曲大家,也是诗林高手。现存小令 65 首,另有《九皋诗集》问世。

元代文坛中,偃玉立的文学成就也很引人注目。偃玉立是回鹘汗国丞相噶欲谷的后裔,进士及第,历任京官或地方官。偃玉立工于诗文,善修图志,有《清源续志》20 卷,另有诗集《世玉集》传世,存诗 13 首。

除以上几位大家外,元代文坛中较知名的畏兀儿诗人和文学家还有马世德、谢文质海牙、廉惇、廉普逵、倚南海涯、凯烈热拨实、三宝桂、边鲁、大都闾、伯颜不花的斤等。元代畏兀儿文学创作成就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的内容,从而赢得当时及后人的很高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畏兀儿文化领域,在绘画和造型艺术方面显得比较薄弱。13 世纪后,这方面的成就差不多集中在非穆斯林畏兀儿人居住地区——吐鲁番地区,那里现存的部分壁画就是元代的产物。

在书法、绘画以及音乐艺术方面,元代畏兀儿人同样做出了卓越成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方面很有建树。贯云石、萨都刺、盛熙明、边鲁、马祖常、马九霄(马祖常弟)等善于书法和绘画。他们当中有人工于狂草,或擅长于篆体,或行、草、隶、篆、楷皆能得心应手。其中盛熙明的书法艺术成就最突出,是元代研究汉字书画艺术的大家。他撰写了《法书考》、《图画考》等著作,研究书法、绘画艺术,形成独家之言,不仅为当时世人注目,也为今人所熟知。绘画方面成就突出的人也相当不少,如伯颜不花的斤,工于画龙。边鲁工于水墨花鸟,属标准中国画。萨都刺也是元代画家中的翘首,他的部分诗文也论及书法。可见他在书法和绘画艺术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力。

在元代通晓音律的畏兀儿人为数也不少。如当时曾任过会福院提举的畏兀儿人闾闾,世习二十弦,悉以铜为弦,其他乐工都无法使用,只有他能使用。除此之外,在元朝做官任职的畏兀儿人中懂音律的还有唐仁祖、耶律延玉等人。元代畏兀儿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批畏兀儿文人学士以钻研汉文化的成就称雄于元代文坛,用汉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等表现手法表达本民族和个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给唐宋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 四、农学及其他学术成就

在元代众多的文人学士中,有不少人参与了当时官修史书的工作,从而对祖国的历史编撰学作出了贡献。例如:马祖常曾参与了《元英宗实录》的编撰。达失帖木尔被任命为翰林承旨,兼修国史。贯云石、安藏、偃玉立等也都参加过编修国史的工作。廉惠山海牙曾为元朝《辽史》四位纂修官之一,在提调官里还有偃哲笃。《宋史》提调官中有岳柱和全普庵撒里二人。《金史》纂修官六人中沙刺班列居首位。《宋史》、《辽史》、《金史》作为二十四史组成部分,记录了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上述这些人精通畏兀儿、蒙古、藏、汉等民族语言文字,又谙经史,曾参与修纂前朝国史,无论调阅资料或理解词义,畏兀儿人均较易胜任。元代畏兀儿人参与这几部史书编修工作的作用不仅在于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史书的内容,而且也说明畏兀儿人为保存和发展祖国历史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后期著名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是著名翻译家迦鲁纳答思的儿子,著有《农桑衣食撮要》(又名《农桑辑要》)一书。元朝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多次颁行了《农桑辑要》一书。鲁明善研究古今农桑著述,调查了各地农业生产活动,为撰写《农桑撮要》一书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此书在当时农田管理、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第三节 元代畏兀儿文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13世纪,西辽政权统一于蒙古帝国。从此,畏兀儿文化被时代的洪流带入更加广阔的天地。畏兀儿文化首先对蒙古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后借助蒙古帝国的势力,传播到更广的地区。这样,畏兀儿文化不仅在蒙古民族中间,而且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中以及在中亚和伊朗高原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1209年,高昌国首领巴尔术阿尔忒的斤断绝与西辽的关系,第一个向成吉思汗表示愿意臣服蒙古帝国。这就决定了畏兀儿文化将在帝国范围内发挥巨大作用。

蒙古族在蒙古帝国建立时“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凡发命令,遣使往来,只是刻指以纪之”。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对高层文化产生了迫切的需求,就在这时,蒙古人接触到了较先进的畏兀儿文化,接受和吸收了畏兀儿文化,在本民族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成吉思汗之所以倚重畏兀儿文化,是因为蒙古人同畏兀儿人历史上居住地域相邻,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再加上两种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有不少相通之处。另一方面,高昌亦都护第一个臣服成吉思汗,为成吉思汗西征南下,在领土扩张的军事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取得了帝国中的政治特权,因此与蒙古人最为接近。在这种亲密关系中,畏兀儿文化很快地被蒙古人接受和加以吸收。

如前所述,成吉思汗俘获乃蛮掌印官塔塔统阿后,“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从此,揭开了蒙古民族文字史的序幕。“畏兀儿体蒙古文字”给蒙古文化带来的重大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编纂习惯法。使用畏兀儿文字,“畏兀儿体蒙古文字”使用的第一成果是蒙古习惯法的法律化。蒙古习惯法在蒙古语中称为“札撒”。它包括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已成为行为规范的种种社会习惯和贵族对群众发布的命令以及成吉思汗的言行(蒙语古称“必里克”)。自有文字以后,札撒与必里克被记录下来,被称为“大札撒”,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法律。“大札撒”的制定与颁布使人们的财产、生命有了一定的保障,进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为社会发展、经济兴旺打下了基础。

第二,撰写编年史。有了文字,蒙古人不再仅靠口传来传述前人的历史,而是记录在册,形成文卷。这时,蒙古帝国设置了一种叫“必赤”的官吏,意思是“书证官”。“必赤”的职责中有“写史”一项。“必赤”记录的历史,当时蒙语称“脱必赤

颜”，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的。

第三，颁发文书，首先是大汗的诏书。当时，大汗的诏书写在羊皮上，汉人称“羊皮圣旨”。在军事征服活动中，也通过文字来施行严格的军令。还有用这种文字撰写一种保证书。如，成吉思汗临终前命令诸王子立文书，要他们保证服从窝阔台，于是窝阔台的兄弟们立下文书。

第四，印章。成吉思汗在塔塔统阿那里第一次获知印章及其作用，从此，他仿照塔塔统阿的办法，开始采用印章。后来，印章在蒙古帝国境内的用途越来越广，从大汗，诸王，军、政、司法机构到各地的派出机构以及下属机构都有规格不同的印章，如金印、银印等。总而言之，印章在蒙古人中成为政权的代证，公文的信物。

第五，随着文字的使用，蒙古帝国开始实行牌符制度。牌有金制牌、银制牌，上书畏兀儿体蒙古文。蒙古帝国派遣使臣时，根据使者级别颁发给不同规格的牌符，凭此执行使命，行使其权力。

第六，碑铭。现存蒙古碑铭中有畏兀儿体蒙古字刻写的，属蒙古帝国时期有立于1225年的碑文，1240年的碑文，1257年的《释迦院碑》等碑文。

蒙古人仿照回鹘文创制了文字以后，编著了第一部巨著——《蒙古秘史》（又译《元朝秘史》）。此著作是蒙古民族十分珍贵的文化典籍，运用编年体例、传记文学的手法、韵散结合的形式，从蒙古民族起源的原始传说写起，一直写到13世纪40年代为止，具有举世公认的史学价值。《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借鉴畏兀儿文字的伟大成果之一。

在蒙古帝国时期，畏兀儿体蒙古文字以官方文字的身份使用于帝国疆域的一切地方，成为蒙古帝国官方通用文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蒙古帝国后来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以后，畏兀儿体蒙古文仍然保持其活力，未失去其所具有的政治权威性。

忽必烈曾有意改变畏兀儿体蒙古字，命国师八思巴创所谓“蒙古新字”，又称“国字”，当今学术界称“八思巴文”。“国字”创制出来后，元朝政府曾强制推行。由于八思巴文不适合于蒙古语，难于在蒙古人中得到推行和普及，最终被淘汰了。13—15世纪期间，畏兀儿体蒙古文一直是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官方文字。元成宗大德年间，畏兀儿学者搠思节儿对畏兀儿体蒙古字加以改进，制定了规范的蒙古字正字法和正音法，使之成为便于推广的文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直使用至今。

总而言之，13世纪崛起的蒙古民族由于接触、吸收畏兀儿文化，尤其借鉴畏兀儿文字创制蒙古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使蒙古帝国完善了典章制度，巩固了帝国的统治，大大推进了蒙古族的文明化程度。

畏兀儿亦都护在蒙古征服活动中建有大功，很受成吉思汗的信任和重用，大批畏兀儿人才开始进入蒙古帝国的政权机构，在各方面发挥十分出色的作用，为畏兀儿文

化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蒙古帝国时期,畏兀儿文化人主要服务于以下方面:

一是担任八合赤。“八合赤”是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共有词,意即“教师”、“师傅”。畏兀儿文人凭借其先进的文化往往以文化导师的身份出现在蒙古社会,这些文化导师在当时被称为“畏兀儿八合赤”。在蒙古帝国第一个当了八合赤的畏兀儿人就是塔塔统阿。他遵照成吉思汗的旨意教授诸王子以畏兀儿字书国言。蒙古帝国建立后大批畏兀儿文人进入蒙古汗国,从此,在宫廷里充当八合赤的畏兀儿文人越来越多。例如:岳邻贴穆尔、措吉思、昔班、杂罢术、孟速思、库尔吉思、阔儿吉思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经是“畏兀儿八合赤”,为蒙古民族培养出了第一代“文化人”,他们的启蒙工作,在蒙古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蒙古人中,首先在贵族阶层中以学习畏兀儿文化为时尚,他们把畏兀儿语言和文字当做知识和学问的顶峰。畏兀儿八合赤们用本民族文化熏育了一大批蒙古贵族青年,使他们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在畏兀儿八合赤的教育下,到13世纪50年代初,蒙古诸王贵族已普遍获得了书写技能。这第一批蒙古文化人不仅能读会写畏兀儿体蒙古文,而且随着知识的增多,眼界开阔,对学术也颇有用心了。

二是担任必赤。蒙古人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发布文书,就有主管文书的人。必赤的职责有二,一是写史,二是管文案,包括书写大汗诏令和记录有关重要事项。蒙哥汗时,有许多必赤在汗庭供职,他们负责书写大汗的诏敕、抄录副本、颁发诏书、制作牌符等事项,除了大汗的宫廷里设有必赤外,其他诸王身边也有必赤。担任必赤的除了畏兀儿人外,还有其他民族,但在这一历史时期,文书都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的。因此,必赤主要由畏兀儿人担任。

三是担任投下官。蒙元文献中的“投下”是贵族勋爵的封地或封邑,因此,“投下官”在汉语中常译成“家臣”。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大,成吉思汗分封的子弟功臣们的领地也愈来愈多。按照蒙古帝国的传统,这部分土地和财产在亲族中进行分配。蒙古贵族在治理城邑和处理复杂的财政问题时急需派有管理能力的投下官。畏兀儿人既具有较高的文化,又同蒙古贵族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多被任用为投下官,专管军民编户与岁赋收入等事宜。

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蒙古帝国的管理机构体制逐渐不能适应庞大的军政管理的需要。蒙古人早期的管理机构是十进位的四级管理机构,这种机构既是行政单位,又是作战单位,这就需要国家行政机构扩大和充实。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仿效畏兀儿族的管理体制,设置判事官。在畏兀儿地区判事官是一种司法官职,而蒙古帝国设置的判事官除了有司法的职能外,还被赋予一部分立法的权力。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文化的权威,一方面建立在它自身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之上,另一方面是建立在政治特权之上的。

## 第四节 元代的畏兀儿历史人物及其贡献

如

前所述,元代的畏兀儿人在蒙古帝国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涌现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

### 1.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元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阿里海牙跟随蒙哥、忽必烈等元军统帅对南宋作战,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攻占了樊城。随后,元军又按照阿里海牙向忽必烈提出的建议,对鄂州地区发动攻势。鄂州战役后,阿里海牙承担了镇守鄂州的重任。元军主力东移之后,阿里海牙指挥的元军攻克了长沙、静江(今桂林),肃清了湖北、湖南、广西的南宋军队。其后,阿里海牙又遵照忽必烈的旨意,率军出征海南,在海南岛地区组建了元朝的行政机构。这是元朝在华中、华南地区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将我国最南部的最大岛屿纳入了元朝版图。

### 2. 廉希宪

廉希宪,元代政治家、军事家。其父布鲁海牙曾跟随成吉思汗远征,至元二十八年,担任燕南诸路廉访使,适逢廉希宪出生,便高兴地说:“吾闻古以官为姓,无以其‘廉’为吾宗之姓乎!”自此以后,子孙都以廉为姓。

廉希宪 19 岁时,以世官子弟的身份,入侍忽必烈,并博得了他的信任,很快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之一。1260 年忽必烈继位,建立元朝。与此同时,阿里不哥也在哈喇和林宣布继位。向刚建立的忽必烈政权发动攻势,一时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沦为阿里不哥的势力范围。面对这种形势,忽必烈任命廉希宪为川陕宣慰使,处理川陕事务。廉希宪接任后,以其周密而果断的行动消除了阿里不哥叛军势力。忽必烈赐廉希宪以金虎符,授权他节制关右诸军,不久,又任命他为中书右丞,行秦蜀事。廉希宪当时才 30 岁,被晋升为平章政事,成为元朝中央行政中枢的领导成员。1262 年被任中书平章政事,成为元朝六位宰相之一。

廉希宪不但治军成绩显著,而且在治理地方、管理民政方面也有建树。他在主持川、陕地区事务时,废除了盐户的徭役,组织民工在城外开垦良田,安置贫民种植。他又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廉希宪一生为建立元朝、发展经济、恢复社会秩序作出了卓越贡献。



### 3. 亦黑迷失

亦黑迷失,元初畏兀儿航海家。元世祖为了扩张国力,从至元九年(1272年)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曾先后五次派亦黑迷失率领船队出使东南亚,他的船队曾到过八罗索国(今印度半岛西南,马拉巴一带地方)、占城(今越南南部)、僧迦刺国(今斯里兰卡)、马八儿国(今印度东南部)、南巫里(今属印度)、速木都刺(今苏门答腊),以及不鲁不都八刺利、葛郎国、木来田等国家和地区。这一壮举,比郑和七下“西洋”还要早130多年<sup>①</sup>。

亦黑迷失5次出征东南亚,说明他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他为我国的航海事业,为促进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4. 贯云石

贯云石(1286—1324年),元代文学艺术家,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阿里海牙曾任湖广行省左丞相,父亲贯只哥曾任平章政事。贯云石原名小云石海涯,后以父名的第一个字为姓,改名贯云石,字浮岑,号成斋,又号酸斋。西域北庭人(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人)。

贯云石幼时“神采秀异”,受到良好的骑射生活的训练。他原本袭父职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后又将官职让给其弟。不久,拜当时大文人姚燧为师,学习祖国文化遗产。大约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孝经直解》,并于1308年刊印行世。后来,他上一封“万言书”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为避祸,称病辞归江南。在此期间,他漫游江南,写出了不少歌颂祖国大好江山的诗篇。远游归来,他定居于今杭州市南门外的海鲜巷度过一生,于1324年去世,享年39岁。他去世后,元朝封他为京兆郡公。

贯云石一生唯从事文学创作,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他的作品涉及面广,思想健康。有反封建礼教的爱情诗章,也有揭露仕途险恶的作品,有歌颂田园生活美好的文章,还有描绘祖国河山的诗篇,充分表现了维吾尔儿女对祖国的由衷热爱。

贯云石擅长写散曲,一生写小令88种,套曲数十套。其散曲作品的内容多涉及爱情,把爱情写得非常真挚感人,他笔下的爱情是“志诚”、“知心”的同义语。

贯云石崇拜李白,继承了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诗作《桃花岩》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据说为修建纪念李白的长庚书院而作。贯云石在怀念李白的同时,表现了他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以“丽、清、新”的风格影响了元代前期诗坛的作家。

贯云石的《阳春白雪序》、《今乐府序》、《孝经直解序》是他传世的三篇极其重要的散文,其中《孝经直解序》是研究元代思想和中国古代各民族思想史的重要参

<sup>①</sup> 周绍祖主编:《西域文化名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考资料。

贯云石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音乐家、书法家,他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无论在声乐方面,还是在器乐演奏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据《乐郊私语》记载:贯云石善于吹奏铁笛,“云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由此可见他是当时的一名歌唱家,充分表现了维吾尔族善歌的特点。他的唱法对当时汉族戏曲界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新的剧种——海盐腔。

贯云石对汉族戏曲影响很大,在明代戏曲家眼中他占有崇高的地位。元代的马致远等人是著名的杂剧作家,是富有成果的作曲家,而贯云石一部杂剧也没有创作,却名列前茅。明代不少论著中,凡提到贯云石的,都洋溢着崇敬之情。

贯云石的书法很有名,“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以长,变化自成一家”<sup>①</sup>。

他的《孝经直解》一书也是别具一格的作品,他译解儒家经典《孝经》,采用上图下文的“全相”方式刊行,广为流传,在当时很有影响。

贯云石一方面受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传播畏兀儿文化,因而他的作品是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西域维吾尔文化同中原汉族文化关系史的重要历史资料。

### 5. 阿鲁浑萨里

阿鲁浑萨里(1244—1370年),元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出生于西域北庭(今吉木萨尔)佛教世家,他父亲乞台萨里曾是元朝释教都总统,主管全国佛教事务。他从小生活这样的家庭,能接触到各种学问。

阿鲁浑萨里自幼聪慧,天资过人,曾受业于国师八思巴,尽通其学,熟知畏兀儿语、汉语、蒙古语和一些外国语。忽必烈听说他很有才华,又让他学习和研究汉民族文化,于是“经、史、百家、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sup>②</sup>。

南宋被灭,全国统一,社会生活恢复秩序,国家对各种专长的人才需求日益紧迫起来。1284年,阿鲁浑萨里被任命为朝列大夫、左侍议奉。他奏请忽必烈设集贤馆,当年获准,并被任命为集贤馆学士兼太史院事。不久集贤馆改名为集贤院,成为元朝朝廷常设机构。此后,他关于设置国子学的建议也被采纳,国子学成了元朝培养和选拔各种人才的主要机构之一。国子学下设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培养和训练朝廷所需各种翻译人才。可见,国子学不仅仅是元朝培养选拔人才的场地,更重要的是它起着传播知识,密切各民族之间文化联系的作用。

阿鲁浑萨里在文化方面的活动,主要方面不在于建树,而在于他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提出不少有益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祖国文化连贯性地发展的建议。阿鲁浑萨里在13世纪文化史上的地位,正是这些贡献所决定的。

<sup>①</sup> 本节大部分内容均以周绍祖主编《西域文化名人志》为参照,下同。

<sup>②</sup> 转引自周绍祖主编:《西域文化名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 6. 伯颜不花的斤

伯颜不花的斤(?—1359年),字苍崖。祖父雪雪的斤任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父朵尔的斤任驸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母鲜于氏,是太常典簿鲜于枢之女。

伯颜不花的斤性格开朗,笃志好学,通晓音律,善于作诗。他的诗留传至今的不多,《元诗选癸集》中有他的七律《黄山》一首,诗中赞美黄山的奇胜美景和祖国河山的壮丽可爱。

伯颜不花的斤还擅长书法和绘画艺术。据记载,他“介立不群,草书似其舅氏”。“其舅氏”是指他的外祖父——元朝大书法家鲜于枢。他学习外祖父的草书,加上他的军旅生活和畏兀儿个性,写字时,运笔放逸,行草恣纵,宛若游龙一般。据记载,伯颜不花的斤“工画龙”,一生画了不少龙图,据传,他画过《袞雾戏波龙图》、《坐龙图》、《出山子母龙图》等龙图。他还知晓音律,保持了畏兀儿能歌善舞的特点。

## 7. 萨都刺

萨都刺(1272—1355年),字天锡,号直斋,是元代著名的诗词作家。他出生在雁门,因而把自己的诗集定名为《雁门集》。他童年聪明,善于文词,18岁起开始创作诗歌,但家庭较贫困,过着“家无田,囊无储”,“家口相煎百忧集”的生活。曾和二弟萨野芝在吴楚一带经商数年。

1327年,萨都刺考中进士,先后出任京口录事达鲁花赤、肃政廉访司照磨、燕南宪司照磨、肃政廉访司知事等职。在任期间有不少善政施惠于民,颇有众望。例如,他在京口时,曾遇到严重灾荒,开仓救活80万民,还整治了度量衡,打击了强权恶人,安定了社会秩序。

萨都刺一生创作了不少诗词,有《雁门集》八卷传世,存诗780余首;有《西湖十景词》一集传世,存词14首。他的诗作体裁多样,风格各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富有现实主义精神。萨都刺的诗作在抒情写景、遣词用典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其诗歌成就代表了元代少数民族诗歌的高水准,堪称元代诗坛杰出的作家,中华民族的杰出诗人。

萨都刺还工于书画。有人称其善楷书,画有《严陵钓台图》、《梅雀》等传世之作,现藏故宫博物院。

## 8. 马祖常

马祖常(1279—1338年),元代著名文学家,字伯庸,属畏兀儿贵族——雍古部。他的一世祖1065—1074年间迁往甘肃临洮从事畜牧。二世祖贴木尔越哥曾任辽马步军指挥使,由于官名中有“马”字,其子孙后代便以“马”为姓氏。

马氏之家累世官宦,且堪称书香门第。马祖常的曾祖月合乃精通汉文,熟读百

家典籍,马祖常的父亲马润有《樵隐集》(今已失传),从父马世德有《过灵泉寺》二绝流传至今,他们都是擅长用汉文写作的元代诗人。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的马祖常7岁就懂得读书,长成参加科举考试,乡贡第一,会试第二,廷对第二,授官应奉翰林文学,后升为监察御史。1320年,因得罪铁木迭尔等权贵,被降职为开平县尹。后复官,历任翰林侍制、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

马祖常经史皆通,能写善译,诗文兼工。他参加编写了《英宗实录》,编译了《列后金鉴》、《千秋纪略》、《松厅事稿》。今存元刊本《石田集》十五卷,收录了他绝大部分诗文。

马祖常不仅在西域作家群中独占鳌头,而且同汉族的姚燧、元明善、虞侍等名家齐肩,为众多文人所推崇,他为文师法先秦两汉,笔力尤精,卓然成家。他致力于诗,诗风清壮,享盛名于当时。

马祖常一生游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到过今甘肃、宁夏、内蒙、河北、河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北等地,这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元代社会由强而弱、由盛而衰的时代,在流离生活中了解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丑恶灵魂,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他从忠君爱民的思想出发,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大胆地揭露了官吏对人民的压迫敲诈,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马祖常的诗,较多地揭露社会黑暗面,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现实,在文坛上堪称一大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9. 薛昂夫

薛昂夫(约1270—1351年),名超吾,号九皋。因汉姓为马,也称马昂夫,马九皋。其祖先本是西域人,后迁中原定居怀孟路(今河南沁阳),其官至御史大夫,后移居龙兴(今江西南昌),其父亲官至御史中丞,死后追封为覃国公。

薛昂夫幼年受学于博学多才的刘辰翁,其人品、创作风格都受到业师的深刻影响。1321年前后,他被召进京都,在秘书监充任郎官。由于他才华出众,忠于职守,深得皇帝信任,很快升为典瑞院佾院,接着又升为西南某路总管。后转任太平路(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总管。当时他年事渐高,但仍自强不息,一方面恭于政务,另一方面勤于创作。他的散曲作品现存小令65首,套数3套。他的散曲相当一部分思想内容深刻,有很大社会意义。多年的仕宦生活,最后使他看清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腐化。因此,他在抨击黑暗现实的同时,写下了不少同情关心劳动人民的作品。

薛昂夫的小令在艺术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写景抒情流利自然,语言活泼清爽,感情纯真,风格以流利闲婉为多,他不仅是元代曲坛大家,也是诗林高手。曾有《九皋诗集》,可惜已失传。

在书法、绘画以及音乐艺术方面,畏兀儿文人也作出了优异的成绩。例如,擅长

书法艺术的有廉希宪、贯云石、萨都刺，以上已作介绍；除此之外还有首童、喜山、隐地那失理、边鲁等。他们中间有人工于狂草，有人擅长篆体或楷书，草篆都能加以使用。在书法艺术方面最有成就的人是元代汉字书法艺术的大家——盛熙明。

#### 10. 盛熙明

盛熙明的祖先是曲鲜（今新疆库车县）人，后移民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他为人谨慎周到，操行洁美，以擅长书法而被任命为奎章阁书史。

盛熙明自幼勤学好问，多才多艺，能通晓六国字书，他一生致力于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的研究。1344年，编著成《书法考》一书，共八卷，这是一部专门研究汉字书法的著述，考究历代书法宗源，品评书法之精妙，博大精深，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是后人从事书法研究必备参考书。1344年将此书进呈当时的皇帝元惠宗，元惠宗通览全书，下令珍藏禁中。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中评论说“夫以西域人而工中国之书，已属难能，况又以其研究所及，著为成书，以诏当世，岂非空前盛业乎？”除此书外，他还著有专门研究绘画艺术的著作，名为《图画考》。

盛熙明是忠实的佛教徒，据记载，他善诵佛经，工为诗，著有《补陀洛迦山考》一书，但已佚。现留存有一首七律诗，这首诗通过游览佛教名山和讲述西汉时寿春人梅福隐居普陀山成仙的传说等，表达他虔诚信佛的心情，同时也描绘了普陀洛迦山春日幽静美好的自然景色。

#### 11. 边鲁

边鲁，字至愚，号鲁生，西域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是元代艺术家。他是一位建树多、技艺高的文学艺术家。据《西湖竹枝集》记载，“鲁善古乐府诗，尤工画花竹”。他墨戏花鸟画得也很好，书法方面长于写古文奇字。他还是一位十分重节操的人，权贵势力要凭借权力是得不到他的绘画的，他的诗书画在元代颇负盛名，可惜传世作品不多，其中他的绘画有《群鸦话寒图》、《芦汀宿雁图》、《水墨牡丹图》等，可惜这些作品散失不传了，他的绘画仅存《花竹锦鸡图轴》一幅。这些绘画都是标准中国画。

在音乐方面，元代的畏兀儿人的作品也不少。但资料有限，我们了解不多。不过从已知的一些史书记载中知道，通达音律的人为数不少。如曾任会福院提举的闾闾，乃国朝沙律爱护持（汉名教统）南的沙之子。熟习二十弦（箜篌），悉以铜为弦。其他乐工都无法使用，唯他能演奏。除此之外，当时在朝做官任职并通音律的还有唐仁祖、耶律文正壬等人。

回鹘文字母在蒙古族中的使用和传播给元朝文化所带来的新局面是大量的畏兀儿翻译家的涌现和翻译作品的问世。

#### 12. 塔塔统阿

塔塔统阿，元初畏兀儿文字学兼语言学者，是畏兀儿式蒙古文的创制者。塔塔

统阿自幼聪慧,善于言论,精通畏兀儿文字。他是突厥支系——乃蛮国专管金印及钱粮的官吏。乃蛮于10—13世纪游于阿尔泰山一带。成吉思汗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不料被俘。成吉思汗问清金印的用处,令其居左右,仍掌金印,蒙元使用印章,即自此而始。成吉思汗又让塔塔统阿教导太子诸王学习畏兀儿文字,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言,遂产生了畏兀儿式蒙文。塔塔统阿病故后,赠中奉大夫,追封雁门郡公,有子四人,都有功于元室。

### 13. 安藏

安藏(或叫安藏扎牙答思),字国宝,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人,元代杰出的汉籍翻译家,自幼学佛经,兼通儒学,精通畏兀儿、蒙古、汉等语言。熟悉汉文典籍,精通佛教经典,尤谙回鹘文。安藏在翰林院中颇有盛名。大学士陈颢拜安藏为师,学习西域诸民族语言。元世祖时,安藏任翰林承旨,负责译写表章奏议、诏令史册等工作。

安藏在译写古代文化典籍方面显示了非凡的才华,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先后将《尚书无逸》、《贞观政要》、《申鉴》、《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汉文典籍译成蒙文,除此之外,他还译了《大藏内经》中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他在政治上很有远见卓识。元世祖即位后,他进献《宝藏论元演集》十卷,以促进民族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 14. 迦鲁纳答思

迦鲁纳答思,因安藏推荐被召入宫,令其向国师八思巴学习佛经。八思巴是藏族人,语言互不相通,但聪明的迦鲁纳答思只用了一年时间,便熟练地掌握了印度语、藏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并能贯通佛经,以其超群才华成了朝廷的一名出色的翻译。1282年,迦鲁纳答思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侍元成宗于潜邸。元成宗即位后,擢升迦鲁纳答思为荣禄大夫、大司徒。1312年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并赏给他一副玉鞍。同年8月病卒。迦鲁纳答思精通诸国语言,他把《西天西番经论》译成了畏兀儿文,为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 15. 必兰纳识里

必兰纳识里,北庭感木鲁国(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是元代畏兀儿佛经翻译家。他自幼熟悉畏兀儿及西域诸种书籍,长大后,能贯通诸国语和众多佛经。他以惊人的毅力用汉字翻译了《楞严经》,用西天字翻译了《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用藏文翻译了《不思议禅观经》。这些佛经经典的译传在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16. 鲁明善

鲁明善,名铁柱,“明善”是他的字,元朝后期著名农学家。出生在高昌回鹘王国,并在故乡度过少年时代,其父亲迦鲁纳答思是元代著名的翻译家,官至荣禄大

夫、大司徒。鲁明善后来到大都,在父亲身边学习曾子、子思之书。当时,元朝正处在所谓“鼎盛时期”,最高统治者日益认识到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多次颁行了《农桑辑要》、《农书》、《栽桑图书》等农业书籍。在这一机遇下,鲁明善热心学习,研究农桑书籍,调查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活动,为后来撰写《农桑衣食撮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成书于1314年,首刊于安丰。全书共分两卷,1万余字,内容范围极广,有气象、水利、农耕、畜牧、园艺、蚕桑、竹林、果菜等方面的各种农事活动和农家日常生活常识208条。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凡天时而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纤悉无遗,具在是书。”

《农桑衣食撮要》以12个月份为顺序,按月列出应进行的农业活动,然后指出每项活动的进行方式,有时说明某一次活动的具体意义,故该书体例有别于其他通论性质的著作,也有别于专论性质的著作。在我国古代农书中,以月令为系统进行写作当首推该书。因此,这部书在我国农书编写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影响极为深远。

《农桑衣食撮要》一书因以月令编排,可使一年12个月的农事活动一目了然,并且语言通俗易懂,便于各族使用,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其中所总结的农业经验,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鲁明善是生活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畏兀儿农学家,他不仅熟知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经验,而且熟悉西域、蒙古地区农牧业生产知识。书中记载的栽种葡萄、种植棉花、酿造酥酒、晾晒干酪、选择羊种等内容,显然汇集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经验。因此,可以说《农桑衣食撮要》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人民农业、制作业经验的总结。另据记载,鲁明善还善于鼓琴,曾编写有《琴谱》八卷。



麦西来甫上的老艺人杂耍



摇床





第  七 章

察合台汗国时期及  
维吾尔族文化

---

## 第一节 察合台汗国的建立

13 世纪 40 年代以后,成吉思汗诸子差不多都先后扮演过某一时期的主角。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后裔,到了 14 世纪,成了亚洲中部地区一支主要力量,建立了以察合台命名的汗国——察合台汗国。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包括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中亚河中地区和阿姆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在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范围内,这是当时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农业活动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经济、文化也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规模。无疑,它的富饶和巨大的经济意义,吸引了帝国的统治者,从成吉思汗在位开始,当帝国继续维持中央集权的时候,察合台的封地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帝国的组成部分,使它无法形成独立的实体。察合台分得疆域的范围包括今锡尔河右岸一带,伊塞克湖周围与楚河流域、伊犁河流域、费尔干纳和巴达克山的草原地区。汗国南部还包括了昆都斯和巴尔赫地区。察合台汗国境内种族和部落最为繁杂,生活方式也极不一致。其首府最初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库雅斯地方,即伊犁河畔的固勒札,后来迁至阿力麻里。据说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阿克苏各绿洲是察合台临终时赐与朵豁刺惕家族的。所以,朵豁刺惕家族就成了天山南北的世袭首领,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做是察合台的属地。

察合台在位 16 年,卒于 1241 年。他的继位人是其孙哈喇旭烈兀(长子木阿秃干之子)。1246 年贵由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认为察合台汗国的汗位传孙不传子是不合法的,于是便废哈喇旭烈兀,另立察合台的第五子也速蒙哥为汗。也速蒙哥耽于酒色,不理政事,国事由妃代理。1248 年贵由大汗死,拖雷之子蒙哥为汗后,为了拉拢政治势力,便把贵由废黜了的哈喇旭烈兀重新扶持上台,废了也速蒙哥。也速蒙哥不服,倾全力反对蒙哥,甚至发动军事进攻,谋取大汗之位。蒙哥大汗出手镇压,将所有参加变乱的诸王处死,命哈喇旭烈兀归国复位。哈喇旭烈兀复位后不久死去,他的遗孀倭耳干纳可敦继位。1259 年,察合台的另一孙子阿鲁忽代替倭耳干纳摄政,把从前属于察合台兀鲁思的全部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260 年,阿鲁忽干脆将倭耳干纳可敦逐出阿力麻里,他自己登上汗位,号令撒马尔罕、布哈拉、克什米尔。忽必烈为取得阿鲁忽的支持,承认他对已有土地的统治权,

并任命他防守自按台山(今阿尔泰山)至阿姆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忽必烈努力经营西域,而阿鲁忽也在他的统治区内加强统治。阿鲁忽死于1265—1266年之间,由木巴刺沙继位。由于木巴刺沙企图自立,忽必烈派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八刺去夺权。八刺经过一番努力把木巴刺沙赶下台,接着与窝阔台系的海都展开斗争。1269年,八刺被海都毒死,海都的势力控制了察合台汗国。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察合台汗国、元王朝与窝阔台汗国之间发生了许多争权斗争。1310年,窝阔台汗国灭亡,其国土大部分被察合台汗国吞没。也先不花于1307年上台之后,察合台汗国与元王朝之间不断发生战争。1320年也先不花去世,其后怯伯上台,他在位时,察合台汗国与元王朝又重新恢复和平。怯伯将首府从阿力麻里迁往撒马尔罕,引起七河流域、伊犁河地区贵族的反对,于是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以阿力麻里为中心,包括哈奥哈儿、吐鲁番一带;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包括河中地区。

1321年,怯伯死,其弟燕只吉台与笃来帖木儿相继继位。1331年,笃来帖木儿死,其弟答儿麻失里继位。1334年,以笃来帖木儿之子不赞为首的贵族指责其叔父答儿麻失里违背了札萨(法令),起兵加以擒杀。此后,察合台汗国进入了汗位频繁更迭的时期,地方上诸侯贵族势力也发展起来。当地贵族合扎罕起兵叛乱,杀死当时的国王合赞汗。从此,察合台汗国的势力发生了重大变化,汗的权威消失,汗国的大权落到权臣手中,各地贵族纷纷仿效,裂地自封,选立自己的汗。元末以来,人们把察合台汗国东部地区称作蒙兀儿斯坦。14世纪40年代中,察合台汗国天山南部地区的统治贵族朵豁刺惕部日益发展,1348年,该部落首领播鲁只找到了一个名叫秃黑鲁·帖木儿的年轻贵族,宣布他是也先不花之子,并在阿克苏拥立他为察合台汗国的汗。播鲁只此举加强了朵豁刺惕部的政治地位,于是天山南北的蒙古统治者只好俯首听命,承认了秃黑鲁·帖木儿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朵豁刺惕部与西部的合扎罕家族相抗衡,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历史上也就把承认秃黑鲁·帖木儿的地区称作察合台汗国。

东察合台汗国从秃黑鲁·帖木儿即位开始至1513年赛亦德汗定都于叶尔羌的前一年为止,历时166年。这一时期是维吾尔族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致力于恢复汗国的统一,多次出兵河中地区,但均以失败告终,所以他们统治的地区始终保持在东部。秃黑鲁·帖木儿汗死于1362—1363年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内乱之后,其幼子黑的儿火者于1389年继位,建都于别失八里。黑的儿火者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于回历795年武力兼并了火州,四年后又攻取了哈密地区。1405年,黑的儿火者去世,长子沙迷查干继位。1407年沙迷查干死后继位者为其弟马哈麻。1415年,马哈麻汗去世,1418年即位的歪思汗逐渐向西扩展,进入蒙兀儿斯坦的东部。东察合台汗国的重心转到

伊犁河谷和天山以南。歪思汗把首都迁到亦力巴里,在吐鲁番种粮,自给口粮。大致从这时起,汗国内的一部分蒙古族开始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业生活。歪思汗去世后,他的次子也先不花称汗。此后的半个世纪之内,汗国内发生多次内讧,可汗频繁更换。到1514年,赛亦德消灭了朵豁刺惕异密米尔咱·阿巴·兀乞儿,建立了新的政权——叶尔羌汗国。这样,在察合台汗国内又出现了以吐鲁番为首都的察合台汗国与叶尔羌汗国并存的局面。1516年,察合台汗国国王满速儿与其弟赛亦德汗在阿克苏和库车之间会晤,满速儿臣服于赛亦德,形式上保持了汗国的统一。满速儿死于1545年,长子沙汗继位。1565年,沙汗死于一次掠夺性袭击中,叶尔羌王朝趁机出兵占领了东部地区,统一了汗国。于是察合台汗国时代结束,天山南北转入了叶尔羌汗国统治时期。

## 第二节 察合台汗国时期的经济生活

**察** 合台汗国时期,区域内社会经济基本上处于下滑的境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多的,首先是,察合台汗国的统治阶层,对于恢复和发展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表现了冷漠的态度。我们几乎看不到察合台汗国采取过旨在发展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措施;相反,察合台汗国统治阶层内部的绝大多数,对于游牧生活有一种病态的留恋心理,视游牧以外的一切为离经叛道。这种心理状态甚至成为也先不花东迁、察合台汗国分裂的公开借口。造成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严重衰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没完没了的战乱和动荡。第一个将战火引进天山南北的是阿鲁忽。他本来是阿里不哥的同党,奉阿里不哥之命赴别失八里主持察合台和窝阔台封地的事务。当阿里不哥在长城脚下被忽必烈击败的时候,阿鲁忽公开背叛了他。阿里不哥由蒙古草原退入天山北部后,对这位乘人之危的阿鲁忽发动了猛烈攻击。阿鲁忽由别失八里退到伊犁河谷,又由伊犁河谷取道天山,退入阿克苏、喀什噶尔、和田等地。由于阿里不哥的军队紧紧追逼,阿鲁忽就像散布战乱的瘟神,他走过的地方立即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不到两年,天山南部完全陷入战争的浩劫之中。阿里不哥对阿鲁忽的战争带有明显的复仇色彩,因此,它的破坏性之大更是空前的。

阿里不哥之乱平定之后,元王朝在天山南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措施。但是对于遭受严重破坏的天山南部来讲,这些措施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更何况元王朝所取得的一丁点儿成就,很快又被海都之乱淹没了。

如果说,在察合台汗国以前,天山南部的动乱局面还有过短暂的停歇的话,那么到察合台汗国时期,这种停歇就越来越少了。从也先不花到贺则尔,时间不到70年,可汗更替达10次之多。贺则尔之后,可汗的更替更加频繁,仅被忽歹达一人扶上汗位的,就有数人之多。而每次可汗的更替都伴随流血。也先不花之后如此,秃黑鲁·帖木儿之后如此,伊力亚斯之后更是如此。

纷乱的政治局面,首先破坏了正常的交通。游兵散勇充斥各地,兵匪已无明显区别。汗国的武装力量与各地的匪盗干着同样的勾当,打家劫舍,勒索商旅。这一时期,天山南部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以及中原地区的联系已经中断,天山南部各绿洲之间的联系也处于停滞状况。行人和商旅失去了起码的安全保障,甚至可汗的使者和可汗委任的官吏也常常需要大批卫队护送。交通状况的恶化,使商业活动首先蒙受了损失。察合台汗国后期,天山南部各经济中心以更快的速度衰落下去,其中最明显的是阿克苏地区。察合台汗国初期,阿克苏地区曾经是汗国在天山南部的重要统治中心,此时,它却变成了一片废墟,人民逃散,瘟疫流行。15世纪初,高昌、鲁克沁、吐鲁番一带原有城邑居民与田园巷陌,许多地方已经荒废,高昌地区以前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当年的别失八里大城已经变成了游牧地区。但是大约15世纪中叶及以后,因为战争减少,元气逐渐恢复,维吾尔族居住区的生产又逐渐发展起来了。

察合台汗国时期,社会结构和经济形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其显著特征是北疆游牧地区的封建经济有所发展。在维吾尔族经济史上,察合台汗国时期颇具特色,其经济演变发展带有显著的社会急剧变化的特点。

## 一、农 业

察合台汗国统一天山南北、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地区割据局面,为当地人们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元朝初期,历史上以农业种植业生产活动为主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农业及种植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曾这样记载可失合儿(喀什噶尔):“极其辽阔广大,城镇和塞堡林立,有美丽的花园、果园和葡萄园。棉花、亚麻和大麻的产出也很丰富。”鸭儿牵(叶尔羌)城“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城市,城里有风光明媚的花园,城外环绕广阔的平原,生产人们所希望的瓜果。”“物产丰饶,生活富裕,盛产棉花。”和阗“有许多城镇和要塞”,“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他的物品,居民经营农田、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培因(策勒县)“境内城镇和塞堡不计其数”。在马可·波罗的行纪中,天山南部诸地维吾尔人定居化以及在种植业生产活动方面的熟练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吐鲁番地区是元代高昌回鹘社会政治中心,也有比较繁盛的农业和种植业经济。察合台汗国时期该地“皆有居人,时禾麦初熟,皆赖泉水灌溉得有,秋少雨故也”。在别失八里和昌八里(今昌吉)的维吾尔人酿造葡萄酒,种植异花、瓜果。唆

里迷(今焉耆)“田野垦辟,民物繁庶”。新疆农业属于绿洲经济,自古以来,水利在农业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推进和管理吐鲁番地区的农业生产,元朝政府于1278年在此置“提刑按察司”,“增副使,佾事各一员,兼职劝农水利事”,以统筹对水利和农业生产的统一管理。察合台汗国中期之后,天山南北部各地的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喀什噶尔等地“皆经营农业,五谷繁盛”。“有城邑居民、田园巷陌”,喀什噶尔和田一带出产“桑、麻、禾、黍、宛如中土”。当时的吐鲁番地区,“天气多暖少寒,鲜雨霖,土宜麻、黍,有桃、杏、枣、李,多葡萄”。鲁陈城(今鄯善县境)“四面多田园,流水环绕”。“树林稼翳,土宜麦、麻、豆,广植葡萄、桃、麦、花红、胡桃、小枣、甜瓜、葫芦之类”。哈密城“农耕虽类壤,椎麦、豌豆、大小麦”。

## 二、畜牧业

在察合台汗国时期,天山南北诸地的维吾尔人亦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这既有古代回鹘人传统的畜牧业经济的原因,同时也受到入主西域的以游牧为主要经济形式的蒙古族的影响。原先维吾尔人聚居的别失八里等地因自然环境适于放牧,故其地畜牧业经济较为发展。王延德记载该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由于崇尚游牧传统的察合台汗国贵族的倡导,该地畜牧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向以种植业为主的吐鲁番一带此时也颇重视畜牧业,明人记述其地“畜羊马”,人们“秋冬居城郭,春夏随水草孳牧,或各山川各田,或打围射猎”。天山南部诸城郭也兼营畜牧业,据史书记载,喀什噶尔“人畜兴旺”,和阗城“马多骏,还有骡、单峰驼”等。

## 三、手工业生产

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人的手工业也比较发达,例如元代别失八里一带就有相当发达的冶铁业,该地盛产铜、铁、铝,还有白布。于1282年,蒙古将领綦公直还在其地设立冶场,铸造农器。其他产品还有食盐,其盐白者如玉,赤者如朱,有五种颜色。这一时期畏兀儿人的纺织技术也很有名,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涉及畏兀儿人社会生活的回鹘文书中,除棉花外还可以见到有关棉布和亚麻布等的记录及其交易情况。官宦贵族庄园中还有专门的“织工”。可见当地畏兀儿人已熟练地掌握了织布技术。

和阗、喀什噶尔的玉石名冠天下,察合台汗国初期已是上贡珍品。于1266年,

察合台汗国即置“忽丹八里局”，设从七品大使一员，专理此事。明后期，葡萄牙人鄂本笃在其行纪里曾备录当时和阗地区玉石开采的盛况，其中就玉矿开采之工序、方法和玉工人员组成，都有详细记载，充分展示了当地玉石开采业的繁盛。另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在今库车、塔里木一带，元朝政府专门委任维吾尔人在此采矿，制石棉布。吐鲁番地区还以出产醇香味美的葡萄酒而闻名域外。元代宫廷御书《饮膳正要》记当时元大都之葡萄酒，“有西香者，有哈刺火者，有平阳、大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刺火者田地酒最佳”。元人熊梦祥《析津志》中曾专文详记了哈刺火州一带畏兀儿人葡萄酒酿制工艺流程，反映了当地酿酒技术的进步发展。除此之外，察合台汗国时期的吐鲁番地区还出产“宝石、镔铁刀、镔铁锉、各色靶、小刀、金铜钻、梧桐碱、红绡道布、柳青撒哈刺禅衣、鞍子、撒带花手巾”及兵器如“弓、箭、刀、盾、甲等物”，喀什噶尔则“出宝石、金、银”。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手工业经济不仅没有因战乱而停滞，相反，与喀喇汗朝时期相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四、商 业

194

维吾尔人素来善于经商，喀喇汗朝和高昌国时期如此，察合台汗国时期亦然。宋人王延德在其著作中便反映了察合台汗国初期高昌回鹘在与中原绢马贸易中表现出来的精明，说回鹘“善马直绢一匹，其弩马充食，才直一丈，贫者皆食肉”。还在蒙古西征前后，畏兀儿商人已频繁往来于蒙古大营之间，《蒙鞑备录》云：“（蒙古）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与两（西）河博易，贩卖于其国。”马可·波罗东使中国，途中经天山南部诸地，后在其行纪中记述喀什噶尔居民“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谋生”，该地的商人将本地出产“运销世界各地”。和阗居民同样“依靠商业和手工业维持生计”。培因城“居民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他们或参与经营交易，或以商路为生，如罗布和哈密地区的居民则俱以迎来送往途经其地的使节、商贾和军队谋生。畏兀儿地区土地、葡萄园和农奴的买卖活动十分活跃兴盛，这在回鹘文书中可找到大量佐证，同样反映了维吾尔人谙于经商的特征。还有不少维吾尔富商“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各地。这些商贾还在内地放高利贷，一年的利息成倍，谓之“羊羔息”。有些官吏们也因借贷款，无法偿还债务，“往往破家散族，以至妻子为贷，然终不能偿”，最终元朝政府不得不出面加以限制，将“羊羔息”代之以“子本相伴，更不生息”的制度。察合台汗国中期以后，随着吐鲁番、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日益成为商品集散地，大批维吾尔商人更在其中积极地发挥着经纪人的



作用。如吐鲁番地区“诸夷欲入贡做买卖,必假道于此,别无道路”,当地人“欲传货各国,以取重利,诸国欲通货,其所需亦在此也”。哈密“为西北诸胡往来之衡要路”。鄂本笃说,叶尔羌城当时“商贾如鲫,百货交汇,屹然为是方著名商场”。当时东往西还的商贾驼队,在此“休整编队,商队首领则由本地汗王以其人纳金数量多寡任命”。所以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人“以贵贡利”的更多,他们中不少人“每沿途寄住,贩易谋利,经年不归”,还有的则假进贡之名,“在京商贩,有会同馆三四年”。帖木儿时代出使撒马尔罕的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在那里见到“从中国运来的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绸品”以及“自和阗运来的宝石、玛瑙、珠货和各种珍贵首饰”。这些内地或和阗当地所产物品俱是由维吾尔商人运输和贩运到中亚以西诸地的。

有关当时的经济生活,除了以上几方面以外,在察合台汗国时期天山南北各地维吾尔人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发展对于人居其地的蒙古人影响是非常深远巨大的。后来大批蒙古人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种植业经济活动,而且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维吾尔人的经济活动和潜移默化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 第三节 察合台兀鲁斯的伊斯兰化与 维吾尔族<sup>①</sup>完全皈依伊斯兰教

**宗**教信仰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在察合台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族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维吾尔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受到当时蒙古统治者“诸教并蓄”政策的影响，察合台汗国初期的维吾尔人除了信奉伊斯兰教外，仍然有一部分人信奉佛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仍然保留着古老的萨满教等民间宗教的习俗。

察合台汗国时期是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间传播的重要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了其他宗教，成为维吾尔全民族精神生活的主流。在察合台汗国，有两种情况为伊斯兰教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机会：其一是14世纪以后，元朝的势力在天山南北地区逐渐减弱；其二是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们，尤其是秃黑鲁·帖木儿以后的诸汗，都是伊斯兰教徒。更具体地说，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时代早已在天山南部传播，并成为南疆回鹘的唯一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在天山北部广大地区的传播以及最终在全疆范围取代其他各种宗教，是同蒙古贵族官宦和察合台兀鲁斯（蒙古族在新疆的后裔）的伊斯兰化分不开的。众所周知，还在察合台汗国时期，移居河中地区逐渐定居化的蒙古察合台汗国诸汗，如八剌、答儿麻失里、合赞（黑的儿）等就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他们的推动影响下，大批入居中亚农业区域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种态势打破了蒙古诸汗“诸教并蓄”的初衷，导致伊斯兰教在新疆各地广泛散播。1347年，察合台汗国分裂后在天山以北建立东察合台汗国的秃黑鲁·帖木儿汗经伊斯兰教传教士之劝导，率先皈依伊斯兰教。在他的影响下，所属16万蒙古人变成了穆斯林。东察合台汗国从秃黑鲁·帖木儿即位开始，至1513年赛亦德汗定都于叶尔羌的前一年为止，前后历时166年。在这一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天山以南的大部分蒙古人逐渐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并开始了维吾尔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最后融合到维吾尔族中去。天山以北的一部分蒙古人也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又保持了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秃黑

<sup>①</sup> 与察合台汗国时期相当的汉文史料中已很少称“畏兀儿”，故本章之后借用今译名“维吾尔”指称之。

鲁·帖木儿在库车人毛拉艾尔西丁的引导下改信伊斯兰教以后,在天山以北地区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维吾尔族也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形成了两个民族文化区域——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区。秃黑鲁·帖木儿以后,黑的儿火者登上汗位。此人也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于回历 795 年(1392—1393 年)用武力兼并吐鲁番。回历 799 年(1396—1397 年),他又发兵攻取哈密地区,之后即在这些地区推行伊斯兰教,对佛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于 1407 年登上汗位的马哈麻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信徒。他在汗国内的蒙古人中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手段严酷。如蒙古人如果不缠头巾,他就要把马蹄铁钉入这个人的头颅中。察合台汗国答儿麻失里汗(1331—1334 年在位)长期生活在汗国西部通行伊斯兰文化的地区,由于他身边的许多蒙古人成了穆斯林,于是他也顺应时势,宣布接受伊斯兰教。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诸汗的努力和推动之下,到了 15 世纪初,居住在天山以南西部的维吾尔人已改信了伊斯兰教,居住在东部别失八里、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人也有一部分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当时哈密、吐鲁番两地,佛教势力仍然不小,境内设有专管佛教事物的“僧纲司”。1473 年,察合台汗国羽奴思汗发兵攻占哈密,除部分仍坚持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逃往肃州外,该地其余的维吾尔人均接受了伊斯兰教。这样一来,至 16 世纪,伊斯兰教在天山南北各地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维吾尔人伊斯兰化过程大体完成,伊斯兰教最终在天山南北成为多个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

察合台汗国时期,察合台兀鲁斯接受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族实现全民伊斯兰化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通过伊斯兰教,进入天山南北地区的许多蒙古人最终融入维吾尔族;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维吾尔族实现了民族统一,带来了新文化的开端。

## 第四节 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活

**察**合台汗国时期在维吾尔族文化史上是重要的、拥有丰富文化遗产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从政治的角度看,与一个多世纪前那种风起云涌的巨大变迁相比较,这一时期是一个洪峰已过、风缓浪平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维吾尔族文化艺术兴盛的历史阶段,用察合台文、回鹘文和波斯文撰写的文学、语言、历史、诗歌作品和绘画、书法作品大量涌现,反映了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族文化艺术的复苏和一度的繁荣。

### 一、语言文字

198

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文化领域内经历剧烈变化的部分是记录维吾尔语的文字。察合台汗国时期,新疆通行多种文字。吐鲁番地区和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仍使用回鹘文,吐鲁番以西各地的维吾尔人主要使用在阿拉伯字母基础上形成的文字,在聂斯脱利教徒中则通行古叙利亚文。蒙古帝国时期,回鹘文虽然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但是它并未能取代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使用的阿拉伯字母,相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字母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且不说这两套文字各自的优劣,单说它们之间的严重对峙状态,就不利于维吾尔族文化的发展。维吾尔文字的最后统一,是在贺则尔(黑的儿)汗执政时期完成的。这位狂热的穆斯林可汗在大力推行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将阿拉伯字母普及到了吐鲁番盆地,从而结束了维吾尔族社会中几种文字并用的局面。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人开始通用的文字以察合台的名字命名为“察合台文”,用察合台文所记的该时期维吾尔语也以察合台的名字命名为“察合台语”。察合台文是由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喀尼亚文演变而成的。这种文字一共有 32 个字母,从右至左横写,每个字母分单写、词首、词中、词末四种写法。用这种文字记载的维吾尔语情况较为复杂,其词汇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较多。到了 14—15 世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对“察合台语”的影响达到了高峰。

察合台文广泛通行于塔里木盆地的中部、西部和蒙古后裔所统治的其他地方。

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哲学、文学、自然科学著作数量很多。用察合台文写成的文学著作称“察合台文学”，在察合台汗国时期，由于维吾尔族在政治、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实现了统一，这一时期成了维吾尔文学艺术史上的繁荣时期。当时使用察合台语的人群，除了当地居民外，还包括逐渐融入维吾尔等民族的察合台王族后裔。以维吾尔语为基础的察合台语的形成，不仅是维吾尔族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也是维吾尔族为中亚各族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中亚的许多民族和地区就是借助这一语言记载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察合台语的一个重大的功绩，就是用这种语言写下了数量宏大的文学作品。

## 二、文 学

察合台汗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在察合台语的形成和发展中，维吾尔文坛出现了一个诗人辈出、群星灿烂的繁荣局面。在帖木儿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形成的察合台语作为维吾尔语的文学语言在13—14世纪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5世纪时产生了许多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在察合台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诸多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其中维吾尔族文学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据文史资料记载，13世纪前半叶，蒙古人到达中亚时，回鹘人遍布天山南北、河中地、阿富汗北部及帕米尔一带。在伊儿汗国境内，有许多著名的回鹘人担任重要的军政职务。帖木儿王朝初建于河中地后将呼罗珊地区划入其领域，强盛时期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今新疆边界，回鹘人大批进驻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地区。帖木儿及其后继者们为了有效地利用回鹘人的智慧和力量，不仅为其领地内原有的回鹘人创造了较好的环境，还使西部察合台汗国、蒙兀儿斯坦国境内的回鹘人以各种途径迁居到河中地和呼罗珊，其中产生了不少维吾尔学者、思想家、诗人。

在帖木儿王朝时期，由于伊斯兰教在精神方面的深刻影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风靡一时，许多学者争相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写作并将其作为衡量学识水平的准绳和向世人炫耀的光环，但也有不少文人、帖木儿家庭中的重要权力人物面对这种情形，毫不示弱，坚持用察合台语写作。他们中享有盛誉的有：鲁提菲、赛卡克、阿塔依、纳瓦依、凯兰代尔、朶达依等。这一时期，维吾尔文坛诗人层出不穷，诗作多姿多彩、美不胜收，对中亚各民族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多民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对察合台汗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及其著作作一简要的介绍。

### （一）花喇子米及其《爱情篇》

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把“篇子”或“书柬”格式

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体裁。“篇子”或“书柬”在维吾尔语中作“Nama”，指用书信体写成的文学作品，起初萌发于民间文学，特别是维吾尔文学中的抒情双行诗，后来在东西方文学中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用“篇子”体裁写成的《爱情篇》是由笔名为“花喇子米”的作者创作的抒情长诗。从作者的笔名可知，他是花刺子模人或曾经居住在花刺子模。从《爱情篇》中用纯维吾尔语以及波斯语写成的题名中所记的部分情况来看，花喇子米生于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他所生活的时代适逢成吉思汗后裔经营下的亚洲大陆正趋于稳定和发展的时代。从作者诗歌创作的技巧和风格可以看出，他有着较深的文学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造诣。花喇子米在中亚旅行期间，于1353年底曾与金帐汗国的可汗加尼别克所封的锡尔河畔之郡王穆罕默德·霍加别克相识，据《爱情篇》的序言部分记述，穆罕默德·霍加别克是一位思想进步、酷爱写诗的启蒙派人士。他曾厚待花喇子米，并劝花喇子米留居当地，创作一部作品呈送可汗。于是诗人答应他的要求，留下来创作了《爱情篇》。

《爱情篇》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诗，其主体部分是一对情侣中的男方用诗歌形式写给女方的10封情书。其中既有对所爱慕对象的外貌的描绘，也有对情人内在品质的赞颂；既有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也有失恋时巨大的痛苦。将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作为主题，以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真挚的感情、豪放的诗句予以歌颂，在当时，在巴哈吾丁·纳合西班底（1314—1388年）的思想尚未广泛流传和哈菲兹·设拉子（1300—1389年）的诗坛巨作尚未深入人心的时代，《爱情篇》的出现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突破。

《爱情篇》的几种手抄本都说明它是用当时的维吾尔文学语言所写成的。而这时的维吾尔文学语言正是喀喇汗朝时期高昌、喀喇尼亚语的继续。在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统治时期，这种语言曾广泛使用。

《爱情篇》运用比拟、夸张、对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对女性美和真挚的爱情作了生动、形象、细腻的描写。整部诗用玛斯纳维、格则勒、木纳加特、克特额等诗体形式和阿鲁孜韵律的长扎吉—木赛代斯格律写成，接近民间歌谣的双行诗形式，格式严谨，节奏清晰，语调中高昂与柔和交织，给人以优美的乐感。

我们虽无从了解《爱情篇》作者1358年以后的情况，但可断言，其作品曾一时成为中亚诗歌创作中书信体抒情诗歌的起点和典范。霍占德就是以《爱情篇》为范本来创作其爱情名作《优雅篇》的。色依德·艾合买德的长诗《忏悔篇》、尤苏甫·艾米尔的长诗《十束篇》和当时同时代问世的《庆幸篇》、《快乐篇》、《心灵之灯》等书信体作品，都是以《爱情篇》作为范本写成的。这些作品为维吾尔文学中的“篇子”体奠定了基础。《爱情篇》曾引起纳瓦依的极大关注。他在其著作《两种语言之争辩》中引用《爱情篇》中的诗句论述维吾尔诗歌表达中所特有、而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没有的词语表现手法。

《爱情篇》尽管存在一些内容和艺术性上的缺陷,但作为伊斯兰教传入后首次用维吾尔文学语言写成的爱情长诗,在维吾尔文学史上仍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 (二)拉勃胡兹及其《先知传》

察合台汗国时期是维吾尔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像“篇子”体裁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体裁,用传记体写成的《先知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拉勃胡兹(约1279—1351年),全名为纳斯鲁丁·布尔罕尼丁·拉勃胡兹,“拉勃胡兹”是他的笔名。他生在中亚的来不特胡兹地方(一说在喀什出生),曾经担任过伊斯兰法官“哈兹”。他精通伊斯兰东方文学、哲学、阿拉伯语、波斯语,并爱好史学。1309—1310年,他根据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故事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先知传》,并将它献给察合台汗国末期即位的塔尔玛辛汗府中的知名人士托克·布骨汗。该作品有两种手抄本:古文本和察合台文本。所谓古文本指的是用作者撰写该作品时期或接近这一时期的语言抄写的文本,从中可以看到古代语言的许多特点。这些手抄本的语言属于后期哈喀尼亚语或由哈喀尼亚语向察合台语过渡时期的语言。而察合台文本抄本指的是16—19世纪间抄写的文本。这类文本的语言与作者的语言差异较大,许多古代维吾尔语被阿拉伯语借词和波斯语词所取代。《先知传》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文学角度看,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该书问世于14世纪初。它不仅保留了古代维吾尔语的许多成分,也反映了察合台语的部分特点。所以对维吾尔语发展史的划分和描写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也就是说,它是如实反映了古代维吾尔语向近代维吾尔语过渡时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的重要语言文献。

《先知传》以伊斯兰教思想意识为基点,形象地叙述了人类产生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从真主创造世界和人祖亚当的故事开始至先知穆罕默德出现这一过程的历史。全书共72章。前64章叙述伊斯兰教的传统故事,其余的8章专门叙述穆罕默德及其四个弟子的生平事迹,以神化手法描写了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传记的故事是依事件发生的次序安排的。首先描述了世界的由来、人类的创造、人类社会的产生及国家的出现,然后谈到了各种宗教的产生,如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后来产生的伊斯兰教。最后较详尽地描述了伊斯兰帝国的建立、帝国的统治者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四个弟子及其统治的结束直到奥玛维统治时期。这些内容都是用神化手法形象地予以描述的。

《先知传》的内容极为丰富,情节复杂而离奇,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生、爱情、劳动、正义和美好理想的赞颂。从形式上看,《先知传》是用维吾尔文学中散文与韵文体相结合的传统形式创作的,其主干部分为散文体;序言的颂歌部分、部分传记

的首末和作品的结尾部分为韵文体,是用阿鲁孜韵律的各种格式写成的几百首诗。作品中形象繁多,可分为六类,即神化人物和幻想人物形象,历史人物形象,平民、神奇人物和事物形象,历史事件和文化、遥远区域形象。构成作品内容的艺术层次有下述8个体系,即社会生产体系(其中论及农牧业和传统的360种手工艺),社会生活体系(其中论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生遭遇、客观事物和主观愿望等),文献体系(其中论及被视为人类文化之瑰宝的四圣书——《则迦尔》、《讨拉特》、《引支勒》(即《圣经》)、《古兰经》,尤其对《古兰经》和《圣训》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伊斯兰教逊尼派所肯定的事物予以大量引用。此外,还屡屡提及《圣人概述》等古籍以及阿拉伯、波斯、突厥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神奇深奥事物体系(其中形象地描绘了圣人因敌方所迫而显示的各种奇迹,以各种灵物的神力,排除艰难险阻等),社会活动体系(有趣地描绘了历史人物、哲学家、天文学家、帝王将相、社会阶层,各宗教教派,部族的各种活动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纪年统计体系(其中对各个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除以回历纪年外,对许多重大事件还有数字统计),理论知识体系(这里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语言学、史学、哲学、民俗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天文学、法学等学科),作品的结构体系(根据传统的著书方法,作品分为序论、正文、结尾三部分,整个传记的大部分有章节之分并以纪年为序)。

《先知传》继承并发扬哈喀尼亚文学语言及维吾尔文学优秀传统,在维吾尔散文创作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确切地说,《先知传》成了维吾尔族传记文字创作史上的光辉里程碑。几个世纪以来它在伊斯兰世界引起无数读者的极大兴趣并享有崇高声誉,是绝非偶然的。《先知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是中世纪维吾尔文化和文学的优秀遗产。

### (三)鲁提菲及其作品《古丽和诺鲁兹》

察合台汗国时代维吾尔文学代表之一是鲁提菲(1366—1465年)。鲁提菲原名艾拜都拉,“鲁提菲”是他的笔名。他出生于喀什噶尔,青年时代就学于帖木儿汗国首都撒马尔罕,后迁居到赫拉特,栖身于迪卡诺村,在那儿度过了自己孤独寂寞、门庭冷落的大半生,享年99岁。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著述,对继承、发展维吾尔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撰写了20多部著作,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各方面。他还曾将著名史学家艾里·雅兹迪的波斯文巨著《凯旋记》译成维吾尔文。他的一部分著作已失传,流传至今的仅有两部诗作:一部是包括300余首各体抒情诗的《鲁提菲集》;一部是叙事长诗《古丽和诺鲁兹》。

鲁提菲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时代。正是在许多优美的抒情诗篇里,在不朽的长篇叙事诗《古丽和诺鲁兹》里,鲁提菲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召唤人们为自身的幸福、为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



争。鲁提菲的300余首抒情诗,绝大部分是“格则勒”,忠贞不贰和生死不渝的爱情是鲁提菲抒情诗的主题。鲁提菲的抒情诗在内容上是对美好的爱情、对美的事物的执著的追求,而在形式上则非常富于变化,不拘一格。他的抒情诗,语言生动优美,流畅活泼,如行云流水,如莺啼燕语。词藻和修辞手法极为丰富,力求立意新奇,不落俗套。鲁提菲的理想、抱负和卓越才华在长篇叙事诗《古丽和诺鲁兹》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的创作也因此达到了他的顶峰。

《古丽和诺鲁兹》长达4200余行,是作者以民间传说为素材创作而成的,讲述的是古丽公主和诺鲁兹王子悲欢离合的故事,这部长诗虽然以爱情为题材,却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人生态度。它歌颂了正直善良、英勇无畏、互助友爱、忠于爱情等人类美好的品德;无情地鞭笞了残酷暴虐、伪善狡诈的邪恶行径。长诗的语言和作者的抒情诗一样非常清新明快,接近当时的口语。作者极为重视词藻的选择和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从而使作品达到了诗人所预期的艺术效果。

鲁提菲既用被当时文坛所崇尚的波斯文写作,又用被轻视的维吾尔语写作,是优秀的“双语诗人”之一。他用察合台语写下了数量浩繁的作品,从而在阿拉伯、波斯文化横溢的那个时代和地区,树立了用察合台语写作的光辉典范。纳瓦依在童年时代即精心研读了鲁提菲的作品,对鲁提菲无限敬仰,并且登门求教。他在《文坛荟萃》中深怀敬意地高度评价了鲁提菲,称他“语言精美、博学多才”,是维吾尔语言的泰斗,“知识的巨匠”。鲁提菲的维吾尔语抒情诗篇在他生前曾结集成册,在操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各族人民中广为流传,并曾配以管弦,众口传唱。对后来维吾尔、乌孜别克、阿塞拜疆等民族的文学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 (四) 赛卡克及其抒情诗

赛卡克是察合台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族著名诗人之一。赛卡克的全名为艾布雅古伯·阿巴拜克·赛卡克,生于1393年,逝于1449年。赛卡克出身于王族,他的一生是在仕途中度过的。他一直担任着乌鲁克伯克的顾问,其绝大部分创作活动是在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城进行的。赛卡克的个人历史是与撒马尔罕政权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作品与众不同,反映的是他所熟悉的统治阶级之间的杀伐、掠夺和无止境的统治奢望,歌颂的是统治阶级,尤其是帖木儿及其后裔的武功。

赛卡克的作品,不论是抒情的,还是歌功颂德的,不论是历史内容的,还是政治内容的,一概是用韵文形式完成的。赛卡克的作品多收入《赛卡克诗集》,这部诗集主要由10部史诗组成。其中一部是描写霍卓·穆罕默德·法尔斯的,一部是描写赫力烈苏丹的,一部是描写乌鲁克伯克的,一部是描写阿尔斯兰·塔尔汗的。赛卡克分别为上述诸人立传。

赛卡克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物。伊赛木图拉·尼木图拉说赛卡克是一位“在

诗歌、修辞学、逻辑学、哲学方面获得巨大成功的学者和诗人”。纳瓦依对他的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他与鲁提菲相提并论,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师长。

赛卡克留给人们的诗作中有 50 首格则勒。他的诗歌思想深邃,内容丰富,情感丰沛,文笔优美。他的抒情诗多以描写爱情为题材,热烈的忠贞的爱情是诗人歌咏的最主要的主题。语言形象、生动而又接近于人们的口语,是赛卡克诗歌的特色。

#### (五)阿塔依及其抒情诗

阿塔依是 15 世纪维吾尔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出生在塔什干和赛里木之间的一个村庄,艾合买提·亚萨维的近亲司马依勒的后裔。他受过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熟悉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他的一生是在赫拉特和巴里黑城度过的。

阿塔依与鲁提菲、赛卡克等人齐名,以写抒情诗章见长。他的诗作较多,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一个手抄的孤本,现藏在圣彼得堡。他的作品均使用阿鲁孜格律诗中的格则勒形式写成,以意味隽永、笔法细腻、语言流畅、节奏明快、音韵铿锵见长,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爱情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阿塔依在以高度艺术化的语言描写爱情和情人的同时,赞美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鄙弃虚幻的天国和他们在世上的代理人——教士。他的抒情诗不能不说是中世纪宗教黑暗统治下的一线人文主义的曙光。

#### (六)尕达依及其诗歌

尕达依(1403—1493 年)是至 15 世纪末在世的著名维吾尔族抒情诗人,他一直生活在赫拉特城并在那里从事创作活动。他的诗歌在当时操突厥语族诸语言的民族中流传,赢得了很大的声誉。纳瓦依在其《文坛荟萃》中称他为突厥民族的诗人,说他的诗歌在乌布利卡斯木·巴布尔时代就赢得了声誉,列举了他所创作的一些诗行予以证明。纳瓦依在《两种语言之争辩》中将尕达依作为察合台文学的重要代表而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尕达依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

尕达依的诗歌有着积极、健康的内容。在他的诗歌里,贤明的国王、清廉政治的理想得到了尽情的描绘。他满怀深情地歌颂了自己生活的城市——赫拉特,歌颂纯洁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爱情是尕达依诗歌的主要内容,他用多种修辞手段描写恋人之美,表述对恋人忠贞不贰的爱情。尕达依的语汇非常丰富,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挥洒自如的地步。他的格则勒有不少节咏唱恋人的秀发,运用种种表现手法充分表达他那奔突汹涌、一泻千里的激情,起到了一咏三叹、荡气回肠的效果。

### (七) 纳瓦依及其文学遗产

伟大的诗人、思想家纳瓦依是维吾尔文学史以及思想史上素负盛名的卓越代表,他以他丰富多彩的作品充分证明他是一位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开拓者,察合台文学的奠基人。纳瓦依(1441—1501年),本名阿里西尔,“纳瓦依”是他的笔名,生于呼罗珊汗国首府赫拉特。纳瓦依幼年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得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指点,学习过东方文学。1456年,16岁的纳瓦依随乌布利卡斯木·巴布尔来到马什哈德,并在其手下效力。1457年乌布利卡斯木去世后,纳瓦依回到赫拉特,不久到了撒马尔罕,在经学院学习两年。纳瓦依在马什哈德时就开始用两种语言——波斯语和本族语写诗。他用波斯语写的诗署名“法尼”(“隐士”之意),用本族语写的诗署名“纳瓦依”(“宏亮、高亢”之意)。

1469年,纳瓦依童年时代的朋友和同学侯赛因·巴依哈拉德开始在赫拉特掌权,他任命纳瓦依为执政官。1472年,纳瓦依在侯赛因·巴依哈拉德支持下,升任宰相,在位期间,他伸张正义,加强整顿,推行改革。1476年,纳瓦依因遭诽谤辞去宰相职务,此后,他不问政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并逐步达到了自己创作的高峰。

纳瓦依把他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文学创作,留下了30多部著作。纳瓦依出生并进行主要活动的赫拉特城是14—15世纪中亚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纳瓦依的家庭也是文学世家。他自幼师从当时知识渊博的学者,受益匪浅。被纳瓦依称为在维吾尔语言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诗人赛卡克是维吾尔语言园地里的佼佼者,鲁提菲都是与他同世纪的人,并且是他的尊师。

纳瓦依之所以成为维吾尔文学的典型代表,不仅仅因为他具有维吾尔人的血统,更重要的是,他用维吾尔语创作了数量很多、质量很高的文学作品。1501年,纳瓦依在赫拉特逝世,享年60岁。纳瓦依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被誉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不仅如此,纳瓦依的作品还反映出他是一位知识渊博、思想敏锐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毫无疑问,在用察合台语创作的所有诗人和学者中间,纳瓦依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五卷诗集》、《海米塞》、《四卷诗集》、《心之所钟》、《两种语言之争辩》、《文坛荟萃》、《鸟语》、《诗律准绳》等。

在纳瓦依去世以后的5个世纪中,诗人们把他尊为维吾尔族诗歌的大师,从他的诗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的诗篇被推崇为维吾尔诗学的百科全书,阿鲁孜韵律的准衡。他的诗早被选编为各地经学院的教材,不仅为文人们诵读,而且配以管弦在民间广泛传唱。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的唱词中就有不少是纳瓦依的诗章。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纳瓦依550周年诞辰日定为全世界人民的纪念日。

### 1.《四卷诗集》

纳瓦依的抒情诗主要集中在《四卷诗集》和《法尼诗集》中。其中,《法尼诗集》是用波斯语写成的,有12000余行。诗人最初编撰了两部抒情诗集,一部是《人初之惊异》,另一部是《人生之少遇》。后来又收进了其他的抒情诗,于1491—1498年编定了总共有45000行的《四卷诗集》。这部诗集是根据人生的不同时期分为四部分编写的。《四卷诗集》的《序言》对人生的四个时期是这样划分的:少年的奇思(青少年时期)、青年的异珍(青年时期)、中年的美质(中年时期)、老年的收益(老年时期)。

《四卷诗集》共收3130首诗歌,每一部篇幅大体相当:第一部《少年的奇思》840首,第二部《青年的异珍》795首,第三部《中年的美质》740首,第四部《老年的收益》793首。收入《四卷诗集》的诗的格式较为自由。如,第一部和第二部有8种格式,第三部和第四部有9种格式。

诗集的主题是颂扬爱情。就诗的形式而言,除格则勒外,尚有木斯塔扎提、木哈买斯(五行诗)、木色德斯(六行诗)、木色满、赞颂诗、对酒诗、克特额、柔巴依、谜语诗、其斯坦、泰尔克极提、双行诗、语义双关诗、对句等15种诗体。每集诗的韵脚按字母顺序安排。

纳瓦依在抒情诗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打破了抒情诗原有的那种狭窄的题材范围,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各种问题都成为他诗歌咏唱和表现的对象。他的诗歌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道德等领域。正是由于他的抒情诗有着这样的特点,再加上他那精湛的艺术造诣,《四卷诗集》又被称为《精义宝库》。纳瓦依的诗作无愧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潮,冲破了那个时代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樊笼,歌颂了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在思想方面,他坚决否定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民置于重于一切、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反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反对遁世思想。在许多诗篇中他召唤人们摒弃对虚无飘渺的天国的向往和对火狱的恐惧,面对现实,热爱生活,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他热烈歌颂忠贞的爱情。他的许多诗句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与人生体验,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智慧。

在《四卷诗集》里,纳瓦依的抒情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他的抒情诗充满了生动的譬喻,奇妙、瑰丽的想象与联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形象鲜明,语言流畅,不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当时第一流的水平,因而历来被奉为维吾尔文学史上抒情诗的典范之作。

### 2.《五卷诗集》

《五卷诗集》(又称《海米塞》)是纳瓦依文学创作的顶峰,也是维吾尔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五卷诗集》是诗人于1483—1485年在赫拉特用他的母语写成的。

《五卷诗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题材,也称《海米塞》(hamsa)。“海米塞”一词本义是“五”,故译作“五卷诗”。这种传统的创作形式是在中世纪的中亚和东方古典诗人中形成的,由五部长诗组成,内容和结构互不衔接,但都用双行诗的形式,按统一的诗歌形式写成;独立的五部长诗经过汇编就成了《五卷诗集》。

纳瓦依的《五卷诗集》由《君子神往》、《帕尔哈特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依》、《七星图》、《斯坎德尔的城堡》五部叙事长诗构成,所叙述的内容都源自古老的民间传说。第一部是表述哲学思想的长诗,第五部写理想的国家和理想的国王,其余三部写爱情的欢乐和离别的痛苦。《五卷诗集》视野广阔,不仅写了诗人所处时代的地域性问题,而且写了世界性问题,涉及道德品质、科学文化、国家安宁与家庭幸福等诸多内容。《五卷诗集》的每一部都反映了当时最新的哲学观点、认识成果和科学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

《君子神往》(又译《正直人的惊愕》)是《五卷诗集》的第一部,共63章,3973个对句,7946行,由序言、正文和结尾三部分组成。诗人在序言部分介绍了他以前的师祖及导师尼扎米·甘吉维(1141—1209年),艾米尔·霍斯佬·德黑里维(1253—1352年)和阿布都拉赫曼·加米(1414—1492年),讲述了他自己写这部诗的目的。这是一部哲理长诗,诗的主体部分每章为一论,每论透过具体的故事阐释一个问题,分别表达对道德、宗教、哲学和社会的看法。诗的结尾部分简述了写诗过程中的曲折,实际上是整部作品的总结。

《帕尔哈特与希琳》是《五卷诗集》的第二部,共54章,5453个对句,11560行,是一部悲剧性的长篇爱情叙事诗,也是纳瓦依最感人的长诗。诗中叙述了和阗王子帕尔哈特和亚美尼亚美丽的公主希琳之间感人的爱情故事,以此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爱国爱民的思想,涉及启蒙教育、农业经济、水利事业等方面,歌颂了公正博学的国王,痛斥了愚昧无知的暴君。

在写作《帕尔哈特与希琳》时,纳瓦依对波斯文学《海米塞》中的《霍斯罗与希琳》进行了再创作,赋予这个古老的传说以新的思想、新的内容。在语言运用上,诗人将文学语言同平民百姓的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物的语言富有个性。诗人根据不同的人物以特定的语言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

《莱丽与麦吉依》是《五卷诗集》的第三部,共38章,3614个对句,7228行,是诗人用悼词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叙事诗。诗中道出了一位有名望的部落首领的女儿莱丽与一个小部落头人的儿子麦吉依(坎依斯)之间的爱情悲剧,对两个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并且借助对外在环境的描绘加以烘托,使主人公的情感与自然景物达到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七星图》是《五卷诗集》的第四部,诗人称之为“有趣的故事”,由流传在中亚地区的七个民间故事改编而成。诗人分别借用七个类型的人物,让他们分别代表

七种品德,这就是,abi(大方、慷慨)代表娴淑、端庄,zaid(多余、过剩)代表谄媚、谎言,said(幸福、舒适)代表幸福如意,jona(花蕾)代表如花的面孔,dihan(农民)代表亲热,suhayi(闪耀的光)代表对称,mudbir(后退、不前)代表艺术。这七个类型的人物的命名虽然出于抽象概念,但诗人却将他们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从外貌描写到心理刻画,都为维吾尔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斯坎德尔的城堡》(《亚历山大的城堡》)是《五卷诗集》的第五部,共89章,7182个对句,14364行,是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根据诗人的解释,这部诗是为了补充《五首诗集》的前四部而创作的。《斯坎德尔的城堡》描述的是古代亚历山大大帝一生的全部经历。其中,斯坎德尔(即亚历山大)的城堡就是正义的象征。纳瓦依笔下的斯坎德尔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亚历山大本本人,而是诗人理想中的国王形象。诗人在这位身兼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国王的形象中灌注了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如果说在《七星图》里诗人是想通过对反面形象的描写给当时的统治者一个儆戒的话,那么,在《斯坎德尔的城堡》中诗人就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正面仿效的典型。这就是纳瓦依写两部诗时用心良苦之所在,也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是纳瓦依的精心结构之作。

### 3.《心之所钟》

《心之所钟》是纳瓦依晚年(1500年)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诗人总结了他在青年到晚年的人生经验,可以说是他的社会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哲学思想的结晶。

《心之所钟》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共40章,论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特点,并作了关于道德伦理和劝善诫恶等方面的论述;第二部分共10章,阐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第三部分由125则格言、警句组成,逻辑性很强,讲述社会知识、道德格言和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考,是《心之所钟》的精华部分。全书语言简洁、生动,有抒情,有议论,其中还穿插一些寓言、故事,并且使用了柔巴依、克特额、纳孜买、毕依特、法尔德等诗歌韵律形式,读来饶有兴味。

### 4.《两种语言之争辩》

这是一部有关语言学方面的著作,表明纳瓦依为维护和发展维吾尔语所作的努力。在这部著作中,纳瓦依把维吾尔语同波斯语进行比较,指出维吾尔语的优点,认为它是“艺术性高的语言”,用它可以创作出优美的文学作品。

在纳瓦依时代,操突厥语族诸语言的诗人们把用波斯语写作当成一种时尚,有人甚至将波斯语比作蜜糖。这种情况在赫拉特尤为严重,那里的绝大多数诗人认为波斯语比自己的母语好,只有用波斯语才能写诗,而用自己的母语是写不出诗来的。纳瓦依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对维吾尔语和波斯语进行了比较,用大量例子说明维吾尔语的优越之处。诗人痛心指出,尽管维吾尔语有这么多优点,可是操突厥诸语的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却不加分析地认为波斯语好,热衷于用波斯语写诗。

而这样一来,操突厥诸语的诗人就越来越不懂自己的母语了。诗人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决心钻研维吾尔语,通过钻研他不仅认识到维吾尔语十分丰富,而且为自己操这种语言感到无比自豪。

### 5.《文坛荟萃》

这是一部用察合台语写成的传记性作品,介绍了诗人的前辈和与诗人同时代的459位作者的生平、作品。其中有35人是用维吾尔语进行创作的。这部著作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坛有很大的价值,对突厥诸语传纪文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6.《鸟语》

《鸟语》是一部寓言诗,作于1498—1499年。纳瓦依是一位善于通过形象进行表述、通过各种文学体裁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诗人。在《鸟语》中,他通过鸟类中的一些角色及其相互关系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纳瓦依在《鸟语》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鸟在戴胜鸟的带领下经过长期艰难的飞行,最终与魔窟中的鸟中皇——凤凰相会。故事中的凤凰、戴胜鸟和普通鸟分别代表上天、苏非主义者和普通人,纳瓦依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通过许多论述,他批判了苏非主义者关于“上天”共存的谬论,提出了了解自己、珍惜自己、珍惜生活、珍惜今世的观点。这部著作在当时苏非主义思潮泛滥于中亚的时期,是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华之作。

纳瓦依的一生是笔耕不辍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纳瓦依作为丝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巨星,继承了鄂尔浑、高昌、喀喇汗及帖木儿时期的维吾尔文化传统,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在古希腊和罗马哲学、阿拉伯和波斯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思维能力、语言运用和表达能力上都远远超出了他同时代的人。他以自己的创作夺取了《五卷诗集》诗歌创作的桂冠,成为这一领域的光辉典范。

### (八)民间文学代表作《阿凡提的故事》

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民间文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多样。激烈动荡的时代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内容,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民间文学题材的产生。如,富有强烈的感染力的《阿凡提的故事》便在这一时期形成,而且内容日趋丰富,成了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许多民间叙事长诗纷纷问世的时期。维吾尔族人民及其他操突厥诸语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了很多以中亚文化交流、战争、爱情等为题材的民间叙事长诗。流传至今的大部分维吾尔民间叙事长诗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察合台汗国时期。这一时期有关伊斯兰教的神话传说和传教者的传教故事广泛流传于维吾

尔族民间,它与来自于阿拉伯和波斯的民间故事一同构成了维吾尔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拉勃胡兹的《先知传》一书的问世更加促进了阿拉伯民间故事、神话与传说在维吾尔民间的“本土化”、“民族化”过程。

### (九) 结语

察合台汗国时期是维吾尔文学繁荣发展并创造出辉煌成就的时代。这一时期虽然不断发生战乱和人口迁徙,但是随之发生的文化交流丰富了维吾尔文学的内容,为维吾尔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重大题材及不朽的艺术形象。在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体裁,如长篇小说、传奇故事、传记文学,属于阿鲁孜格律的格则勒、柔巴依、克特额、纳孜买、毕依特、法尔德、木哈买斯、木色德斯、木色满等被引进维吾尔文学,阿鲁孜格律诗在维吾尔文坛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三、艺 术

在察合台汗国时期,伊斯兰教传播到了整个维吾尔族生活的地区。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所到之处,维吾尔族以前的造型艺术和绘画艺术横遭破坏,新的造型艺术和人物绘画艺术更不可能产生。于是,维吾尔民族文化史上造型艺术和人物绘画艺术的这段空白延续了整整 500 年之久,直到 20 世纪中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细密画和书法艺术以及音乐、舞蹈艺术的成就。

### (一) 细密画和书法艺术

维吾尔族绘画艺术可分为皈依伊斯兰教前的绘画艺术和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绘画艺术。皈依伊斯兰教前的维吾尔族绘画艺术以千佛洞壁画艺术为代表,可以说成就惊人。有关千佛洞绘画艺术,本书的第三章第四节(高昌回鹘王国时代的文学艺术)已有足够的阐述。如上所述,皈依伊斯兰教之后,虽然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维吾尔族的绘画艺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并未完全扼杀维吾尔人的绘画天才和对绘画艺术的追求,相反,维吾尔族绘画艺术以细密画的形式发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伊斯兰教的传入还给维吾尔族带来了以阿拉伯文为基础的书法艺术。在喀喇汗朝时代,书法在维吾尔艺术中得到一定的重视,但成就不大。在察合台汗国时期,尤其是帖木儿之后,由于大批维吾尔族艺术家、学者迁入呼罗珊、赫拉特、撒马尔罕、河中地等地,那里又一次出现了文化艺术事业的高潮。虽然随着伊斯兰教思想的巩固,扼杀了富有表现力的造型艺术,但建筑和手工



艺中的装饰图案、书法与细密画法混杂的装潢艺术风格得到了弘扬。在察合台汗国时期,手抄书籍都要求制作成最精美的艺术品。书籍完全是由书法家一页页手工抄写后配以细密画插图,外加精心设计的封面装订,各类作品中均有技法高超的书法和细密画。维吾尔族画家创造了细密画艺术在帖木儿时代的繁荣局面。在这一时期,宫廷设立的文秘机构中有许多画家和书法家,他们专门负责抄写和装帧书籍。据研究,在帖木儿时期从事抄写和装帧书籍的人大部分是维吾尔人,流传至今的纳瓦依的《五卷诗集》等巨著大多是维吾尔族书法家和细密画画家抄写装帧而成书的。这些可以显示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细密画艺术和书法艺术高水平的历史书籍,现藏在土耳其、德国和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图书馆内。研究那些手抄本著作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人的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水平。

## (二) 音乐、舞蹈艺术

在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的音乐艺术进入了收获的季节。其表现之一是各地的散篇乐章趋于规范化、统一化,出现了一部分“木卡姆”。在当时的学者的著作中使用了有关十二木卡姆的不同名称。操突厥诸语的各民族,尤其是维吾尔、土库曼、阿塞拜疆等民族的音乐艺术进入了繁荣时期,出现了以某种名称定型的乐章。十二木卡姆中的《吾孜哈勒》、《拉克》、《奥夏克》、《怯勒·伊拉克》、《艾杰姆》、《纳瓦》等乐章已经出现。此外,其他木卡姆乐章的音乐素材也已出现并流传于民间。

表现之二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研究音乐艺术的浪潮,在这一浪潮中,穆罕默德·花喇子米、纳瓦依、玛吾拉纳·艾力莎、穆罕默德·加米、艾米尔·穆尔塔扎、霍加玉苏甫·布尔罕等十几名维吾尔族学者、音乐家从事音乐创作、规范化及整理工作。其中纳瓦依创作了名为《纳瓦》的木卡姆乐章。这一时期,维吾尔人的各个聚居区出现了学习、创作、继承、整理和演奏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热潮,从而为叶尔羌汗国时期维吾尔木卡姆的整理奠定了基础。

表现之三是这一时期对维吾尔族音乐艺术理论的探索更加深入,有几部重要著作问世。如,阿塔吾拉·胡塞尼的《艺术之美》,纳瓦依的《韵律准绳》、祖胡热丁·穆罕默德·巴布尔的《阿鲁孜书》等,都涉及音乐创作、音乐规律和音乐教育等方面。

在帖木儿时代,在古典维吾尔舞蹈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型集体舞蹈——麦西来甫。“麦西来甫”是阿拉伯语,本义为歌舞作乐。用阿拉伯语命名维吾尔舞蹈的现象,是这一时期阿拉伯、波斯语借词大量进入维吾尔语的又一佐证。“麦西来甫”一语,除用以表达这种大型舞蹈外,每一木卡姆套曲的最后,即第三部分也称为

“麦西来甫”。“麦西来甫”这种基调的舞蹈出现在察合台汗国时期,似乎太不合时宜。它的规模和气氛,与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是不相适应的。在这一时期,动荡的政局带给维吾尔族人民的痛苦远远大于欢乐,但是,生活总能够激起人民追求真善美的情,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劳动人民仍然需要能够抒发感情、借以自慰的场所和方式,“麦西来甫”适应劳动人民的这种需求,逐渐演变成一种民间娱乐形式。维吾尔人以能歌善舞著称,而“麦西来甫”就是培养他们歌舞技能的主要场所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察合台汗国时期出现在维吾尔族文化领域内的这一新事物是具有不容置疑的深远意义的。

## 四、学 术

关于察合台汗国时期的维吾尔人所从事的学术活动我们了解的不多,因为有关这一时期维吾尔人学术成就的文献记载甚少。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看,这一时期的维吾尔学术状况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诗学

所谓诗学指的是察合台汗国时期所出现的有关文艺学、诗词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一些著作和文献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随着察合台文的规范化和普及以及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诗学方面的一些学术著作。这些学术著作都以提高语言艺术水平为目的,围绕逻辑学、修辞学、美学等学科,倡导维吾尔语言的规范化,主张提高作品的修辞艺术和逻辑性,从各个角度论述了维吾尔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优越性。按说当时的诗学著作应该很多,但流传至今的仅有两部:

#### 1. 玉苏甫·赛卡克的《科学的源泉》

玉苏甫·赛卡克(1160—1228年)是察合台汗国时期学识渊博的语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不仅通晓天文学、化学和希腊文化的各个学科,而且是一位精通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的文学巨匠。在逻辑学、修辞学、美学方面,他著有《写作秘诀》,在音乐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创造了至今仍在乐师中享有盛名的木卡姆乐章《巴雅特》。察合台汗王曾把他请入宫中,聘任他为科学顾问。在宫中,他完成了《科学的源泉》(又名《科学的钥匙》)一书,为维吾尔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科学的源泉》是玉苏甫·赛卡克的学术性代表著作之一,用阿拉伯语写成,涉及语言、文学等13个学科。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思想进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各个时期知识界的重视,许多有识之士,如供职于帖木儿王宫的色迪尔丁·马斯吾德·塔富塔扎尼、艾力·谢尔夫·居尔加尼等,曾

对《科学的源泉》进行注释,并将其介绍给公众。当时及后来的维吾尔族学者还将这部书作为各级经学院的教材使用。1950年,诗人穆罕买提·哈菲孜将《科学的源泉》由阿拉伯文译成维吾尔文。这部著作是在法拉比之后,专门探讨语言艺术、修辞学和诗学等诸问题的专著,它为后来的维吾尔诗学理论打下了基础。

## 2. 纳瓦依的《韵律准绳》

纳瓦依为维吾尔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在诗学领域内也是成就巨大的学者。纳瓦依有关诗学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写于1490年的《姆安玛之书》<sup>①</sup>,另一部是写于1492年的《韵律准绳》。《姆安玛之书》是纳瓦依专门论述秘语诗的一部著作,著作中论及的内容是秘语诗的结构,用诗的形式表现秘语诗的技巧,秘语诗中修辞语的使用方法等。这是一部维吾尔文学史上论及秘语这一文学体裁的专门著作。《韵律准绳》是纳瓦依学术著作中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该书专门论及阿鲁孜韵律的诸多问题。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传入维吾尔社会之后,在阿拉伯文学的影响下,不少维吾尔族诗人用阿拉伯阿鲁孜韵律格式进行创作。但是,阿鲁孜韵律较为复杂,需要给予详尽的阐释,否则,就会产生错误的理解。纳瓦依出于对文学的责任感,写出了《韵律准绳》一书,对阿鲁孜韵律诗的修辞格式、韵律形式、阿鲁孜韵律在波斯语和维吾尔语诗歌中的运用及其相关的例子等都作了充分的解释。该书可谓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诗学理论著作中的典范,为后来的阿鲁孜韵律诗的健康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 (二) 医学

在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医学虽然在蒙古入侵时遭到了破坏,但是也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大批维吾尔人流入河中地,在那里传播维吾尔医学,并使维吾尔医学与阿拉伯、波斯民族医学相互接触而共同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著名穆斯林医学家的经典著作在维吾尔学术界和民间广泛流传,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伊斯兰医学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治疗方法、药品药物的使用均趋于统一化。遗憾的是,属于该成果的维吾尔医学文献尚未发现。但这并不表明这一时期维吾尔医学中没有医学著作出现,相反,在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各大城市里,维吾尔族学者在伊斯兰经学院不仅学习宗教知识,同时也学习医学等课程。据记载,当时著名的医学家伊本西纳、阿布白克里·穆罕默德·孜克里亚等人的《医典》、《扎合拉花喇子米》、《扎合拉鲁克曼》、《达吾德安塔茫》等医学著作广泛流传于维吾尔族当中,深受维吾尔族医者的欢迎,他们将其与自己传统的医学相结合,大大丰富了维吾尔医学的内容。

<sup>①</sup> “姆安玛”是具有秘语性质的诗歌,是秘语诗。

### (三)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

有关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人在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著作和研究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根据零散的资料,就维吾尔人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情况,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其一,在这一时期,维吾尔人的天文学在原来的朴素天文学观点的基础上,接受阿拉伯天文学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形成和进一步完善了关于黄道十二宫变换的规律等学说,同时数学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天文学方面,当时河中地国王乌鲁伯克(生于1394年)曾在亲自设立的“乌鲁伯克学院”和专设天文台上与当时的维吾尔、波斯学者观察天文现象,研究了108个星球的运动和位置,乌鲁伯克于1437年写成颇负盛名的《新编天文表》。该著作分四部:第一部讲述阿拉伯、波斯、汉族和维吾尔人所使用的历法;第二部论述天文观察和计算方法;第三部展示行星和太阳的运动及太阳和月亮运动规律的计时的方法;第四部讲述行星运动对人类命运的影响等问题。此外,还对一年的时间作了精确的计算。这一时期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学者们集中在一起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如当时的哲学家居尔加尼,历史学家哈菲孜·艾比若,医学家买理吾拉纳·纳菲斯,著名学者伊本·艾合买德·哈兹扎德,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合雅思丁·加米西德·卡西、穆艾尼丁·卡西、阿拉吾丁·伊本穆罕默德·撒马尔罕迪等人集中在撒马尔罕的王宫所设立的学术机构中,开展科学探索。

综上所述,在战乱和动荡的察合台汗国时代,维吾尔族文化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仍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中成就最多的领域可以说是文学艺术。伊斯兰教在维吾尔人中的普及对维吾尔族语言文学的统一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使民族文化不断趋于完整。在许多领域内,包括生活习俗、文学艺术、宗教观念、苏非主义思想、科学发展等方面,出现了不少成果。在中亚地区操用突厥诸语的民族中,维吾尔语言文字和文化再一次占据优势,当时亚洲中部的许多民族都借用名为察合台语的维吾尔书面语记录历史活动和本民族的文化。国外学者所说的“维吾尔文化现象”或“初步复兴”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一时期维吾尔文化总体恢复繁荣状况而言的。

## 第五节 阿拉伯、波斯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

**察** 合台汗国时期是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进一步传播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了维吾尔族信奉过的所有其他宗教,开始独揽维吾尔族的精神生活领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维吾尔族文化除长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之外,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波斯文化也深刻影响了维吾尔族文化,给维吾尔族的整个文化生活涂上了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阿拉伯、波斯文化成分大量涌入,丰富了维吾尔族文化的内容。

借助伊斯兰教,阿拉伯、波斯文化早在喀喇汗朝时期就开始对维吾尔族文化产生影响,这种文化影响从喀喇汗朝时期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这两种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高潮,即喀喇汗朝时代和察合台汗国时代。尽管在喀喇汗朝时期阿拉伯、波斯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远不如察合台汗国时期。因为喀喇汗朝时期伊斯兰教仅在整个维吾尔族居住区的南部推行,并没有控制维吾尔族全民族的精神生活领域。当时阿拉伯、波斯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力还不算大,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的哈喀尼亚维吾尔文字也未能在整个维吾尔族居住区得到通行,在维吾尔族文化各领域,原有民族传统的地位依然极高,无论是维吾尔族文学艺术,还是语言要素,或者传统生活习惯,或者政治社会制度,都仍然沿着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轨道继续发展。就维吾尔语而言,在喀喇汗朝时期,虽然维吾尔语开始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用词汇,但是从那个时期的文献语言来看,这种影响尚很小,借词的数量有限,文字也处于规范化的进程中,当时高昌国范围内的维吾尔语几乎没有受到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仍然使用回鹘文。到了察合台汗国时期,随着伊斯兰教独揽维吾尔族精神生活和以河中地为中心的维吾尔族文化与阿拉伯、波斯文化交流的加强,这两种文化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影响的程度甚至可以说达到了高峰。

在察合台汗国时期,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之所以能够对维吾尔族文化产生很大影响,有以下几种社会基础:

### 1. 察合台兀鲁斯的伊斯兰化和统治阶级大力推行伊斯兰教

察合台汗国的几代统治者实际上处在不断被维吾尔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察合台汗国中期,特别是帖木儿时期前后,蒙古统治者及其人民逐渐被维吾尔族同化,到帖木儿时代,这种同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在蒙古后裔帖木儿、黑的儿等几位虔诚穆斯林统治者的努力推行下,整个维吾尔族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或自愿或被迫地接受伊斯兰教,维吾尔民族从南北对立的分裂状态走向了统一,无论在地域、社会结构、精神领域及经济上都归于整合,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民族而登上历史舞台。所以,察合台兀鲁斯的维吾尔化和伊斯兰教的普及可以看做是维吾尔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转折,这无疑促进了阿拉伯、波斯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发生影响的速度和规模。

### 2. 察合台语言文字的形成

在维吾尔族的文字史上,使用阿拉伯字母是喀喇汗朝初期的事。虽然文字不等于语言,但这次文字变迁的影响是巨大的。举一个事实:喀喇汗朝时代的哈喀尼亚语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分很少,后来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引入加快了阿拉伯、波斯语成分的输入,导致了以维吾尔语为基础、以统治者察合台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察合台语的形成。察合台语是14世纪以后在天山南部、中亚河中地区通行的一种综合型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除了当地居民外,也包括已经被维吾尔族同化的察合台后裔。察合台语的基本成分——包括语音、语法、基本词汇是建立在维吾尔语基础上的。关于察合台语的基本情形,我们不妨打个比喻:这座语言大厦的骨架(语音、语法)取自维吾尔语,垒墙的砖瓦(词汇)则来自各方面——主要来自维吾尔语,兼采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等的成分。不过,维吾尔语固有词汇仍然在察合台语词汇中占据核心地位。

察合台语的形成既可以视作阿拉伯、波斯文化对维吾尔文化发生影响的结果,亦可以视作这种影响的载体之一。在察合台汗国的广大地区,以维吾尔语为基础的察合台语,被操用突厥诸语的各民族当做书面语言来使用,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在察合台汗国时期,由于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由于与操波斯语的民族频繁交往,不断吸收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丰富了察合台语的词汇。在这种综合型语言的使用和普及过程中,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因素大量渗入维吾尔族文化之中,对维吾尔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3. 教育事业的繁荣

这里所说的教育不是指现代学校教育,而是指伊斯兰教教堂学校或高等经学院的教育,这是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民众接受文化教育的基本形式,也是从事宗教文化研究、培养宗教人士、提供和保证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必要途径。维吾尔族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特别是帖木儿信奉伊斯兰教以后,在天山南北地区和

撒马尔罕、呼罗珊、花刺子模、赫拉特等地随之涌现出了许多经学院和乡村的经堂学校。尤其是帖木儿设立的经学院,成了当时的中、高等教育基地。这些经学院里开设的课程有阿拉伯语、波斯语、文学、教学法、圣训学、伊期兰教史、《古兰经》注释学、天文学、医学、语言文学、逻辑学、修辞学等。维吾尔族学子就读于这些经学院,在学习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同时,还要学习阿拉伯、波斯文化,毕业后通过布道、著书等形式向维吾尔族民众传播这些外来文化,从而加快了维吾尔族民众接受伊斯兰教文化的步伐。据历史资料记载,喀喇汗朝时期喀什噶尔就有过 17 所经学院,察合台汗国后期新疆和河中地区出现的宗教学校数量更多。需要指出的是,维吾尔族学子在宗教学校就读的过程中不仅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宗教知识,而且学习阿拉伯民间文学、伊斯兰教伦理学、波斯古典文学等。于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便得到了维吾尔族的认可和崇尚,促进了维吾尔族与这些民族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从喀喇汗朝时期起至 20 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维吾尔族学子都接受过宗教教育和以阿拉伯、波斯语为基础的阿拉伯、波斯文化教育,他们所撰写的各类文献几乎都包含着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和阿拉伯、波斯文化成分。

察合台汗国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和社会上层人士特别崇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新疆和中亚地区形成了崇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风气。文学家们推崇波斯语,学习波斯文学,模仿波斯文学进行创作,用波斯语写作被当做一件时髦的事情。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阿拉伯语是蜜一样的语言,波斯语是糖一样的语言”。虽然有些学者出于民族感情和对民族语言的责任感,用维吾尔语(察合台语)写了不少著作,但他们同样摆脱不了时代的影响,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进行写作。这一时期出现的维吾尔族文化方面的著作,有不少是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成的。

在察合台汗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产生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是阿拉伯和波斯民间文学通过翻译、借用、再创作等形式进入了维吾尔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之中。例如,古代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许多民间故事通过拉勃胡兹的《先知传》流传于维吾尔民间并保存到今天。纳瓦依在《五卷诗集》中详细记载了许多阿拉伯、波斯民间传说和故事,通过他的这部著作,许多阿拉伯与波斯古典文学遗产成了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察合台汗国时期,阿拉伯与波斯文化在哲学、医学、书法艺术、文学、历法等几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哲学和思想方面,在伊斯兰教教义的基础上,在许多阿拉伯、波斯和维吾尔族思想家和苏非主义大师的影响下,那克西班牙迪亚尼苏非主义神秘思潮浸入维吾尔族社会并不停地蔓延。许多维吾尔学者和平民成为苏非主义教派的门徒,成为后来叶尔羌汗国时期极端主义思潮泛滥的社会和思想基础。在医学方面,维吾尔医学和阿拉伯、波斯医学进入了整合统一的过程,以伊本西纳

为代表的伊斯兰医学受到阿拉伯、波斯和维吾尔医学界的普遍认可。需要指出的是,维吾尔医学作为操突厥诸语各民族医学的先导,在学习的同时,也对阿拉伯、波斯医学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察合台汗国时期,维吾尔书法艺术汲取了阿拉伯文书法艺术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维吾尔族书法传统。阿拉伯书法艺术中的塔力克字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维吾尔族书法的特点。在文学方面,阿拉伯和波斯民族文学中的许多体裁,如木哈买斯(五行诗)、柔巴依、克特额、玛斯纳维双行诗等韵律格式被维吾尔族文学家借用并予以革新,成了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文学体裁。

在察合台汗国时期,阿拉伯、波斯文化与维吾尔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据记载,13—14世纪之间,维吾尔族佚名学者曾将《古兰经》译成当时的察合台语。纳瓦依在1500年所写的诗集——《四十个圣训》里用诗歌形式译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四十篇圣训。拉勃胡兹在《先知传》的写作过程中,翻译了大量的《古兰经》篇章、圣训和阿拉伯民间文学及历史著作,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精神渗透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一时期很可能还有其他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文献被翻译,但由于资料欠缺,我们无法列出具体的篇目。由于种种原因,大批维吾尔人在察合台汗国时期跟蒙古军队一起进入了河中地和今阿富汗北部,并与当地原有的维吾尔人一起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中的有些佼佼者成为操突厥诸语民族的文化导师,在同阿拉伯与波斯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赫拉特、呼罗珊、花刺子模、撒马尔罕、喀什噶尔等城市曾经是伊斯兰教育中心和科学文化交流中心,来自各地的杰出人物和来自波斯与阿拉伯的传教士、学者、苏非大师、苦行僧、商人及学生汇集一处,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活动。在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中,那些城市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很突出的。

在察合台汗国时期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阿拉伯与波斯文化通过多种渠道极大地影响了维吾尔族文化发展,使维吾尔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方面都打上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波斯文化的烙印。但是,文化影响作为历史事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虽然在这一时期维吾尔族文化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影响下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民族文化的整体统一,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维吾尔族在佛教文化时期创造的大部分文化艺术遗产遭到彻底的排斥和破坏,致使维吾尔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断层。

总之,察合台汗国时期及以后的维吾尔文化中,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及其所依赖的精神支柱——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既表现为辉煌的成就,也产生了一些历史的悲剧和文化的损失。当然,这也体现了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发展逻辑和辩证法。





第八章

叶尔羌汗国时期及  
维吾尔族文化

---

## 第一节 叶尔羌汗国概述

**察**

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汗 1347 年建立的蒙兀儿斯坦约存在了 80 年,到了 1432 年,汗国第六代统治者歪思汗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羽奴思汗和也先不花汗之间的汗位争夺使汗国走向分裂。后来,虽然歪思汗之少子也先不花即位,短时间地统一了西至塔什干地区的部分疆域,但 1478 年他去世以后,蒙兀儿斯坦终于彻底解体<sup>①</sup>。

羽奴思汗的长子马合木占据了中亚锡尔河和塔拉斯河流域、伊塞克湖一带以及费尔干盆地至塔什干地区,羽奴思汗的次子阿黑麻占据了阿克苏河以北至哈密以西的区域,宣布自己为蒙兀儿斯坦法定的君主。早在秃黑鲁·帖木儿时期就已皈依伊斯兰教而融合在天山以南维吾尔族当中的朵豁刺惕部落之首领米尔咱·阿巴·乱乞儿则占据了阿克苏河以南至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的地区。这三个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引发了长时间的战争。这使蒙兀儿斯坦境内的各个部落和民族陷入战火之灾,社会走向衰败。

15 世纪后半叶,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汗建立的金帐汗国(钦察汗国)也开始分裂。金帐汗国统治下的月即别汗之后裔昔班尼汗(1450—1510 年)带领部分人马侵入河中地区,开始攻打跛足帖木儿王国的领地。临时占据河中地区的马合木也很愿意消灭跛足帖木儿的后裔而统治整个察合台汗国的疆域,因此,他支持昔班尼汗,成为他的庇护者。1500 年,昔班尼汗在马合木的军事援助和精神支持下,占领了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区。1501 年,昔班尼汗背弃马合木,占领了马合木的塔什干地区,随后,又在整个河中地区发动大规模战争,将统治该地区的跛足帖木儿后裔扎希尔丁·巴布尔赶出了河中地区。巴布尔带领其拥护者逃往喀布尔,后来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亦称巴布尔王朝)。紧接着,昔班尼汗又向这一地区的马合木发动大规模战争。为了对付昔班尼汗,马合木向统治着今新疆东部地区的弟弟阿黑麻请求援助。1502 年,阿黑麻将汗位临时留给长子满速儿,同诸子赛亦德

<sup>①</sup>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年,维译版)一书中称:“也先不花汗死于 1462 年。”

等一起率领大军向河中地区进发,并在费尔干附近的阿黑昔城与昔班尼汗的三万大军遭遇。经过数次激战,昔班尼汗获胜,俘获马合木、阿黑麻及其将士 15000 人。后来释放了马合木和阿黑麻,继续扣留赛亦德,条件是将塔什干和赛兰移交给昔班尼汗,蒙兀儿斯坦军今后不再进入费尔干以西地区。

马合木和阿黑麻带领剩余部众回到阿克苏。1503 年,赛亦德从昔班尼汗手中逃脱,历尽艰险,来到阿克苏,并同伯父马合木联合起来,准备向昔班尼汗进行报复。1504 年,赛亦德的父亲阿黑麻因病在阿克苏去世。是年,马合木重新调集人马,与侄儿赛亦德一同去讨伐昔班尼汗。但是,他们在忽毡河流域被昔班尼汗彻底打败,马合木及其五个儿子在那次激战中被杀。结果,原先属于马合木的疆土全部归属昔班尼汗。这时,替代马合木留在阿克苏的赛亦德汗之兄满速儿汗宣布自己为蒙兀儿斯坦法定的汗王,并积极扩大自己的权限,将赛亦德汗等兄弟挤出汗庭,从而引发了兄弟之间争夺汗位的斗争。1509 年,赛亦德汗及其弟哈里勒组织起天山及阿克苏一带的吉利吉思人向兄长满速儿汗开战。赛亦德汗在这场战争中失利,同弟弟哈里勒一起逃往安集延。不久,哈里勒被昔班尼汗的属下所杀,受昔班尼汗和自己的兄长满速儿汗两面夹击的赛亦德汗又逃出安集延,投奔喀布尔的表兄巴布尔。

1510 年 12 月,昔班尼汗死于发生在伊朗马鲁城的激战中。之后,巴布尔打算夺取昔班尼汗统治的河中地区,满速儿汗统治的蒙兀儿斯坦地区以及米尔咱·阿巴·乱乞儿统治的向阳地(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地区),恢复一统的察合台汗国。于是,他派表弟赛亦德汗率领大军去夺回河中地区。1511 年 5 月 13 日,赛亦德汗从喀布尔出发,迅速占领了安集延、费尔干、伊塞克湖、锡尔河上游等地区。正在此时,米尔咱·阿巴·乱乞儿也带领大军从喀什噶尔出发,来征讨赛亦德汗。在安集延附近的激战中,米尔咱·阿巴·乱乞儿大败,逃往喀什噶尔。赛亦德汗打算彻底消灭米尔咱·阿巴·乱乞儿的势力,因此同哈萨克汗国的统治者哈斯木汗结盟<sup>①</sup>,1514 年 5 月,赛亦德汗率军从安集延出发,向喀什噶尔进军。他们迅速夺取喀什噶尔以后,又向米尔咱·阿巴·乱乞儿的大本营——叶尔羌出兵,一路攻克沿途设置的军事要塞,于 9 月 20 日,胜利进入叶尔羌城。米尔咱·阿巴·乱乞儿意识到自己无力抵抗赛亦德汗的军事力量,就带领部分官员弃叶尔羌而逃往和田。受尽暴君米尔咱·阿巴·乱乞儿长达 45 年残暴统治的叶尔羌人民非常隆重地欢迎了赛亦德汗。赛亦德汗坐在察合台汗国传统风格的牙帐里,宣布米尔咱·阿巴·乱乞儿傀儡政权彻底灭亡、以他为首的叶尔羌汗国(或称赛亦德汗国)成立。从此,察合台后裔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诞生。从世系上看,汗国的创建者赛亦德汗

<sup>①</sup>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175—178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虽然属于察合台蒙兀儿后裔,但作为1353年就已皈依伊斯兰教且早已维吾尔化了的秃黑鲁·帖木儿汗的第十三代孙,赛亦德汗实际上已经是维吾尔族的一员了。

叶尔羌汗国于1514年建立,1680年灭亡,历时166年。最强盛时期,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与其毗邻的巴尔喀什湖以南、伊塞克湖地区、费尔干盆地至八达哈伤及瓦罕走廊一带。如同“喀喇汗朝”一样,“叶尔羌汗国”这一名称是现代史学家对那个汗国的称谓,而在17、18世纪的穆斯林史学著作中,叶尔羌汗国曾被称为“蒙兀儿斯坦”<sup>①</sup>。

叶尔羌汗国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发展史上很重要的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点是:

其一,这一时期,作为察合台汗国的建立者、统治者的蒙古王族完成了其维吾尔化和伊斯兰化过程,朵豁刺惕、巴鲁刺思、楚刺思等蒙古部落最终被维吾尔族所同化。

其二,赛亦德汗主动与其兄长满速儿汗和解并同他结盟,结束了各割据政权之间无休止的内战,在汗国范围内实现了相对的和平。于是,维吾尔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大文化区域和政治区域(即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政治区域和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政治区域)完全统一,最终完成了维吾尔族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演化过程。在文化、政治大统一过程中,维吾尔族吸纳新鲜血液充实自己,变得更加强盛,由此逐渐发展成为新疆这块土地上影响最大的现代民族。

其三,赛亦德汗在建立叶尔羌汗国的过程中,同周围的哈萨克、吉利吉思、蒙古(瓦剌部)、塔吉克、回族等民族密切合作,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因而,这些民族也不断强盛,不断发展,成为新疆地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其四,叶尔羌汗国时期,特别是拉失德汗执政的时期(1533—1559年或1560年)是新疆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由于战乱而衰退的经济得以复苏,并且逐步繁荣。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事业也得以发展。

其五,因战乱而一时中断的同我国内地及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得到恢复,并且更加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给后来清朝政府在新疆建省打下了基础。

其六,这一时期,虽然从喀什噶尔到河中地区的丝绸之路通道由于重重障碍而被封死,陆上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但以赛亦德汗为首的叶尔羌汗国开辟了经克什米尔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新线路,为丝绸之路日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sup>①</sup> 沙·马合木·楚刺思:《编年史》,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1499—1511年)著《拉失德史》,沙·马合木·楚刺思于1669年用波斯文著《寻求真理者之友》,佚名作家用维吾尔语著《喀什噶尔史》等著作中该汗国被称为“蒙兀儿斯坦”。这可能是东察合台汗国疆域当时的名称。

其七,中世纪维吾尔社会,苏非主义非常盛行。苏非主义意识形态渗入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当时中亚苏非主义中心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的苏非派信徒,自称“先知”而大批云集到喀什噶尔及叶尔羌。从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进步思潮同疯狂的依禅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苏非主义的迷信思想,巫术、占卦、苦行等主张,以及“穆里德派”具有宗教——政治色彩的“厌世主义”思潮与代表美、人道和进步的“世俗主义”思潮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叶尔羌汗国统治集团内部也得到充分反映。赛亦德以及后来的阿布都·拉失德、米尔咱·海答儿、柯迪尔汗、阿亚兹别克·阔什奇、多斯提·叶尔坎迪、麦吾拉纳·胡力克等进步的学者、诗人及木卡姆学家,针对那些蒙昧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叶尔羌汗国时期成为维吾尔文化史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这一现象,对叶尔羌汗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第二节 叶尔羌汗国的体制和官制

**叶**尔羌汗国的体制,基本上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的体制相同。但是,叶尔羌汗国由察合台汗国演变而来,原先的游牧经济被定居农业经济所取代,伊斯兰教占据统治地位,因而,在当地农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汗国的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叶尔羌汗国时期,虽然蒙古部族原有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还继续存在,但范围有所扩大,成为主要由可汗亲族成员、汗国范围内的各部异密、中央政府的官员以及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参加的协商会,主要针对统治集团内部统一思想、继承汗位、分封领地等问题作出决定。因为叶尔羌汗国代表的是农业文化,所以,它改变了蒙古汗国传统体制中“国家是整个汗族的财产”、“长者为汗”制度,而建立了“儿子继位”的储君制度。储君制度是农业文化的共同特点之一。

叶尔羌汗国实行传统的分封制度,按照“国家是整个汗族的财产”这一观点,汗将汗国的领地划分成地区,分别赐予作为总督的汗族成员。受封者主要是汗的儿子和兄弟,也有孙子,他们被称为“纳依甫”(总督),纳依甫对领地拥有全权,他的指令在领地内要贯彻执行,汗不得干涉<sup>①</sup>。但是,汗有权随时更换封地和纳依甫。中央为了加强对各地总督的控制,派出“阿塔利克”监督他们。阿塔利克多为异密,手握兵权。在他们面前,纳依甫不敢轻举妄动。纳依甫作为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只管“衣食租税”<sup>②</sup>,对封地无继承权,当时被称为“速檀”(Sultan)。速檀必须定时觐见大汗,贡献礼品,陪同大汗度过新年及其他各种节日。“按照惯例,他们每年至少贡献三次礼品。”<sup>③</sup>

据历史文献记载,叶尔羌汗国实行的是军事官员、中央官员、宫廷官员、宗教官员、地方行政官员等五层官吏制度。从前各汗国时期形成的伯克制度,在叶尔羌汗国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并延伸到政权体制的各个方面。

在军事官职体系中,除最高统治者“汗”以外的头号人物是“兀鲁思伯克”,即

<sup>①</sup>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维吾尔文),24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sup>②</sup>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维吾尔文),24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sup>③</sup> 安瓦尔·拜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1008页,民族出版社,1991。

“阿塔伯克”(宰相、首领);其次是“阔什伯克”(大本营长官、军事指挥官)，“乌赤伯克”(战时军队的带头人)，“图黑伯克”(掌旗伯克，负责守护汗的大旗)，“塔瓦赤伯克”(在军政机关中掌管卫队的伯克)等。

行政官职体系中有“维孜尔”(汗的顾问)，“阿塔利克”(“阿塔”维吾尔语意为“父亲”，“阿塔利克”意为“可接替父位的导师”，既是荣誉称号又是重要的官职)，“密喇布”(掌管水利，主管兴修和维护水利设施，决定水的分配和收取水费的伯克)，“吉拉克亚拉格伯克”(主管向地方征收粮草和装备供应军队的伯克)，“塔哈尔赤伯克”(负责税收和军需粮草的伯克)，“什哈乌勒”(负责汗国礼宾事务的官员)等官职。

宫廷官职体系中有“伊希卡噶”(掌管宫廷内部事务的官员)，“亚提什伯克”(汗的夜间卫队长官)，“巴赫什”(汗的首席秘书，录事)，“巴卡乌勒”(汗的御膳总管)，“米拉胡尔”(掌管宫廷马匹牲畜的官员)，“叶萨乌勒”(汗的侍从、卫士)等官职。

宗教官职体系中有“纳吉布”(由“圣裔”担任，坐在汗的左边，监督汗国一切事务的官员)，“哈孜”(伊斯兰教法官)，“穆甫提”(阐释伊斯兰教法、教规的官员)，“伊玛目”(率领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人)，“木特斡里”(寺院财产的管理者)等官职。

地方官职体系中有“阿奇木伯克”(地方执政者，即各地区行政长官)，阿奇木伯克以下设“阿塔伯克”，“伊希卡噶伯克”，“米尔扎伯克”，“密喇布”，“讷克布”(负责手工业者的官员)，“商伯克”(负责商务的官员)，“都管伯克”(负责赋税的官员)，“达斯特罕伯克”，“多尔嘎伯克”(负责传达命令的官员)，“哈孜伯克”(负责教法、教规的官员)，“茂特色布伯克”(负责宗教典礼的官员)，“库特瓦勒伯克”(负责城市治安的官员)，“巴济格尔伯克”(税务官员)，“帕察沙布”(执法官员)，“海孜尼达尔”(司库)，“杰别伯克”(负责武器的官员)，“依希哈拉伯克”(负责交通、驿站的官员)，“阿尔瓦伯克”(负责外贸、商队的官员)，“巴克迈塔尔伯克”(负责园林、农耕事务的官员)，“卡什伯克”(负责玉石加工业的官员)，“密斯伯克”(负责矿务的官员)，“阿卡拉克奇伯克”(掌管哈萨克及吉利吉思部族事务的官员)，“加萨克伯克”(管理非穆斯林蒙古人的官员)，“塔尔罕伯克”(管理吐鲁番、哈密地区的官员)，“明伯克”(千户长)，“玉孜伯克”(百户长)，“吾尔钦伯克”(五十户长)，“温伯克”(十户长)等不同级别的官职<sup>①</sup>。

叶尔羌汗国的多种伯克制度是建立在当时非常兴盛的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

<sup>①</sup> 安瓦尔·拜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1010、1011页，民族出版社，1991。

汗国分给各级伯克 200—400 户农奴,以及 30—200 巴特曼的耕地<sup>①</sup>。

农奴在政治、经济上完全依附庸于伯克,必须将收成的九成交付伯克。除了农奴以外,叶尔羌汗国各级伯克都有被称为“依里克奇”(长工)、“嘎勒恰”(仆从)、“迪戴克”(女奴)的特殊的劳工,他们在政治、经济、人身方面完全依附于伯克,除衣食之外,没有任何报酬,他们的身份甚至可以传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叶尔羌汗国的官制已经比较系统和稳固了,官吏具有相当大的法定特权,反映出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的特点。

---

<sup>①</sup> 《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一四、卷三〇、卷七五。“巴特曼”原本是重量单位,此处用播种时需要种子的数量计算土地面积。



### 第三节 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经济文化

#### 一、农业及畜牧业

叶尔羌汗国时期,受以前战乱破坏的农业、畜牧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叶尔羌汗国建立后,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疆域内严重的经济衰败。尤其是在米尔咱·阿巴·乱乞儿长达45年的独裁统治时期,天山南部地区交通中断,商业萧条,城镇荒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他残酷压榨,很多农民背井离乡,致使农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

赛亦德汗掌握政权以后,吸取米尔咱·阿巴·乱乞儿政权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经济的措施。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宣布十年免征赋税。关于这一措施,楚刺思在《编年史》(拉失德史·续编)一书中记载:“米尔咱·阿巴·乱乞儿严重地毁坏了这个国家,速檀赛亦德称汗,公正地、宽宏地免除百姓们十年的负担。这十年的头五年中,士兵的供给由可汗的金库支付。到了第六年,金库空了,士兵的生活发生了困难,结果,向百姓们借债。头面人物们商议以后,在第六年就向可汗报告说,十年免税期已满。于是,又开始向百姓们征收赋税。”<sup>①</sup>

其次,推行向荒芜的农业区迁移居民、垦荒种田的政策。推行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及其干流特孜那甫河、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尼雅河、克里雅河、安德拉河、阿克苏河以及塔里木河流域出现了不少垦荒点和居民点。安德拉河流域的安德拉兰干,克里雅河流域的奥依托格拉克、莱苏,喀拉喀什河流域的朗如、扎瓦、雅瓦,叶尔羌河流域的艾色勒巴格、英阿瓦提,今巴楚境内的阿克塔木,阿瓦提、乌什、沙雅、库车境内的很多乡村,位于和田与莎车之间的叶城镇等

<sup>①</sup> 《编年史》,油印本,63页,新疆社会科学院;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维吾尔文),上编,第二册,768页,民族出版社,1987。

也都是当时出现的新的屯垦点和居民点<sup>①</sup>。小麦、豆类、稻米等谷类作物的耕种规模扩大,棉花、油菜、胡麻、芝麻、甜菜等经济作物也被广泛地耕种。

园艺业和蔬菜种植业也是叶尔羌汗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西瓜、甜瓜、葫芦、胡萝卜、水萝卜、蔓菁、韭菜、洋葱、辣椒、青菜、茄子、向日葵、苜蓿、无核葡萄、木纳格葡萄等多种优质葡萄,石榴、苹果、木瓜、梨、杏、桃、核桃、樱桃、李子、沙枣、桑、巴旦杏、阿月浑子等蔬菜瓜果品种也被普遍种植。叶尔羌汗国时期,随着农业和园艺业的发展,农业地区居民的庭院文化也得到发展。《西域图志》卷四三《土产·回部·百谷草木之属》中记载,居民庭院普遍栽培玫瑰、鸡冠花、千日红、凤仙花、吉祥草、大蜀葵等<sup>②</sup>。

再其次,重视兴修水利。吐鲁番、哈密、托克逊、库车和喀什噶尔附近,开凿了许多新的坎儿井,新建的乡村都挖通了水渠。据说,叶尔羌汗国第四代君主马黑麻(公元1591/1592—1609/1610年)时期,在喀什噶尔以南60公里处开凿过名为“汗艾日克”的一条大水渠<sup>③</sup>。

畜牧业在叶尔羌汗国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叶尔羌汗国境内的吉利吉思人、蒙古人、哈萨克人以及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区、阿尔金山麓的山地维吾尔人,都从事畜牧业生产。除此之外,天山南麓和塔里木河流域也是非常好的天然牧场,这些地区的畜牧业比较发达。农业地区居民也普遍从事家庭养殖业。因而,出现了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描述的“人畜两旺,辽阔的牧场已不敷用”<sup>④</sup>的景象。

## 二、手工业、矿业和冶金业

叶尔羌汗国时期,手工业蓬勃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也有了很大增长。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轮台等地是当时矿业和冶金业的中心。这些地区开采和加工金、银、铜、铁、玉、盐、矾砂、硫磺等矿产。这些矿产除了用来生产坎土曼、铁锹、镰刀、犁头等农具以外,还做成锯、钻子、刨、斧、磨盘轴、各种钉、马掌等工具和金属制品,制成剑、矛、短剑、月牙斧、箭头、盾、胄、火枪等兵器,此外,还有首饰加工业,生产各种金银饰品。

叶尔羌汗国时期,矿业和冶金业基本上由大汗控制,大汗将矿的经营权租给矿商。租赁期间,不经过租赁商的允许,其他人不得开采。租赁商廉价雇用劳工进行

①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维吾尔文),上编,第二册,768页,民族出版社,1987;安瓦尔·拜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1019页,民族出版社,1991。

②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维吾尔文),277,27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③ 安瓦尔·拜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1020页,民族出版社,1991。

④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第二编,30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开采。发达的矿业和冶金业,为手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手工业生产走向作坊化,生产技术也日趋精湛。当时,纺织、织毯、木器加工、石雕、铁器加工、铜制品加工、首饰加工、缝纫、印染、榨油、肥皂制造、理发、制陶、铸锅、手工制鞋、制刀、制锁等 10 余种手工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铸有较为优质的金币,用于国际商业流通中。新疆以及中亚地区、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地发现的相当数量铸有赛亦德汗名字的金币,为我们的上述观点提供了依据<sup>①</sup>。

### 三、商 业

恢复交通、发展贸易是叶尔羌汗国建立之初就已采取的重要经济复苏措施之一,因此汗国的对内贸易规模的扩大比对外贸易规模要快。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吐鲁番、哈密等城市成为当时主要的贸易中心。对此,17 世纪初曾经游历叶尔羌汗国的葡萄牙人在《鄂本笃访契丹记》一书中有具体的描述:“商贾如鲫,百货交汇。屹然为东方著名商场。”<sup>②</sup>这一时期,随着城市贸易的繁荣,各地出现了许多乡村集市,从而形成了乡村天天都有赶集日的现象。

叶尔羌汗国的手工业生产的目的,不仅是满足汗国内部的需要,也是为了同邻邦进行交换,换一句话说,就是发展对外贸易。随着对内贸易的繁荣,对外贸易也得到了重视。这一时期,由于战乱而荒废的丝绸之路重新开通,经过喀什噶尔通往河中地区的商路,被通往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拉达克商路”<sup>③</sup>所替代,同这些邻国的贸易往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来往于这些商路的商队络绎不绝。鄂本笃指出,在叶尔羌城和喀什噶尔城见到成群的喀布尔、克什米尔、印度商人在进行贸易<sup>④</sup>。

叶尔羌汗国也很重视同明王朝的贸易。鄂本笃说:“肃州城为西方商贾荟聚之地。西方有七八国与支那帝国素有协约。”<sup>⑤</sup>鄂本笃是跟随商队从拉合尔出发进入叶尔羌汗国,又跟随叶尔羌汗国商队去明王朝肃州的。他亲眼目睹叶尔羌汗国送往明王朝的珍贵贡品。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哈密、吐鲁番等地的人贡物品为:马、驼、玉石、青金石、金刚钻、镔铁刀、镔铁锉、各色小刀、梧桐碱、羚羊角、红绢道布、柳青撒哈刺禅衣、鞍子、诸禽皮等。上述内容说明,叶尔羌汗国时期商业得到了不断发展。

①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维吾尔文),上编,773 页,民族出版社,1987。

②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421 页。

③ 拉达克商路——经和田卡朗谷塔格(黑盲山)山口通往克什米尔的山路。

④ 安瓦尔·拜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1022 页,民族出版社,1991。

⑤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维吾尔文),284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 四、建 筑

叶尔羌汗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总体上较稳定,这使得各领域都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但是,在中亚(尤其是河中地区)蔓延成灾的苏非主义渗入叶尔羌汗国,依禅苏非派一时到处兴风作浪,结果从拉失德汗时起,包括传统维吾尔建筑艺术在内的各文化形态,都开始蒙上浓厚的宗教色彩——只重视建造和装饰清真寺、修道室(依禅苏非派首领进行半疯半迷的宗教活动的场所)、“先知”陵园等宗教建筑,而值得修建的许多建筑未被修建。在苏非派极端厌世主义思潮的控制下,叶尔羌汗国社会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百姓、手艺人放弃家业,成天到苏非、依禅们的修道室或“先知”陵园念“孜克尔”(伊斯兰苏非派半疯半迷的宗教活动)。当然,主张厌世主义的苏非、依禅们无力阻挡维吾尔文化总的发展趋势,叶尔羌汗国时期的建筑艺术在体现“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新的建筑典范。具体地说,有下面一些表现:

住宅建筑得到一定的发展。建筑结构上以土木为主,全木结构也占一定的比例。百姓住宅普遍采用天窗和雕花窗格,它们起到装饰窗户的作用。这一时期住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住宅同庭院及果园连成一片。建造住宅之前,先规划好庭院及与之相连的园林,种植各种树木,用树木环绕庭院。这就形成“民宅相望,房屋被茂密的园林环抱”<sup>①</sup>的景象。

富丽堂皇的汗国宫殿。叶尔羌汗国不再像它之前的汗国那样有冬都和夏都,而是一年四季专以叶尔羌城为国都。据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的描述,宫殿建于城堡之中,高30尺。城堡有六扇大门,非常结实。每一扇大门两边各有一阙,它们高高耸立在大门前方,任何人进入大门都必须穿过两阙之间。如果敌人攻打汗宫,会从前后左右受到夹击。宫殿旁有风景宜人的果园,夏天在果园里乘凉是保证身体健康的最好办法。宫里建有非常华丽的房屋,四周有近十个花园,中间有数座大建筑物。每一个建筑物有100间房子,房中摆有书架,墙上有壁龛,四壁及顶棚用石灰粉刷,贴在墙面的琉璃砖上绘有各种图纹<sup>②</sup>。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给我们表述的这座汗宫毁于叶尔羌汗国后期的两大宗教派别——“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战争中。据考证,其遗址在今莎车县城“奥尔达克勒”街道一带,宫墙及壕沟遗迹保存至今。

清真寺及其附属建筑群。叶尔羌汗国时期最显眼的建筑物种类之一是清真寺

<sup>①</sup> 《新疆地方史》(维吾尔文),第二册,423页。

<sup>②</sup>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第二编,2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及高级经文学校。根据史料记载,叶尔羌汗国范围内共有 573 所高级经文学校<sup>①</sup>。高级经文学校作为叶尔羌汗国时期的高等学府,多建于大城市中。比如,叶尔羌城的“米尔咱·海答儿高级经文学校”(也称为“扎罕高级经文学校”),叶尔羌汗国第八代君主阿布都拉汗(1639—1652年)于 1641 年在喀什噶尔创建的“汗国高级经文学校”,库车的“威里雅高级经文学校”,喀什噶尔的“凯里米雅高级经文学校”、“喀咱奇高级经文学校”,叶尔羌城的“穆罕默德雅高级经文学校”、“哈孜雅高级经文学校”、“阿尔斯兰巴格高级经文学校”,英吉沙尔的“吾里叶特高级经文学校”等。

高级经文学校多与清真寺一同建造。为了便于教学、学生的日常活动和祷告活动,课堂、阅览室、教师办公室、宿舍、沐浴堂、水塘或水井、果园、庭院等设施连为一体。例如,叶尔羌城的“赛亦德高级经文学校”为两层建筑物,共有 360 间屋。“米尔咱·海答儿高级经文学校”富丽堂皇,用熟砖建成,贴有琉璃瓦。据记载,该学校的塔很高,站到塔上可以看见 30 里开外的叶尔羌河。喀什噶尔的“汗国高级经文学校”也很雄伟,由大门、高塔、宣礼站台、外廊、内外庭院、前廊、房间等 7 个部分组成。大门高 3 米、宽 8.2 米,大门上方为教师备课、休息的房间,门楣上有用美术字镌刻的关于知识之重要性的格言。大门两侧有用雕刻图案装饰的、高达 13 米的塔,塔尖上装有镀金的新月。墙壁的 13 层以下用熟砖、以上用土坯砌成。学校总面积为 1468 平方米,有大小房间 50 间<sup>②</sup>。

除此之外,在清真寺、高级经文学校、修道室的附近以及各乡村,均建有各种供少年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经文学堂。据《拉失德史》记载,当时汗国境内有这类经文学堂 1690 所<sup>③</sup>。

带有前廊的清真寺是典型的清真寺建筑形式。据记载,当时汗国范围内有 585 所清真寺。清真寺厅堂的四壁、顶棚和门楣上除有各种雕刻图案以外,还有用阿拉伯风格的艺术字体写成的《古兰经》句段。高高的宣礼台带有圆顶,并以石膏花纹或者用砖砌成的各种图案装饰。这类清真寺中最为典型的有,叶尔羌城的“阿勒屯清真寺”(建于 1533 年)、“叶尔羌大清真寺”(扩建于 1638—1669 年)、“阿孜纳清真寺”等。

叶尔羌汗国时期曾经盛行为名人建造陵园(麻扎)。后来,在苏非主义的影响下,朝拜麻扎的风气日盛一日,竟出现了违背伊斯兰教教义的修建豪华坟墓的热潮,各地先后建起了许多富丽堂皇的陵园。有着极端封建思想的和卓和依禅们为了赢得百姓的崇敬,竟然歪曲《古兰经》和《哈底斯》(圣训录)中阐释的伊斯兰教教

① 哈吉·努尔哈吉、陈国光:《新疆伊斯兰教史》(维吾尔文),243 页,民族出版社,1994。

② 阿·买合苏提:《维吾尔族建筑史》(维吾尔文),256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③ 《新疆文艺》(维吾尔文),1988(1)。

义,说什么“真主将伟人们的陵墓作为了需求者的隐蔽之处。你们遇到困难而找不到出路时,请向神圣的陵园祈求帮助吧!”<sup>①</sup>他们号召人们朝拜麻扎,放弃世俗生活。这一倾向,虽然对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制约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就陵园建筑对维吾尔族建筑艺术的影响而言,仍然不失为一种文化遗产,还是值得一提的。

叶尔羌汗国时期最大的陵园是名为“阿勒屯鲁克”的汗室陵园,是1533年为了安葬叶尔羌汗国开国君主赛亦德汗而建造的。后来,又有拉失德汗、哈林汗、马黑麻汗、阿黑麻汗、拉提甫汗、阿布都拉哈汗等汗王及其后代以及汗妃阿曼尼莎罕等安葬于此。“阿勒屯鲁克”可以称之为叶尔羌汗国时期地下建筑的典范。其墓穴深3.5米,圆顶,四壁为清真寺祭坛形状,周围有若干拱顶房,死者都安葬在这些拱顶房里的墓穴中。陵园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由大门、清真寺、池塘、守夜室、坟场等部分组成。

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史学家、《拉失德史》一书的作者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的陵园。该陵园原址在今莎车县镇政府附近,即现解放军驻莎车炮兵营内。解放前后,由于该陵园被居民区围住,结果被拆毁。陵园原所在地,现今仍叫“海答儿巴格”。

这一时期建造的陵园中最为特殊的是“阿帕克和卓陵园”。该陵园坐落在今喀什市阔干乡海孜菜提村,总面积达49950平方米(75亩),包括高级经文学学校、大池塘、小池塘、阿勒屯大门(带有宣礼台的高塔)、华美清真寺、陵墓、蓝色拱北、诵经堂、阿孜纳清真寺、花园等部分。

作为“阿帕克和卓陵园”主要建筑物的陵墓室(大拱北)是叶尔羌汗国第九代君主阿布都拉哈汗时期,为了埋葬阿帕克和卓的父亲穆罕默德·玉苏甫和卓,于1640年建造的。后来,17世纪形成的“白山派”之著名教主阿帕克和卓等五代教主,共72人先后埋葬于此,形成很大的陵墓群。近代有香妃(阿帕克和卓的孙女——乾隆的妃子依帕尔汗)死后遗体从北京运回埋葬在该陵园的传说,所以该陵园也有人称之为香妃墓。后来,陵园被“黑山派”烧毁。1679年,阿帕克和卓凭借准噶尔汗国的势力篡夺叶尔羌汗国政权以后,扩建了该陵园。1693年,阿帕克和卓被毒死后即葬于此圆顶屋中。从此,该陵园被称为“阿帕克和卓陵园”,成为新疆的一处瞻仰胜地。据《新疆伊斯兰教史》一书记载,清朝统一新疆以后,1795年乾隆皇帝下诏保护此陵园,国库出钱对其进行维修和扩建,还赐给“灵位牌”。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清政府任职的图尔都之妻苏德香出钱对陵园进行扩建。图尔都因病去世以后,按照清政府之令,苏德香将丈夫的遗体运回喀什噶尔葬于该陵

<sup>①</sup> 《玛哈图木·阿杂木传》(维吾尔文);阿·买合苏提:《维吾尔建筑史》(维吾尔文),2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园中的“蓝色拱北之内”。<sup>①</sup>历史上“阿帕克和卓陵园”虽经多次修葺和扩建,但原建造形式没有多大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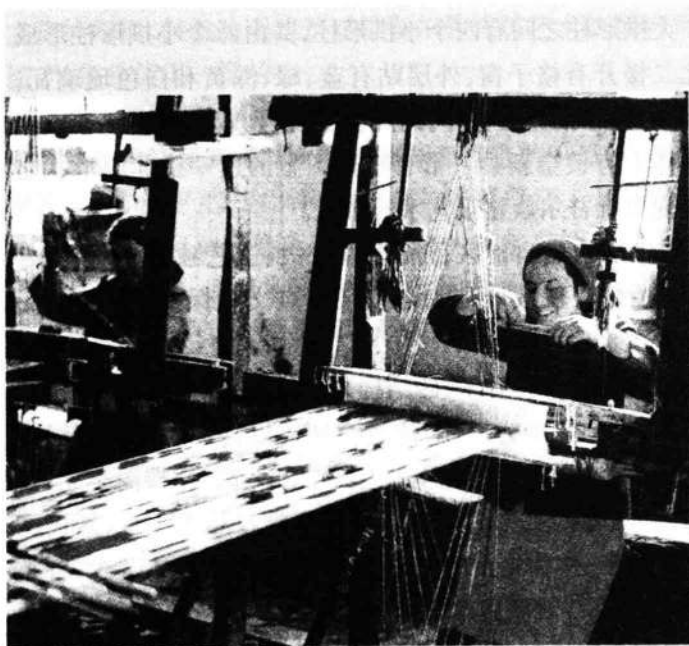
“阿帕克和卓陵园”中最具特色的建筑物“蓝色拱北”高 26.5 米,直径为 17 米,由四根大拱形柱撑起。大拱形柱之间有四个小拱形柱,共由八个小拱形柱形成球状,上面建有圆顶。拱北二楼开有格子窗,外层贴有蓝、绿、深黄和白色琉璃瓦,拱顶为绿色琉璃瓦。拱北下的大厅很宽敞,中间的高台上,排列着大小陵墓。大厅四角有四个高塔,塔顶的球体上有镀金新月。带有雕刻图案的这一拱北以形状之美丽,结构之复杂、牢固,展现出维吾尔族建筑艺术的特点。

“阿帕克和卓陵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目前规模较大、工艺独特、保存较好的古陵园之一,1957 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总之,叶尔羌汗国时期的建筑艺术具有木、砖结构,拱形圆屋顶的结构形式,其工艺将木工、石膏、雕刻、贴瓦、绘画等融为一体,建筑物种类以宫廷、清真寺、经文学校、陵园建筑为主。作为叶尔羌汗国的首都,叶尔羌城“高塔、高台、楼阁林立,清真寺、经文学校及其宣礼塔、拱北随处可见。城乡高级经文学校达 573 个,居民区清真寺达 585 个,居民区达 3784 个,作为集市的街道达 424 个,浴池达 437 个,各类学堂达 2263 个,驿站、客栈达 1736 个,池塘达 835 个,大集市达 198 个,各种手工业作坊达 1564 个”<sup>②</sup>。汗国全国有 9 座大城市,36 个城门。这些数据表明,叶尔羌汗国时期的建筑艺术,在规模上不断扩大,技术质量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sup>①</sup> 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麻扎》(维吾尔文),24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sup>②</sup> 《新疆文艺》(维吾尔文),1988(1)。



艾德莱斯绸织工



美丽的艾德莱斯绸制作的衣裙



## 第四节 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社会文化

**叶**尔羌汗国的社会文化,基本上是喀喇汗朝时期兴起、十五六世纪达到高峰的伊斯兰化维吾尔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叶尔羌汗国的社会文化同察合台汗国前后两个时期文化的区别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更多的是在汗国境内各民族内在特点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族吸纳了已经完成伊斯兰化的蒙兀儿楚刺思、朵豁刺惕等部落,成为叶尔羌汗国最主要的民族,维吾尔族的文化作为一体化的混合型文化,也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另一方面讲,叶尔羌汗国初期社会相对稳定,这就为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叶尔羌汗国的君主大多为文人、艺术家,他们执政时期很注重以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为标志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下面,我们也就这几个方面,对叶尔羌汗国的社会文化作一简要介绍。

235

### 一、教 育

叶尔羌汗国时期教育事业得到了重视,汗国各城镇出现了许多高级经文学校及其他学校。其中,拉失德汗时期设立于喀什噶尔的“汗国高级经文学校”,扩建于叶尔羌城的“阿克高级经文学校”,阿克苏的“拜图拉高级经文学校”,库车的“萨克萨克高级经文学校”等是当时最大的高等学府,其经费由国库拨出。各县乡经文学校由瓦合甫(寺院不动产)收入及什一税和天课供给。这些经文学校大致开设有穆斯林言行常识,《古兰经》及《哈底斯》阐释,伊斯兰教原理,伊斯兰教原理注解,《哈底斯》摘录,伊斯兰教法基础,《哈底斯》、《古兰经》词句等宗教课程以外,还设有伊斯兰教史、世界历史、逻辑学、语言学、语法、历法、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代数、医学、书法、文学、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等课程。这些高等学府的教师们除母语——维吾尔语以外,还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时的初级和中级经文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海里法提(掌学,经文学校里主管学习的人)、哈提甫(训诫者)、伊玛目(率领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人)、麦曾(清真寺宣礼员)等。高级经文学校则培养大毛拉、艾拉穆、穆甫提(伊斯兰神学家兼法学家)、哈孜等。根据

史料记载,拉失德汗时期,来自伊拉克、大不里士(在伊朗)、设拉子(在伊朗)及中亚花刺子模、撒马尔罕、安集延、巴尔赫、赫拉特,甚至伊斯坦布尔等地的求学者,在柯迪尔汗·叶尔坎迪(1562年去世)执教的“阿克高级经文学校”就读<sup>①</sup>。叶尔羌汗国时期的不少文学家、史学家、翻译家和阐释伊斯兰教典籍的专家及其他领域的学者都是由这些高级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

## 二、文 学

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文坛一度成为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苏非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激烈战场。众所周知,当时苏非派内部存在相互完全对立的两个哲学派别,即代表进步思潮的“世俗派”和以狂热的依禅们为代表的“厌世派”。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在当时的文学艺术领域内得到充分展现。在赛亦德汗和拉失德汗执政时期,“世俗派”所代表的进步思潮占据上风,为当时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另一方面讲,自喀喇汗朝时期开始的维吾尔文学之“黄金时代”和作为该“黄金时代”之延续——以纳瓦依为代表的察合台维吾尔文学所掀起的维吾尔诗学浪潮,在叶尔羌汗国时代也未终断其发展的连贯性。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这些文学家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展现出维吾尔语不竭的生命力。尤其在阿帕克和卓为首的“厌世派”分裂暴动使叶尔羌汗国走向瓦解的时期,出现了赫尔克提(1643—1724年),翟黎里(1674—1759年),诺比提(1690—?)等忧国忧民的大诗人。他们以富有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向黑暗的社会发起攻击。由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劳苦大众的一分子,因此,在其文学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社会下层劳动人民受苦受辱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对赛亦德时代的怀念和对和卓、苏非们的愤恨。

总之,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文学虽在语言的华丽程度上不及察合台维吾尔文学,但在真实地表现现实社会现象这一点上,则大大超过了它以前的文学。

下面,我们对叶尔羌汗国时期较具代表性的几位文学家进行简要的介绍<sup>②</sup>。

### 1. 赛亦德

赛亦德(1485—1533年),全名阿布勒·法惕赫·速檀·赛亦德,察合台王族后裔,其父速檀·阿黑麻是秃黑鲁·帖木儿汗的第六代孙,曾领有蒙兀儿草原。赛亦德12岁时随父出征月即别,16岁时进入吉利吉思地区,被推为首领。1514年在表兄巴布尔的帮助下,翻越帕米尔,攻克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等地。1514年9月在叶尔羌称汗,建立了叶尔羌汗国。在位期间,汗国内大治,社会安定,民心

<sup>①</sup> 伊赛木图拉·尼木图拉:《乐师传》(维吾尔文),34页,民族出版社,1984。

<sup>②</sup> 以下的论述多参照周绍祖等著:《西域文化名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沙漠边缘樵夫的晚归

归顺。有一首民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单身带着一坛金，独自安然东西行，汗德化民不不乱，四境无不保安宁。”<sup>①</sup>他在位时多次出征，夺取了锡尔河上游和八达哈伤地区，扩大了汗国版图。1533年出征克什米尔途中因高山病去世。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评价他：“品学兼优，为人无可非议。他的谈吐文雅，不论操波斯语或突厥语都非常流畅。”“他的英勇也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箭法极为高超，据我所知，在蒙兀儿人、月即别人或察合台兀鲁思中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曾见过他连射七八箭，箭箭中的。”<sup>②</sup>

赛亦德不仅是叶尔羌汗国的君主，而且多才多艺。关于他的学识才华，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写道：“这位汗诵读文章之正确，也是我从没听说过的……他写波斯字体阿拉伯字非常漂亮，他拼写的突厥语和波斯语都毫无错误。他用突厥语写书信写得很好……他的诗雄劲有力，也是罕见的。他作诗决不暗自吟诵，而是在集会上或庆典上朗诵；如果旁边打开一本诗集，并给他规定了韵脚，他可以即席成吟。这位汗精于琵琶、三弦琴、四弦琴和伽恰克，最精的还是四弦琴。他精通骨雕艺术，善于制箭。”<sup>③</sup>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赛亦德是王位上的诗人，还是一位乐师。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还指出，赛亦德作诗多在集会上吟诵，不让别人抄录。他很少用波斯文创作，多用维吾尔文创作。因为赛亦德不让别人抄录自己吟的诗，因此，他的诗未能集结成诗集传世。现有的两首诗是米尔咱·马黑麻·海答

①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2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②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361—36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③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362—3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儿根据自己的记忆辑入《拉失德史》的,下面是其中一首:

哪一座花园里会有你这样美丽的花朵?  
哪一束鲜花前会有我这样的百灵鸟唱歌?

据说天山仙女唱歌能使人心底快活,  
但投入了对情人的爱千倍于天仙之乐。

你的每一呼吸,给人以启迪,  
你的双眉更使人心胸开阔。

你的一句话能使死人又复活,  
你的樱唇更是治病的万能良药。

这是一首格则勒诗,以爱情为主题,抒发作者热爱现实生活,向往幸福快乐的未来世界的热情洋溢的思想感情。诗中用“情人”同“花朵”,“花朵”同“百灵鸟”,“仙女”同“天堂”的彼此关系,把情人的美丽姿态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美女的形象实际上象征着美好的人生,诗人号召人们不要放弃这美好人生,认为你爱她,她会给你灵魂,给你生命,给你幸福快乐。这就是诗人的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

赛亦德这两首格则勒诗是用典型的察合台维吾尔文学语言写成的。从词语的锤炼来看,他确实是一位精通波斯语和维吾尔语的语言大师。其修辞技巧使人心服,拍手叫好。

## 2. 拉失德

拉失德(1509—1560?年),又译拉希德、拉施德、热西德等,全名阿布都·拉失德,他是叶尔羌汗国开国君主赛亦德汗之子。楚刺思在他的《拉失德史·续编》一中写道:“拉失德汗秉性温良、书法精湛,是用波斯语和突厥语写诗的至善至美的诗人……除已故的君王赛亦德汗之外,在蒙兀儿人、月即别人或察合台兀鲁思中,再无箭法比他更好的人了。”<sup>①</sup>

据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记载,赛亦德十分喜爱拉失德。从3岁起,先后指定异密·忽里·巴鲁刺思和他的叔父阿里·米刺黑·巴鲁刺思汗和大毛拉马黑麻·失刺思为其老师。这些老师都是学识渊博、品格高尚的大毛

<sup>①</sup> 周绍祖等编:《西域文化名人志》,230—23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拉,其职责是照管和教诲拉失德。在他们的精心教导下,拉失德逐渐成长为一位能文能武的全才。13岁时,曾被委以管理蒙兀儿斯坦的重任,后来又跟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出征几次,学习战略战术,最终成为一位上马统军、下马参政的领袖人物。1533年,赛亦德去世,拉失德继承父位,成为叶尔羌汗国第二代君主。执政达38年。

拉失德在位期间,叶尔羌汗国境内政治形势比较安定,经济开始恢复,加之拉失德汗本人热心于文学,促成了叶尔羌汗国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叶尔羌不仅是汗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许多逃离家乡的文人、学者返回故乡,从事学术、文学艺术活动。拉失德曾不顾守旧的宗教势力的反对,保护和支柯迪尔汗和王妃阿曼尼莎罕搜集和整理木卡姆套曲,为保存这一民间文化瑰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拉失德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王位上的诗人,据《拉失德史·续编》记载,他的诗作不少,曾有《拉失德诗集》和《拉失德格则勒诗集》两个短诗集和《斯拉丁纳曼》、《麦许克纳曼》两部长诗。可惜未流传下来,仅有一些片断因被《拉失德史·续编》引用而保存至今<sup>①</sup>。其中一首诗写道:

高居于华贵宝座而不可一世的君主,  
死期来临时不比贫穷者有何优越。  
拉失德,哪座花园的花朵不曾凋谢?  
你万不可在人间的花园中迷痴惑惑。

上面的引诗说明,作为君主的拉失德,能把君主和贫穷相提并论,告诫自己不可骄奢淫逸,是难能可贵的。这流露出作者平等、公正的思想。事实上,拉失德身为汗王,迎娶樵夫的女儿阿曼尼莎罕为妻,本身就是他所主张的平等思想的实践。诗人作品的另一主题是歌颂男女青年的爱情。如:

晨风啊,带去我心中的秘密吧。  
请向我的情人送达我的问候。  
清晨或黄昏你接近她的身边,  
请转述我对她朝夕不断的思念。

这首诗歌颂爱情,表达他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快乐美好未来的愿望。实

<sup>①</sup> 周绍祖等编:《西域文化名人志》,23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际上,他为了爱情,曾不顾舆论的反对,追求阿曼尼莎罕并娶她为妻,这就是对封建思想的背叛。

从以上引用的两首诗的片断可见,拉失德的诗歌语言优美,通俗易懂,文意流畅,意境深远,形象感人。

### 3. 阿亚兹别克

阿亚兹别克,又译阿亚孜比克,全名阿亚兹别克·阔什奇,叶尔羌汗国时代著名维吾尔族诗人,生卒年月不详。“阿亚兹”是其本名,别克是其官名,曾在赛亦德和拉失德两代汗王的宫廷里任职,为叶尔羌汗国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许多努力。(今一说,他即是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

关于阿亚兹别克的创作生涯和诗作,没有完整的记载。已发现的作品有《世事记》(又译《加罕纳曼》)一篇长诗。

根据阿亚兹别克在《世事记》中的有关自述,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曾在1510年左右,在安集延地区度过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1512年投奔赛亦德,1514年跟随赛亦德到喀什噶尔。大约20年以后,参加赛亦德的军事行动,到中亚八达哈伤地区,并在那里完成其代表作《世事记》。

长诗《世事记》作于1533年,采用当时最流行的马斯纳维双行诗体,计64章,2650行。按照当时长诗的写作惯例,其中有60行用来赞颂真主、穆罕默德先知及其四大贤助。160行是序言,说明作者的创作目的。正文由2399行诗句组成。最后的32行是尾声,抒发作者的感情,寄托他的希望。

《世事记》的故事梗概:很久以前有个夏热亚尔王国。国王叫夏司瓦尔,因为膝下无子,感到非常痛苦。夏司瓦尔国王年近200岁时忽然喜得贵子,他高兴万分,给王子取名菲鲁兹曼。王子很快长成了一位堂堂男子汉。一天晚上,王子酒后酣睡,做了个美梦,梦中来到一座美丽的百花园,在那里见到很多美女和一个名叫热娜的绝色美人。热娜与他饮酒、谈心,王子对热娜一见倾心……可他醒来后什么都不见了,周围一切依旧。从此王子害了相思病。按照王子的要求,国王带王子去打猎。王子看见一只黄羊,为追逐那奔跑的黄羊,来到一个地方,仔细一看,竟是梦中所见的那个百花园。花园里的美女们把王子带到热娜身边,王子一见热娜就昏倒了。王子清醒过来,向热娜求婚。热娜提了一个条件,要求王子在她睡着的时候,用具有深刻哲理内涵的言论三次使她醒转过来,她就接受王子的爱情。王子答应了她的条件。

热娜第一次入睡后,王子和她的宝座谈话,宝座对王子述说了自己的全部经历。宝座的经历感动了热娜,她醒过来了。热娜第二次入睡后,王子和石头酒杯谈话。石杯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热娜听了石杯的故事,再次受感动醒转过来。热娜第三次入睡后,王子和宫里点燃的蜡烛谈话,热娜被蜡烛的故事感动,第三次醒过

来了。于是热娜答应和王子结婚。正当王子和热娜欢天喜地地喜结良缘之时,王子的母亲因想念儿子而去世。国王打听不到儿子的下落,感到十分悲伤。这个情景有一天被王子梦见,于是王子带热娜回到故乡,父子团聚,夏司瓦尔国王传位给儿子后去世。菲鲁兹曼登基,做了150年国王。热娜先他辞世,菲鲁兹曼把王位传给儿子,弃绝人世之乐,过着孤独生活。有一天,他又遇见了当年给他带来奇遇的那只黄羊,他跟着黄羊又来到那个百花园。可是花园里什么都不存在了。

《世事记》是阿亚兹别克的代表作,表现了他对人世诸事的哲学思辨和深刻认识。这部长诗首先表现了阿亚兹别克朴素辩证的哲学观点。他叙述宝座、石杯、蜡烛的故事,借此说明自己对世界运动和发展变化的必然性的看法。在他看来,世上的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是一条必然规律。生存、兴旺、欢乐、相会不是永恒的,生而有死,兴而有衰,乐而有悲,合而有离。而这一切均以流畅隽永的诗句来表述:

快乐的花园里吹来妖风,  
搞的是吹走落花的把戏。  
春天被秋天代替,  
令花朵花瓣全都飘散。  
离别用大限之幕盖住自己的脸,  
幽会的日子变得夜一般黑暗。  
.....  
世界上有生存,必然有死亡。  
也有诀别的痛苦煎熬。

长诗所塑造的国王夏司瓦尔、王子菲鲁兹曼、热娜公主的形象,所讲述的他们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作者在序言中叙述的自己的经历,都是为了用形象化的手法证实他关于世界不断发展变化的看法。其次,阿亚兹别克还强调学习知识的益处,提倡敬重博学多才的人,主张处理国家大事要公道,为人民做好事,人要珍视自己的一生、要珍惜时间等进步的观点。

这部长诗中还有写史的成分。阿亚兹别克在序言中记叙了赛亦德从巴布尔那里到达安集延地区,统治安集延,之后又进攻喀什噶尔并建立叶尔羌汗国,进攻八达哈伤地区,把这一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历史事件。

综上所述,《世事记》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突出地表现了阿亚兹别克对世事诸事的哲学思考,是一部包含深刻哲理、有一定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作品,为今人研究叶尔羌汗国时代的社会状况,了解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由于《世事记》从民间传奇故事中选取素材,大大增强了叙事性,使作品有了很强的感染力。让故事本身来说话,就避免了枯燥乏味的长篇说教,提高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做到了抒发感情与叙述事件相结合,长篇叙述与精辟归纳相统一。

由于阿亚兹别克在这部长诗中巧妙地运用了对称的韵脚,使长诗的语言有了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这部作品较多地保存了古代维吾尔语的原貌。

#### 4. 赫尔克提

赫尔克提(生卒年不详),又译海尔克特,全名穆罕默德·伊明·和卓库力,依维吾尔族姓名惯例,穆罕默德为本名,和卓库力为父名,赫尔克提是笔名。“赫尔克提”一词源自阿拉伯语,意为“破衣”或“衣衫褴褛之人”,意在表明他是寒门子弟。赫尔克提还有一个笔名叫“古穆纳木”,意为“无名”或“佚名”,相当于汉语中的“无名氏”。这个笔名始见于《古穆纳木诗集》手抄本。这个手抄本是1957年在新疆莎车县发现的,原件是一部首尾不全的手抄本残卷。1963年,诗人铁依甫江曾将其中的一部分格则勒诗加以整理,在《新疆文艺》上刊布,自此“古穆纳木”开始为世人所知。但是由于诗集的写作风格与赫尔克提相似,诗集中有一联语句提及作者的父亲名叫“和卓库力”,与赫尔克提的父名相同,自然产生了赫尔克提与古穆纳木究竟是什么关系的疑问。1981年,米尔·苏里唐先生在《源泉》(布拉克)杂志第5期上撰文,提出古穆纳木与赫尔克提是同一个人还是亲兄弟的论题;1986年,他又在第18期《源泉》上撰文进一步提出古穆纳木同赫尔克提可能是亲兄弟的设想,但需要更为确凿的证据。1991年,艾则孜·艾力在第36期《源泉》上发表文章,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乌兹别克斯坦的《东方之堡》杂志在1990年第8期上刊布了伊沙克·伊本·孜亚吾敦于1719年写成的《凯兰代尔传》的片断。其第三部分中明确记载赫尔克提还有个笔名是古穆纳木。至此,这个悬案得以解决,赫尔克提与古穆纳木实为一人已成维吾尔文学界的共识。

关于赫尔克提的生平及创作,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极为有限,仅知道他于17世纪后半叶生于喀什噶尔塔孜洪地方巴鄂奇村。赫尔克提的父亲和卓库力是当地一名果农,精于园艺,远近闻名,曾因此被征入喀什噶尔白山派宗教领袖阿帕克和卓的庄园管理园林,充任杂役。

赫尔克提幼年时期就读于巴鄂奇村经学堂,稍长即去喀什噶尔城沙吉亚经文学院继续深造。他在沙吉亚经文学院读书的16年中,除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维吾尔文、历史、地理、逻辑外,还研读了维吾尔古典文学诗人纳瓦依、鲁提菲、赛卡克,东方诗人尼扎米·甘吉维、阿布都拉赫曼·加米等诗人的诗歌作品,使他对维吾尔文学和东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便以“赫尔克提”为笔名,写一些短诗,锤炼诗艺。

他于沙吉亚经文学院毕业以后,返回巴鄂奇村,投笔务农,向父亲学起园艺来



了。他在自己的著作里一口气描述了数十种花木,如果没有丰厚的生活做底子,这是不可想象的。

各式各样的玫瑰,有红、有绿、还有黄,  
鸣禽绰绰,蝶影乱,轻吐声音的蜜浆。  
芙蓉花捧出一盅盅殷红美酒芬芳,  
待端详,她偏偏头把水灵灵目光躲藏。  
什么罗兰、水仙、紫苏,样样都有,  
秘鲁蔷薇、蝶恋花,默默爬墙头。  
什么琥珀黄,还有真纳和百合,  
什么荷花、茉莉,以及金钟倒座。

赫尔克提随父被征入阿帕克和卓的府内充任杂役,先后当过园丁、司灯、烤羊肉厨师等。“在阿帕克和卓的庄园里,赫尔克提亲眼目睹了宗教上层分子相互倾轧,尔虞我诈的卑劣行径,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劳作之余,奋笔疾书,将心中的愤懑诉诸笔端,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sup>①</sup>

赫尔克提一生写了许多诗歌作品,但传世的仅有长篇叙事诗《爱情与劳动》(又译《爱苦相依》)和《古穆纳木诗集》。《爱情与劳动》的手抄本共207页,分27章,约2000行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共两章,阐述“爱情”一词的微言大义;第二部分描写飞蛾和蜡烛的爱情;第三部分是作品的主要部分,描述玫瑰和百灵的爱情。用拟人手法,塑造了玫瑰、百灵、晨风三个文学形象;第四部分是作者的抒情尾声。

概括地讲,在这首长诗中诗人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自己向往光明,追求自由的思想。通过塑造文学形象玫瑰、百灵、晨风,揭露了封建主义制度的丑恶本质,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追求平等、自由、幸福美满生活的美好愿望。

诗人在这部作品里,创造出许多正面的光辉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克提在这部长诗中塑造的三个拟人化的文学形象。“晨风”是忠诚、友谊、善良、勤劳的化身。他以解除他人痛苦,帮助他人获得幸福为快乐,是一个以助人为神圣使命的理想形象。他又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所以能分辨好坏,宣传公平人道。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晨风”正是诗人自己的形象,象征着诗人向往光明、正义、友谊和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美德。“晨风”为了帮助“玫瑰”和“百灵”吃了很多苦,这说明诗人的性格里有对当时封建社会的反抗精神。“玫瑰”心地善良,充满信心和希望,

<sup>①</sup> 译文引自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铅印本,西北民族学院,1992。

是忠于爱情的形象,象征着光明和正义。“玫瑰”对爱情的看法是很进步的,她严于律己,有自我批评精神。诗人通过“玫瑰”的形象,表明了自己向往光明,追求幸福和自由生活的观点。“百灵”在性格上既忠诚又大胆。他珍视爱情,在“晨风”的帮助下,见到了“玫瑰”而且爱上了她,但又害怕“玫瑰”的刺,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后来他在“晨风”的帮助下,终于得到了“玫瑰”的爱情,表明当时下层劳动人民追求爱情,追求正义的愿望。除了这三个主要形象外,诗人还提及“一株玫瑰”这样一个反面形象,虽然很漂亮,但没有花的香味,骄傲自大,看不起任何人,内心很空虚,对爱情的态度很粗俗,很丑恶,象征趋附统治者的庸俗之辈。诗人通过“一株玫瑰”表现了他对当时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鄙视。

赫尔克提继承了维吾尔文学的长诗创作传统,并加以发展,巧妙地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象征、比喻、夸张、拟人、反复等,大大提高了长诗的艺术水平。长诗的语言生动、形象,是17—18世纪维吾尔文学语言的典范。

维吾尔文学自从有了赫尔克提便开始超脱出宗教束缚,汹涌向前,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深邃了。在他以后,许多诗人、作家,不但继承了他的诗风,而且还各领风骚,往更深更美之处发掘。例如翟黎里得其事理,纳吾拜提得其浓艳,尼扎里取其动作。赫尔克提的诗在挣脱了宗教的牢笼之后,不但敢于言情抒志,走上重情主义的道路,在尾声里,作了充分的演述,而且还敢于面对当时社会上的价值观念,挺身而出,进行挑战。

《古穆纳木诗集》是赫尔克提署名“古穆纳木”的一部短诗集。现存一个写本残卷,前后和当中都有缺页,仅存109页。其中有格则勒85首,木哈麦斯3首,柔巴依25首,另有以塔尔吉班德格式写的198行诗。

辑入《古穆纳木诗集》的大部分格则勒以爱情为题材。诗人借此表现他对故乡的爱,表达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赞美真诚、纯洁的爱情,抒发对恋人的思念和渴望见面的心愿,歌颂情人的美丽和忠贞的爱情,阐明他本人的伦理哲学观点。在一部分格则勒中,诗人用讽刺性的语言批评了那些引导人们走上厌世之路的保守顽固的苏非派和禁欲者。

对爱情的忠实和献身精神是诗人在他的格则勒中热烈颂扬的主题之一。他认为“渴望和恋人见面的人,如果他不是胆小鬼,由于天天遇到苦难放弃自己的生命,而绝不要放弃自己的情人;情人如果是个忠实的人,绝不留意美丽的仙女,他会放弃天国的仙女”。诗人在这里一方面歌颂了忠实的爱情,另一方面体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美,特别是女性的美,高于天国仙女之美。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题为《喀什噶尔》的格则勒是最能体现爱国之情的优秀篇章。他在这首格则勒中满怀豪情地赞美了他的故乡,表达了对故乡的热爱。他认为“喀什噶尔是个无价之

宝,喀什噶尔这个地方比罗克纳巴提泉和木萨拉蔷薇花坛还可贵”,“他的石头,尽是珠玑”,“喀什的芙蓉,比天国之花更芬芳”,“行乐人,从荆棘丛也能发现馥郁”,“厥田为稀世之玉,厥水甘如天国之水”,“谁来到喀什,神往喀什美人,天堂美人也看不上眼,最后连同自己的故乡全忘记干净”。在另一首格则勒中他这样写道:

我呀,并不需要去天房朝觐访胜,  
喀什有的是麻扎,擦眼土药够用。  
睫毛可为帚,扫净那大片的广场,  
倾洒泪水,在这儿建起天堂来礼歌。

讲到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文学创作,首先应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以阿帕克和卓为首的“伊斯哈克派”(即白山派)篡夺政权,使叶尔羌汗国灭亡以后,在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文学活动之影响下,又出现了许多文学家。他们的创作,虽然从时间上讲,不属于叶尔羌汗国时期,但就艺术传统、文风及内容而言,同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举出著名的抒情诗人翟黎里(1674—1759年),和卓·加罕·阿尔希(1685—1756年),哈拉巴提(1638—1730年),萨拉依(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生活在喀什噶尔),诺比提(1692—?),毛拉·艾拉穆·沙雅里(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生活在沙雅)等几十位诗人及其表现当时现实生活的长诗和诗集。

第二,这一时期,翻译、传记创作以及对东方优秀的民间长诗和故事进行维吾尔化的再创作等活动蓬勃发展。在没有印刷条件的情况下,人们用维吾尔文迅速抄传前人创作的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名著。比如,以手抄本形式保存至今的叶萨维(1166年去世)的《叶萨维箴言集》(《霍加·艾赫买德·叶萨维诗集》),阿塔依(15世纪上半叶)的《阿塔依诗集》、鲁提菲(1465年去世)的《鲁提菲诗集》《古丽—纳吾鲁孜》长诗,赛卡克(1468年去世)的《格则勒诗集》,纳瓦依的《纳瓦依诗歌》,福祖里的《福祖里诗集》等都是在叶尔羌汗国时期被传抄的。此外,纳瓦依的《五卷书》中名为《斯坎德尔的城堡》的长诗被佚名作者改编成散文体,以《散文体伊斯坎达尔书》一名问世。巴布尔的《巴布尔传》被改变为格则勒诗体,以《巴布鲁木》一名问世。拉勃胡兹著于1310年的《先知传》,被佚名译者从波斯文译成维吾尔文,以《拉勃胡兹故事集》一名问世。艾尔卡什菲的《凯里莱与戴米乃》,被毛拉·穆罕莫德·托木里译成维吾尔文。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用波斯文写成的《拉失德史》,由佚名译者译成维吾尔文。此外,由哈万德·沙赫·伊本·马合木德·米尔洪德用波斯文写成的历史著作《清乐园》,被米尔法孜勒译成维吾尔文。

总之,这一时期从阿拉伯文、波斯文、印度文译成维吾尔文传抄的文学、史学、

伦理、地理及医学等领域的著作非常多。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对于叶尔羌汗国文化的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因而,这些领域中取得的成果,作为叶尔羌汗国时期繁荣的文化之组成部分,也有必要为之书写一笔。

### 三、木卡姆文化

叶尔羌汗国时期最大的文化成果,当推木卡姆艺术。我们在前面曾简要地介绍过在维吾尔族皈依伊斯兰教前后,木卡姆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但木卡姆艺术融入真正意义上的维吾尔文化因素,得以整理和形成体系,却是在叶尔羌汗国时期。关于这个问题,布哈拉音乐家达尔维希·艾里·羌写于1572年的《音乐册》;1823年,在印度穆斯塔法阿巴德城编纂的《格雅斯词典》之有关条目;1854年,由和田人毛拉·伊赛木图拉·本·尼木图拉·穆吉孜编写的《乐师传》;1541—1545年,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写成的《拉失德史》;1696年,由沙·马合木·楚刺思著成的《编年史》(《拉失德史·续编》);毛拉·米尔萨里赫的《成吉思汗传》等著作中都有较翔实的阐述。尤其是穆吉孜的《乐师传》一书,尽管它也像其他传统史书一样,带有部分传说色彩,但仍不失为全面介绍叶尔羌汗国时期木卡姆艺术之全貌的、唯一的、非常珍贵的史料。《乐师传》在介绍世界音乐大师的过程中,尤为突出地表现了法拉比、纳瓦依、阿曼尼莎罕、柯迪尔汗·叶尔坎迪等木卡姆艺术家的功绩,对维吾尔族木卡姆史上的这些功臣,表达了崇高敬意。该著作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唯独它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木卡姆艺术家阿曼尼莎罕及其导师柯迪尔汗·叶尔坎迪丰功伟绩的确切史料,然而由于叶尔羌汗国宫廷内部“正义派”同“蒙昧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以及后来和卓、依禅们无休止的发难,他们曾一度被人们遗忘。

#### 1. 阿曼尼莎罕

阿曼尼莎罕(1534—1567年)是叶尔羌汗国第二代君主拉失德的王妃,女诗人,音乐家。本为民家女,生于特孜纳布河畔的库米西村(今麦盖提县境内)一个贫苦樵夫家庭。其父是民间艺人。阿曼尼莎罕8岁丧母,靠父亲马赫木提打柴为生。幼年时曾入学读书,后随父学习弹唱。据《乐师传》记载:阿曼尼莎罕是拉失德的后妃,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女诗人。著有《娜斐斯诗集》,书法技艺高超,音乐方面也具有极高的才华,因此,拉失德对她一见钟情。她除了著有《娜斐斯诗集》外,还著有以教育妇女为内容的《美德训》和《心声解说篇》。她还创造了一曲木卡姆。34岁时,因难产去世<sup>①</sup>。

阿曼尼莎罕在搜集、整理、汇编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套曲过程中立下了不

<sup>①</sup> 周绍祖编:《西域文化名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朽的功勋。在阿曼尼莎罕的影响下,拉失德将流散到各地的乐师、歌手、诗人召集入宫,由阿曼尼莎罕和柯迪尔汗带领他们收集民间流传的《木卡姆》诸乐章,并加工整理,汇编成16部乐章。

阿曼尼莎罕的上述三本书(包括《娜斐斯诗集》)没有流传下来,她仅有的几首诗记录在《乐师传》中,其中还夹杂着动人的故事:传说拉失德领着大臣和将领从叶尔羌出发,沿着塔里木河到塔克拉玛干去打猎,在那里扎营住了几天。拉失德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处,穿上破旧旧服装扮成农民模样,在夜里以投宿者的身份住到偏僻地方的穷人家,借此检查官兵是否欺压百姓。有一天,拉失德领着叫艾克来木的一名仆人来到了一所破烂不堪的房子。这房子里住着名叫马赫木提的以打柴为生的老人。后来的王妃就是这位老人的女儿。拉



阿曼尼莎罕

失德发现屋角放着弹布尔,要求马赫木提弹奏。马赫木提道:“我不会弹,我的女儿让我买的,她会弹。”拉失德说:“那么让女儿弹吧!”马赫木提令女儿弹奏。姑娘拿起弹布尔弹起潘吉尕木卡姆,使拉失德十分吃惊。姑娘弹起自己作词的木卡姆时,拉失德被爱情陶醉了。

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要遭我们的主啊,万分感谢你。  
你把一个公正的人封为一国之王。  
阿布都·拉失德汗为穷人遮住了灼体的炎阳。

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娜斐斯啊,要对神圣的主发誓,  
如若不为公正的国王祷告,就受无情的惩罚。

姑娘弹奏完毕,拉失德焦急地问道:“娜斐斯是谁?这首格则勒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姑娘答道:“别人的格则勒也用得着背下来吗?我只读纳瓦依、福祖里、翟黎里的诗,别的诗不读。这一首诗是我自己作的,娜斐斯是我的笔名……”阿曼尼莎罕站起来,拿起自己作的几首诗给拉失德看,拉失德发现她的书法和她的面容一样美。拉失德不敢相信这么年轻的女子能写出如此美妙的文字,说道:“请吧,当着

我的面写一首诗给我看一下。”姑娘拿起笔，写下了以下的诗：

真主啊，你的奴仆在怀疑地看着我，  
今晚这屋子长出了刺，在逼着我。

拉失德看完诗，笑着说：“我信了，请别嘲笑我。”说完就走了。

上述几首诗表明，阿曼尼莎罕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诗人。

## 2. 柯迪尔汗

柯迪尔汗(?—1572年)<sup>①</sup>，全名玉素甫·柯迪尔汗·叶尔坎迪，叶尔羌汗国时期的著名音乐家、诗人。据《乐师史》记载，他在音乐方面的技艺超群，四方罕见，喜读纳瓦依之格则勒诗。<sup>②</sup>他的嗓音纯正洪亮，歌喉无与伦比。许多人从伊拉克、伊朗、撒马尔罕、克什米尔等地慕名来拜师学艺。他又是一位诗人，著有《柯迪尔汗诗集》。拉失德汗过世两年后去世。

1985年1月在莎车发现了《克得日诗集序言》(买买提伊明·玉素甫整理，1986年5月由喀什噶尔维吾尔文出版社出版)。《序言》中写道：“在民间流传着一千首，甚至两千首诗，也可能比这多，也可能少，但这些诗很有名。”他说他把自己的诗汇集成九卷。并为每一卷定了名称，注明了每一卷的内容。辑入其中的各种诗体的诗，说明柯迪尔汗作为诗人其创作活动曾经相当活跃。

据《乐师传》记载，柯迪尔汗生活在叶尔羌汗国的鼎盛时期，担任叶尔羌汗国宫廷的首席乐师。拉失德汗在位时，常和柯迪尔汗一起进餐，一同歇息。可见，柯迪尔汗很受拉失德汗的器重。由于拉失德汗的器重和支持，他才得以施展才能。他同阿曼尼莎罕一起收集和整理木卡姆。在此基础上，汇成16个乐章，构成木卡姆组曲。柯迪尔汗同阿曼尼莎罕还从纳瓦依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中取材，改制了木卡姆唱词，赋予古老的木卡姆以统一的格式和新颖的内容，从而使这一民间艺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广泛流传，经久不衰。现在的“十二木卡姆”是对当时16个木卡姆乐章的继承，除了少部分乐章外，其余乐章同当时的16个乐章中的12个乐章标题相同。由于只保留了12个乐章，故此称“十二木卡姆”。

《克得日诗集序言》共28页，因损失1页，现存27页。每页13行，用波斯字体阿拉伯文抄写。书中有诗有叙述，叙述了当时写《诗集》的目的、环境和主观条件，并说明了《诗集》的分类、名称、内容等情况。诗体格式包括玛斯纳维双行诗、柔巴依、克特额、乃孜木等。

在拉失德汗的庇护下，16世纪中叶，以阿曼尼莎罕和柯迪尔汗为首的木卡姆艺术家们，开始对维吾尔族木卡姆进行划时代的改革及重建工作。这一伟大的艺

<sup>①</sup> 伊赛木图拉·尼木图拉：《乐师传》，民族出版社，1982年。

<sup>②</sup> 伊赛木图拉·尼木图拉：《乐师传》，58页，民族出版社，1982年。

术工程在激烈的斗争中实施。在此过程中,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木卡姆改革,获得以下五大成就:

一是在拉失德汗的倡议下,阿曼尼莎罕和柯迪尔汗等著名木卡姆学家直接参与建成的“木卡姆学校”,结束了木卡姆受依禅苏非主义压制的状况。在喀喇汗朝前后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的基础上,将木卡姆系统化,统一了木卡姆的名称和乐章。

二是使维吾尔族古典十二木卡姆贴近民众,使民间乐曲与宫廷音乐相融合,为民族歌舞注入了新的活力。将木卡姆分成“琼乃额曼”、“达斯坦”和“麦西来甫”等三大部分,十二木卡姆得以进一步规范。

三是将处于变化之中的木卡姆唱词进一步规范,并使其相对稳定。阿曼尼莎罕和柯迪尔汗十分推崇纳瓦依的诗,因此所组编的木卡姆唱词的绝大部分为纳瓦依用察合台语创作的格则勒诗。木卡姆大师吐尔迪阿洪传给我们的“十二木卡姆”的唱词基本上都是叶尔羌汗国时期组编的歌词。

四是将维吾尔族古典十二木卡姆系统化,使十二木卡姆的一些地方变体,如刀郎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库车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伊犁木卡姆均得以发展,并为十二木卡姆的规范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木卡姆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是使维吾尔族古典十二木卡姆在数量和质量上得以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拉失德汗实行的木卡姆民主,在政治上打击了反对木卡姆的宗教狂热势力,使阿曼尼莎罕等木卡姆大师得到了短期的精神解放;另一方面,一些乐器得到改造,使之更适合弹奏维吾尔民乐;此外,还确定了木卡姆各部分的序曲。

应该指出,维吾尔族艺术中的这一瑰宝,在叶尔羌汗国时期得以继承并形成其古典风格,其中,赛亦德汗和拉失德汗等国君对音乐、诗歌、歌舞、书法等艺术门类的热爱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那些开明君主们的庇护下,深受当时疯狂的和卓、依禅们排挤而无法施展才能的阿曼尼莎罕、柯迪尔汗、多斯提·叶尔坎迪等著名的木卡姆艺术家和民间艺人重新聚集到宫廷里,以明确的目标拯救了已濒临消失的木卡姆艺术,并赋予了它新的活力。因而,重新整理叶尔羌汗国时期再度兴盛的“麦西来甫—赛乃木”及“达斯坦”乐曲,将系统化了的维吾尔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当时的十二个“琼乃额曼”)贴近民众,将民间的“麦西来甫—达斯坦”贴近宫廷等事务得以实现。这些使得以木卡姆为主体的维吾尔民族艺术充满了可以经受时代考验的新的生命力。此外,在此次木卡姆改革的推动之下,汗国各地传统的“麦西来甫”木卡姆及民间乐曲进一步繁荣,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出现了多种地方变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木卡姆乐曲有:刀郎(指麦盖提、巴楚、阿瓦提等塔里木河流域的地区的一部分维吾尔人)地区非常普及的“刀郎麦西来甫木卡姆”;以传统的“纳孜尔阔木”舞曲为基础的吐鲁番地区的地方性木卡姆;“哈密麦西来甫木卡姆”;“十二木卡姆”的伊犁变体;以“库车赛乃木”为基础的“库车乃额曼”等。但这些地方性木卡姆只是统一的



木卡姆  
演奏盛况

#### 四、历史学

历史学是叶尔羌汗国时期维吾尔族文化的另一大成就。当然,在维吾尔族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历史学也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叶尔羌汗国以前维吾尔族历史的著作绝大多数是游历过此地的汉、阿拉伯、波斯人写下的游记。在这些著作中,传说故事占相当大的比例。而叶尔羌汗国时期的历史著作,则基本上是那一带的见证人所著,它以自己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在维吾尔族历史学中显示了很高的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是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及其《拉失德史》。

##### 1.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是叶尔羌汗国时期政治、文化、军事领域中的著名人物,尤以其史学名著《拉失德史》(又译作《中亚蒙兀儿史》)闻名于世。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故乡是喀什噶尔。他母亲忽卜·尼格尔·哈尼木出身察合台王族,父亲马黑麻·忽辛·古列干属于朵豁剌惕部落,该部落于《元史》无可考。据说这个部落原属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统率,蒙古西征后分布于今南疆的焉耆以西各地。海答儿的祖先是朵豁剌惕部落的首领,世世代代在南疆以察合台汗的名义进行统治。有



一种看法认为这个部落的人操突厥语言。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生活在一个十分动荡的时代。当时,蒙古人逐渐被柯尔克孜人和瓦剌人从北疆地区驱逐出来而退守于南疆一隅之地,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人南下驱逐了当地的帖木儿后人,后者逃奔印度,在印度建立起莫卧儿王朝。察合台后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和瓦剌人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海答儿青年时代曾跟随父亲转战各地。后来他父亲被昔班尼汗杀死,他被赛亦德收留。由于和赛亦德汗有着姻亲关系(赛亦德的祖父羽努思汗是海答儿的外祖父),他得到亲切的款待和器重,并被擢升高位。以后海答儿辅佐赛亦德,颇有建树。

赛亦德建立叶尔羌汗国之前,新疆地区处于严重封建割据、混战不息的状态。赛亦德的兄长满速儿占据吐鲁番地区。而和田、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则被朵豁刺惕部的异密米尔咱·阿巴·乱乞儿所统治。为了消灭米尔咱·阿巴·乱乞儿的割据势力,赛亦德偕海答儿于1514年向喀什噶尔进军,击溃了米尔咱·阿巴·乱乞儿的军队,建立了叶尔羌汗国。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为帮助赛亦德与其兄满速儿和解也起了良好的桥梁作用。赛亦德死后,长子拉失德即位,为了消灭朵豁刺惕部异密的势力,捕杀了朵豁刺惕部异密海答儿的叔父赛亦德·马黑麻及其家属。海答儿当时正领兵进攻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为了避免被拉失德汗所杀,不得已而逃亡印度。1541年,海答儿来到克什米尔,在克什米尔居留十年后,于1551年在克什米尔去世。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不仅是一位政治人物,而且是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对16世纪的维吾尔族史学 and 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541年,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到克什米尔以后,用大部分时间搜集书籍,整理传说,进行著述。从1541年到1545年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拉失德史》。这部著作以拉失德的名字命名,说明他并不计较对拉失德的恩怨。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说明,当时南疆地区的汗是拉失德,所以把这本书命名为《拉失德史》。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保存本民族的历史。

《拉失德史》是用波斯文写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秃黑鲁·帖木儿时期到拉失德时期的历史。其中记叙了两个统治家族的兴衰:一是从秃黑鲁·帖木儿算起的察合台汗王族,二是从异密播鲁只算起的朵豁刺惕部诸异密的家族。第二部分是“史迹概述”,即作者本人的回忆录。这一部分从作者出生写起,一直写到他统治克什米尔为止,其中记叙了作者的生平,皈依了伊斯兰教后维吾尔化了的察合台王族后裔的事迹,还有乌兹别克汗的事迹。如果说第一部分主要依据他人著作和搜集到的传说写成,那么第二部分写的则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拉失德史》一书的历史价值是它叙述了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中亚,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历史。

《拉失德史》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而且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

者不限于叙述历史事件,而是一边叙述历史事件,一边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也用富有感情的诗歌语言议论或抒情。描写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战场上士兵作战情况时,往往写成韵文。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撰写《拉失德史》时集传成史,大胆运用文学手段表现历史人物,把历史人物置于当时那个时代的典型环境中,在各种现实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展示人物的性格,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再现历史。历史内容和艺术表现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和统一。《拉失德史》在史传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功,打开了史学通向文学的门户,成为维吾尔族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影响深远的著作。例如,毛拉·夏克尔的《胜利书》,毛拉·比拉里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毛拉·穆萨·赛拉米的《伊米德史》,毛拉·伊赛木图拉·尼木图拉的《乐师传》等史传作品的问世,均与《拉失德史》的影响有关。

## 2. 麻赫默德·楚刺思

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第二位史学家是楚刺思,又译麻赫默德·楚刺思或马赫茂德·贾拉斯,全名米尔扎·沙阿·麻赫默德·楚刺思,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在世,叶尔羌汗国末期史学家、文学家,他著有《拉失德史·续编》(《编年史》)。他的本名叫麻赫穆德,“楚刺思”是他所属部族的名称。据他自己在《拉失德史·续编》中记叙,楚刺思部族在蒙古帝国兴起时曾反抗过成吉思汗,战败后被分遣各地,融进蒙古帝国各民族中去了。1514年,赛亦德率领5000名士兵进入朵豁刺惕部的领地喀什噶尔时,楚刺思部族的异密参加了这一重要军事行动。赛亦德在叶尔羌建立政权后,论功行赏,楚刺思部族被封于阿克苏、乌什一带。从16世纪80年代起,楚刺思部族的代表人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在叶尔羌汗廷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拉失德史·续编》的撰写和文字水平推测,麻赫默德·楚刺思当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丰富的语言、文字、美学、历史、地理、逻辑学知识。最初,麻赫默德·楚刺思曾在叶尔羌汗国第六位统治者阿布都·拉提甫的下属阿拉雅尔伯克处任书记官,深受阿布都·拉提甫的器重,被晋升伯克。他是一位忠诚的黑山派信徒。

麻赫默德·楚刺思作为叶尔羌汗国后期的臣民,是许多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的目击者,而且还是其中某些事件的参与者,他一生看到叶尔羌汗国的宝座上换过九个汗。这些均为他撰写《拉失德史·续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麻赫默德·楚刺思一生写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拉失德史·续编》,另一部是《寻求真理者之友》。《寻求真理者之友》是一部记叙黑山派和卓的传记作品,大概完成于1696年。

麻赫默德·楚刺思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名著《拉失德史·续编》(又译《编年史》)。这是继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拉失德史》之后影响最大的一部叙述中亚史的著作。关于写作此书的动机,作者曾作过说明:“我心中有了这样的念头,

米尔咱·海答儿以拉失德的名字写下了《拉失德史》这样的历史著作,在那部著作里,叙述了秃黑鲁·帖木儿汗时期到拉失德汗时期的世事变迁、帝王更替以及这些帝王的事迹。从拉失德至艾孜拉特·穆罕默德伊明·巴哈杜尔之间,没有谁写下一部历史著作。虽然我并不具备撰写一部史书的才能,可是,尽我的学识和智力,写下了这部著作。”<sup>①</sup>

“这部著作写于1687年左右<sup>②</sup>,书中记载了13—17世纪期间发生在中亚和新疆地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尤为可贵的是它继《拉失德史》之后,续写了自拉失德至巴哈杜尔之间叶尔羌一百多年的历史。使今人有可能对这一地区自拉失德汗之后到17世纪叶尔羌汗国灭亡的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补充了《拉失德史》和汉文史籍的不足,实为一大贡献。由于作者修史态度严谨,所用史料可信,所提供的史料成为研究中亚和新疆历史的重要依据,因此这本书以其珍贵的史学价值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sup>③</sup>

《拉失德史·续编》不仅是一部难得的历史著作,由于其语言流畅、生动,写状物、塑造人物的文学手法高超,因此它又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作者虽然在修史,却不乏文采,善于从传说中辑录细节,生动传神地再现历史人物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窝阔台汗的故事:相传成吉思汗有令,禁止臣民用牲时断喉宰杀,只许打死或勒死。这与伊斯兰教法规和穆斯林的生活习俗显然是不相容的。窝阔台汗治下的一位穆斯林百姓,有一次购得一羊,牵回家,先关闭门户,然后在居室里按其伊斯兰教规断喉放血,准备食用。不料有一个居心不良的告密者,怀着告发请赏的目的一直尾随着他,爬上房顶,从天窗里窥见了一切。当这位穆斯林刚刚把羊杀了,告密者即从天窗跳入屋里,当场把主人扭送皇宫,要求窝阔台汗按律处死这位犯禁的穆斯林。但窝阔台的裁决出人意料。他说这个穆斯林是遵王命的,他关门闭户以后才断喉杀牲,这正是不想违抗可汗禁令的做法,不仅不该受罚,相反应该奖励。于是窝阔台下令处死告密者,将其家产判归被告。这里传说和叙史的文字浑然一体,生动具体地再现了窝阔台汗足智谋、通权变的处理政务的个人风格<sup>④</sup>。

麻赫默德·楚刺思的《拉失德史·续编》的相当一部分是依据口头材料和亲身经历编写的,史料价值很高,但文笔上有缺憾,对历史事件的时间多未作明确记载,如果不参照同时代或其以后写成的史籍,就无法确定这些事件发生在何年何月。

《拉失德史·续编》里辑录了麻赫默德·楚刺思的许多诗作。从这些诗歌的

① 麻赫默德·楚刺思:《拉失德史·续编》,第一编,361—362页。

② 译文转引自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出版社,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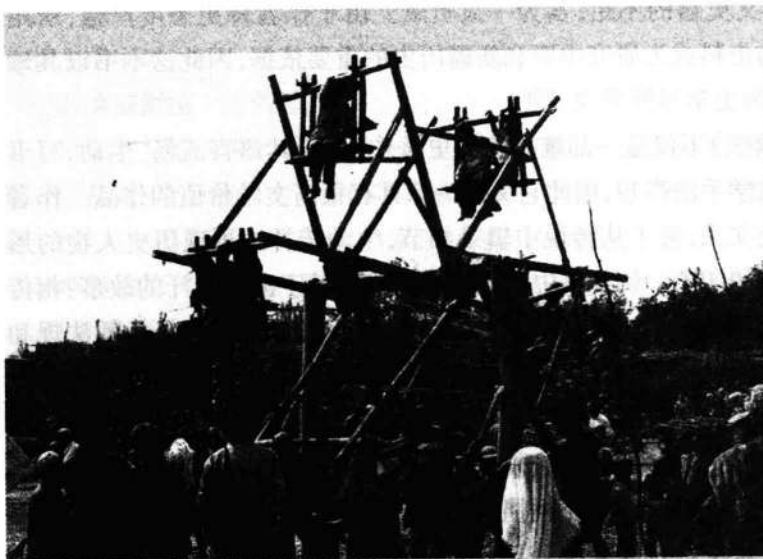
③ 一说1667年。

④ 周绍祖等编:《西域文化名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艺术水平和思想内容看,我们应该承认麻赫默德·楚刺思是一位诗人。

## 维吾尔族民俗

254



老少咸宜  
的“转轮”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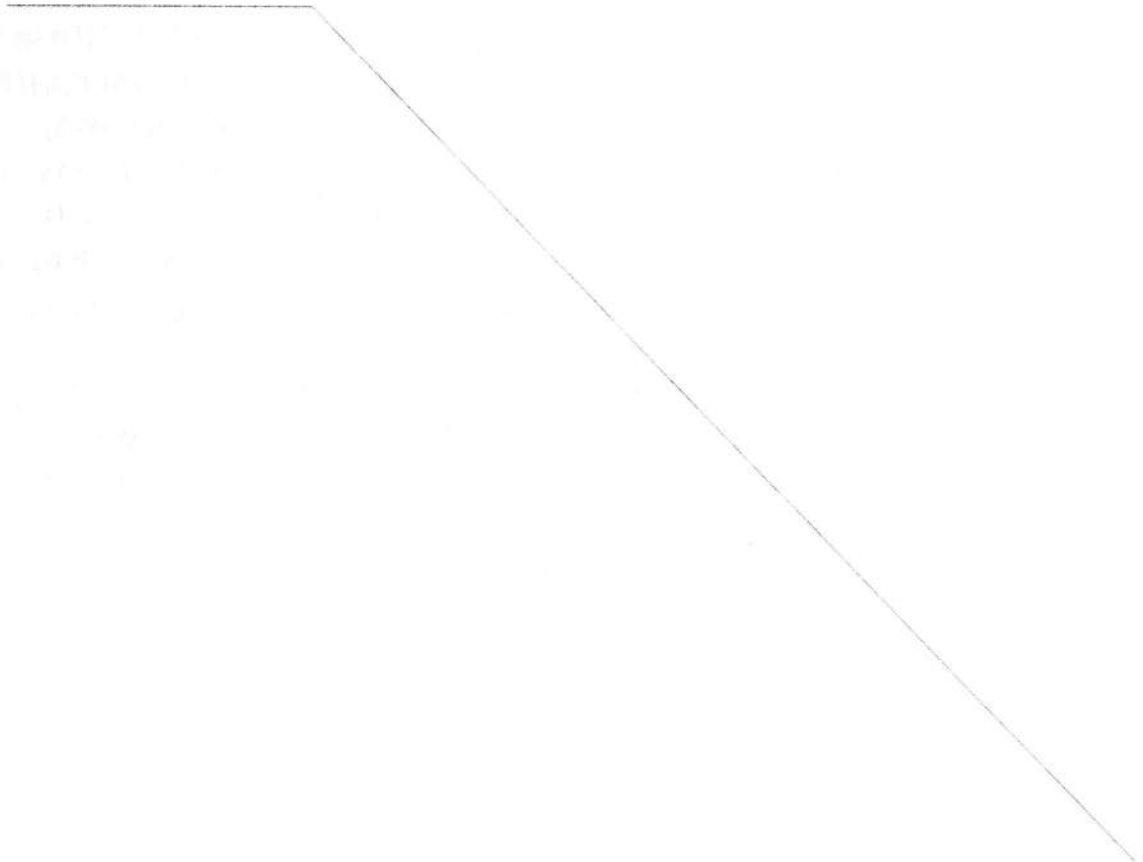


养鹰人



# 第九章

## 清代的维吾尔族文化



## 第一节 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

**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前,准噶尔贵族统治天山南路大约70多年。在此期间,他们把维吾尔人看做是他们的“阿拉巴图”,每年向维吾尔人民征收大量的贡赋。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1727—1745年),仅叶尔羌一地每年就要缴相当于10万腾格的贡赋,实际的征收数额比这个数目还要大。准噶尔统治者规定,每一个维吾尔族男子算作一户。每户逢集市一次要给准噶尔统治者缴纳一匹布,如果无布,可以缴羊皮数张或猞猁皮一张。农作物收获时,先要将收获物平分,平分以后要征取1/10的粮税,还需要用酒肉招待差来的头目人等,稍不如意则恣意抢掠<sup>①</sup>。这种盘剥压榨使维吾尔族人民的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

清朝同准噶尔之间的主要矛盾除喀尔喀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是争夺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聚居区。1697年,噶尔丹死后,首先脱离准噶尔贵族归附清朝的是哈密统治者额贝都拉。从此之后,哈密统治者与清朝共同对准噶尔贵族展开了斗争,多次击退了准噶尔向哈密发动的袭击。1720年,清朝军队打败准噶尔,进兵吐鲁番。额敏和卓在鲁克沁降清,于是吐鲁番地区由清政府控制。

1745年,噶尔丹策零病死,准噶尔贵族集团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最后,达瓦齐在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夺得汗位。阿睦尔撒纳自恃功高,与达瓦齐矛盾日趋尖锐。在夺取汗位的斗争中,阿睦尔撒纳投向清朝。清朝决定乘此良机向准噶尔进军。1755年清军在伊犁的格登山全歼达瓦齐的一支小部队,达瓦齐逃至乌什被俘。

清政府击败达瓦齐之后,采纳乌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等人的建议,释放大和卓,将这两个和卓任命为统治天山南路的首领<sup>②</sup>,但清朝的条件是必须定其贡赋,“令其交纳”<sup>③</sup>。这表明,一方面清政府让大小和卓作为自己的代理,管理回疆事务,另一方面维吾尔族地区已经成为清朝版图的一部分。

但是,正当大和卓打败黑山派势力之后,本来已经归顺清朝的阿睦尔撒纳为夺

<sup>①</sup>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七。

<sup>②</sup> 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卓传》。

<sup>③</sup>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三二。

取更大的权力而背叛了清朝。阿睦尔撒纳反叛清朝的举动影响了小和卓。大和卓认为清朝军队把他们从囚禁中解救出来,所以“恩不可负”;小和卓和大和卓相反,完全背弃了他们原来的承诺,彻底脱离与清朝的隶属关系。由于大和卓的犹豫不定,小和卓一派占了上风。大和卓经不住狂热的宗教蛊惑,最终成为叛乱首领。1757年,小和卓打出“巴图尔汗国”的旗号,与已经全部统一了全国的清朝中央政府决裂。

当时,小和卓称汗,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已完全被平息。清朝派副都统阿敏道、鄂对等人前去“招抚”并核实真相。小和卓杀了阿敏道及其部属。清政府见和平统一无望,决定出兵南疆,进行军事解决。小和卓联合准噶尔和安集延、布哈拉等地的贵族封建主,增强自己的实力。1758年5月,清朝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以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以鄂对为前导,率领万余人,从吐鲁番出发,进攻库车。8月,占领库车。小和卓逃往叶尔羌。库车战败后,大和卓和小和卓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最后,决定由小和卓据守叶尔羌,大和卓守喀什噶尔,互为犄角,以待清军的到来。在此期间,大小和卓还讨论了如果被清军打败,他们将投奔浩罕的问题。10月,兆惠率领清军步骑四千人到达叶尔羌,驻兵于城外喀拉苏,称“黑水营”,兆惠到达叶尔羌之前,曾派鄂对和田招抚,和田脱离了大小和卓,归降清军。小和卓率骑兵四千,步兵万余出击,包围了黑水营的清军。大小和卓围攻黑水营长达三个月之久,清政府先后派出三支援军,以解黑水营之围。1759年夏,清朝派富德和田进攻叶尔羌,兆惠从乌什进攻喀什噶尔。大小和卓自知大势已去,逃往帕米尔高原的巴达克山。清军向巴达克山施加政治与军事压力,巴达克山的酋长满在苏勒坦沙擒获并处死大小和卓,把小和卓的首级送交清军表示归附。至此,天山南北均归入清朝版图。

清朝统一新疆天山南北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在统一过程中,维吾尔族的许多上层人物和大批普通老百姓站在清政府一边,为清朝统一全国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例如,哈密、吐鲁番的统治人物早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20年代即已降清。清朝进军准噶尔时,被准噶尔迁到伊犁地区当农奴的许多维吾尔人立即反抗准噶尔,起而协助清军。一些与和卓家族有矛盾的封建上层人物,如库车的鄂对、拜城的噶岱墨特、色提人阿勒第等,也相继抛弃自己的家室,潜往伊犁,迎接清军。另外,维吾尔族的一些望族如玉素甫、额敏和卓和苏来曼父子等随军效劳,为清军工作。大批维吾尔族普通百姓和许多封建上层人物站在清军一边,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第二节 清代维吾尔族的经济文化

**清**代,维吾尔族聚居区的经济向前发展了一步,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周围各绿洲和吐鲁番盆地的经济已进入了较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258 当时的维吾尔族已基本上在各绿洲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在塔里木各绿洲上形成了许多村庄。根据《圣武记》和《新疆识略》的记载,到公元17世纪中后期时,新疆的维吾尔村庄大约有1000个。喀什噶尔所属的村庄有16个;叶尔羌所属的村庄有31个;和阗所属的村庄有6个;英吉沙所属的村庄有9个;阿克苏所属的村庄有22个;乌什所属的村庄有11个;拜城所属的村庄18个;赛喇木所属的村庄有9个;库车所属的村庄有97个;沙雅尔所属村庄有32个。到了公元19世纪80年代,清朝建省之后,又逐渐形成了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或城市。这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给维吾尔族聚居区创造的稳定政治局面。出现这种稳定的政治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致力于安定社会。这给广大的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带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尤其是清政府在维吾尔族聚居区实施的经济方面的一些措施,刺激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据前人的研究,“其中,居第一位的是对农奴占有制的限制”。

这条限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针对地方官吏的,另一方面是针对伊斯兰教机构的。因此,清朝在维吾尔族聚居区实施的各种措施造就了一种新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维吾尔族聚居区经济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正是在这种前提下,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

### 一、农 业

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水利设施的恢复和完善,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

据《西域图志·屯政门》记载:1765年,哈密地区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为106石。1771年,乌什地区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为199石。1776年,阿克苏地区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为372石。清朝时期,维吾尔族居住地区的农业已出产很多种农产品。农产品以小麦、棉花、高粱、稻米、玉米、青稞、芝麻、大麻、豆类为主。《西域闻见录》



称“吐鲁番：土产麦、谷、胡麻、甜瓜、西瓜、葡萄种类甚多，无不佳妙，甲于西域。土田肥沃，亦多棉豆之利”。吐鲁番的情形是这样，其周围的情形也大同小异。

经济作物中，植棉业占重要的地位，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产量的提高上，比以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清朝官方文献记载，18世纪70年代初期，喀什噶尔地区每年交纳棉花13600斤。经济作物中，仅次于棉植业的是园艺业。尤其是这一时期到过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旅行者，都赞美那里的园艺业和各种果品市场的情形。尤其是那些靠近商业中心的地方，园艺业完全以市场为主要对象，成为商业性明显的农业部门之一。因此，维吾尔族聚居区瓜果葡萄之盛，堪称我国西北之最。

清朝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水利设施集中体现于修复河道。18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文献中都提及这一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利用水利资源的状况。《新疆图志》卷六八记载：“喀什噶尔河。……出木素鲁克回庄以下分为数大渠，其正河南流。……入夏诸山雪水汇流而下，实为巨川。疏勒、伽师、巴楚皆赖以灌溉焉。”《西域水道记》记载：“喀什噶尔河北源曰乌兰乌苏河，东南流，分为渠……”，“东流经木素鲁克庄北，逐渐而南，经霍尔于庄……渠水流通，故绕园圃。”《回疆通志》卷七记载：“英吉沙尔。雪山在图木舒克卡伦四十里，从山中流出。大河阔四五丈；至图木舒克地方，分流各处，回民（指维吾尔）开渠引水灌田。”“和田……城南五百里哈浪古塔克地方，小河一道……水皆北流，各回庄开渠灌田，资其利焉。车将河源出西南雪山二百八十里。”《回疆通志》卷十记载：“库车……渭干河在城西，自北山出，环城南东流，回庄引渠灌田。”

“喀拉沙尔……开都河，俗名通天河，源出北大雪山，经喀拉沙尔西门外五里，水势甚宽。回庄多开渠，引以灌田。”《西陲重略》记载：“自伊犁而南至乌什……在城西北三十里，水则有毕底河，来自布鲁特游牧，东流分为二支，……其官屯及回庄田亩，均资灌溉。”

谈到清代的农田灌溉事业，不能不提及清政府在伊犁地区开凿阿库吾斯塘皇渠的历史。“阿库吾斯塘”是维吾尔语，意为“白渠”，它的汉语名称为“皇渠”。多少世纪以来，伊犁河一直在静静地流淌，但对两岸的灌溉事业没有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过去，以游牧为主的准噶尔人对于这种情况不十分关心，只在伊犁河南岸开凿乔胡尔渠，没有修建成套的灌溉系统。伊犁河谷虽然号称水草丰茂，也只能满足他们游牧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1760年起，清政府在伊犁河谷实行屯田以后，农田水利自然成了当务之急，遂有开凿阿库吾斯塘皇渠的举动。

阿库吾斯塘渠全长约90公里，东自喀什河畔起，直抵伊犁将军府治所驻在地——惠远城下，灌溉着伊犁河北岸的数十万亩农田。该渠的源头是伊犁河北岸的皮里沁出泉，然后向东延伸到吉里戛浪谷口，最后到达伊犁河的主要源头之一的喀什河，成为与一段伊犁河平行走向的宏大的水利工程。这项水利工程的另一个

侧面,则是与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农民的辛酸遭遇联系在一起。流传至今的许多伊犁民歌和关于主持开凿阿库吾斯塘渠的伊沙噶伯克穆哈默德的传说差不多都是以这项工程为背景的。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挖渠歌》深刻地体现劳动人民为开凿这条渠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的表现是铁制农具广泛使用。犁铧、坎土曼、镰刀,还有其他生活用具,在数量和使用规模上,都体现了新时期的深刻变革,出现了一些锻造业兴盛、有地域特点的城镇。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农具方面,还反映在短刀、灶具、食具等生活用具方面。

## 二、手工业

清朝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手工业是在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工匠的技艺精湛,产品多样。金属制品有刀、斧、锯、铲以及铜制生活用品壶、盆、菜炊;纺织品有绸、绢、丝棉、绸帛等,棉织品有土布、花布;皮毛制品有地毯、花毡、帕拉斯、塔勒帕克、多帕、油漆木盘、皮靴、皮大衣等。其他如玉石雕刻、悬挂在腰带上,或插入靴勒中的小刀等均工艺精巧,受人喜爱。就数量而言,它在手工产品中的比重是首屈一指的。

另一方面,此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手工业的主要特点是手工业者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要居民,并按行业集中在一定的区域。比如,阿克苏的伊盖奇村镇、伊宁的马蹄铁村等。

## 三、商业

清朝时期维吾尔族经济文化的另一个侧面是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的需求分不开。清朝前期,天山南北路基本上具备了发展商业的社会条件,表现为一些城镇市场的不断扩大。根据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英吉沙、和田等地已经成为商业中心。据《伊米德史》记载,当时“喀什噶尔在商业上有第二布哈拉之称”<sup>①</sup>。这表明喀什噶尔在天山南路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

除上述城市之外,伊宁、阿图什、库尔勒等地也已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在各地进行的贸易中,棉布和茶叶的比例比较大。棉布主要运往天山北路和中亚的哈萨克族游牧区。

<sup>①</sup> 毛拉·穆萨·塞拉木:《伊米德史》(维吾尔文)。

### 第三节 清代维吾尔族的社会文化

**清**政府统辖天山南北之后,除了把伯克的世袭制改为任免制外,基本上没有触动维吾尔族聚居区原有的社会制度。这样,社会的统治机构由大小不等的各级伯克构成。所以说,清朝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社会制度还是建立在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按此制度看来,清朝时期的维吾尔社会文化依然保留着原来的面貌。

#### 一、语言文字

在语言文字方面,清政府实行各民族语言文字同时存在的政策。各级军政机构中设有译员,从事维吾尔语、汉语翻译工作。清政府在天山南北各地提倡教育,在伊犁等地设立的义塾,也吸收维吾尔族上层人物的子弟入学。天山南路的教育由伊斯兰教机构主管,主要以麦德力斯(经学院)教育为主,同时教授维吾尔语言文字、历史、天文、哲学、简单算术原理和医学知识。

这一时期,维吾尔语使用方面的根本变化是,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用察合台文写成。还出现了将波斯语、阿拉伯语作品译成维吾尔语的热潮。这充分说明,维吾尔语言和文字全面恢复了自己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与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维吾尔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符合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愿望。

#### 二、翻译工作

清代一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投身于翻译工作,广泛介绍流行在本地区、中亚以及伊朗高原的文学作品。

大约在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帕孜里·哈姆希·叶尔坎迪和一位名叫夏·穆合买提·霍加尼扎木丁·喀拉喀什的维吾尔族诗人,将《王书》由波斯语翻译成维吾尔语,译本的书名是《王书的突厥语译文》。帕孜里·哈姆希·叶

尔坎迪精通波斯语,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再创作<sup>①</sup>。《王书》的另一译本的译者是墨玉县人夏·穆合买提·霍加尼扎木丁·喀拉喀什。所不同的是他的译本不是诗体,而是散文体。

这一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还有尤努斯·叶尔坎迪。他把塔吉克著名诗人——阿布杜拉赫曼·加米的长诗《尤素甫—佐来哈》译成了维吾尔语。此外,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译者还有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毛拉尼亚孜·叶尔坎迪。他们先后将《拉失德史》由波斯文译成维吾尔文。1787年,穆罕默德·斯迪克·鲁希迪将波斯文的《喀布斯》一书译成维吾尔文。这些译著促进了维吾尔文化的发展。

### 三、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

清朝统一天山南北路之后,允许伊斯兰教继续存在,同时又采取措施限制它的政治经济特权,仅给主持婚姻礼仪、遗产分配和管理教育的权力。因此,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影响,依然十分深远。

清代维吾尔族大多数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之中的哈尼斐派,另有一部分人属于神秘主义派中的依禅派。依禅派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礼拜寺和哈尼卡。清朝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每个村庄都有礼拜寺。礼拜寺的种类和大小不同。据《西域闻见录》的有关记载,当时有各负专责的宗教人员,如喀孜伯克、茂特色布伯克、匝布梯墨克塔布伯克、哈提甫、海里排提等。

清代维吾尔族的麻扎崇拜活动比较盛行。据一些旅行家的著作记载,麻扎崇拜成了天山南部维吾尔族农村教徒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宗教活动,特别是喀什噶尔一带,麻扎崇拜活动非常活跃,去麻扎的人数有时竟达数万人。

维吾尔族的生活习俗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他们的文化特征。拿服饰来说,男子一般头缠白布或戴毡帽、小花帽,不蓄发辫,不剃须,唯剪唇髭,便于饮食。女子披戴头巾,用以遮脸,再戴帽子。未成婚的女子将头发梳成十几根至几十根发辫,待婚后才将发辫散开,梳成两条辫子盘起或散发后垂。喜戴耳环、戒指等首饰。男子衣服称为“袷袂”,多过膝、宽袖、无领、无扣。青年的内衣,多缀花边。女子普遍穿连衣裙。靴及鞋多用皮革制成,如靴子、软底靴等。维吾尔族居住房屋多是土木结构,他们将环境布置得十分优美,注意种植并且注重环境卫生。

维吾尔族的婚姻皆由父母兄长做主,择定佳期后请阿訇念经,然后再举行婚礼。离婚也极自由,也有离婚后复婚的。

维吾尔族的丧葬习俗,当时也是依照伊斯兰教教规进行。葬时,请阿訇诵经。

<sup>①</sup> 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455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 第四节 清代维吾尔族的文学与史学

### 一、文学创作

清代是维吾尔文学创作繁荣的时代。据研究,此期间“问世的维吾尔文学作品,差不多都带有明显的非宗教趋向。它们比较强调个性的价值和思想的解放”<sup>①</sup>。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赫尔克提、翟黎里、诺比提、阿不都热依木·那扎尔、凯兰代尔、塞布尔、毛拉·比拉利、斯依提·穆合麦提·喀什、艾合买提·夏·卡里卡西、毛拉·夏克尔和泰杰勒等人。

赫尔克提的名作《爱情与苦恼》,用拟人的手法描写了玫瑰与夜莺的纯真爱恋,控诉了黑暗与强暴。翟黎里的诗作内容主要是反抗压迫,同情人民,抨击黑暗。诺比提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前半叶生活在和阗,他以优美的语言,抒情的风格,讴歌爱情,赞美自己的故乡。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阿不都热依木·那扎尔,他的代表作《热碧娅—赛丁》直接取材于喀什噶尔一带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歌颂人民,歌颂真挚的爱情,揭露了封建主凶狠残暴的本性,表达了人民群众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

除长诗《热碧娅—赛丁》外,阿不都热依木·那扎尔还写下了取材于其他方面的大量诗歌。它们后来被汇编为《五部诗》。《获取解脱的途径》是作者晚年的一部哲理长诗。这是作者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作者在这部著作里,着重强调了法规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 二、史学著作

在史学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不少史学著作。

《和卓传》是一部研究准噶尔贵族统治天山南路的重要史书,也是研究依禅派

<sup>①</sup>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564页,民族出版社,1985。

在天山南路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是喀什噶尔人穆罕默德·沙迪克·喀什噶尔,生于1685年,卒于1765年。他还有一部考据性的历史著作《艾萨毕里凯夫》,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论证了吐鲁番地区艾萨毕里凯夫麻扎的来历,驳斥了围绕这座麻扎的种种荒谬传说。

《麦赫杜姆·艾扎木与和卓·伊斯哈克家族传》是一部有关白山派和黑山派历史由来的重要历史著作,作者是墨玉县人穆罕默德·依瓦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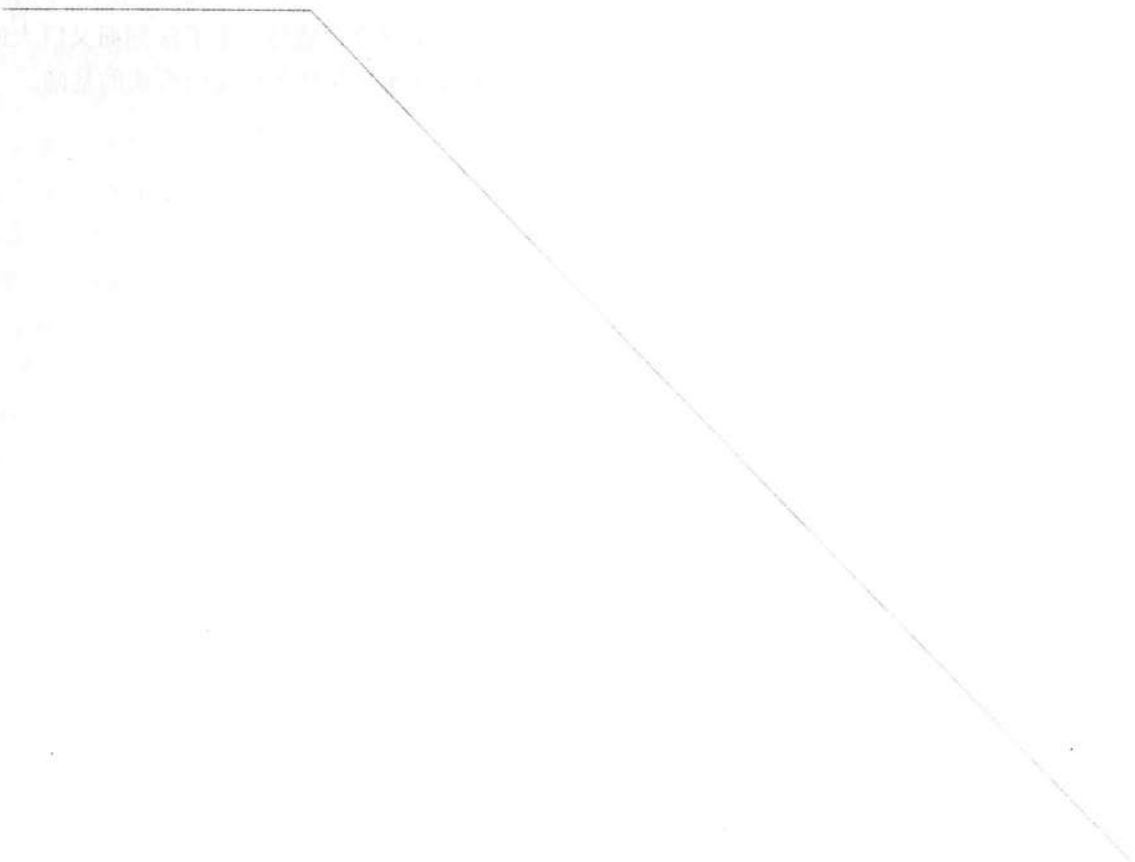
清代维吾尔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毛拉·穆萨·塞拉米及其历史书籍。他撰写了《圣人传》、《艾萨毕里凯夫》、《安宁史》、《伊米德史》等著作。

除上述历史著作之外,清代还有不少作者用散文体或诗体语言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反映历史事件的作品中有毛拉·夏克尔的《凯旋书》,毛拉·比拉里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斯依提·穆罕默德的《苦难记历》,喀斯木伯克的《伊宁大事记》,毛拉·米尔萨里赫·喀什噶里的《喀什噶尔史》,泰来比的《喀什噶尔史记》等;记述历史人物的作品中有毛拉·阿吉的《布格拉汗传》,毛拉·艾依提的《阿尔斯兰汗传记》等著作。



# 第十章

## 民国时期的维吾尔族文化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 20 世纪,维吾尔族文化也开始表现出新时代特有的时代特征。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有其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诸多原因。

清代末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都遭遇了衰弱的危机,外国列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使国家的主权和资源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侵害;国内封建地主、都市富豪、资产阶级与农民、城镇平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反抗封建君主制度,反抗洋人的革命活动也更加活跃起来。

新疆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大省,一方面受整个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地处一隅、与内地距离遥远等特殊原因,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政治气候。1911 年的辛亥革命、1917 年的十月革命、1933 年的“四一二”事变、1949 年的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剧变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这些外在的和内部的因素成了维吾尔族现代文化形成的基础。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新疆概况

### 一、社会政治状况

**中** 国社会到了清朝末年,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我国进行的侵略,清政府内部出现严重腐败和混乱局面,人民群众革命和反抗呼声强烈,清政府各级官员表现出的惶惶不安与占地为王、各自为政的无序局面等一系列的原因,在20世纪的初期,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新疆地区虽然在名义上仍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管辖,但实际上早已变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进行随意瓜分的一块松软的蛋糕了。

曾任清政府镇迪道尹和新疆提法使的杨增新取代了清廷派驻新疆的巡抚袁大化,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提督兼布政使。他一方面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削弱和分散了辛亥革命时伊犁起义的革命力量,让他们拥戴他为新疆都督;另一方面扑灭了哈密和吐鲁番农民起义的火焰,建立了他的封建独裁军阀政权。1933年,在一次宴会中,杨增新被自己手下的官员樊耀南谋杀,结束了他在新疆主政的时代。时任新疆政务厅厅长的金树仁以平定叛乱、为杨增新报仇为借口,捕杀了樊耀南等人,攫取了新疆的军政大权。

金树仁看到新疆的经济人才极其缺乏,派专人赴南京邀请经济人才来疆工作,恰好盛世才被他们选中。盛世才来到新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金树仁的赏识和信任,被指派负责重要的军事方面的工作。西北军阀马仲英应哈密起义代表之请,率领他的军队进入新疆,威胁到奇台的时候,金树仁派盛世才带领两支部队,去抵御马仲英的进逼。这时,金树仁的部下乘机联合归化军,想把金树仁逐出迪化。当金树仁借助自己原本雄厚的实力准备扭转局面的时候,他信任和重用的盛世才却翻脸倒戈,与他为敌。走投无路的金树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带领自己的旧部同党取道苏联回到南京。盛世才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掌握了新疆的命运,获得了统领新疆的大权。

盛世才主政新疆之初,伪装进步,颁布了“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

的所谓“六大政策”，处理政务多与苏联领事馆商量而后行事，摆出亲近中国共产党、冷落国民党的姿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盛世才逐渐撕下进步的伪装，公开迫害共产党，镇压进步力量，使新疆完全笼罩在他的血腥统治之下，终于引发了“三区革命”。

国民党政府趁“三区革命”爆发之机，将大批军队开进新疆，任命朱绍良为新疆省代理主席，控制了新疆。

无论是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军阀，还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新疆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加深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激化了社会矛盾。压迫剥削越强烈，人民群众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正义斗争就越激烈，反抗独裁暴政和反动势力的革命运动就越高涨。1911年，辛亥革命力量在迪化、伊犁等地，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但是这些革命斗争的结果与内地省区的斗争结果一样，在辛亥革命的强烈感召力影响下发动起来的新疆革命运动，其果实最终仍然被少数的反动派、野心家所篡夺和占有，未能建立起人民所向往的民主制度，这片土地最终还是成了军阀横行的地方。但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各种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一刻也没有停歇。1912年在铁木尔的带领下爆发了农民起义。1931—1934年间，以和加尼牙孜等人为首的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爆发了。1944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了三区革命。此外，在其他7个地区内革命力量的反抗斗争或者以较为隐蔽的形式，或者以公开的方式出现，对新疆的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新疆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和平解放。维吾尔族也同新疆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得到了彻底解放，与全国各地其他各族人民群众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 二、经济状况

民国成立以后，新疆协饷断绝，收支几乎全由省内自行解决。据统计，至1927年，地方税高达307.8万余元，加之国税166.7万余元，共计474.5万余元，均由百姓负担。尽管当时财政收入有所增加，而支出也在上升，仍然入不敷出，连年赤字。杨增新企图以印发纸币摆脱财政困境，结果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金银外流。据统计，仅1912—1915年，金银外流累计就高达400万两<sup>①</sup>。

金树仁上台后，财政金融状况愈加恶化。1928—1933年财政亏空累计达1.6

<sup>①</sup>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壬集下，23页。

亿余元。金树仁想通过整顿税收增加收入,但无济于事,于是就滥印钞票<sup>①</sup>。马仲英入疆后也印发纸币,致使物价暴涨,新疆财政濒于破产。

盛世才上台以后,虽然对财政收支进行了改革,税收大幅度增加,但财政仍未见好转。1933—1936年,政府财政年年亏空。以1936年为例:收入1032.8万元,支出1452.2万元,赤字491.74万元<sup>②</sup>。官员盘剥百姓,贪污成风<sup>③</sup>。

据统计,1912年新疆人口为2097763人,461961户。1928年,人口增加到2551741人,户增至530910户<sup>④</sup>。进入40年代后,新疆人口有较大增长,1944年全疆人口为4011330人<sup>⑤</sup>。

### 1. 农业

民国以后,杨增新提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至1916年耕地面积增至1200余万亩。由于封闭保守,耕作技术很落后。据统计,1915年麦类种植面积为6096186亩,产量为6097688石,稻谷种植面积498644亩,产量510798石<sup>⑥</sup>。经济作物类主要有棉、麻、油料、桑蚕、瓜果等。吐鲁番、鄯善、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十余县均产棉,质量好,但未能在当地发展纺织业,对外运输又很困难。因此,棉花生产受到限制。桑蚕业主要在和田地区,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哈密等地也植桑养蚕,发展较快。水果有质优味美的甜瓜(哈密瓜)、吐鲁番葡萄、库尔勒香梨、阿图什无花果等,这一时期,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无显著变化。

金树仁执政初期,全疆耕地面积约1143万亩。1930年战乱迭起,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土地大量荒芜。据统计,因战争破坏被毁的土地达680万亩,前期兴修的水利设施也同时被毁<sup>⑦</sup>。

1934年,省政府提出救济农村,农业生产有所恢复,耕地面积增加了。在耕作方面,引进了苏联较先进的技术,开始使用农业机械,开办各种农业实验场,对小麦、棉花、桑树等品种和栽培技术进行改良。

### 2. 畜牧业

新疆的畜牧业在杨增新时期生产技术落后,畜种退化,疫情流行,牲畜大批死亡,畜牧产品加工技术低劣。到1934年,全疆牲畜总数不足400万头,牧民生活苦不堪言。从1934年起,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畜牧业生产。如禁止屠宰耕牛和母畜,母羊不准出口,设兽医站或巡回兽医所,注射疫苗和预防疫情,培养兽医人才

① 《新疆简史》编写组编:《新疆简史》,第三册,10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新新疆》,第一卷,第一期,20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三册,219页。

③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④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626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1986年重印本。

⑤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⑥ 《新疆简史》编写组编:《新疆简史》,第三册,3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⑦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60、4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等。至1936年,畜牧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sup>①</sup>。

### 3. 工矿业

在工矿方面,杨增新无所作为,金树仁虽想掘取资源而获暴利,但战火四起,亦无能为力。阿山金矿采挖淘洗均为土法。1930年,金树仁在承化县(今阿勒泰)置金课矿局,安置难民开采金矿。又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买淘金机器10台,但因管理无方,由官办变为民采。于阗、墨玉、且末等地金矿,因官吏、投机商贾等重利盘剥,矿工无法忍受,1933年,于阗、墨玉爆发了金矿矿工反抗金树仁统治的斗争。乌苏南山、独山子出石油,因缺乏技术设备和资金,只能以土法用蒸锅提炼灯油。据《中国经济年鉴》统计,1931年乌苏石油公司产油5万斤。阜远县(今吉木萨尔)水西沟有铁矿,1920年,省实业厅曾试行开采冶炼,但由于耐火砖不过关、冶炼炉爆裂而停办。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人的勤奋工作,新疆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显著,这一时期,新疆各地出现了一批近代工矿企业。1937年,建成塔城电厂,装机容量为150千瓦;迪化电厂,装机容量为250千瓦,后来改装为500千瓦;伊犁电厂,装机容量为250千瓦。1938年,建成乌什电厂和阿山电厂。1939年,建成投产喀什电厂,装机容量为250千瓦。吐鲁番电厂将迪化新光电灯厂一台旧发电机移去安装。当时,全省有交流发电机21台、直流发电机8台。所发之电,供照明用电为1525千瓦,供工业用电为1118千瓦<sup>②</sup>。

1940年,迪化建成八道湾煤矿,次年建成六道湾第二煤矿、伊犁煤矿。1942年,建成塔城煤矿,这一年全省原煤产量达18万吨,采煤技术已由土法逐渐过渡到半机械化。孚远县(吉木萨尔)水西沟铁矿进行土法开采,年产1万吨。温泉县阿拉套山钨矿,由苏联开采,有工程人员60余名,矿工3000余名。至1943年停采,共采钨砂50余吨。独山子油矿由苏联方面主管开采,据1942年7月统计,每月可出汽油3.3万加仑,每年可供应汽油40万加仑<sup>③</sup>。

1942年,全省有各种机床119台,2257匹马力。机械厂设在乌苏、迪化、伊犁、塔城、喀什等地。

这一时期,由建设厅筹建金属冶制厂、制酸厂、天山化工厂、新丰纱厂等,由省营商业银行筹建明新玻璃厂、陶瓷工厂、新民工艺厂等。

### 4. 机器修理业

1937年6月,建成塔城五金器件修理厂,次年6月建成迪化汽车修配总厂,伊犁汽车修配厂。

①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60、461、45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③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 5. 食品加工工业

1937年建成迪化面粉厂、伊犁面粉厂、伊犁食油加工厂、伊犁酿酒厂、绥定面粉厂、昌吉食品包装纸厂。1938年,建成迪化食油加工厂、塔城面粉厂、伊犁水磨面粉厂。1939年,建成喀什食油加工厂、迪化奶酪厂、迪化糖果厂、迪化自来水公司、伊犁奶酪厂<sup>①</sup>。

## 6. 纺织工业

纺织、制革等行业,民间多以手工制作。1921年,成立阜民纺织公司,官商出资合办,购买美国2000锭纺纱机、织布机、梳棉机等全套设备,1926年在迪化建厂,有职工200余人,日产棉布1000疋。1933年被战火所毁<sup>②</sup>。

1937年还建成迪化第一、第二锯木厂,伊犁锯木厂、伊犁肥皂厂等。

1938年年底,全省纺织厂拥有棉织机6.6万锭,毛织机1万锭。在和田、洛浦两县建了毡毯织厂。

## 7.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业方面,1920年成立公路局,修筑迪化至奇台公路。1926年从天津购买汽车30辆,1928年迪化经塔城通往苏联的公路竣工通车。1935年盛世才决定修筑迪化至伊犁、迪化至哈密公路,全长1859公里,由苏联专家设计,中方施工,1937年竣工通车。南京政府交通部于1932年12月与欧亚航空公司开启北平、上海至迪化航线,在迪化设立欧亚航空公司分公司运营,每周一班,从兰州飞往迪化、塔城,再联运至柏林<sup>③</sup>。

1935年春季开始修筑迪伊(迪化—伊犁)、迪哈(迪化—哈密)公路,1937年7月1日完成正式通车,全长1859公里。后又西接中苏边境霍尔果斯,东至星星峡与内地公路连接,成为由新疆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从1939年起,修筑由额敏至塔城的公路、迪化—焉耆—阿克苏—喀什—和田的公路。4年完成了1564公里的公路。同时完成了由塔城至额敏的简易公路377公里,焉耆区简易公路100公里,阿克苏区简易公路443公里,和田区简易公路250公里。全省有新公路3422公里。有2439座大型、中型、小型承重25吨的桥梁。1942年年底,新疆有汽车1100多辆,汽车站37个,修理站5个,修造厂3个,汽车驾驶员1315名<sup>④</sup>。

航运事业也随之应运而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与苏联开通了航空运输。1939年,开辟哈密—阿拉木图航线。最初,每周三由阿拉木图飞哈密,每周四由哈密飞阿拉木图,后改为当天往返。在此之前,重庆至哈密的航班已经开航。从重庆

①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6、460、4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③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④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经哈密、阿拉木图至莫斯科全程联航需要五天。抗战胜利后,改由南京起飞,不过航班越来越少。

## 8. 电讯事业

有线电报于清朝末年开通,1913年增加奇台至元湖线路。1918年在星星峡增设报房一处。1919年,北京政府决定开通北京至新疆的无线电报,与英国马可尼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购置设备,在兰州、迪化、喀什分别安装25瓦弧光无线电收发报机,1923年安装完毕,因效果不好,1935年改为经辽宁转发。后又与山东济南、苏联西伯利亚、印度新德里等开通电报业务。1927年迪化总局安装500瓦长波机一部。1932年增设250瓦短波电台一座。在奇台、哈密、焉耆等地分别安装了电台,通讯联系有了改进。1930年迪化开始安装电话,在电报房内附设电话局。1934年盛世才亲自控制通讯系统,在督办公署内设交通处。1936年,迪化可与28处通长途电话。

1942年,无线电台已增至23座,重庆与迪化可以直接通话。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记载:全省有电话局5处,交换机10部。电话线路3896公里。1942年,有线电报以迪化为中心,往西直达苏联,线路全长1118公里,设电报局11处。由迪化至乌苏到塔城,直抵巴克图中苏边界,全线长920公里。迪化东至古城子(奇台)全线长278公里,中间设电报局4处。迪化东至兰州,南经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焉耆到库尔勒,全线长1580公里,设电报局10处。以上三路电报干线及支线共3896公里,电报局31处<sup>①</sup>。

<sup>①</sup>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教育事业

### 一、官办教育

**官**办教育指各级政府主办的各类学校的教育,其中有一部分是以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学校教育。因为缺乏各民族统计的资料和数据,只能作一般概况的叙述。

#### 1. 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的教育概况

杨增新推行惠民政策,不重视教育。当时,迪化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一所师范学校,其余皆为小学。各县只有一两所设备极其简陋的初级小学。据《新疆游记》作者谢彬统计:民国元年,全省有学校60所,有学生1802人,教师107人。1919年,有各类学校141所,学生4247人,教师202人;全省有4个图书馆,藏书1200册。1924年创办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为当时新疆最高学府,开设俄文、法律等课程<sup>①</sup>。

#### 2. 金树仁统治时期新疆的教育概况

金树仁执政后,提出“开办教育,疏通民智”。全省有学生7380人,其中中学生约200余名。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30年升格为俄文法政学院。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各一所,省立图书馆一所,有图书5000余册。学校图书馆有藏书1000余册。当时曾选派部分学生到内地上学,少数学生到德国、日本留学。然而,从1930年爆发战乱之后,学校教育遭到严重破坏。

#### 3. 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的教育概况

盛世才执政初期,落后的新疆教育事业有所变化。1931年,全省59县有小学153所,学生7162名;初中1所、师范学校1所、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所,共有学生约300名。1937年学校增加到1515所,学生112986名<sup>②</sup>。1935年,在俄文法政专门学

<sup>①</sup>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60、4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sup>②</sup> 程东白:《十年来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附表。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三卷,22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学院<sup>①</sup>。

#### 4. 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的教育概况

国民党控制了新疆以后,新疆教育被逐步纳入民国政府的教育轨道。1943年春,新疆省政府制定的第三期三年计划,为刚刚在新疆站稳脚跟的国民教育规定了发展方向。

1943年5月,新疆成立了国民教育研究会,制定出《新疆省国民教育研究会暂行简章》及《新疆省国民教育研究会工作考核实施细则》<sup>②</sup>。1943年9月,新疆中心国民学校110所,国民学校471所。1944年9月,中心学校141所,国民学校577所。1945年9月,中心学校201所,国民学校677所<sup>③</sup>。

国民党政府开始试图将新疆教育纳入全国国民教育发展轨道,然而三区革命爆发,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加之国民党官员腐败,致使新疆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 (1) 小学教育

表 1-1 1944—1949 年省立会立小学在校人数<sup>④</sup>

年 份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在校生		14970	217372	183761	189448	197850

##### (2) 中等教育

表 1-2 1948 年普通中学一览表<sup>⑤</sup>

校 名	在校生	校 名	在校生
迪化第一中学	810	喀什小学	320
迪化第二中学	54	哈密初级中学	124
迪化第三中学	63	镇西初级中学	124
迪化第一女中	218	语文学校	126
迪化第二女中	80	合计	1983

①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6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11276,7月,新疆省政府颁布《新疆省小学改中心学校国民学校实施办法》,规定各区、县辖区按本境学校数量、师资情况设立一所或若干所中心学校,其余均改为国民学校,中心学校包括高、初两级;国民学校则为初级学校。新疆档案馆,政2—8—138。

③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102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④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112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⑤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112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表 1-3 1944—1949 年新疆中学教育发展统计表<sup>①</sup>

年 份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在校人数		2457	3517	1595	1983	

表 1-4 1948 年师范学校一览表<sup>②</sup>

校 名	在校生人数	校 名	在校生人数
迪化第一师范	669	库车简易师范	191
迪化第二师范	210	焉耆简易师范	129
迪化第一女子师范	277	哈密简易师范	80
喀什师范	100	喀什教训班	130
阿克苏师范	460	阿克苏教训班	80
阿克苏简易师范学校	128	和阗教训班	80
和阗简易师范学校	240	合计	2764

表 1-5 1944—1949 年新疆师范教育发展统计表<sup>③</sup>

年份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在校人数		2588	2327	2764		

275

表 1-6 1948 年职业学校在校生统计表<sup>④</sup>

校名	年份	
	1947	1948
喀什职业学校	200	160
迪化职业学校	92	119
和阗职业学校	120	120
阿克苏职业学校	80	90
合 计	492	489

①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113 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②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113 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③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114 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④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114 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表 1-7

1944—1949 年新疆职业教育发展统计表<sup>①</sup>

年 份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在校人数	358	373	531	492	489	

## 二、经堂教育

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依赖于庞大的教育体系,尤其在维吾尔族聚居区,这种依赖性就更为显著。

中世纪至近现代新疆穆斯林的宗教教育是一种私塾式的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它渊源于阿拉伯的早期伊斯兰教教育。旧式的宗教教育,维吾尔语称其教育场所为“乌苏勒卡德木”,即宗教学校<sup>②</sup>。宗教学校主要开设经文课(因此俗称经文学校),由阿訇招收若干名学员,在清真寺内或阿訇家中传习伊斯兰教的经典和功课,用以培养适应穆斯林社会生活需要的宗教人才。宗教学校在办学初期,以家庭教育为主,有时也在清真寺内活动,诵读《古兰经》和《圣训》条文。

经文学校分初级和高级两个等级。高级经文学校即经学院。初级经文学堂叫做“马克塔布”,遍布全疆各地,主要集中在天山以南。例如喀什噶尔城内就有七八十所,每个乡村达六七所之多。初级经文学校一般只有一名教师,招收三五名或者一二十名学生。教师称“海里派”(汉语译作“掌学”),在农村一般通称“毛拉”,由熟读《古兰经》并有一定伊斯兰教知识的阿訇担任。招收的学生不受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四岁半至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四岁至十岁的女孩可在同一个班里学习,并可随时入学、退学或转学。教学不分班次,有时按智力高低或年龄大小分别面授。学生中一切事务均由教师管理,如果学生数量较多,教师便指定一名学习较好的学生协助,称为助理掌学。教师对学生要求严格,未经允许不准外出。授课内容由教师自定,一般有宗教礼仪、“五功”、《古兰经》和察合台文。由于伊斯兰教经典及宗教礼仪、宗教教育的读本均使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所以,经文学校又专设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一般的教学顺序是,新生入学之初,教师教学生背诵几段经文后,便开始学习拼读阿拉伯文字母,然后教“艾甫提也克”,即《古兰经》的部分章节,达到不用拼音节就能流利地朗读《古兰经》一部分语句的程度,方可转为对《古兰经》的正式学习阶段。学生只要能用阿拉伯文中中规中矩地朗读《古兰经》中的单词和语句,就算完成了对《古兰经》的学习。接下来,学习苏菲安拉牙尔等学者的诗选,要求掌握其

<sup>①</sup>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114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sup>②</sup> 包尔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在新疆的兴灭》,见《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

规则,并能阅读诗章中未标出附加符号的波斯文和察合台文的词语。

初级经文学校的教学方法简单,教师口授,学生记诵,基本没有课本,到了近代才有少量从国外传入的课本。教学工具十分简陋,有的地方先是用芦苇笔写在羊骨头上,后来写在木板上。老师在口授教学内容时,既不讲解,也不进行演绎,所以,学生一般只会念不会写,更不解其意。

学完并掌握上述的教学内容大约需要 10 年左右的时间。因经文学校无学制的规定,一般学生只要能背诵《古兰经》30 章,熟知伊斯兰教礼仪,经伊玛目批准,在主麻日前一天给伊玛目送一块“哈木”(大布)表示拜谢,就可算在初级经文学校毕业了,成了一个具备一般宗教常识的普通穆斯林。其中有的学生可以进入城镇的高级经文学校进一步深造。

初级经文学校教师的报酬是不固定的,一部分收入可以从清真寺或经文学校的瓦合甫地的地租中获得,但主要依靠学生的馈赠。具体形式是:(1)新生入学时向教师缴纳一定的钱物。(2)实行“礼拜四学费制”,即每逢礼拜四学生至少送给老师一个铜钱。(3)每当学完一本书、开始学另一本新书时,学生要向老师缴纳一枚银币或一两白银的学费,或者一些衣料。(4)每逢节日学生要给老师送礼,除现金外,还有肉、禽、蛋、点心、馕或饭食。总之,教师和学生所需要的一切费用概由家长负担,就连烧水用的柴火也由学生自带。

高级经文学校(即经学院)又称“麦德里斯”,附设在城镇内大的清真寺内或麻扎附近。喀什、莎车、英吉沙、叶城、伽师、哈密等城市均有高级经文学校。据调查,1949 年以前仅喀什地区就有经文学校 145 所,其中教经堂(高级经文学校)达 17 所之多,裕祥巴扎清真寺教经堂最为古老,距今已有 800 余年历史。汗里克教经堂的规模和声誉居新疆地区之首,在校学生最多时超过 300 人,距今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在中亚颇负盛名。

经学院的教师称为“穆德力斯”,俗称“毛拉”。由于各校学生人数不等,所以教师多少亦不等,少则一名,多则十几名。汗里克麦德里斯最盛时期教师曾达到 16 名,他们必须具备哈提甫(主麻日领拜者)以上的资历,由喀什艾提尔清真寺的谢赫任命,并准许到其他清真寺兼职。为了教学的需要,有的学校还聘请一些外籍教师临时授课。

经学院的学生来自全疆各地,一般都具有初级经文学校的学历。例如,教学质量较高的汗里克麦德里斯,其学员不仅来自附近的疏附、疏勒、伽师、英吉沙、麦盖提各县,而且远在和阗、阿克苏、库车、吐鲁番等地的求学者亦慕名而来。学生大都为宗教人士、上层人士的富家子弟,学习期间衣、食、学杂等一切费用均自理;少数劳动人民子弟如果有幸进入经学院,也只是一边学习一边在社会上谋事(如经商、打工等)来维持学习。

经学院使用的教材大体分为宗教经典、宗教礼仪、宗教教律和文学四类。具体来讲,除讲授《古兰经》及其注释、《圣训》学以及阿拉伯文词法学、句法学、修辞学等宗教学科外,还讲授其他学科,如宗教哲学、逻辑学等,以能通读、背诵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经典为合格。此外,还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土耳其文的宗教、文学知识,如《赛日甫》、《夏日毛拉》、《夏日瓦卡耶》、《穆合太尔卡耶》、《艾德牙西日甫》、《木西卡提西日甫》等。课本都是私人从阿拉伯、波斯、中亚、印度等地贩运进来的。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阿拉伯文与波斯文是经堂教育的基础工具课。无论是初级经文学校,还是经学院,由于地区的差异和时代的不同,其授课内容亦不尽相同,有时各有侧重。不过在学习中,波斯语典籍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是维吾尔族经堂教育乃至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于同一班级的学生年龄有大有小,学习进度有快有慢,所以有的老师就按学生年龄和进度编组,每组几名到十几名不等,分别围着老师听课,间或也开展一点讨论,但一般是老师领读,学生附诵。学制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学完规定的课程后,一般要通过谢赫、喀孜卡朗、穆夫提、艾兰木等宗教人物主持的考试,合格者即准予毕业,发给加盖宗教人物印章的证书,被授予大毛拉、伊玛目或哈提甫的资格,可到清真寺、经文学校等宗教机构任职。有的学生经权威学者认可即准予毕业;有的学生经穆斯林群众公认,可到清真寺、宗教学校任职,不一定持有毕业证书。

由于经学院一般附设在清真寺或麻扎附近,故其管理人员多由四类宗教人士担任:伊玛目、穆德力斯、木特挖里和穆安津。他们的报酬来源与初级经文学校的教师不同,基本由学校从瓦合甫地的收入中支付<sup>①</sup>。

1949年南疆六个县的宗教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比较<sup>②</sup>

县 别	普通学校(所)	学生人数(人)	宗教学校(所)	学生人数(人)
莎车县	69	12542	114	4530
疏附县	67	16375	45	2543
英吉沙县	60	9728	60	1013
巴楚县	25	5290	41	945
阿图什县	23	5007	41	1019
岳普湖县	18	2534	11	540
合计	282	51446	342	10590

<sup>①</sup>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二册,385、386、387、38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sup>②</sup> 谷苞:《民族研究文选》,22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 三、新式教育的出现

自维吾尔族全民皈依伊斯兰教以后,维吾尔民族教育事业也随之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的教育思想,走上伊斯兰宗教教育的道路。1759年,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之后,新疆的文化教育领域开始出现以汉语文为主的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新疆建省之后,在维吾尔族人民居住较为集中的一些地方出现了私塾。后来由于学习汉语文的需要,以培养通汉语从而可以谋公职的人员为目的的“学堂”应运而生。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境内这样的学堂已经增加到了500所左右,有超过1500名学生在这样的学堂读书。但是由于当时执政新疆的袁大化为防止辛亥革命对新疆产生过大的影响,把当时新疆的全部教育经费挪用于军费开支,使得大多数学堂都因经费等方面的困难而关门停业。

从1894年开始,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新疆创建医院、印刷厂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学校。这些基督教会传教之所除了招揽当地的一些穆斯林孤儿寡母,为他们提供衣食等生活所需外,还组织他们诵读《圣经》,举行祷告,施行基督教教育,开展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基督化教育活动。

维吾尔族当中最先创办新式学校的人首推喀什的穆萨巴依家族和塔什·阿洪等。穆萨巴依是喀什的企业家,开办工厂,经营外贸。他们认识到宗教经堂教育是乡村教育落后、人们守旧愚昧的根源,基督教会学校里所收留的儿童都有被基督教化的危险,所以,新式教育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方法。穆萨巴依家族于1907—1908年间在喀什等地开设了新式学校,培养财务人员和教师,后来根据需要在伊宁也开设了这样的学校。1907年在喀什的上阿图什乡依克萨克村开设了“艾比扎德师范学校”<sup>①</sup>。一些曾经在土耳其留学的教师仿照伊斯坦布尔的教学方式在这所学校中进行教学,课程中增加了俄语和汉语。

1912年,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在喀什市开设了新式学校<sup>②</sup>。他为了让塔里木盆地四周地区的人民群众接受新式教育,除了外聘新式教育教师外,每年还向伊斯坦布尔、喀山、乌法、奥伦堡等穆斯林聚居区域委派10—15名学生去深造。1914年,从土耳其邀请来疆的教师艾合买德·卡玛力出任上阿图什师范学校(可能就是“艾比扎德师范学校”)的校长。1914年9月14日,这所私立学校得到了喀什道台的认可。但是,后来保守势力逐步占据政府要职,1917年7月,艾合买德·卡玛力被逐出了喀什。

<sup>①</sup> 苗普生、田卫疆:《新疆史纲》,46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sup>②</sup> [日]大石真一郎:《喀什的新生活运动及新式教育的实行》,转引自《新疆地方志》(维吾尔文),24页,2000(2)。

辛亥革命之后,另有一批教育家们在喀什市和其周围的卡孜勒克、布拉克苏、下阿图什、和田、库车、吐鲁番、伊宁、塔城等城市乡村开设了新式学校,进一步发展科学的文化教育。当时,这类新式学校被社会上的保守势力称为“扎迪得克”(革新派),由于一些保守的宗教势力和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整个民族利益的眼界狭窄的私欲者的阻碍和挑唆,这些新式学校饱受挤压,但它们依然如夜空中闪烁着的明星照亮了那些渴望知识的求知者的双眼,为新疆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库图鲁克·夏吾克、买买提力·台沃甫克等人作为新式教育和启蒙运动的旗手走向社会舞台,推动了后来“维吾尔文化促进会”掀起的新式教育运动的飞速发展。

#### 四、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与民族教育

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各地先后成立了各个民族的文化促进会,在新疆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打开了新的篇章。这些组织的建立是趋于以下几个步骤。

一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到新疆,经过多方努力后获得新疆政府的准许,于1933年决定在喀什努尔别西地方开办学校,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一年6月,一所有20间教室的新式学校建起来了。7月,喀什教育局成立,接着喀什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也成立了。

盛世才登上新疆政坛后,省政府急需有才干的翻译人才。与此同时,为了搞好新疆的民族工作,需要有一个能提供有效帮助的组织。在这种关键时刻,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建议盛世才将喀什的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移到迪化。盛世才为此邀请克然木汗·艾沙扎德、阿布都热合曼·阿吉等人到迪化,派督办府军事秘书塔依尔伯克协助他们处理相关事务,并且作了这样的指示:新政府之所以帮助各民族成立文化促进会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就是要达到为联合而分立的目的;为此准备充分的条件以期在很远的将来,消灭民族间的隔阂和民族文化界限,使其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sup>①</sup>。

在这方面的准备就绪之后,1934年8月1日,新疆省维吾尔文化复兴中央联盟(即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在迪化成立。之后,联盟之下又成立了艺术团,吸收了许多艺术爱好者。当年年底,维吾尔文化复兴联盟在全疆10个地区54个县成立了分支机构,分支机构达到了292个。维吾尔文化复兴中央联盟直接领导其中的216个。中央联盟内设主任办公室、秘书室、财务处、宗教财产管理处、视察室、教育处、宣传处、艺术处、出版处等部门。

<sup>①</sup>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7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在此期间,省政府也为发展新疆的教育事业采取了许多措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由此形成了政府管理的学校与联盟创建的学校并存的局面。以下有一些数据,可以为我们说明当时维吾尔族学校教育的情况。

1934年,全疆范围内维吾尔文化复兴联盟方面开设的学校(即会立学校)有1000所,学生109901人;政府设立的学校(即公立学校)有129所,学生10843人。到1935年,会立学校增加到了1045所,学生人数也达到了309966人;公立学校有135所,学生人数增至105460人。1938年维文会举办会立学校达1540所。据《国民政府年鉴》记载,1942年新疆的会立学校在校小学生是100677人,公立学校的在校小学生人数是306300人。这一时期,得到重视和落实的工作之一就是群众性扫盲运动。仅1941年就有144655名维吾尔族中年男女脱盲。

新疆当时有9个民族成立了文化促进会,“按照各民族的需要和特点,举办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sup>①</sup>。而维文会历时16年,创办教育的规模之大,学生人数之多,在维吾尔族教育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维文会的教育活动提高了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抗日的宣传,增强了维吾尔族的爱国意识,培养出许多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解放战争以及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维文会创办教育的活动为解放后维吾尔族初级教育的起步奠定了基础。截至1943年,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在全疆10个专区、54个县建立了分会,并在区、县分会之下又建立了支会。1943年,维文会已经覆盖了全疆维吾尔族聚居区,也可以说覆盖了全疆各地,其教育网点遍布全疆。当年创办的学校有许多至今仍在,南疆许多县的第一小学大都是由维文会的会办学校转制而来。例如,喀什维文会创办的诺贝希小学、库纳克巴扎小学、吐曼博依小学、安江热斯小学等。今天的喀什市第一小学,当年维文会曾在此建喀什简易师范学校;柯坪县维文会创办的小学,现在为柯坪县第一小学、库木艾日克小学;今天的沙雅县第一小学,是由维文会于1935年创办的达日历塔木孤儿学校发展而来的;阿瓦提县第一小学的前身是维文会1934年在这里创办的第一所会立学校;今天阿克苏地区直属中学、阿克苏地区第一中学等多所学校都是由维文会创办的会立学校沿革而来。清末民初以来的新疆,传统的宗教教育一直在整个教育中占据主要地位,维文会兴办教育的活动动摇了伊斯兰教宗教教育的至尊地位,影响所及,宗教上层也加入到兴办近代教育的行列,使宗教活动朝着有利于推动新疆的进步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影响,一是维文会的领导大多是维吾尔族的宗教上层人士,他们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使维文会兴办教育的活动更容易为维吾尔族群众所接受;二

<sup>①</sup> 茅盾:《六大政策下的新文化》,载《反帝战线》,第四卷,第一期。

是大量的宗教财产被用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表现在与清真寺和经文学校分用宗教税“乌守尔”(öšür)、“扎卡提”(zakat)和“瓦合甫”(wähpä)。关于“瓦合甫”转归维文会、大量的“瓦合甫”用于维文会兴办教育一事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收藏的127号《契约》中有所反映<sup>①</sup>。在这股办学的热潮中,伊斯兰教徒原本给清真寺捐的财产此时转而直接捐助给维文会创办教育,这种民办公助性质的办学途径解决了一部分教育经费和教育场所的问题。

维文会创办的新式学校改革原有经文学校的教育,除了学习经文知识外,学生开始接触近代的科学文化。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保守的宗教人士的极力反对,但学习科学文化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道理,已为大多数维吾尔族群众接受,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不过维文会办的大多是小学,中学很少,师范学校更少,极少涉及学前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扫盲性质的学校所占比例较大。充分发挥维吾尔族的歌舞特色而兴办的特色学校少,对发掘和保存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专门人才培养不足,在课程设置上政治课的比重过大,影响了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影响了科技人才培养。由于师资的匮乏,有一部分教师素质很低,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总之,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历时1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积极发展维吾尔族文化教育事业,是建立学校和增加在校学生最多的文化促进会,有力地辅助了新疆国民教育,使“新疆这块有着悠长历史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处女地’得到开发,并结出丰美的果实来”<sup>②</sup>,落后的新疆教育面貌有所改观,民族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正如茅盾先生所言,“遍布新疆各地的文化促进会,实际上是开拓新疆各族灿烂文化的一支主力军”<sup>③</sup>,它为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基础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发展新疆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教育事业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我们今天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sup>④</sup>。

## 五、“三区革命”时期的维吾尔族教育

1944年12月,三区成立临时政府,艾比甫·尤尼切夫任教育部长。临时政府于1945年1月通过了九项宣言,其中第九项是“发展民族文化及保健卫生事业”。

三区临时政府发展教育的重要措施是培训教师和开办各类学校。

三区临时政府在三区革命取得初步胜利的1945年夏就着手开展培训教师的

<sup>①</sup>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二册,32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sup>②</sup>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新疆文化史料》(内部资料),第一辑,1990。

<sup>③</sup>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新疆文化史料》(内部资料),第一辑,1990。

<sup>④</sup> 左红卫、郭红霞:《新疆维文会举办民族教育及其作用》,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89、92页。



工作。首先是临时政府教育部要求各专区教育处、各市县教育科及时为各地学校配备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并让参军或调任其他工作的教师分批返回教育工作岗位。同年10月,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108号决议,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教师归队,军事部门工作人员中凡曾担任过教育工作的,只要教育厅提出要求,一律回去从事教学工作。1945年3月,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29号决议,指令教育厅举办教师培训班,在军政机关工作的人员回学校工作,脱离教师工作经商者,如不回归按战时拒绝服从国家命令处理。其次是陆续开办了一些教师培训班。

三区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发展很快。以伊宁市为例,1947—1948年,共有217班,286名教师,6943名学生;1948—1949年,共有235个班,302名教师,7624名学生。以阿勒泰专区为例,1947—1948年,共有4828名学生;1948—1949年,共有教员294名,250个班,7500名学生。1948—1949年,伊犁专区有四年制和七年制学校270所,计1107个班,学生34793名,教师1249名;塔城专区有四年制和七年制学校210所,490个班,学生14594名,教师570名;阿勒泰专区有学校65所,234个班,学生7591名,教师240名。全三区合计有四年制和七年制学校545所,1831个班,学生56982名,教师2059名。

三区临时政府为孤儿开办了孤儿学校。伊宁市孤儿学校于1947年正式成立。这种学校条件相当好,学校有小卫生所,有专门的浴室、理发室,有专门照料学生、为学生洗衣服的人员,还有专门的图书室,免费发放生活用品。结合读书,孩子们学习缝纫、木工等手艺。

三区临时政府还组建了专科学校。1947年,伊宁民族中学被改建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当年就开设了农业水利、商务兽医、财会和中等师范等专业班。1948年9月,又成立了医学专科学校,开办了医士、护士、助产士等专业。学校的专业课请苏联专家讲授,采用苏联的医学专科教材。此外,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如1948年举办了民族军医培训班、外语训练班等。

三区临时政府也开设了自己的职业技术学校。1947年,伊犁专区成立了女子全日制手工艺专业学校。除伊宁市设中心校部外,在绥定(今霍城)、宁西(今察布查尔)、尼勒克等县均设有分校。1949年,中心校部有8个班,17名教师,213名学生。除此之外,伊宁市的茹先、东方等学校在1948—1949年度开办了女子手工艺专业班,其他初级中学一般也都开设了手工劳作课。

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对扫盲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制订了专区、市县和学校扫盲规划。1948—1949年掀起了群众性的扫盲高潮<sup>①</sup>。

<sup>①</sup>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纲》,117、120、121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表 1-8

1948—1949 年三区扫盲统计表<sup>①</sup>

	伊 犁	塔 城	阿 山
扫盲班(个)	394	271	120
在学人数(人)	10359	7418	
脱盲人数(人)	4928	4000	3290

<sup>①</sup>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纲》,121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和出版印刷事业

#### 一、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

20世纪是维吾尔族文字由变革向着规范化发展的时代,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对这种变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直至1930年,维吾尔族一直使用察合台维吾尔文字。1935年,《新疆日报》维文版开始出版,在这份报纸中除了使用记录阿拉伯借词的字母外,拼写维吾尔语词语时均使用纯粹的维吾尔文字。1936年,由伊犁地区维文会印制的《维吾尔语识字课本》使用的是现代维吾尔文字,剔除了那些专门用来拼写阿拉伯借词的字母。

在苏联也进行过数次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提出的许多理论与原则对新疆维吾尔族文字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5年7月18日,由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加的第一次文字讨论会在阿拉木图召开,对一直在使用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根据维吾尔语的特点最初定制了27个字母的维吾尔文字。1930年5月,第二次维吾尔文字改革学术会议在阿拉木图召开,决定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字向拉丁文字转变。1947年2月4日,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实施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的转变。以俄文字母为基础而创制的苏联境内维吾尔人使用的字母由41个字母组成——除了全部收入33个俄文字母外,又吸收了8个表示维吾尔语特有音位的字母。

#### 二、维吾尔族的新闻出版和印刷事业

清朝后期,新疆各地出版了各种报纸。1910年3月,伊犁同盟会创办《伊犁白话报》,1912年11月停刊<sup>①</sup>。1910年,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库图鲁克·肖克

<sup>①</sup> 袁德毅:《新疆首次创刊的报纸——伊犁白话报》,载《新疆地方志》(维吾尔文),1990(1)。

在喀什创办《觉悟报》(Ang Geziti)<sup>①</sup>,1918年重新出版<sup>②</sup>。1914年,瑞典传教团总部的G.拉奎特(Gostaf Raket)主编《光明——六城日志》(Yaruqluq —Altä Šähärning roznamäsi)<sup>③</sup>。1912—1938年间,瑞典喀什噶尔传教团编了一批宗教内容的书籍、小册子,在传教团所建立印刷所印刷。这批印刷品中的大多数译自瑞典文、英文或阿拉伯文,也有传教士们自己写的作品。这些用维吾尔文印刷的书籍和报纸在当时新疆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sup>④</sup>。

属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印刷品的出版工作始于1911年。当时出版了一种主要对象是学校的维吾尔文读物,用旧式手动印刷机印刷。最初,传教团开办学校使用的是用手写体印制的教材。1900年,拉奎特给斯德哥尔摩的传教公安监理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用喀什噶尔当地语言编写的教材和读物已经编完,但每一册都得用手抄,希望支援排印设备。1912年,排印设备运抵喀什噶尔,于是印刷的教材数量剧增,从入门教材到地理、科学方面的各种教科书都有,大部分是瑞典小学或成人教育机构使用教材的译本,但进行了修订或改写,以适应新疆的情况。有些教材中包含关于日常生活的劝导内容。以科学教材为例,在涉及人体的那一部分中,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卫生方面的劝导内容。由G.阿赫尔伯特编写、1929年出版的《正字法指导》一书,在规范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的拼写方面成就特别突出。O.赫曼森著、1936年出版的《中亚史》标志着瑞典喀什噶尔传教团已超越了学校教育的目标而转向了对公众的教育,1935年出版的《维吾尔语语法》也可以认为是这种转向的体现之一<sup>⑤</sup>。

官方也重视印刷事业。1937年建成伊犁印刷所、塔城印刷所、阿山印刷所,购买美国机器,配有铅字铜模、石印、装订机等。次年建成的迪化第一印刷厂,由《新疆日报》社承办,装有印刷、装订、裁纸等机器;迪化第二印刷所由新疆反帝总会承办,有印刷、装订等机器;喀什和阿克苏印刷所都用美国机器<sup>⑥</sup>。

国民党统治时期,编写和印刷教材的事业较前有所发展。1946年11月,省教育厅成立新疆教科图书编审委员会,隶属新疆省政府,负责全省中等以下学校教科图书的编辑、审译及审定事宜。编委会下设四科:第一科是编辑科,第二科是审译科,第三科是审查科,第四科是总务科<sup>⑦</sup>。编委会颁布《新疆省教科图书编审办

① 阿布都热依木·热合曼:《论现代维吾尔语形成的过程》,载《语言与翻译》,1996(2),27、42页。

② 努尔买买提·扎满:《维吾尔现代文学史》(维吾尔文),10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③ 艾赛提·苏来曼:《论瑞典的文化交流关系及瑞典的维吾尔研究发展历程》,载《新疆大学学报》,2005(3),23页。

④ 艾赛提·苏来曼:《论瑞典的文化交流关系及瑞典的维吾尔研究发展历程》,载《新疆大学学报》,2005(3),21页。

⑤ [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等译:《重返喀什噶尔》,20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⑥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4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⑦ 新疆档案馆,文—1—1,卷三八三。

法》，规定新疆中等以下学校使用教科图书，凡未经新疆省政府教科图书编审委员会允许不得发行和采用。同时，还公布了《新疆省编审教科图书共同标准》，以加强对教科书编辑、出版和使用的管理<sup>①</sup>。1948年，省教育厅耗资9026345600元编写教材，印刷维吾尔文伊斯兰教史1000册、自然5000册、经文5000册、算术8000册、地理10000册、中学代数5000册、行政手册2000册，维吾尔文读本70000册、蒙文算术2000册，共计130000册<sup>②</sup>；1949年4月，省教育厅又印刷21000册维吾尔文读本，并及时发往各区县中小学<sup>③</sup>。

新疆的官办报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杨增新统治时期在迪化出了《天山报》，民国十九年（1930年），《天山报》改名《天山日报》，汉文四开一张，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印刷发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改名《新疆日报》，出汉文版（日刊）、维吾尔文版（双日刊）、哈文版（周刊）。另有《伊犁新疆日报》、《塔城新疆日报》、《阿山新疆日报》、《喀什新疆日报》等根据当地民族分布情况分别出版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文版，刊期为三日刊、周刊、半月刊不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主管党员一度执掌《新疆日报》领导与编辑之责权<sup>④</sup>。

这一时期的印刷业主要集中在迪化。1934年8月1日，即盛世才宣布“新疆和平统一日”的当天，由省维文会油印发行了第一份维吾尔文《新疆日报》<sup>⑤</sup>，向维吾尔族百姓报道了在迪化举行群众大会的情况以及盛世才、和加尼牙孜等人的讲话，使维吾尔族群众第一次详细了解了盛世才的政治主张。第二年，省维文会与省政府合作铅印了《新疆维吾尔报》，不久《新疆维吾尔报》同《天山日报》合并改名为《新疆日报》，政府投资在迪化组建第一印刷厂，专责承印《新疆日报》，该厂拥有相当规模的土建工程以及成套的印刷、装订、裁报装置和4300公斤的铅字<sup>⑥</sup>。

1935年以后，宣传活动日益频繁，使用的语种不断增多，于是政府投资组建迪化第二印刷厂。第二印刷厂专责承印反帝会的宣传品。第二印刷厂是以新的期望值为起点的，因此，工程规模、机器设备均优于第一印刷厂，仅铅字重量就超过第一印刷厂2500公斤<sup>⑦</sup>。

第二期三年计划期间，印刷业有了新的发展。《新疆风暴七十年》概述这一时期

① 新疆档案馆，文—1—1，卷三八三。

② 新疆档案馆，文—1—1，卷三八三。

③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纲》，111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④ 纪大椿主编：《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⑤ 乌普尔·托合提：《中国共产党人和新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载《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的活动》，8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⑥ 乌普尔·托合提：《中国共产党人和新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载《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的活动》，8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⑦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3887页。

期印刷业状况说：“自民国二十二年后，印刷工业随着文化的发展和各部门建设事业的发展，不但有了新的印刷工业，而且目前已经完全达到了现代化生产的阶段。”<sup>①</sup>“列举的事实是：全疆共有大型、中型、小型新式印刷机三十架，各种动力合电力七十千瓦，其生产面积每小时为五万六千到八万五千平方公尺，从事印刷工业的专门技术工人达六百余人<sup>②</sup>。

另一个数据是，1943年，《新疆日报》维吾尔文版全年共印997357份<sup>③</sup>。塔城印刷维吾尔报纸450067份，喀什印刷维吾尔文报纸43352份，和田印刷维吾尔文报纸11950份<sup>④</sup>。

对于维吾尔民族的经济和社会来讲，印刷业的发展除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维吾尔民族早期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就是在印刷业这个摇篮中成长的<sup>⑤</sup>。

库图鲁克·夏吾克（又译库图鲁克·肖克，1876—1937年）是为近代维吾尔印刷出版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就是他在喀什创办了维吾尔文《觉悟报》，宣传爱国民主思想，虽遭反动政府的封闭，不久被迫停刊，但他在维吾尔文报业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库图鲁克·夏吾克于1933年又创办了《自由生活报》，印行一段时间停刊，在当年年底成立的喀什维文会和教育局支持下得以恢复印行，并改名《新生活报》，1936年改名《喀什新疆日报》，发行至1949年<sup>⑥</sup>。

①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3887页。

②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4888—4689页。

③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4690页。

④ 白山：《一年以来印刷的发展》，载《反帝战线》，1941年1月1日。

⑤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7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⑥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第四卷，343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文学和史学

### 一、文学

**进**入20世纪,维吾尔文学一反沿袭近千年的古典文学样式,转向崭新的文学模式。维吾尔文学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转变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国内外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式教育的引入等诸多因素促成的。

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库图鲁克·夏吾克、纳再尔霍加·阿布都赛买提、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等人在20世纪前期都从事文学创作,倡导国际主义思想和启蒙主义思想。他们的文学创作虽然在形式上依然以古代已经形成的传统的文学样式为主,但是由于他们生活着的故乡发生着划时代的变化,要求文学作品表现对社会上愚昧、贫穷、纠纷、懒惰等的变革之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 1. 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

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1862—1924年),喀什人,是著名的社会贤达和启蒙活动家,也是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当时新疆的学校教育很落后,其内容主要是脱离实际的宗教教义,其中非科学的、宣扬封建迷信的成分占主流,教学方法陈旧死板。在这种情况下,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从实际出发,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教材的编写等诸方面下工夫,编写出了一套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科学民主、反对愚昧落后为内容的书籍,如《语法与句法》、《朗读》、《数学》、《必要的信仰》、《儿童教育》、《给少年儿童的劝告》、《文学迷宫的钥匙》、《给人民群众的劝告》等。他的这些著作以通俗易懂为主要特点,因而在当时和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新疆的一些新式学校用作必修的教材,这对新疆的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他在对话体的著作《必要的信仰》中写道:

问:人类贫穷和受苦的原因是什么?

答:是两样东西。一是愚昧和野蛮,二是分裂和争斗。

问:尊敬和威信以及力量是由什么构成的?

答:知识和团结<sup>①</sup>。

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是维吾尔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先驱。他的《文学之钥匙》是文学课的重要教材。这部用优美的诗体语言写成的语文教科书,分两卷十五章,对所有的文学体裁,尤其是诗歌的各个种类作了科学简明的解释。该书于1910年在塔什干出版发行<sup>②</sup>。他的诗体著作《真理之精华》现存埃及某地的一个图书馆中。近年发现了他的《穆罕麦斯全集》和一部分用穆罕麦斯格式写的诗《瓜果的辩论》,已在维吾尔文丛刊《源泉》1989年第1期上刊布。维吾尔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泰杰里对他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sup>③</sup>。

## 2. 库图鲁克·夏吾克

库图鲁克·夏吾克(1876—1937年)是当时著名的启蒙运动活动家、诗人,也是这一时期维吾尔文坛上的杰出人物。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愿真主赐给我一把利剑,我就给它下命令,  
去砍断那套在人民脖子上屈辱的枷锁铁链。

假如祖国仍是衰败,那就让它砍下我的头颅,  
肖克的眼睛决不愿看到人民被奴役的命运。

正确认识自己生活的时代和时代提出的要求,唤醒黑暗统治下沉睡的民众,号召他们为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奋斗,这是现代维吾尔文学形成阶段的独有的特征。在库图鲁克·夏吾克的诗歌中,这种思想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他在《觉醒了》一诗里,向人民发出这样的呼吁:

只有为自由而斗争,我们才能活得自由,  
亲爱的人民,睁开你的眼睛吧,大地和天空苏醒了。  
醒来的活得自在,睡着的叫苦不迭,  
你不为自己的处境担忧,晦气的严冬就要苏醒。

① 阿扎提·苏里坦、张明、努尔买买提·扎满:《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史》,12页,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② 2000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维吾尔文出版。

③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第四卷,3424—34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该睡醒了,再睡就很不应该,  
为了知识,为了文明,整个世界觉醒了<sup>①</sup>。

### 3. 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

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1901—1933年),吐鲁番人,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以自己出色的社会活动和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在新疆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黑暗旧社会的白色恐怖之下,开创了维吾尔新诗歌运动的战斗历程。他在1912年写的《苏醒》一诗中呐喊道:

哎,可怜的维吾尔族,苏醒吧,觉已睡足,  
你没有财物,再失不过命一条。  
若不再拯救自己于死亡之间,  
啊,你的境况惨淡,你的命运危险。

起来,抬起头,赶快醒来!  
砍下敌人的头,抛洒他们的血!  
若再不睁眼,细细向四周寻视,  
你将最终在悔恨中死亡。

291

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的许多诗歌都失散了,有些流传在民间,保存在人民群众的记忆中。这样的诗有100多首,已被收集整理,编入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不都哈力克·维吾尔诗集》,其中的一些诗还被选入中学和大学的教材。

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文指出,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进步诗人,出版了他的著作,召开了纪念会,还为他塑造了雕像。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的诗在国外刊布,受到人们的喜爱,引起了学术界重视和研究<sup>②</sup>。

### 4. 尼米希依提

尼米希依提(1906—1972年)是现代维吾尔文学中一位极负盛名的诗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参加了反抗当时的反动统治的斗争,写下了不少揭露旧社会黑暗、歌颂光明、向往自由的抒情诗,同时搜集整理了流传在维吾尔族民间的反对封建专制、歌颂爱情自由的长诗。如《巨大的妥协》和《智慧的光

<sup>①</sup>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第四卷,3430—34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sup>②</sup>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第四卷,347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辉》，这两本诗集后来均被国民党查禁，他曾和穆塔里甫一起在阿克苏报社工作，受到穆塔里甫的影响。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在1942年写的《伟大的祖国》一诗中写道：

伟大的祖国，我的母亲，  
山、林、花、海全在你的胸中。  
金黄的土地，富庶的高原，  
你雄伟的身姿毗连着天边。  
伟大的祖国，我的母亲，  
你的一切都在人民手中。  
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人民，  
祖国！你像睡狮猛醒。

#### 5. 鲁特夫拉·穆塔里甫

鲁特夫拉·穆塔里甫(1922—1945年)是杰出的维吾尔族革命诗人。他在1938年10月写的《中国》一诗，表达了他歌颂伟大的祖国、激励各族人民为拯救祖国英勇斗争的炽烈的爱国热情。诗中写道：

中国！  
中国！  
你就是我的故乡！  
因为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民，  
生长在你那温暖的，  
纯洁的怀抱里。  
从你那里，  
我们找到了正义，  
认识了自己，  
明白了真理。  
因此呵，  
在我们肩上，  
负有你无穷无尽的债务，  
这个债务我们一定要清偿，  
哪怕付出我们的头颅。

这一时期,对光明的渴望、寻求真理、争取自由平等成为以上这些人以及后来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文人的创作思想导向。

这一期的维吾尔文坛上还兴起了戏剧文学这一新的文学门类,涌现了大批的诗人、剧作者,产生了影响很大的著名诗人、剧作家黎·穆塔里甫,赛福鼎·艾则孜、包尔汉、尼米希依提、祖农·哈迪尔等,特别是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文学生机勃勃、繁荣兴盛。

## 二、史 学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的学术园地里还出现了一批历史著作。托克逊·托合提(1859—1942年)1928年在和田写成为《朝覲记》(Hajnamä)的游记<sup>①</sup>。库图鲁克·夏吾克1930年撰写了《喀什噶尔纪事》一书<sup>②</sup>。依达伊图拉阿訇和萨比尔阿訇在昭苏县写成了《突厥—蒙古史》<sup>③</sup>。穆罕默德·阿吉·买吾力维1947年在疏附县撰写过《中亚史》<sup>④</sup>。

翦伯赞(1898—1968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湖南省桃源县翦旗营(今翦家枫树岗村)人,1898年4月14日出生于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家庭。湖南维吾尔族是西域高昌畏兀哈勒将军的后裔<sup>⑤</sup>。翦伯赞1903年(5岁)入私塾读书,1916年在常德中学毕业。1924年夏天,他远涉重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经济专业。1926年7月回国后,翦伯赞经同学介绍,进入邓演达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加入国民党<sup>⑥</sup>。1930—1931年,翦伯赞参加了北京和广州的反蒋运动。蒋、汪合流促使他脱离国民党各派内部纷争,专心从事学术活动。1935—1937年,翦伯赞致力于历史研究。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翦伯赞被监视。中国共产党设法营救他,并将他安全地转送到重庆,此后,他除了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政论性文章外,还写了《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等许多研究历史的文章,史料翔实、文笔犀利,直指国民党政府和汉奸卖国贼。1941—1946年5月,他在重庆撰写和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和大量的历史论文和政治论文,特别是《桃花扇底看南朝》一文,对孔尚任的《桃花扇》作了历史分析,以古喻今,以剧论史,才气横溢。1947年10月,他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三卷。他的《中国史纲》一、二、三卷,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① 《天下只有一个和田——文学、艺术》(维吾尔文),第五卷,1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②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第四卷,3430—34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③ 《新疆工人时报》(维吾尔文),1999年7月21日。

④ 疏附县政协主编:《疏附县文史资料》(维吾尔文),第一卷,151—152页,1995年自印。

⑤ 陈遵望、见闻:《湖南维吾尔族》,4,10页。《翦氏族谱》,岳麓书社,1994。

⑥ 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249页,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1996。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翦伯赞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先后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等职务。他为了更好地从事史学研究,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史学体系,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sup>①</sup>。他和范文澜等人发起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翦伯赞也很重视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各族人民共同的劳动和斗争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翦伯赞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sup>②</sup>。

《伊米德史》是清末民初产生的一部史书,作者是毛拉·穆萨·赛拉米。《伊米德史》是作者于1906—1908年对他的第一部史书《安宁史》增补和改写而完成的另一部历史著作,1911年7月7日,作者亲自抄写,留存于世。其手稿现存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sup>③</sup>。1904年,《安宁史》在喀山出版后,毛拉·穆萨·赛拉米发现其内容欠缺,对有些历史事件的叙述有出入。为了补充内容、纠正不妥之处,他撰写了《伊米德史》。两部史书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伊米德史》中,原《安宁史》的题解部分被改写了,第一和第七章扩写了,补充了新的内容。第二,《安宁史》中原有的一些数字,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有所变动,有的被纠正了。第三,《安宁史》中原有部分标题和内容,以及描述的段落均作了较大改变,尤其是正文中采用的诗句、歌谣、谚语、格言得到了补充和更新。经这样修改以后,《伊米德史》的文学性得到了大大的加强<sup>④</sup>。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保存有汉译本,刊登在《新疆宗教研究资料》<sup>⑤</sup>上。

①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97页,载《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99。

② 王茜、刘国防等:《维吾尔族:历史与现状》,206页,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

③ 艾尼瓦尔·白图尔:《毛拉·穆萨·赛拉米及其“伊米德史”》,《“伊米德史”刊布者的序言》,见《伊米德史》(维吾尔文),民族出版社,1988。

④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卷),421页,民族出版社,1999。

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疆民族辞典》,24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 第五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艺术

### 一、戏 剧

**戏** 剧是维吾尔族艺术的一个新兴门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独特的地方色彩。

20世纪30年代以前，莎车、库车、伊犁、塔城等地的民间艺人每逢各种喜庆活动时，常常编演一些小型歌舞剧，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抨击、揭露、讽刺和嘲笑。虽然在表演技术上还很不成熟，但却在戏剧艺术方面迈出了大胆一步。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活动的开展，戏剧活动开始活跃起来。1934年，维文会成立，下设文工团，后来又在新疆文化协会领导下开展活动。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等地建立了俱乐部，戏剧艺术开始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汉族进步戏剧家一起培养了一批维吾尔族戏剧工作者，建立了实验话剧团，帮助维吾尔族搜集、整理和创作了一些优秀剧目，并且搬上舞台。如1939年维文会文工团的海米提·依克木写的大型音乐话剧《阿娜尔罕》、木敏写的喜剧《哈比勒·费尔洪》等，在排练和上演的过程中，都曾得到过赵丹的具体帮助和指导。1940年，在赵丹的指导下，维文会在文化俱乐部上演了大型话剧《战斗吧，祖国》，在迪化轰动一时，戏票抢购一空，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观众在俱乐部门前等票。盛世才查禁了这个戏。1940年底—1941年初，维文会剧团在迪化上演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和《货郎与小姐》。不久，迪化各民族创作的舞台剧本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黎·穆塔里甫最先创作了大型话剧《奇曼古丽》、喜剧《萨木萨克阿哥很活跃》、歌剧《战斗的姑娘》；接着是阿合迈德·孜牙依的《热碧亚与赛丁》，哈斯木江·坎比里的《被诽谤的翟乃甫》，阿不都秀库尔·亚里坤的话剧《上海之夜》和喜剧《夏尔拉唐》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这些剧目上演后，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当时迪化舞台上曾出现过一个时期的繁荣景象。

在进步人士的积极扶持下，维文会下设艺术剧团很快就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

有才干的文艺人才。在维文会和艺术剧团的指导下,以伊宁市各个学校为基础,成立了许多艺术小组,汇集了一大批当时在伊犁享有盛名的艺术工作者。

艺术剧团经常在一些比较大的果园和学校搭起舞台进行演出。最初,艺术剧团主要演出民间歌舞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小喜剧。后来创作演出了《血迹》、《孤儿们的境遇》、《幻想中的医生》和《艾买提伯克》等剧目,还演出过果戈理的《娶亲》和《酗酒的下场》等话剧。1936年,艺术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建成了民族俱乐部,为演出大型舞台剧提供了场所。年底,《血迹》、《货郎与小姐》等剧以及集体整理改编的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帕尔哈德与西琳》、《纳孜古姆》都被成功地搬上舞台。后来,还有一批妇女相继上台参加演出。1942年以后,又有一批新剧目搬上舞台,其中,除了鲁特夫拉·穆塔里甫的作品外,还有阿不都克力木·阿巴索夫等人翻译的《中国游击队的建立》、《自己的环境》等。祖农·哈迪尔的话剧《蕴倩姆》、《巴依和长工》、《耍巫术的人》、《玉素甫·艾合买提》等。这些作品有些是宣传纯洁的爱情、婚姻自由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有些则揭露了残酷的阶级压迫的实质。当时,这些作品在教育 and 唤醒人民起来同反对派进行斗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三区革命爆发后,艺术剧团的工作暂时停止,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投入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46年,三区革命政府把战前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员召集起来,重新成立了艺术剧团,不久更名为团结剧团。团结剧团曾组织慰问团前往博尔塔拉、精河、果子沟、乌苏、玛纳斯等地为三区革命军指战员慰问演出<sup>①</sup>。

1930—1940年演出的一些戏剧作品为激发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精神唱响了战歌,增强了人民群众与独裁统治、压迫和剥削斗争勇气,表现了对光明的渴望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在维吾尔戏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哈斯木江·坎比里、阿合迈德·孜牙依、黎·穆塔里甫、祖农·哈迪尔等文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祖农·哈迪尔(1911—1989年)是维吾尔现当代文学的先驱之一<sup>②</sup>,著名的小说、戏剧作家,出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书,1935年迁居伊犁,在师资培训班结业后任教师。1937年到迪化,在中学及农业专科学校就读。1940年回伊宁,在维文会伊宁剧团任文学部主任。三区革命时期曾任随军记者及《战斗》、《同盟》杂志编辑、主编等职。1954年到乌鲁木齐,在文化局任职,并在文联任专业作家。1959年当选自治区文联副主席,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1989年9月,出访哈萨克斯坦时病逝,葬于阿拉木图。作家的文学生涯始于1936年,处女作为反映民族苦难生活的三幕话剧《愚昧之苦》,继而又创作了《阿娜尔古丽》、《游击队之子》、《相逢》、《古丽尼沙》、《遭遇》、《喜事》等多部戏

① 《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编:《维吾尔族简史》,3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②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卷),457页,民族出版社,1999。

剧作品。其中,1940年创作的三幕五场话剧《蕴倩姆》曾轰动一时,在全疆各地上演数百场,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被多次重新演出。此外,他还创作了《黄金的召唤》、《精疲力竭的时候》、《慈爱的护士》、《老师的信》、《茹都帕衣》等多部短篇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小说、戏剧方面辛勤耕耘,创作了许多富有生命力和艺术价值的作品,用维吾尔、汉文出版作品集10余种。他作为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为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哈斯木江·坎比里(1910—1956年)是维吾尔族现代戏剧艺术的创始人之一<sup>①</sup>,生于新疆阿图什。早年在家乡上学,后随父到苏联居住,起初在雅尔堪特,后来在塔什干民族学院就读。1919年年初,塔什干成立“维吾尔族联盟”,对旅居苏联的维吾尔族侨民进行新文化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当时哈斯木江·坎比里恰好在那里,受到新文化及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1930—1931年间,他在中亚维吾尔人中从事文化启蒙和宣传工作,1932年回国后,投身于全疆各地掀起的反帝反封建、反对愚昧落后的斗争。1934年,伊犁成立以反帝反封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求发展、求解放为宗旨的维文会,哈斯木江当选为副会长。当地政府对这支日益壮大的队伍深感不安,于1937年逮捕了包括哈斯木江在内的伊犁维文会所有领导成员。哈斯木江最初被关在伊宁监狱,后被押解到迪化监狱,1943年获释,但继续受监视。后设法脱身,来到伊犁后,参加了地下革命组织的游击队。三区革命爆发后,积极参与革命政权的组织工作,并获得上校军衔,被任命为三区革命南征军司令。当南征军从阿克苏撤回后,在伊宁主管三区革命政府的文教卫生工作。1946年成立新疆联合政府后,出任喀什地区副专员。1947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迪化各族游行群众,在南疆成批逮捕革命青年,哈斯木江也在其中。他被监禁到1948年8月,被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邀请到迪化任维文会主席,并担任《真理报》主编<sup>②</sup>。新疆和平解放后他任莎车地区专员,1954年后任南疆行政公署副专员。1956年3月在喀什逝世。哈斯木江·坎比里的文学创作始于塔什干就读时,他以“伊纳克”(和睦之意)的笔名创作了不少诗歌和歌词。他自己谱曲、自己演唱,宣传革命思想。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戏剧方面。1932年回国后,在伊犁组织乡村剧团,创作演出反帝反封建的各种小戏剧,深受人民群众欢迎。20世纪30年代初,他创作并演出的戏剧有《残暴的乡约》、《受贿的乡约》、《巫医》、《被诽谤的翟乃甫》<sup>③</sup>;他还打破封建迷信桎梏,动员、培养妻子上台演出,开创了维吾尔族女子上台演戏的先例;1936年以后,又创作了反映人民群众为自由而斗争的《光辉的胜利》一剧,又把古典叙事诗《艾里甫与赛乃姆》搬上舞台,在社会上引

①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卷),126页,民族出版社,1999。

②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第四卷,349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③ 西利甫·胡西塔尔:《新疆历史人物志》(1),1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起强烈反响。哈斯木江·坎比里不仅为维吾尔族现代戏剧开辟了道路,而且在从事军事工作之余创作诗歌,以此为武器,与军阀盛世才、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势力、愚昧落后进行斗争,表达了对自由、民主的强烈追求和对三区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如《献给汗腾格里的喜日》、《赠给爱人》、《我不会忘记》、《祖国之恋》、《我的年轻时代》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sup>①</sup>。

## 二、音 乐

维吾尔族的音乐源远流长,是古代西域音乐的继续与发展。现代维吾尔族音乐分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两类。民间音乐除了各种地方通俗音乐外,“麦西来甫”音乐是比较突出的。

### 1. 麦西来甫

“麦西来甫”是维吾尔族群众的一种歌舞娱乐形式,参加的人数不限,可多可少,一般在节假日或傍晚休息时举行。搞麦西来甫时,人们聚在一起,说拉弹唱,跳舞娱乐,尽兴而后散。若遇喜事或迎接贵宾,则举行大型麦西来甫。参加麦西来甫的人机会均等,都可以登场跳舞或表演节目,非常热闹。麦西来甫的历史悠久,我国的一些古籍和壁画中都有记载和描绘。据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古代有冬天轮流举办宴会、男女一起唱歌跳舞、进行娱乐的风俗习惯,称为“索尔丘克”(Surquk)或“苏合迪提”。史学家认为,现在的“麦西来甫”就是从这些古老的仪式、风俗演变而来的。

新疆各地的麦西来甫都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其内容、形式、规模都有差异。喀什和伊犁地区有同行间轮流举行麦西来甫,季节性野游麦西来甫,少女少妇举行的麦西来甫,同龄人之间冬季举行的麦西来甫等。要说保持维吾尔族古老风格,就数麦盖提县的“刀郎麦西来甫”了。这种麦西来甫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有节日麦西来甫、婚娶麦西来甫、邀请麦西来甫、道歉麦西来甫、消除成见麦西来甫等。

麦西来甫的内容十分丰富,除歌舞之外,还有诗朗诵、讲笑话、讲故事、表演杂技、乐器合奏、独奏等。每次举行麦西来甫,常常通宵达旦,热闹非凡。

麦西来甫以激发人们欢乐为目的,一般是先舞后歌,如“刀郎麦西来甫”上演奏的音乐称“刀郎木卡姆”,分九个乐章,用“刀郎卡龙琴”、热瓦甫、手鼓和萨巴依(一种打击乐器)演奏,每个乐章又由序曲、“切克特曼”、“赛乃姆”、“赛勒克斯”和“斯日勒玛”等几个部分组成。歌舞开始后,先由一人高唱序曲,紧接着开始跳舞,男女舞者随着高昂热烈的舞曲变换各种舞姿。随着乐曲节奏的加快,许多人因体

<sup>①</sup>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卷),126页,民族出版社,1999。



力渐渐不支而先后退下,坚持到最后的即是“舞皇”、“舞后”,受人羡慕和称赞<sup>①</sup>。

## 2. 民间歌曲

维吾尔族的民间歌曲按传统音乐形式大致可分为3种:

第一种叫做“柯夏克”(汉译民谣或小调),是一种由上下对句或四联句组成的分节歌,也有以四句为基础,稍加扩展而构成者,在天山南北各地均有流传。歌词内容有反映历史事件的。如反对沙俄侵占伊犁、逼迫迁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也有反映维吾尔族人民在封建伯克和地主阶级统治下的苦难生活的,还有大量反映爱情生活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

第二种叫做“达斯坦”,这是一种叙事歌曲,专门演唱具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长篇史诗。歌词多是著名诗人根据民间传说而创作的,格律严谨,语言生动,深受维吾尔族人民喜爱。

第三种叫做“劳动歌”,这是一种伴随劳动而唱的歌曲,但不像劳动号子那样具有明显的劳动节奏,曲调多属散板性质,无固定节拍。

此外,还流传着很多生活习俗歌曲,如《摇篮曲》、《送嫁歌》等。在维吾尔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民间歌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遇亲友聚会,贵客临门,喜庆节日,在几件民间乐器的伴奏下,男女老幼,载歌载舞,繁音急节,鼓乐无歇,有时竟通宵达旦<sup>②</sup>。

在近代,维吾尔族也有著名民间音乐家,如塔什瓦依出生喀什城附近的色满庄一个贫苦脚夫的家中,自幼失去父母,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以父母亲留给他的一把破旧的热瓦甫为伴,弹唱游方,乞讨为生,开始了艰难困苦的音乐生涯。他专心致志地学习民间音乐,大量搜集加工。他在人民遭受劫难的时代创作的乐曲《塔什瓦依》,乐曲的主调带有悲叹和希望的火花,内容丰厚,深受人们欢迎,是维吾尔族近代杰出的原创音乐作品之一<sup>③</sup>。

① 楼望皓:《中国新疆民俗》,19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② 关也维:《维吾尔民间歌曲》,载《新疆日报》,1981年8月29日,第4版;阿·克日木·里提甫江搜集《维吾尔族民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③ 帕塔尔江·阿不都拉、艾买提,乌买尔:《塔西瓦依》,载《新疆日报》1979年1月2日,第4版;艾莱提·阿布都拉:《塔什瓦依——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家的故事》,载《新疆艺术》,1982(1),12、19页;《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编:《维吾尔族简史》,19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 3. 木卡姆

木卡姆主要指十二木卡姆,是流行于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中的乐舞大套曲,因由12套大曲组成而得名,俗称《喀什木卡姆》,被认为是最纯粹、最典型的维吾尔族乐舞传统作品<sup>①</sup>。到了20世纪,十二木卡姆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完备化。此外,木卡姆音乐被科学配器,有时作为现代戏剧的音乐,被搬上舞台。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木卡姆被系统化和完备化的过程中,纳克斯和吐尔地阿洪等木卡姆音乐大师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纳克斯(Naqhis,1843—1922年),喀什英吉沙县人,著名诗人、翻译家、音乐家、经学院穆代热斯(教授)。纳克斯是他的笔名,意思是“残缺的”,本名是萨比尔阿訇,父名是阿布都卡德尔,全名是毛拉·萨比尔·本尼·阿布都卡德尔·纳克斯。纳克斯是维吾尔古典文学后期从事文学创作的著名诗人,流传至今的作品主要有:《纳克斯诗集》(Diwani naqhis)、《祝福书》(Qhutluqnamä)、《白伊斯阿奇木伯克》(Bäyis Akimbäg)、《心之所有》(Mæwjudul qhulub)、《我说还是零》(Nöldäymän)等。纳克斯擅长音乐,在搜集和整理木卡姆曲、歌词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完整流传至今的《十二木卡姆》样本就是纳克斯的功绩<sup>②</sup>。

吐尔地阿洪(1881—1956年)是维吾尔族著名的木卡姆表演艺术家、民间音乐家<sup>③</sup>。全名吐尔地阿洪·台外库勒,原籍新疆英吉沙县,是《十二木卡姆》的当代传人。吐尔地阿洪孩提时酷爱音乐,在父亲的指导下,6岁学习演奏萨塔尔乐器,12岁学唱木卡姆,20岁掌握了全部《十二木卡姆》<sup>④</sup>。在塔里木盆地走村串巷演奏和演唱木卡姆,深受人民的爱戴,获得“吐尔地阿洪木卡姆奇”的美名。吐尔地阿洪善于演奏各种维吾尔族民间乐器,如“沙塔尔”、“弹布尔”、“都塔尔”、“卡龙”、“锵”以及“热瓦甫”。1939年全家迁居叶城,与当地民间艺人组成木卡姆演唱班子,使木卡姆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在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的大力支持下,1950年7月,1951年8月至1956年8月,新疆文教委员会从叶城请来吐尔地阿洪,整理《十二木卡姆》古典音乐,参加了《十二木卡姆》的录音、记谱、灌制唱片、正式出版等工作。1954年吐尔地阿洪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1956年9月8日在喀什病故<sup>⑤</sup>。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疆民族辞典》,23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新疆文史》(维吾尔文),2003(3);《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5(3)。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疆民族辞典》,2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④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卷)》,348页,民族出版社,1999。

⑤ 王茜、刘国防等:《维吾尔族:历史与现状》,20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

### 三、舞 蹈

维吾尔族的舞蹈是由民间舞蹈和宗教舞蹈发展而来的。民间舞蹈非常柔美、精妙,要求舞者全身各部分协调动作。它分为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男女合舞、假面舞、滑稽舞等几类。舞蹈中一般不会有扭动屁股,暴露身体部位,男女相拥相吻的动作出现。舞蹈表现的内容主要是劳动、忠诚、思念、渴望、爱情等。

作为维吾尔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舞蹈艺术,在本文叙述的这个时期有了全方位的发展。它体现在群体性娱乐舞蹈拥有了新的时间和空间,更体现在高品位的欣赏性舞蹈得到了完善和规范。

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欣赏性舞蹈,在舞蹈动作、舞蹈道具以及舞蹈音乐等方面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增强了规范性,减少了随意性。欣赏性舞蹈通常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里为特定的观众提供的,所以轰动的效果、激越的气氛不再是它追求的目标。欣赏性舞蹈所表现的主要是悠闲、轻松、风趣、传神的情调。与此同时,欣赏性舞蹈的诸多规定性动作,在观众和表演者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明显的界线,从而减少了观众参与的机会。其积极的结果是,维吾尔族舞蹈中专供欣赏的部分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这种现象,对于维吾尔族舞蹈形式的丰富和升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种欣赏性舞蹈在天山南北的很多地方被统称为“赛乃姆”,形成了《喀什赛乃姆》、《库车赛乃姆》、《伊犁赛乃姆》等固定的舞蹈种类。

新的《赛乃姆》舞蹈,虽然源自《木卡姆》的《赛乃姆》部分,但是,它在歌舞穿插等诸多方面毕竟造就了一系列全新的形式和风格,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兴盛于各地的《赛乃姆》舞蹈,在总体结构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地域差异。这种变化,正好说明了维吾尔族舞蹈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新的文化环境里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sup>①</sup>。

萨玛舞是比较典型的民间舞蹈之一。萨玛一词又译作沙麻、萨嘛、珊蛮,实际上都是“萨满”的异译,意为“巫师”。它是由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巫师跳神演变而来。维吾尔族把“巫师”称为“巴赫西”。巴赫西在驱鬼逐妖时的跳神活动其实就是舞蹈。早在16世纪时,畏兀儿人中即已形成姿态可观的“巴赫西舞”,这种舞蹈带有宗教的神秘性,不能用音乐伴奏,只能用“哦”、“嗨”等呼叫声来加强气氛。后来维吾尔人把“巴赫西舞”的动作规范化,使之更为优美,并以乐曲伴奏,配以歌曲,使其内容和形式有了很大的改观,于是形成了萨玛舞,流行于天山南北,成为举行麦西来甫时开始必跳的舞蹈<sup>②</sup>。

夏地亚那舞也是著名的民间舞蹈之一。“夏地亚那”是维吾尔语词汇,意为

<sup>①</sup>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3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sup>②</sup>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疆民族辞典》,23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欢乐”。这种舞蹈节奏明亮,舞步欢快,人数多不限,动作可以发挥。每逢喜庆节日,举行麦西来甫,必以“夏地亚那舞”使聚会达到欢乐热烈的高潮。20世纪30—40年代,夏地亚那舞经大规模的整理和修改,在大众舞台上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康巴尔汗·阿合买提(1916—1994年)是20世纪30—40年代之间在新疆维吾尔族舞坛上独领风骚的著名舞蹈家。她生于喀什疏附县阿瓦提乡,1927年,随父母迁居乌兹别克斯坦,读完小学后,考入舞蹈表演艺术家塔玛热女士任校长的芭蕾舞学校学习。康巴尔汗在校学习期间,打下了坚实的舞蹈基础。1937年,加入塔什干红旗歌舞团。1939年,前往莫斯科音乐舞蹈学院进修。她不断地探索维吾尔族舞蹈发展之路,表演的“尼木帕旦”(意为快步舞)、“乌夏克”(十二木卡姆之一)等维吾尔古典舞蹈,把舞蹈艺术和民间舞蹈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感,被人们称为“康”派舞蹈艺术,成为维吾尔族舞蹈的主要流派。1942年11月,康巴尔汗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新疆,在塔城文工团工作。同年5月,参加全疆舞蹈比赛,获一等奖。不久,调到省维文会所属的文工团工作,表现出舞蹈表演和舞蹈创作上的卓越才能。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康巴尔汗率队跳着欢快的维吾尔族舞蹈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1950年,她以新疆代表的身份赴京,参加了国庆周年庆祝活动,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此后她历任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新疆学院艺术系主任,新疆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新疆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委、副主席,新疆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常委、副主席等职务。康巴尔汗还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自治区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12月,以康巴尔汗命名的艺术基金会在自治区正式成立。1994年2月13日在乌鲁木齐病逝,享年79岁<sup>①</sup>。

康巴尔汗对维吾尔族舞蹈艺术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她舞台生涯中的艺术展现,还表现为她开创了维吾尔族舞蹈教育的新时代。维吾尔族舞蹈艺术的传承一向都是通过民间娱乐活动和拜师学艺的方式进行的,康巴尔汗是专门系统地培养舞蹈艺术人才的开拓者。

<sup>①</sup> 王茜、刘国防等:《维吾尔族:历史与现状》,210页,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科学技术

### 一、医学

民 国之初,新疆几乎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是一些外国教会为了在新疆传教,曾借医病为名开办了几所医院。例如,新教会在新疆设立医院三处,药局一所,病床 24 张。耶稣新教西人服务团,有医生 7 人(男 3 女 4),护士 2 人。耶稣教会华人服务团有医务人员 5 人,实习护士 4 人。由此可见,杨增新统治下的新疆医疗极其落后,医院、医生、医药以及医疗器械的缺乏,居全国各省之冠。连杨增新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惟此项人才(医生),实嫌缺乏。”<sup>①</sup>“新省地处边隅,通晓医理之人甚少。遇有疾病发生,挽救无术,往往坐视斯民之夭折。即间有粗通医术者,然亦寥寥无几,不敷分配,顾此失彼,尤为可虑。”因“新省瘟疫盛行,医治无方,以致人民死亡,相继约计不下千数百人”,“推原其故,实缘医术不良,死于病者十之三,死于医者十之七”<sup>②</sup>。

新疆瘟疫流行几达五六年之久。死亡率甚高,“十室九空”,“田园荒芜”。从民国元年(1912 年)起,瘟疫开始流行于南疆和阗、于阗、洛浦一带,大批人口相继死亡,直至民国九年(1920 年),这种瘟疫也未能制止。杨增新在《补过斋文牍》中记载,和阗、于阗、洛浦等县“人民因疫死者,每县多则数万人,少亦万数千人,并有全家传染死绝者”<sup>③</sup>。谢彬在《新疆游记》中也记载了这次瘟疫流行的情况:“和、于、洛三县,民国初元即有瘟疫流行。迄今(指 1917 年 7 月)未息,人民死亡达十万(据洛浦呈报,自民国二年秋迄今,疫死三万二百余人),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地价减半,购者尤难觅其人。”“其疫惨厉,视昔年云贵之殇子疮,东三省之鼠疫,有过之无不及。”<sup>④</sup>因当时缺医缺药,瘟疫蔓延到喀什、伊犁、迪化等地。对于这样严重的

① 杨增新:《呈报选派医生分赴南疆医病并拟在省城组设医学研究所文》,见《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② 杨增新:《呈为新疆设立医学传习所文》,载《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③ 杨增新:《呈为新疆设立医学传习所文》,载《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④ 谢彬:《新疆游记》,239 页。

疫情,杨增新事先既未采取防治措施,事后也不予以隔离,任其流行,坐视蔓延。当于阗县知事赈济灾民时,杨增新自己不管,也不准别人管,并为此大发雷霆,训斥知事“遣散流民,博施济众”,“殊属谬妄”。他宣称:“天灾流行,疫病亦属常事,应由地方人民自行集资建醮,以迓天和,何得开支公款?”对于知事给民众发放寒衣,更是恼火,因而痛斥知事“开支公款”,“见好于人”。瘟疫的流行,不但直接威胁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也使喀什英俄领事馆人员甚感恐慌。他们一方面屡次向喀什道尹“询以救济之法”;另一方面,通过他们驻京使馆,将瘟疫流行情况反映到北京政府外交部。为此,外交部不得不电请杨增新“从速设法消灭,以免蔓延”<sup>①</sup>。

在外交部的干预下,杨增新于民国六年(1917年)6月18日,开始采取防治措施。一方面给和阗、于阗、洛浦三县各派一名官医(月薪银80两);另一方面,呈报北京政府准许他在迪化设立医学研究所(后称新疆医学传习所),借以培养中医。但设立医学研究所的方案,延至民国七年(1918年)12月才开始付诸实施。当时,杨增新令其在迪化的中医中招考粗通文理、稍知医学的40人,选聘深通医理的教员分门授课,三年结业。学生入研究所后,“先从时疫入手,渐次推及于各科”,以求“切于时用”。学生的待遇,除“酌给津贴银两”外,“由公家筹备笔墨纸张茶炭等费”。其经费从“坎井、洋磨等项红利项下开支”,共拨银12217.8两(折银元17893.632元)。学生结业后,“发给文凭”,“挟术行医,自谋衣食”。“既有养身之资,又可为济世之用”,“不致成为游民”。

杨增新设立医学研究所,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是外界的干预,他连这样的研究所也是不肯设立的。对于举办医科专门学校,杨增新公开表示反对。他称:“若照部章设立医学专门学校,则规模宏大,功课繁多。新省地处边荒,不惟无此专科教员,亦难筹此巨大经费,殊非救急之法。”在没有经费、没有师资、没有教材、没有校舍的借口下,不肯在新疆举办为人民造福的医科专门学校<sup>②</sup>。

这一事实说明,杨增新所谓“行政以民生为要务,卫生以防疫为亟图”,纯系一派谎言。训斥于阗知事救济灾民,指责知事在灾区发放寒衣以及不积极举办医科学校等事实,就揭穿了杨增新“以民生为要务”、“以防疫为亟图”这一方针的虚伪性<sup>③</sup>。

医学是维吾尔族科学技术中的最为重要的部分,社会对医学相当重视。从医者除了向老一辈医生学习之外,也通过学校教材系统学习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民间行医者通过把脉,诊视体征、查问饮食起居状况为病人诊断,解脱病人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欧许多国家的宗教组织先后向新疆派传

①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18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②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18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③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18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教士。这些传教士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获准开设医院,在社会上医病施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在医疗方面对新疆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建立了一些西医医院。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西医诊疗在新疆还未得到全面普及,究其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新疆的社会经济落后和技术力量不足。但是,维吾尔民族医疗仍保留着自己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维吾尔族民众的医疗需求,保障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据研究,维吾尔民族医学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技术,在皮肤病、血管疾病、肿瘤等的诊疗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好的疗效。著名民族医学家玉素甫阿吉·喀什噶里(1876—1961年)、阿布里米提·玉素甫(1924—1994年)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疗技术和资料。

玉素甫阿吉·喀什噶里1876年生于喀什依齐乌斯塘博依区牙合西齐街一家商人家庭,从小受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就较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察合台文。1905年,玉素甫阿吉随父亲和叔父前去麦加朝觐,沿途游览了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埃及、巴基斯坦等国,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他决心学医,以实际行动帮助受苦受难的同胞。他父亲邀请吐鲁番有名的维医穆义丁阿洪前来喀什噶尔行医,收玉素甫阿吉为徒。

1910年,玉素甫阿吉学成后,在老师的帮助下在喀什噶尔乌斯塘博依独开诊所,每天病人络绎不绝。他在喀什西郊柯孜尔林开园种植草药百余种,同时他翻译、整理、校注了古维吾尔医书《塔里库依拉集》(二卷),撰写了《喀喇巴丁喀迪尔》、《行记》等著作。特别是他在晚年写了《喀农箴》医典,为维吾尔民族医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盛世才统治时期,玉素甫阿吉曾被捕入狱。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玉素甫阿吉获得自由。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他在家中创办维吾尔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批维吾尔族医生。1955年,在人民政府和喀什卫生部门的倡导下,第一所维吾尔医院——喀什维吾尔医院成立了。玉素甫阿吉刻苦研究疑难病,在多年临床生涯中,征服了许多顽症,尤其在白癜风的治疗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他贡献出自家祖传秘方,为维吾尔族医学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sup>①</sup>。

##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维吾尔族的主体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经济是维吾尔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新疆的农业发展主要依靠疆内的河水和坎儿井水灌溉。如何抵御干旱,改良农作物的品种,提高农作物的亩产量等问题总是政府官员和广大农民群众时刻都要考虑的

<sup>①</sup> 王茜、刘国防等:《维吾尔族:历史与现状》,204页,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

问题。维吾尔族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大麦、小米、水稻等。粮食和农产品在新疆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社会商品的价值通常也是由粮食来决定和进行价格上的调节的。

新疆生产的瓜果久负盛名,有土生土长的符合新疆土质、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品种。仅甜瓜(哈密瓜)一项,新疆就有多达30多个品种。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伽师的黑库克齐瓜、喀什的皮夏克西仁、哈密库克齐、鄯善的东湖甜瓜等。

葡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农业产品。新疆的葡萄有克什米西(即无核葡萄)、穆那格、克孜勒萨依、喀西克尔、沙依瓦等100多个品种。其中最为知名的要数克什米西葡萄了,它的皮很薄,从外面几乎可以看清里面的肉质,其味甜美,犹如蜂蜜一般香甜。它的糖含量一般都超过24%,营养价值相当高。克什米西葡萄被晾成干品后,它的含糖量可以高达75%—80%以上。这种葡萄品种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享誉海内外了。

核桃是新疆非常重要的农产品之一,是营养丰富的干果,而且具有比较高的药用价值。新疆核桃的品种也非常丰富,主要有凯盖孜核桃(即薄皮核桃)、海富核桃、无皮核桃、索卡核桃、齐里格核桃等品种。

棉花是新疆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新疆的棉花生产除了供应内需之外,还有一定的外贸销售。20世纪初期,官方大力实施发展棉花生产的政策。吐鲁番是新疆自然条件最优越的棉花种植区,具有悠久的植棉历史。为了扩大棉花生产,进一步发展吐鲁番地区的棉花产业,根据当时新疆巡抚的命令,在吐鲁番专门设立了一个官银号,为棉花生产提供必需的资金保障。俄国领事鲍戈亚夫连斯基在游历天山南北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官银号的工作情况。他在自己的游记中记述:银号的作用是给有此要求的植棉者发放贷款,以扩大棉花的种植,贷款可用于购买棉种、租进土地以及加工棉花。贷给每个人的款额最多不超过一千两,月利为每两三分,也就是说,年利为36%。以俄国标准来看,利息当然很高,但在中国却是普普通通的,因此,也无怨言。贷款期限是6个月到9个月<sup>①</sup>。1904年,新疆地方当局给吐鲁番拨款银十万两,用以维修当地的坎儿井,意在保证当地植棉业有足够的水源<sup>②</sup>。

为了进一步加强新疆棉花的外贸出口,广大棉农对棉花品种的改良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当时,一些维吾尔族商人借朝觐的机会,从国外引进了美国的棉花良种。维吾尔族棉花种植区域很快就接受和推广了这种新品种,甚至在喀什、英吉沙、和田、阿克苏、库车等棉花的主要种植区都掀起了抢购美国棉花新品种的高潮。在喀什,驻喀什的中俄银行接受了从国外引进棉子品种的任务,并且将一些品种免

① [俄]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134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② [俄]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135页,商务印书馆,1980。



费提供给维吾尔族棉民进行种植<sup>①</sup>。从1904年以后,吐鲁番地区先后在6个地方建起棉花轧花厂,当时就有近1000台棉子分离机。这些轧花厂中要算俄罗斯的科科文—巴索夫商行创建的轧花厂的规模最大。

随着棉花生产面积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棉花的加工工业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民国时期前后,喀什人阿訇巴尤夫(斯玛义帕合塔)几乎垄断了喀什周边六城的棉花产品与国外的棉商进行交易。后来他的子孙克然木阿吉、乌买尔巴依(1870—1937年)等人继续发展他的产业。乌买尔巴依在喀什市创建了一座轧花厂,雇佣了一名俄罗斯的技术人员指导生产。这个轧花厂有4台棉子分离机,是以水力为动力进行生产的,每台这样的机器每天能分离1.2万斤棉子<sup>②</sup>。后来,乌买尔巴依名下的棉毛厂扩大到了4座,水动力棉子分离厂增加到了2座,手工棉子分离厂180座。在这些私人合作开办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要算喀什的团结公司(1937—1943年)在喀什创建的轧花厂了。这些企业对新疆的棉花生产产生了十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

坎儿井是新疆富有特色的一种水利灌溉工程,主要分布在吐鲁番、哈密、奇台、库车、喀什等地。由于人们对地下水的开发和水利工程的建设,大部分坎儿井后来逐渐废弃,现存的坎儿井主要在吐鲁番一带。民国前后的新疆政府把吐鲁番的坎儿井开凿作为重要的工程项目来进行,私人开凿坎儿井须经过地方政府的批准。据1917年的统计,吐鲁番一带有坎儿井800多条。到1944年,吐鲁番地区未废弃的坎儿井仍有379条,其中能够灌溉800—1000亩土地的大型坎儿井占10%,能灌溉200—500亩地的中型坎儿井占70%,能灌溉75—100亩土地的小型坎儿井占20%。当时,吐鲁番一带的总耕地面积有335734亩,其中靠坎儿井井水灌溉的土地就有170632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0%以上。1944年,新和县有未干枯的坎儿井156条,鄯善县有坎儿井478条。从这个时期以后的数据资料来看,新疆各地的坎儿井总数超过了1500条,总长度超过了5000公里。有人认为新疆的坎儿井与长城、大运河一并堪称我国的三大奇迹工程。

### 三、建筑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的建筑业主要表现在住宅、宗教学校、经学院、医院、影剧院、商店、银行、清真寺、麻扎等的建筑方面。砌墙一般用石块、土坯、土、沙子、石膏、麦草、芦苇、畜毛、鸡蛋、冰糖等材料,房顶多用木板、苇席、芦苇、禾秸等材料,房门、窗户、天窗等处主要采用木料和金属等材料。

① [俄]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136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② [俄]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142页,商务印书馆,1980。

维吾尔族的私人住宅多为平房,也有两层或三层的楼房,其中比较能够体现维吾尔族建筑工艺和风格特点的有20世纪初期建造的喀什市乌买尔巴依的私家宅院,1907年修造的喀什市尤喀克喀孜热克村的阿布都拉图玛克的宅院(现在保存还较为完整)。民国时期由喀什人祖农·喀什噶里设计修建的且末县附近的尼牙孜伯克宅院、皮山县卡拉塔格孜农场阿瓦提村的吐尔地阿吉私家宅院,建于1934—1935年间的喀什市上喀孜热克村的阿布都哈德尔阿吉的宅院等。这些宅院中,除了阿布都哈德尔阿吉的宅院是俄罗斯风格的,其余的建筑都体现了十分浓重的维吾尔民族建筑特色与地方风格。

各类学校的建筑中,有喀什市别什克然木和阿图什等地的学校校舍(1934—1935年),伊宁市的“海热叶提学校”(1934—1935),新疆大学的红楼(1935年)、伊宁市的部分学校的教学楼等。这些建筑大都是维吾尔族地方建筑风格与俄罗斯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产物。

1935年,伊宁市区地图绘制完成。当年建成了伊宁市属中学的教学楼、飞机场、苏联新月医院的大楼、阔克桥等。1937年还建造了伊宁市面粉厂和电厂。

1930年以后,迪化也建造了许多新建筑,例如:1933年建造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1936—1939年间建造的迪化面粉厂,1936年建造的新疆公安处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维吾尔族建筑工艺与汉族、欧洲建筑工艺完美结合的产物。

这一时期,各地对重要的清真寺、麻扎也进行了一次重建和维修,其中喀什一带的清真寺、麻扎的建造和维修规模比较突出,因为1902年喀什一带发生了一次较大地震,许多古旧建筑在这次地震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帕霍加陵墓、艾孜热提毛拉大麻扎、苏图克·布格拉汗麻扎都得到了维修。1934—1936年间,喀什市对清真寺、经学院、各类学校又作了一次大规模维修和重建。

1933年,在维文会的大力倡导下,在各地掀起了一股建设教育机构、修建学校和教职人员住宅的热潮,在社会上很快促发了全面的建筑革新之风。在此之前,因加强与俄罗斯通商而受欧洲建筑风格影响曾有过一次建筑革新,这次建筑革新是继那次建筑革新之后的又一次建筑革新高潮。经过这两次外来建筑艺术的影响,维吾尔民族建筑艺术吸收了外来的建筑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玻璃门窗在公用建筑和私人宅院建筑中全面普及,室内地面上开始铺设地板,一些学校的教室中有了壁炉等。

## 第七节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的工商业

20

世纪以来,维吾尔族历史上造就的商业特长得到了重新活跃的机会,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相对稳定和国外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直至19世纪后期,新疆的主要产品基本上都是手工产品。这种手工制品除了能够满足内需外,还有一定量的剩余。地方产品中的大部分都用当地特有的传统方式加工制作,有些地方产品的生产只是为了进行实物交换。商人在各地收购剩余产品运往国外出售,主要出口方向是俄罗斯和东欧一带。同时他们又从国外购买工业产品运回新疆出售,丰富了新疆的市场。还有些商人将新疆的特产和原料运往内地省区出售,从那里采购新疆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这种商业活动最初都是在私人之间进行的,后来由于商业贸易的需要,商人和私营业主组建了联营组织和商会,在商会的领导下开展有组织的商业贸易活动。1893年,伊宁成立了最早的商业合作组织——伊犁商业联盟。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在奇台、莎车、伊宁等地又相继成立了许多商会。1915年,新疆商贸总会成立,有56个常务理事和2331名会员。1916年,会员人数达到2461人。

从1935年开始,北疆地区的阿勒泰、塔城、伊犁,东疆地区的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南疆一带的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莎车、叶城、皮山、墨玉、洛浦、和田等地县都与苏联建立了工商贸方面的紧密联系,这些县市、地区相继成立了不同规模的公司,少的有三五个,多的有十二三个。仅在喀什一地,就建立了团结公司、解放公司、奋发公司、希望公司、青年公司等10余个合作性的公司。这些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为新疆各族人民及政府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例如:团结公司设计建造了喀什市的亚瓦格桥、叶城的依特木里克桥等。1940年初,伊宁市的知名商人台来提为抗日救亡捐款3000万两国币(当时2000两国币相当于一个法郎),捐资15万两国币用于建筑伊犁一带的公路。据《大公报》记者报道,他捐资修建的这条公路成为当时新疆唯一的一条柏油路。除此之外,各地县的商贸公司都曾为当地政府和民众做过许多善事。

从19世纪末开始,新疆陆续修建了一些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列举如下:

1897年在迪化创建的新疆机械制造厂,1925年建成。

- 1900 年间组建的塔城金矿公司,1907 年建成。
- 1907 年创建独山子石油公司,1908 年建成投产。
- 1907 年创建迪化机械局。
- 1909 年玉山巴依创建伊犁皮革厂,1926 年扩建。
- 1914 年塔西阿洪等创建莎车火柴厂。
- 1922 年工商厅创建迪化皮革厂。
- 1926—1928 年组建迪化福民纺织公司。
- 1936 年创建迪化电厂,迪化印刷厂。
- 1936 年伊犁工商股份公司创建伊犁面粉厂。
- 1944 年省建设厅创建天山化工厂。

以上这些工厂企业的创建,使新疆有了工业产品,出现了第一批工人和技术人员。

这一时期,由于采矿业得到了发展,黄金、铜、铁、石油、铝等产品除基本满足新疆本地的需求外,还有一部分矿产品远销外地。

鲍戈亚夫连斯基是当时俄罗斯驻我国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地区的领事。根据他提供的有关喀什、伊犁、迪化等地与俄罗斯的贸易统计数字显示,活畜与畜产品贸易具有相当的规模。1902 年从喀什出口俄罗斯的商品有 11 种,其中畜产品(羊毛、肠衣、皮革等)就占了 6 种;1904 年从伊犁出口俄罗斯的商品有 44 种,其中畜产品就占了 34 种;1903 年从迪化出口俄罗斯的商品种类有 32 种。就商品总金额来说,1902 年由喀什出口俄罗斯商品的总值为 2924261 卢布,1903 年由迪化出口俄罗斯的商品总值为 1820300 卢布,1904 年由伊犁出口俄罗斯的商品总金额为 1763314.12 卢布<sup>①</sup>。

据有关资料分析,当时喀什和伊犁对俄罗斯的商业贸易表现得非常积极,达到了进出平衡的状态。例如:1902 年,俄罗斯输入喀什的商品价值总额为 899680 卢布,而喀什出口额达到了 2294261 卢布,超过俄罗斯 1240581 卢布。1904 年,俄罗斯输入伊犁的商品总额为 1703314 卢布,超出伊犁出口额 945 223 卢布<sup>②</sup>。

1905 年,俄罗斯输入新疆的商品总额为 2367089 两白银,同期,新疆出口俄罗斯的商品总额为 1893684 两白银,贸易差为 473405 两。1906 年,俄罗斯输入新疆的商品总额为 3581438 两白银,同期新疆出口俄罗斯的商品总额为 2881066 两白银,贸易差为 752720 两。两年共差为 1177125 两<sup>③</sup>。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新疆与俄罗斯方面所进行的贸易基本达到了进出平衡。

①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400 页。

② [俄]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

③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一册,7 页。

玉山巴依(1844—1926年)是20世纪初新疆民族工业的巨子,他所创办的伊犁玉山巴依皮革厂,在维吾尔族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sup>①</sup>。

玉山巴依家族世居新疆阿图什的依克萨克村<sup>②</sup>。其先祖以种田为主,兼营牧业。曾祖父吐尔迪精于管理,改变经营重点,兼营商业,商业收入竟超出农牧业收入。祖父阿不都·热苏里受过良好教育,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19世纪50年代其经营范围已扩展到新疆各地乃至国外,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户。其父木沙因家财万贯,人称木沙巴依,因曾去朝觐,又称木沙阿吉;俄罗斯人称他木沙巴也夫<sup>③</sup>。木沙有六子一女。长子玉山巴依、次子巴吾东先在喀什一带经营土布,后又转往玛纳斯、伊犁等地做活畜、皮毛生意,1895年在宁远(今伊宁市)开设福盛行。木沙等玉山巴依和巴吾东兄弟有了一段闯荡商海的经历后,便把他们送到欧洲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他送给儿子一句话:“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1896年,他指导另外几个儿子在宁远开办皮革作坊,雇工数十名,土法制革。这是其家族发迹史上首次涉足工业生产。

玉山巴依又被译作玉赛音巴依、胡沙引巴依、一山八爷等。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又有泛舟商海积累起的经验,因此木沙逐渐把经营管理权移交给他,放手由他去干。玉山巴依也想借此机会一展才华。他看到欧洲工厂林立,国家富强,而中国则缺少工业,国力日衰,有一种紧迫感与危机感。虽然新疆富有皮毛资源,但只能输出廉价原料,让人家加工后再倾销回来。他觉得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新疆应该建立起自己的近代工业,应该设法挽回失去的权利,于是他立志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建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

玉山巴依向清政府提出开设工厂的申请,当时正值清政府提倡兴办洋务之时,他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伊犁制革有限公司成立,总投资25万两白银,官私各出其半。派巴吾东去德国购买制革技术和设备(包括一套制革机、120马力锅炉和75马力发电机等),用火车从德国运到俄国的鄂木斯克,然后经由额尔齐斯河运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在那里将机器拆开,用牛车运抵宁远。德国技师格别尔林、斯拉布、马柯思等人来新疆负责安装机器,培养技工与指导生产。工厂厂址选在宁远的高桥子地方,主厂房、锅炉房、烟囱等重要设施雇用俄国工匠修建,重要建筑材料也从俄国购进。1909年(宣统元年)制革厂建成投产。

工厂最初招收职工250人,产品有熟皮、皮革、皮鞋、马鞍、皮带、肥皂、蜡烛等。这些产品除畅销新疆本地外,皮革产品还外销俄国。俄国商人在新疆经商享有暂

①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第三卷,268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疆民族辞典》,24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③ 西利甫·胡西塔尔:《穆萨巴尤及其商业企业》(维吾尔文),见伊布拉音选编《侯赛尼亚精神与塔克拉玛干的苏醒》,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不纳税的特权,这就影响了皮革厂与之竞争。1910年(宣统二年)4月,新疆当局呈请清政府批准,皮革厂除收买生皮照章完税外,所制熟皮不再征税。

民国初年,新疆都督杨增新抽出官股,由玉山巴依出资购买,皮革厂成了独资民营企业,由玉山巴依担任厂长,巴吾东做他的副手。1919年前后,皮革厂有雇工100余人,年产大皮一万多张,生产规模较建厂初期有所缩小。为整顿企业,玉山巴依从苏联聘请技师,深入挖掘生产潜力,扩大生产经营规模。1925年,企业活力增强,工厂雇工达到500人,生产品种增加,产量大幅度提高。1926年,玉山巴依去世,工厂由其长子沙比提管理,其后又由其后代米吉提·塔来提等人经营。1955年皮革厂实行公私合营,工厂主要由公方代表赵景华负责,米吉提等人参与管理。

玉山巴依作为新疆首家民族工业的创办者,对新疆历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在新疆建立首家近代化工厂,进行大机器生产,这对新疆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玉山巴依思想开放,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注重引进培养技术人才。大机器生产的皮革厂需要高素质的企业员工,如皮革制造和机修技师、会计、统计、熟练工人等。这些人才不能全都从国外引进,他就派米吉提·塔来提和阿不都克里木到苏联、土耳其等国学习制革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回国后在新疆开办夜校和职业学校,自己培养所需各方面人才。玉山巴依还直接聘用外国技师传授技术,比如他设法让德国技师格尔别林留在工厂充当教习,从俄国喀山聘请四位女教师,在伊犁开办学习班,教授女工学习缝纫、纺织、绣花等技术。由于玉山巴依善于学习国外制革行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座工厂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达到了新疆一流。最后,玉山巴依改良了新疆的畜牧品种。玉山巴依为提高皮革生产质量,从改良畜种抓起。他从国外引进良种羊、马、牛,以改良新疆的牧畜品种。到1952年时,他们饲养的良种羊达到一万只,良种马两千多匹,良种牛五千头,这为以后新疆畜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sup>①</sup>。

<sup>①</sup>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第三卷,268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 参考文献

1. 《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2. 《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3. 《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4. 《周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
5. 《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
6. 《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7. 《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8. 《唐会要》，中华书局重印，1955。
9. 《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10. 《辽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11.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
12. 《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13. 《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14.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5. 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
16.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印行。
17.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历史资料简编》，民族出版社，1981。
18.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19.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
20.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
21.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22. 伊赛木图拉·尼木图拉:《乐师传》(维吾尔文),民族出版社,1984。
23.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
24.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25. 马大正:《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26. 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27.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28. 谷苞:《民族研究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29.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30.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31.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
32.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33. 王治来:《中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4.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出版社,1987。
35.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36. 周绍祖等编:《西域文化名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37. 《新疆简史》编写组编:《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38. 郎樱:《〈福乐智慧〉与东方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39.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40.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41. 高国藩:《敦煌民俗文化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
42. 邢莉:《游牧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43. 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维吾尔哲学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44. 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中亚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45. 买买提依明·沙比尔:《维吾尔手工艺艺术》,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2。
46. 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47.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著:《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48. 《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编:《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4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新疆文化史料》(内部资料),第一辑,1990。
50. 努尔买买提·扎满:《维吾尔现代文学史》(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51. 安瓦尔·巴依图尔:《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中央民族出版社,1991。
52.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53.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54. 阿里木江·买合苏提、阿不都秀库尔·买合苏提:《维吾尔族建筑史》(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56. 阿迪里·穆罕默德·土兰:《喀什噶尔的遗址》(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57. 伊明·吐尔逊:《塔里木一瞥》(维吾尔文),民族出版社,1990。
58. 伊明·吐尔逊:《古代维吾尔文化》(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59. 纪大椿主编:《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60. 王茜、刘国防等:《维吾尔族:历史与现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
61. 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62. 刘勋:《新疆的2000年》(维吾尔文),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63. 陈遵望、见闻:《湖南维吾尔族》,岳麓书社,1994。
64. 刘宾、张宏超主编:《维吾尔古典文学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65. 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主编:《维吾尔文学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66. 阿扎提·苏里坦、张明、努尔买买提·扎满:《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67. 哈吉·努尔哈吉、陈国光:《新疆伊斯兰教史》(维吾尔文),民族出版社,1994。
68. 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麻扎》(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69. 穆罕默德·玉苏甫:《新疆历史上的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70. 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1996。
71. 西利浦·胡西塔尔:《新疆历史人物志》(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72. 楼望皓:《中国新疆民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73. 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2。
74.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卷)》,民族出版社,1999。
7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76. [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77. [德]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
78. [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贾应逸审校:《丝绸古道上的文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79. [德]冯·加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
80. [俄]马洛夫:《蒙古与黠戛斯地区的古突厥文文献》(俄文),莫斯科,1951。
81. [俄]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
82. [日]千岛信次:《丝绸之路的99个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
83. [俄]吉洪诺夫:《回鹘汗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84. [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等译:《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85. 莫尼克·玛雅尔:《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
86. [俄]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1980。
87. 克利亚什托尔尼:《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88. [俄]A. Г. 马列也夫:《九至十二世纪回鹘汗国》,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89. 雅诺什·哈耳马塔:《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 后 记

编写一本描述维吾尔族文化发展历程的史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付诸行动。2000年,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新疆大学科研处的热情关心和鼓励下,由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教授牵头申报的题为《维吾尔族文化史研究》的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被批准立项。

在有关部门的强有力的支持下,我们立即组成了由项目负责人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教授担任组长,以马德元、胡毅、热扎克·买提尼亚孜、海热提江·乌斯曼等四位教授和艾尼瓦尔·赛买提、优努斯江·艾力两位副教授为成员的课题组,利用教学工作之余有限的时间开展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维吾尔族文化简史》的初稿。

课题组成员的具体分工是:前言及第四、八章由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教授执笔;绪论和第三章由胡毅教授执笔;第一、二、五章由马德元教授执笔;第六章由热扎克·买提尼亚孜教授执笔;第七章由艾尼瓦尔·赛买提副教授执笔;第九章由优努斯江·艾力副教授执笔;第十章由海热提江·乌斯曼教授执笔。课题组长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对全文进行初步审订。

2004年3月4日,自治区社科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会对《维吾尔族文化简史》的初稿进行了评议,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会后,课题组指定马德元教授根据评审专家和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修改统稿,加工润色,历经数年,圆满完成了《维吾尔族文化简史》一书的定稿工作。

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这本《维吾尔族文化简史》是课题组全体成员心血的结晶,是精诚合作的收获。在此我们首先要感谢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新疆大学科研处的领导和全体工

作人员,没有他们对我们这项事业的呵护、关爱和支持,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绩;我们还要感谢在百忙中抽时间辛勤审阅书稿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各位专家,没有他们的指引和斧正,我们的这个成果肯定会黯然失色。

维吾尔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维吾尔族文化史的研究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我们为此做出了努力,搭建了初步的框架,对史料进行了粗疏的梳理,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遗漏和谬误肯定不少。为使本书臻于完善,我们期待着各位专家学者和同行们宝贵的批评意见。

维吾尔族文化史课题组

2010年11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吾尔族文化简史/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满,马德元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6  
(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丛书)  
ISBN 978-7-228-13351-2

I. ①维… II. ①阿… ②马… III. ①维吾尔族—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西北地区 IV. ①K2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898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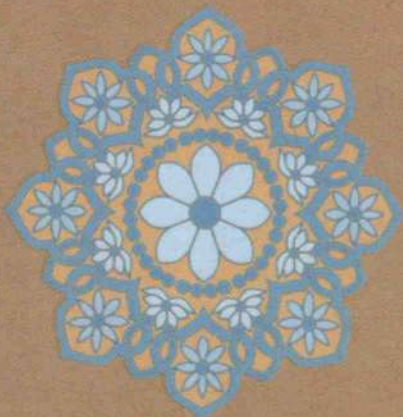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钟 鸣  
特邀编辑:塔伊尔江·穆罕默德  
美术编辑:王 洋  
责任校对:晁 清

---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乌鲁木齐隆益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定 价 56.00元

---

维吾尔族



文化简史

ISBN 978-7-228-13351-2



9 787228 133512 >

定价:56.00 元